

南懷瑾總序・王小強著

# 「文明衝突」 的背後

——解讀伊斯蘭  
原教旨主義復興

- ◇ 歷史的終結
- ◇ 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 ◇ 少數人提前超級現代化
- ◇ 「鐵拳鎮壓」，逼上梁山
- ◇ 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
- ◇ 恐怖主義全球化
- ◇ 戰爭私有化
- ◇ 為什麼人的大是大非
- ◇ 重新設計烏瑪
- ◇ 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

大風出版社



9.11 那會兒，恐怖襲擊好像還是突發事件，讓人心驚肉跳。三年時間過去，經過大張旗鼓的全球反恐戰爭，打開電視看新聞，爆炸、槍擊、炸飛機、殺人質，天天不斷，一天數起，就像一日三餐，成為當今人類日常生活形影不離的家常便飯。明擺在眼前的現實是，不要命的恐怖份子越殺越抓越多，自殺式的恐怖襲擊越打越烈越狠。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售價 HK\$58.00

ISBN 988 98078 11 5



桑尼研究系列

# 「文明衝突」的背後

——解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

南懷瑾總序・王小強著

大風出版社



書 名：「文明衝突」的背後  
——解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

系 列：桑尼研究

作 者：王小強

出版發行：大風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置富道11號3樓A座

電 話：(852) 2550 8911

傳 真：(852) 2550 8711

網 址：<http://www.strongwind.com.hk>

電 郵：[info@strongwind.com.hk](mailto:info@strongwind.com.hk)

出版日期：二零零四年十一月

國際書號：988-98078-1-5

©大風出版社 2004

Strong Wind Press 200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Strong Wind Press

Flat A, 3/F, 11 Chi Fu Road, Pokfulam, Hong Kong

Tel : (852) 2550 8911

Fax: (852) 2550 8711

## 作者簡介

王小強，經濟學家。1996年獲英國劍橋大學政治與經濟系博士學位。

曾任職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副組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常務副所長、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研究員、粵海（企業）集團顧問。現任中信集團肖特吉公司顧問，Associate Senior Research Fellow, Judg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研究員。

著有《摸著石頭過河：中國改革之路》、《產業重組時不我待》。合著有《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1986年獲孫冶方經濟學獎）、《富饒的貧困》（1987年獲香港電臺推薦“十本好書”）、《香港聯繫匯率保衛戰》、《三網合一》、《再造中國》、《西部大開發方略》、《西部大開發考察實錄》。

# 總序

自從二次大戰以來，世界上發生了太多的變化，國際間交往更趨頻繁，相互競爭牽制。先是猶太人戰後在中東地區建立以色列國，後來發展成嚴重的中東問題。二戰後，非洲的殖民地國家，都脫離了白人的統治，宣告獨立自由了；祇不過，自由卻帶給他們貧窮疾病，和更多的問題。

歐洲在二戰時受創極重，經濟上困難尤甚，有遠見者不久即開始研究整合歐洲及歐元的發行。由於美國參加作戰，美國富有、美國出頭了，語言文化也隨之而來。好萊塢的電影、美式牛仔褲及速食，逐漸風行全球。傳統以法文為國際契約的習慣，也漸漸用美式英語取代了。

亞洲受美國的影響更大，佔領日本，改造日本，韓戰越戰，美國試圖掌控全世界。

戰後科學的進步和新發明，如電視電腦的普遍化、民用航空的發展進步，使地球上的國家都成為緊鄰。醫藥的大幅改進，人口的增長，使競爭更加激烈。加上人類登陸月球的壯舉，核子武器的發明，造成國際間的互動更為複雜。

不論世界如何發展和變化，關係人們存在和生活的，基本上仍然是文化經濟問題。

中國在閉關二十多年後，終於開門面對世界。中國的發展改變了與其他各國的關係，國際的平衡也產生更多的變數。在

自我奮鬥和發展的過程中，中國遭逢的問題，較之其他國家更加複雜。它目睹了蘇聯共產制度解體，面對自身文化的何去何從，以及經濟制度的方向等等嚴重問題。

在各種嚴苛的挑戰下，中華民族，像以往一樣，總有許多知識分子，懷抱為祖國打拚的熱情，運用智慧，研究問題，提出分析見解，扮演著智庫的角色。

在這些知識分子之中，有一個名叫王小強的學者，多年來投身研究工作，發掘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在一九九三年春季，老友許鳴真先生自北京來香港相敘，同來攜有王小強君，許老特意介紹，慎重託付，望予照顧指引云云。

我見小強，挺拔強項，大有不合流俗的器識，儼然一士諤諤的風格。但世俗中豈可或少這樣一類特立獨行的人物，當下便欣然接納。

小強從一九七九年開始，投身中國改革的調查研究。一九八九年赴美，先後就讀於克羅拉多州立大學經濟研究所，以及匹茲堡大學公共管理及國際事務碩士研究班；以後再赴英國，在劍橋大學得到政治與經濟系博士學位。

小強對經濟問題有深入的研究。經濟問題因各國文化背景不同，時代不同，實行起來各自有別。人們都知道美國自稱為民主國家，但是，早有學者及有識之士指出，民主是一種救時的方劑，正如莊子所謂：“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可以一宿，不可以久處也。”一個國家的社會體制，祇能適用於自己本國，輸出到別國就會水土不服而變調。經濟政策也是如此，各國祇能

依照自身的特點，調整適合自己的經濟政策。

小強後在香港的大學和機構繼續研究工作，並成立桑尼研究公司。他全力以赴，孜孜不倦，他的文章和著作，發表於中外許多雜誌和文獻中，現在經過整理彙集，陸續印行出版。在出版的一系列書籍中，有《再造一個香港》、《“文明衝突”的背後》、《摸著石頭過河》；還有其他人物不同角度的探索。

小強的文章言論每有意氣。其實，一個有抱負的青年，有感而發，大多有這份的習氣。這正如宋儒辛稼軒所說的：“昔越王見怒蛙而式之，曰：是猶有氣。蓋人而有氣，然後可論天下事。”以此觀之，亦可為之展頤了。

近年來，小強留港時間較久，對香港各方面都加深了認識，希望香港能更加進步，生活美好。尤為難能可貴者，王君自從由歐美歸來，除政治經濟問題外，也著力於中華歷史文化方面的研討。融合東西文化，視野廣闊了，他鍥而不捨地努力，提出所知所見，目的無他，企能引起更多學術討論，共同為國家社會的進步貢獻心力。

小強嘗謂，學術非為一己之私，各家見解雖有不同，但經過論辯，必能激蕩出完美的政策方向。

古人云：“道並行而不悖”，見仁見智，互擅勝籌，匯合各方主觀，相互容納，即為集思廣益。今值桑尼系列書籍出版之際，特為之序，有鼓勵也有鞭策，並致祝賀之忱。

南懷瑾 於香港  
二〇〇四年八月



# 序言

好友小強讓我為他的新書《“文明衝突”的背後》寫個序，對我來說是很困難的任務。作為一個編輯，我自己很少寫什麼文章，總喜歡對別人的東西評頭論足，有時過於挑剔，可能還得罪過人。既然是當了二十多年的編輯，看的文章多了，就在心裡面留下了對這些作者的劃分，大概分量最重的，就是我所評判的標準：“用功”還是“不用功”。小強的“用功”是我最佩服和最應該學習的。且不說 20 世紀 80 年代，至 90 年代以來，他所研究的領域總追蹤時代，以時不我待的精神去用功地探索。《“文明衝突”的背後》同樣是有感而發，不停留於發感慨的空談，而是用功地搜尋緣由和發展，探索真諦。從去年他開始著手研究，初稿、修改稿，發給我看，許多我所關注的問題，可以在文章中找到回答，我追隨著這“解讀”，以彌補自己對當今世界這麼大問題的認識上的不足。

三年前的 9.11，當飛機撞上紐約的世貿大廈，也撞擊了我們的思想和靈魂，記得在那些日子裡，我曾經和一些朋友討論，我認為，美國一定會好好想一想，調整它的外交政策。朋友反對我的說法，告訴我，正好相反。事實當然是朋友對，我錯。當我看到西方世界那些我所一直喜歡的作家、演員、教授站在反戰的一邊，我懷著希望，人類追求文明的力量，追求世界各民族、文化和宗教都是平等的力量，可以遏止壓迫和強

權，當然，還是我錯。

為什麼這些並非無知莽夫的伊斯蘭青年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消滅另一生命？是什麼使標榜捍衛人權、民主和自由的人從不願意想一想別的民族의 境遇，他們真正在想什麼，他們有權利選擇什麼！什麼原因在冷戰結束以後，這個世界不但沒有走向一個更好的世界，反而充滿了戰火和不人道？小強說，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從已有的公平出發，搞經濟改革，追求效率；資本主義陣營從已有的效率出發，搞社會改良，注重公平。兩大陣營的對抗和競爭，付出巨大代價，畢竟從不同的方向，推動人類整體的社會進步。”力量平衡的打破，結果就是帝國霸權的持強凌弱，所有的文明與進步力量都在明火執仗的強權下顯得那麼憤怒的無奈。我不喜歡這樣的世界，我感到深深的哀傷。

本來，追求社會正義，追求人的尊嚴，追求自由與平等是最基本的普世價值的底線，在今天，卻可不一定是唯一的“政治正確”。當年一起戰鬥的改革戰友，因為仇恨共產黨，所以認定美國可以而且應該充當世界警察去“人權高於主權”！為了“改革”的目標——建立私有產權，所以，俄羅斯的私有化絕不會比國有制更不公平，即便是黑手黨也能最終建立秩序！本來，崇尚自由與平等就得剷除強權——無論是獨裁政府還是帝國霸權，怎麼就變成了如此的雙重標準？普世價值已經在今天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扭曲了。有的人變得利欲熏心，有的人變得麻木不仁，“理想主義”成了珍稀品。

小強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這些天，“也有人熱淚涔涔，憂心

忡忡，卻不是由於個人的不幸”這句子，總盤旋在我腦中，揮之不去，放到他的身上再恰當不過了。

很久很久以前，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還是孩子，能夠得到的書是那麼少，卻把裡面讀到的警世名言都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成為激勵自己度過跌宕起伏青少年時期的精神食糧。當時有一批蘇聯小說，《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麼》和《落角》等，記得最清楚的就有這麼幾句：“也有人熱淚涔涔，憂心忡忡，卻不是由於個人的不幸”，和“好人永遠激動”，可惜我已經找不回當年我的記滿箴言的本子，是其中哪本書中的句子也分辨不明了，不過，人就是這樣，青年時代的一兩句話，足以融於自己的血液中，成為自己一輩子所思所行的習慣。

我們在那個年齡裡，尋找問題的答案，我們在不上學的學生時代裡如饑似渴地讀一切可以獲得的書。從馬克思、列寧到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從德熱拉斯、薩特到愛倫堡；從政治到文學；從“垮掉的一代”到唐詩宋詞。那些白皮書、黃皮書和灰皮書，為我們展開了一個複雜而又新鮮的世界，打開了我們心靈的窗戶，也點燃了我們去思索的火花。三五個朋友，常常要冒著陷入囹圄之災的危險，聚集在一起，交流讀書的心得，縱論天下大事與小事，討論什麼是理想世界，討論什麼是人類追求的終極目標，也討論什麼時候，怎麼樣的情勢下才可能結束這樣的“文革”，使中國走出當時的“動亂”，使中國人民真正過上好日子。身處特殊的歷史時期，懷抱著理想，我們互相滋補著知識與思想，靠了這些養料，於是，我們長成不斷發問、不斷尋找答案的人。

我相信，正是有過那一段特殊經歷錘煉的人，當他們投身於中國經濟改革和開放的大潮之中，他們總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即使是孤立無援，即便是處於逆境，即使是屢戰屢敗，還是會屢敗屢戰、探索真理的腳步從未停下。因為心裡永遠抱持著“理想、希望、追求——這些被世界冷落而被我們熱愛的東西。”張承志這樣說。而小強正是這麼做的。

肖夢

2004年9月11日

# 目 錄

|      |             |    |
|------|-------------|----|
| 總序   | 南懷瑾         | V  |
| 序言   | 肖夢          | IX |
| 作者的話 |             | 1  |
| 第一章  | 歷史的終結       | 7  |
| 1.1  | 伊斯蘭與社會主義    | 10 |
| 1.2  | 伊斯蘭繼續革命     | 19 |
| 1.3  | 歷史終結的終結     | 22 |
| 第二章  | 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 41 |
| 2.1  | 社會主義開放改革    | 43 |
| 2.2  | 原教旨主義反思     | 46 |
| 第三章  | 少數人提前超級現代化  | 61 |
| 3.1  | 少數人暴富起來     | 63 |
| 3.2  | 產業發展少       | 65 |
| 3.3  | 嚴重兩級分化      | 70 |
| 3.4  | 廉價服務業大發展    | 71 |
| 3.5  | 階級鬥爭更激烈     | 74 |
| 3.6  |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 77 |

|                        |     |
|------------------------|-----|
| <b>第四章 “鐵拳鎮壓”，逼上梁山</b> | 93  |
| 4.1 政治兩級分化             | 95  |
| 4.2 伊斯蘭扶貧濟困            | 96  |
| 4.3 鐵拳鎮壓，逼上梁山          | 98  |
| <b>第五章 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b>   | 107 |
| 5.1 滿世界利益均沾            | 109 |
| 5.2 騙人的“和平路線圖”         | 112 |
| 5.3 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          | 117 |
| <b>第六章 恐怖主義全球化</b>     | 143 |
| 6.1 什麼是恐怖主義？           | 145 |
| 6.2 信仰危機全球化            | 148 |
| 6.3 恐怖主義全球化            | 153 |
| <b>第七章 戰爭私有化</b>       | 167 |
| 7.1 政府支持恐怖主義           | 170 |
| 7.2 玩火者必自焚             | 174 |
| 7.3 恐怖主義的社會根源          | 180 |
| <b>第八章 為什麼人的大是大非</b>   | 193 |
| 8.1 不患寡而患不均            | 196 |
| 8.2 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 200 |
| <b>第九章 重新設計烏瑪</b>      | 207 |
| 9.1 什麼文明的衝突？           | 209 |

---

|                |                               |            |
|----------------|-------------------------------|------------|
| 9.2            | 重新設計烏瑪                        | 213        |
| 9.3            | 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                     | 217        |
| 9.4            | 左右為難的困境                       | 222        |
| <b>第十章</b>     | <b>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b>              | <b>253</b> |
| 10.1           | 否定之否定                         | 255        |
| 10.2           | 宗教復興的社會啟迪                     | 261        |
| <b>附錄一</b>     | <b>亨廷頓“黃禍”加“綠禍”<br/>的世界大戰</b> | <b>267</b> |
| <b>附錄二</b>     | <b>漂亮的女司機</b>                 | <b>283</b> |
| <b>引用及參考書目</b> |                               | <b>287</b> |

# 作者的話



9.11 那會兒，恐怖襲擊好像還是突發事件，讓人抽不冷子嚇一跳。三年時間過去，經過大張旗鼓的全球反恐戰爭，打開電視看新聞，爆炸、槍擊、炸飛機、殺人質，紛至沓來，天天不斷，一天數起，目不暇接，就像一日三餐家常便飯，成為當今人類日常生活形影不離的組成部分。明擺在眼前的現實是，不要命的恐怖份子越殺越抓越多，自殺式的恐怖襲擊越打越烈越狠。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根本用不著強調，如何理解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運動，對判斷 21 世紀“世界新秩序”的可能走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幾乎所有人都公開反對“恐怖主義 = 原教旨主義 = 伊斯蘭復興運動”的簡單公式。原教旨主義是伊斯蘭復興運動的一部分，恐怖主義是原教旨主義的一小撮，這才是標準而安全的表述。但是，伊斯蘭復興運動從何而來？不明不白了。雖然外部眾說紛紜，內部派系林立，就思想邏輯而言，推動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的意識形態是原教旨主義。<sup>1</sup>反問一句，看得清楚：除了原教旨主義，還有什麼任何其他更重要的哲學基礎，在推動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

亨廷頓的概括，體現出上述外交辭令與真實內容交叉形成的語焉不詳：



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通常被視為政治的伊斯蘭教，它祇是範圍更加廣泛的伊斯蘭教觀念、實踐和辭藻的復興，以及穆斯林對伊斯蘭教再作貢獻的一個組成部分。復興運動是主流而不是極端的，是普遍的而不是孤立的。復興運動影響到了所有國家的穆斯林以及大多數穆斯林國家的社會和政治的大多數方面。……忽視 20 世紀末伊斯蘭教復興運動對東半球的政治影響，就等於忽視 16 世紀末新教改革對歐洲的政治影響。……1995 年，除伊朗外，每個穆斯林人口佔優勢的國家在文化、社會和政治上都比 15 年前更伊斯蘭化和伊斯蘭主義化。<sup>2</sup>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運動，被不少西方學者當成“黃禍”的兄弟——“綠禍”。<sup>3</sup> 1993 年，美國《外交季刊》春季號發表兩篇文章——“什麼綠禍”和“激進伊斯蘭的挑戰”，從正反兩個角度，開宗明義，正式展開討論“綠禍”、“綠色威脅”(green menace)。<sup>4</sup> 接著，該刊夏季號發表亨廷頓的著名文章——“文明的衝突？”把討論推到上綱上線的高潮。<sup>5</sup> 接著，亨廷頓的文章舒展成世界名著，書裡關於伊斯蘭與儒教文明聯合對抗西方的經典分析，給出“黃禍”加“綠禍”的災難前景。<sup>6</sup> 接著，偏執敵視、抨擊詆毀伊斯蘭的文字聲討鋪天蓋地。接著，諸多學者從不同角度著述糾正找補，文獻史料汗牛充棟。<sup>7</sup>

作者不懂得宗教，更不是研究伊斯蘭教的專家。祇是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試圖用一般常識，理解滿世界愈演愈烈的恐怖襲擊。這本書原是 2003 年寫的長文，分上下兩篇，印僅供內部參考的《香港傳真》No.2003~32、33。如今根據一年多來相關事件的發展，補充些許資料，略加修改文字，將原文為了壓

縮篇幅的部分註釋內容放入正文。

因為不是專家，又未曾有機會到中東、中亞等阿拉伯、穆斯林國家實地考察，祇好每天看電視新聞，圖書館找、朋友處借這方面的紀錄片、故事片，大部分相關知識，來自惡補文字材料。為了不致於自以為是，信口開河，行文藉用各路權威說法、引文加註釋，尋章摘句，引經據典，不厭其煩。目的是支撐常識原本可以得出的判斷，盡可能有根有據。文中單列出來的楷書，均為引文原文。引文中又插入的註釋，單獨注明出處。註釋標明的出處，對上文陸續出現的引號文字負責。

感謝楊瑩做了許多資料搜集、整理、翻譯和圖表繪製工作。

#### 註釋：

- <sup>1</sup> “必須指出的是，穆斯林反對使用‘基本教義派’這個名詞，並相當正確地指出此‘基本教義派’名詞是由美國新教徒所創造出來的，以作為榮譽的標誌，但是此名詞無法完全翻譯成阿拉伯文。如我們所瞭解的，Usul是指伊斯蘭法理學的基本原則，而且如同所有穆斯林所承認的，所有的穆斯林都可以說是認同基本教義(usuliyyah)”（凱倫·阿姆斯特壯：〈伊斯蘭〉第235頁）。
- <sup>2</sup>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11~113頁。
- <sup>3</sup> 愛德華·薩依德：《遮蔽的伊斯蘭》第61頁。
- <sup>4</sup> Leon T. Hadar：“What green peril”和Judith Miller：“The challenge of radical Islam”，*Foreign Affairs* 春季號1993，第24~56頁。
- <sup>5</sup> 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 夏季號1993，第22~49頁。
- <sup>6</sup>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66~269頁（詳見附錄一）。

#### 4 作者的話

“亨廷頓‘黃禍’加‘綠禍’的世界大戰”)。

- <sup>7</sup> 譬如，埃斯波西托的《伊斯蘭威脅》、Karim Karim 的《伊斯蘭禍》、Tariq Ali 的《原教旨主義衝突》、Bassam Tibi 的《原教旨主義挑戰》，Lawrance Davidson 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等等。

宗教裡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歎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要求拋棄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想的處境。因此對宗教的批判就是對苦難世界——宗教是它的靈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sup>8</sup>

9.11 事件以後，本·拉登、奧爾瑪、薩達姆、薩德爾，成了挑戰美帝國主義全球獨霸的急先鋒。中東和平進程中斷，阿以衝突昇級，阿富汗硝煙未散，伊拉克戰火重燃。不管如何匪夷所思，2002 年 9 月 11 日，幾個視死如歸的劫機者，單槍匹馬，打斷了冷戰結束以後，資本主義全球化肆無忌憚的歷史進程。2003 年，“反恐”成為國際政治的新主題。<sup>9</sup> 高科技武裝的美國大軍，解放了阿富汗解放伊拉克，中亞、中東都得照人權民主原則重建。<sup>10</sup> 外科手術把美國價值觀強行植入穆斯林，勢必全面引發一場亨廷頓描繪的“文明的衝突”。<sup>11</sup>

什麼是文明的衝突？1978 年卡特訪問沙特，飛機抵達利雅德國際機場，正趕上清真寺傳來禮拜鐘聲。熱烈歡迎的軍樂隊，全體放下樂器，就地蹶屁股禱告，把個超級大國總統晾在舷梯口，暴曬正晌午的毒日頭。<sup>12</sup> 文明的衝突，涉及宗教、文化之底蘊，什麼都得從開天闢地說起，深了去了。自殺式恐怖襲擊前赴後繼，表現出不可理喻的宗教狂熱，就是明證。

問題當真如此深奧難解嗎？值得一問的是，文明的衝突古已有之。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自當代就從來沒停過。為什麼偏偏在今天，美國資本主義全球化如日中天之際，忽然以一種大無畏的姿態，周旋到國際政治舞臺的中心？

**註釋：**

<sup>8</sup> 黑體加重為原文所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頁）。

<sup>9</sup> 2003年初，白宮發佈《抗擊恐怖主義國家戰略》，莊嚴宣告：“我們將保持對9.11攻擊事件的反響所產生的勢頭，同我們的外國合作夥伴和各種國際組織一道，把打擊恐怖主義保持在國際議事日程的首要位置”（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翻譯，網址：<http://suinfo.state.gov>）。

<sup>10</sup> 根據“被剝奪政治和經濟權利的人越多，極端行為、恐怖活動、跨國犯罪和非法移民就會越多”的基本邏輯，2004年，美國進一步提出“大中東”的社會改造計劃，西起摩洛哥，東至巴基斯坦，要求努力實現知識的社會、自由的社會和婦女有地位的社會。這個把政治而不是經濟放在頭等重要位置的美國計劃，引起阿拉伯人的激烈反彈（“阿拉伯人如何面對‘大中東’計劃”，《參考消息》2004年6月20日，第3頁）。

<sup>11</sup> 事實上，正是以亨廷頓為代表的美國人，在盡可能模糊和放大衝突的性質，“其基本歷程是：‘伊斯蘭復興’、‘原教旨主義’、‘聖戰’、‘文明’的衝突。”張錫模批評亨廷頓：“第一，亨廷頓的論述採取了語意曖昧的修辭策略，經常將文明、文化與宗教三詞混合使用，但對文明單位的界定及諸文明之間的界線區劃原理之闡述卻顯得極為模糊。第二，作為抽象的集合性概念，‘文明’畢竟不是國際政治的行為主體，且主體之間有衝突紀錄，並不等於今後必然會發生衝突。第三，在具體分析上，無論是伊斯蘭或是基督教，都不是鐵板一塊”（張錫模：《聖戰與文明》第17、20頁）。

<sup>12</sup> 蔡德貴：《當代伊斯蘭阿拉伯哲學研究》第14頁。

# 第一章

## 歷史的終結

- 1.1 伊斯蘭與社會主義
- 1.2 伊斯蘭繼續革命
- 1.3 歷史終結的終結





公平和效率，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永恆主題。在冷戰時期，“資本主義的恐懼迫使社會主義放寬自由，社會主義的恐懼也迫使資本主義增加平等”。<sup>13</sup> 社會主義陣營從已有的公平出發，搞經濟改革，追求效率；資本主義陣營從已有的效率出發，搞社會改良，注重公平。兩大陣營的對抗和競爭，付出巨大代價，畢竟從不同的方向，推動人類整體的社會進步。那時候，在反抗西方殖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中，伊斯蘭復興運動發揮過作用，卻不是主力，更別提國際政治的主角了。穆斯林國家陸續獨立之後，更多展開的是社會主義實踐。在埃及，是納賽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sup>14</sup> 在敘利亞和黎巴嫩，是復興社會黨的復興社會主義。<sup>15</sup> 在伊拉克，是薩達姆的統一自由社會主義。<sup>16</sup> 在利比亞，是卡扎菲的伊斯蘭社會主義。在突尼斯，是布爾吉巴的憲政社會主義。<sup>17</sup> 在蘇丹，是尼邁里的阿拉伯社會主義。<sup>18</sup> 在阿爾及利亞，先是本·貝拉的自管社會主義，後是布邁丁有阿爾及利亞特色的社會主義。<sup>19</sup> 在黑非洲的索馬里，是西亞德·巴雷的原本科學社會主義。<sup>20</sup> 在塞內加爾，是桑戈爾的民主社會主義。<sup>21</sup> 在亞洲的巴基斯坦，真納提倡、布托實行社會主義。<sup>22</sup> 在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蘇加諾也搞社會主義。<sup>23</sup> 1965 年，布邁丁靠軍事政變推翻本·貝拉，改了朝換了代，接著還搞社會主義。<sup>24</sup> 由此可見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在發展中國家的頑強生命力。<sup>25</sup> 雖然大家各有各的理解，社會主義是與西方資本主義截然區別的一面大旗。<sup>26</sup>



## 1.1 伊斯蘭與社會主義

當然，按照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的理解，這些信仰伊斯蘭教的社會主義，並不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統統不夠純粹，更談不上科學。<sup>27</sup> 雖然堅決反對剝削，卻以為有了宗教的“天課”和施捨，應當容忍、甚至鼓勵不剝削的私有制，包括個體戶、合夥制和工人入股、參與管理等等。<sup>28</sup> 然而，在土地改革和建立農村合作組織，石油和主要工業、金融、商業國有化，實行計劃經濟，勞動者以所有者身份參加管理，以及嚴格限制私人資本做大做强等大政方針上，這些穆斯林國家反對資本主義道路的實踐，真說真練，異常堅決。

譬如，埃及地少人多，納賽爾大力推動三次土改，無償沒收王室和外國人的土地，強行徵購大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的貧雇農。在土改的基礎上，廣泛建立農村合作社，實行農產品國家定價的徵購和代銷制度。<sup>29</sup> 在城市，政府頒佈“社會主義法令”，把大批工商企業收歸國有或改為公私合營，全面實行計劃經濟。<sup>30</sup> 經過 1961 年的社會主義國有化運動，“到 1962 年，埃及政府已掌握 90% 的出口貿易，95% 的工業和全部掌握銀行、保險業和進口貿易。”<sup>31</sup> 與此同時，政府陸續推行小學、中學、大學免費教育，限定城市最高收入，制定最低工資標準，降低房租，職工參與企業分紅，生活必需品價格限制和價格補貼制度。納賽爾驕傲地宣稱：

隨著革命的向前發展，在埃及解決經濟和落後的社會主義措施，並不是自由選擇的問題，而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性。這種

必然性是由現實和群眾的普遍願望、並由 20 世紀後半個世紀正在變化中的世界形勢所決定的。……以富裕和正義為支柱的社會主義是社會解放的道路。<sup>32</sup>

以埃及為榜樣，60 年代，利比亞、阿爾及利亞、蘇丹、敘利亞、伊拉克、也門、突尼斯、索馬里等穆斯林國家，相繼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在農村推動土地改革，組織農村合作社，在城市推動工商業國有化、引進計劃經濟。<sup>33</sup> 為此，1964 年，修正主義的赫魯曉夫訪問埃及，授予納賽爾“蘇聯英雄”稱號。1966 年，修正主義的蘇聯共產黨第 23 次代表大會，特邀殘酷鎮壓共產黨的埃及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sup>34</sup>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政黨的代表參加，以“同志”相稱。<sup>35</sup>

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列寧說：“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sup>36</sup> 古怪的是，篤信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國家，從哪裡麻醉出如此廣泛而堅定的社會主義慧根，如醉如痴？相比較而言，同是趨人向善的宗教，基督教重現實，佛教講究因果輪迴，後起的伊斯蘭教兩世並重，更強調用出世的精神入世。穆罕默德以摩西和耶穌的後來者自居，<sup>37</sup> 專門衝著猶太教、基督教整治不了的唯利是圖、貪婪腐敗、貧富分化和種族仇殺而來。伊斯蘭闡述的不僅是個人與上帝直接溝通的親密關係，更多關注的是按照均貧富的原則改造社會。

《古蘭經》——穆罕默德於七世紀初給阿拉伯人帶來的天啟聖經裡，就曾強調穆斯林的首要責任，就是去創造一個公義、平等的社會，讓貧者、弱者都能得到尊重。為了追求這樣的境

界，穆斯林需要在各個層面，都推動“吉哈德”（聖戰）：在精神、政治、社會、個人、軍事、經濟諸層面皆然。<sup>38</sup>

眾所周知，《古蘭經》不僅重視人的信仰，而且也重視人們在今世的生活。但基督教卻不是這樣，他們把物質與精神、今世生活與後世生活分開看待。伊斯蘭把今世作為獲取後世幸福的橋梁。……《古蘭經》認為，雖然後世是人類的最終目標，是永恆的幸福，但《古蘭經》也要求人們在今世建立美好的社會和政治。穆斯林的社會和政治責任不亞於其宗教責任。……在伊斯蘭世界，伊斯蘭一出現就致力於建立文明和社會體制。<sup>39</sup>

穆罕默德強調：“虔誠信神的人都有責任打造公平美好的社會。”<sup>40</sup> 在他看來，“清貧者是高尚的，是真主的寵兒。”“穆罕默德在麥加的地位節節提昇，最為人稱道的就是對窮人和奴隸十分關愛。”<sup>41</sup> 對勞苦大眾的道德關切，煥發追求公平正義的戰鬥精神。穆罕默德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主啊！你使我生為無產者生，死為無產者死，讓我在無產者的隊伍中再生吧！……為人民從政，不忠於職守者，與天堂無份；為官而騙人民者，與天堂無份；……真主與清官同在。<sup>42</sup>

高舉為無產者、為人民從政的道義旗幟，穆罕默德率領一夥志同道合的同志，從繁華腐敗的商業都市——麥加遷徙到落後純樸的麥地那，與游牧經商的原始部落相匹配，組織成教、政、軍、民、學渾然一體的“烏瑪”共同體，用超越血緣種族、超越階級國家、超越民族人種的平等理念相互激勵，團結奮進，迅速開拓一片新天地，又從農村包圍城市，摧枯拉朽，所向披靡。

伊斯蘭與其他“鴉片”的根本性區別在於，“在穆斯林社會中，國家與宗教社團實際上是不分的。”<sup>43</sup> “伊斯蘭教是政治的宗教或宗教的政治。”<sup>44</sup> 不僅拯救個人靈魂，而且改造整個世界——拯救靈魂是非理性宗教，改造世界是理性政治。伊斯蘭從不提倡消極的虛無和遁世，歷來主張以積極進取的姿態干預生活；不僅嚮往沒有人剝削人、壓迫人的理想社會，而且積極展開理論、制度、法律、組織全方位的社會實踐。<sup>45</sup> 所以，“就伊斯蘭教本身來講，根本不存在政治參與問題。因為在伊斯蘭學者看來，伊斯蘭就是政治，政治就是伊斯蘭，它們是合二為一的東西。”<sup>46</sup> 用當代原教旨主義宗師庫特卜的話說：伊斯蘭雖然是宗教信仰，但“它是一種可按計劃實施的，可以提供給現實的範式。”<sup>47</sup>

先知穆罕默德在伊斯蘭史上的地位並非祇是一位傳遞神旨的使者，其最偉大之處乃是在麥地那時期為穆斯林社群奠定了政教合一的體制，這種整合宗教、政治權力相互配合的制度一直都是穆斯林社群追求的理想。……對穆斯林而言，穆罕默德之所以偉大，並非祇因為他提昇了阿拉伯人的歷史地位，更是因為他為不分種族的穆斯林建立了一個今世的樂園典範。<sup>48</sup>

《古蘭經》呼籲穆斯林要信靠神，建立一個弱勢族群——即老人、孤兒和幼兒——都能享有全部人權並且被公平對待的社會。<sup>49</sup>

於是，伊斯蘭的“律法”便和源自西歐、並推廣至全球的現代法律概念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對穆斯林而言，伊斯蘭的法律是人生所有規範的總和，伊斯蘭信仰本身即規範著人類所有的

行為，而對非行的懲罰，並非僅具有現世意義，更具有來世意義。因此，在這種世界觀之下，並不存在著政教分離的問題，而穆斯林政治認同的基礎，也都必須以伊斯蘭為起點。<sup>50</sup>

西方公認的伊斯蘭教和中東史大師伯納德·路易斯指出：“常有一說，曰：伊斯蘭教因征服而傳播。這個說法是誤導的，雖然伊斯蘭教傳行天下在相當程度上，無法離開平行進行的征服行動與殖民歷程。”在奴隸制晚期，腐朽的拜占庭與同樣腐朽的波斯在中東地區爭霸拉鋸，軍隊燒殺搶掠，帝國橫徵暴斂，政府貪污腐敗，教會烏煙瘴氣，富豪驕奢淫逸，百姓水深火熱，社會兩極分化，人民信仰危機。

是該發生革命性變化的時候了。就深層意義來說，伊斯蘭教的到來本身就曾經是一種革命。這個新信仰勝過了既存的教義與教會，沒有為前兩種聖約帶來第三個版本，反而是帶來了替代兩者的新經典。在征服之下成立的新君主，無論是在政治、靈修或社會方面，都推翻了舊秩序，並在其上建立了一個新秩序。在伊斯蘭教秩序之下，最理想的境界將不會有神職人員、沒有教會體制、沒有王公貴族、沒有任何形式的特權社會組織或是種姓階級和社會階層，惟一剩下的高下之別，就祇有接受真理者相對於剛愎自用、拒絕真理者的那一份自明自見的優越——當然，也包括了自然世界與現實社會中明顯的男尊女卑與主崇奴賤。但就是連這些不平等，新的教義也將它軟化，使之符合人道。伊斯蘭教世界不像古代的世界，在此，奴隸不再是動產，而是一個人，有著受到認可的法律與道德地位。婦女雖然還處在多妻與妃妾的制度下，他們卻擁有一些財產權，

這些財產權在西方世界，一直到現代才有可資比擬的權益。<sup>51</sup>

為了這份“一直到現代才有可資比擬的權益”，古代伊斯蘭揭竿而起，一呼百應：

塞息西亞的主教 Jesubah III 抱怨說：祇要回教徒一出現，成千上萬的基督徒，就跑去參加他們的行列。而在北非——奧古斯的老家——所有的人民，頃刻之間，都投入了伊斯蘭。穆罕默德死於西元 632 年，到 641 年時，整個一性論教徒及景教徒的區域，包括“泰默”與“阿凡土塔”的區域，都已為伊斯蘭所佔領。在 717 年，伊斯蘭教已兵臨君士坦丁堡，而希臘的教會幾瀕臨覆滅的境地。而早在 628 年，穆罕默德的一位親戚，便曾攜帶禮物，來謁中國的皇帝宋太宗，並蒙准予離去，設立傳道院，從 700 年起，回教寺院已出現於山東。而在 720 年，大馬士革教主，向久已定居在法國南部的阿拉伯人，發出指令，征服法蘭克人的王國。兩個世紀以後，當西方一個新的宗教世界，於舊的西方教會殘骸之中，興起的時候，伊斯蘭已經發展到了蘇丹和爪哇。<sup>52</sup>

伊斯蘭教“五功”，祈禱、禮拜、天課、齋月、朝聖，招招強調建立平等正義的現實社會。“信主唯一”是所有穆斯林不分貧富貴賤文盲博士，人人自己與上帝直接溝通，用不著供奉等級森嚴的教會組織，聆聽道貌岸然的教士哼哼教導。“天課”是均貧富的社會財富再分配機制。<sup>53</sup>“齋月”是“促使飽漢體驗餓漢飢”。<sup>54</sup>朝聖是親身體驗人人平等的生命旅途。<sup>55</sup>“伊斯蘭包裹住身體，象徵著它傾向超脫塵俗，而衣著的統一廢除了階級區

別，並強調社區重要性高於西方個人主義。”<sup>56</sup>

根據當代原教旨主義的理解，伊斯蘭是在根本否定資本主義私有制之後，承認私有制和貧富差別的。“伊斯蘭教認為世界的一切財富都屬於真主”。<sup>57</sup> 現實中，人們祇是通過社會分工，分頭管理真主~社會的財產。庫特卜說：“伊斯蘭從來不承認沒有界定和限制的私有制。……最廣義地說，產權祇屬於社會，(把財產)委託給社會的安拉，才是一切事物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財產屬於社會，祇是由私人管理。一旦管理工作結束，財產自然交還最終所有者——社會。”<sup>58</sup> 有能力的人，有更多的財產，不過是能者多勞，代管更多真主~社會的財產。<sup>59</sup> 既然是代管真主~社會的財產，祇有勤勞致富值得鼓勵，投機賭博、<sup>60</sup> 放高利貸、詐騙搶劫等巧取豪奪，既沒有必要，也不被允許。<sup>61</sup> 既然是代管真主~社會的財產，自然無權濫用，所有不必要的消費，飲酒、吸毒、嫖娼，豪華、奢靡、揮霍，全是罪過；<sup>62</sup> 祇有“天課”和施捨才是正途，因為“他們的財產中，有乞丐和貧民的權利。”<sup>63</sup> 既然是代管真主~社會的財產，必須克盡厥職，努力使資產增值。單純儲蓄意味著沒有能力、不夠資格代管，拿利息不勞而獲更沒有道理。財產閒置，不是懶惰就是無能，理應收回。<sup>64</sup> 窖藏金銀等於監守自盜，罪大惡極，炮烙伺候：

窖藏金銀，而不用於主道者，你應當以痛苦的刑罰向他們報喜。在那日，要把那些金銀放在火裡燒紅，然後用來烙他們的前額、肋下和脊背。這是你們為自己而窖藏的金銀。你們嗜嗜藏在窖裡的東西的滋味吧！<sup>65</sup>

這就是伊斯蘭教堅持私有制的邏輯。——殫精竭誠資產增值，廢寢忘食“天課”施捨。宵衣旰食，握髮吐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sup>66</sup>“在伊斯蘭教裡個體對財產的所有權是一種社會職責。”<sup>67</sup>任務是努力使真主~社會的財產不斷增值；目的是通過“天課”施捨的再分配，實現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sup>68</sup>所以，伊斯蘭講究按勞分配，<sup>69</sup>鼓勵多勞多得，<sup>70</sup>反對不勞而獲，反對利息，反對賭博，反對驕奢淫逸，更別提通過佔有財產，制度化出階級、階級剝削與階級壓迫了。在穆斯林眼裡，保護和鼓勵私有制，是為了獎勤罰懶，提高為真主代管財產的服務質量，哪裡聽說過什麼“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sup>71</sup>庫特卜說：“伊斯蘭關於私有制的準確表達是：財產屬於社會是基本原理，私有產權是在諸多條件限制下的(財產)管理。有些財產屬於公有，私人沒有任何權利佔有。”<sup>72</sup>所以，庫特卜有針對性地反復強調，對個人財產所有權的保護，必須滿足三個條件：

其一是個人財產的來源必須是合法的，其二是個人財產的擴充方法必須是合法的，其三是這些財產的使用應該在適當的方面，不允許浪費和濫用。如果社會出現不均衡，或出現了災難，那麼，國家有絕對的權利來使用個人的財產。在特殊情況下，國家有權徵用個人財產，以便應付緊急情況和保障社會安定。<sup>73</sup>

根據這樣的產權邏輯，沙特是當今全世界唯一一個以家族姓氏命名的國家，明明是家天下，必須自動拿出大把錢財，實



行義務教育、免費醫療、住房補貼等種種社會福利。<sup>74</sup> 所以，納賽爾認為：“社會主義源於伊斯蘭教，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於伊斯蘭教初期，先知穆罕默德是它的創始人。”“伊斯蘭教不是一般的宗教，而是主持人間公正和平等、提供機會均等的宗教。這一切可用‘社會主義’一詞表達。”<sup>75</sup> “穆斯林的宗教是一個百分之百的社會主義宗教。”<sup>76</sup> 所以，卡扎菲認為：“伊斯蘭教為實現公平和平等做了準備；它不允許任何富人把他的財富用作壓迫或剝削他人的工具。”如果私有制不產生危害，也可以繼續存在。但是，財富和貧困，“在任何社會裡都不應被允許共同存在，國家的職責就是要強制實施撙節富濟貧的法律。伊斯蘭教反對貧困，並且堅定不移地站在勞動階級一邊。”<sup>77</sup> “在這個基礎上，可以說伊斯蘭的精神和基本原則與社會主義沒有什麼矛盾，即使不像今日的社會主義那樣明顯也罷。”<sup>78</sup> 所以，布托認為：“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的原則並不互相排斥，伊斯蘭教提倡平等，而社會主義則是實現平等的現代手段。”<sup>79</sup> 伊斯蘭社會主義在印巴次大陸的代表人物是穆罕默德·伊克巴爾。

在他看來，伊斯蘭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唯一差別在於，一個是“敬畏真主的革命”，而另一個則是“無神論的革命”。而二者的相似性更多：伊斯蘭教主張社會平等、反對種族歧視，認為“天下穆斯林皆為兄弟”，而社會主義也有相似的理論觀點，諸如民族團結、各民族不論大小一律平等、無產階級不僅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等等；伊斯蘭教堅信認主獨一，反對偶像崇拜，而社會主義則批判商品拜物教，主張以暴力粉碎舊的國家機器；伊斯蘭教反對貧富不均、兩極分化，並

以天課制度來調節社會財富的分配，而社會主義則主張不勞動者不得果實，反對階級壓迫、階級剝削，禁止少數人壟斷社會財富。如此等等。<sup>80</sup>

湯因比可能概括得不錯：“伊斯蘭教和共產主義一樣，創造了它為革除當代基督教實踐中表現出來的種種惡習的鬥爭方式。”<sup>81</sup> 可以說，在那東風壓倒西風的年代裡，正是對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之大同世界的憧憬和追求，“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與“全世界穆斯林聯合起來”聯合起來了。<sup>82</sup>

## 1.2 伊斯蘭繼續革命

更有甚者，隨著計劃經濟出現官僚主義和集權弊端，社會主義陣營因修正主義的辯論而分裂，特別是蘇修與美帝爭霸，在中東唯利是圖，首鼠兩端，<sup>83</sup> 伊斯蘭國家反蘇防修之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

卡扎菲獨自躲進沙漠，苦思冥想了兩個多月，寫出《綠皮書》三部曲，把資本主義稱為“世界第一理論”，把馬克思主義稱為“世界第二理論”，自己提出一切權力歸人民的“世界第三理論”，“宣告社會主義新社會必將到來，動員工人、學生、農民、士兵等所有被剝削的勞動群眾為實現社會主義舉行人民革命，建立沒有任何政治和社會弊病的社會。……要變革社會結構，為建立一個人民掌握政權、財富和武器的新社會，一個以自然法則為人類關係的準繩、依據和唯一源泉的民主社會而奠定基礎。”<sup>84</sup>

為此，卡扎菲發動了一場“中國式的文化革命”，撤除所有政府機構，一切權力交給全國人民大會和各級人民大會，所有官員改稱秘書，所有駐外機構改稱人民辦事處；取消工資制，讓工人成為生產過程的合夥人；號召學生“把所有在你們面前關閉政府機構大門的資產階級官僚踏翻在地，……撕碎所有不表述阿拉伯主義、伊斯蘭教、社會主義和進步的進口書本。取消所有不講述真理的課程。”<sup>85</sup>

在政治體制上，卡扎菲反對議會制、政黨制、等級制和公民投票制，因為這些代議制民主否認人民的直接參與，本質上都是具有欺騙性的專制制度。“人民大會是人民民主的唯一途徑。”1977年，利比亞宣佈成立阿拉伯利比亞人民社會主義民眾國。卡扎菲認為，民眾國優於共和國，因為人民可以直接掌握權力。

在經濟體制上，卡扎菲反對工資制，“國營和私營企業的工人都同樣是僱傭勞動者。……僱傭勞動者類似奴隸主僱傭的奴隸，祇不過是臨時的奴隸。”所以，“當代各種社會從僱傭社會向夥伴社會的轉變，是當今世界各種互相矛盾的經濟學主張必然的辯證結果，……在社會主義企業勞動的人是生產的夥伴。”<sup>86</sup> 1973年，利比亞通過立法，“所有雇員在十人以上的企業根據法規要將四分之一以上的利潤分給工人——30%用現金支付，其餘的為雇員保險賠償費。工人在50人以上的私營企業必須有兩名雇員參加董事會。”1978年，宗教界人士對取消私有制提出懷疑，卡扎菲強調：“如果他們繼續反對他，他就會燒掉《綠皮書》而用毛澤東的紅寶書取而代之。‘這很快就會發生’，他威脅說。”<sup>87</sup>

1988 年，卡扎菲繼續革命，提出推倒監獄，釋放所有犯人。<sup>18</sup> 發表《民眾時代大綠色人權宣言》，宣佈公民享有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禁止強迫勞動和長期監禁。1993~1994 年，卡扎菲繼續革命，把全國分成 1500 個公社，取消省、市、區級政權，將一切職權下放到公社。<sup>89</sup> 卡扎菲心潮澎湃，豪言壯語：

如果“左派”是指反對反動派和反帝國主義，那麼好，我就是在極左的一方；沒有人能比我更左了。如果說“左”意味著“社會主義”，那麼以真主的名義，我斷言社會主義源自我們的宗教和我們的聖經。我們是社會主義的貯藏所，而先知是一切社會主義者的伊瑪目——最高領袖。<sup>90</sup>

在卡扎菲看來，伊斯蘭社會主義才是徹底純正的社會主義。“通過社會主義解決經濟問題的可能性祇有在伊斯蘭教（而非馬克思主義）的背景下才能取得正式認可，因為伊斯蘭教和社會主義是不可分割的。兩者都顧及到了民族化和限制財富。”<sup>91</sup> 蘇聯東歐的實踐證明，不信神的唯物主義，很容易變成唯利是圖的官僚主義、修正主義和國際關係上的霸權主義。“社會主義必須以伊斯蘭教原則為指導思想。”<sup>92</sup> “祇有伊斯蘭教才能引導人類走向社會主義。”<sup>93</sup>

光陰荏苒，人老珠黃。卡扎菲、薩達姆們大搞個人崇拜，殘酷鎮壓異己，深居簡出，一言九鼎，經過主流媒體百口嘲嘮，萬目睚眦，早就是渾不講理的暴君、喪心病狂的魔頭了。值得提一筆的是，這些被全球化大潮淘汰的過氣人物，曾經有過輝煌。

1968~1977 年，伊拉克公營部門在國民生產中的比重，從 31% 上升到 80%。到 1982 年，農村中共有 970 萬杜諾姆土地分給了 26.44 萬農戶，並且建立了 1877 個合作社和 82 個專業合作社。到 1980 年，小學入學率高達 116% (女子高達 110%)。<sup>94</sup> 1960~1970 年 GDP 年平均增長率為 6.1%，1970~1980 年 GDP 年平均增長率為 12.1%。<sup>95</sup> 人均 GDP，從 1970 年的 330 美元猛增到 1980 年的三千美元，伊拉克躍昇中等收入國家。<sup>96</sup>

人口更少的利比亞發展得更快，1962~1979 年，GDP 從五億美元增長到 245 億美元；1951~1979 年，人均收入從 40 美元增長 8170 美元，超過了老牌發達國家——英國和意大利。隨著經濟發展、收入增加，免費教育、公費醫療、住房補貼等社會福利普遍實施，體現在住宅、汽車的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sup>97</sup>

當然，這個高速發展，石油收入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不應當忘記的歷史是，分散小國從西方跨國公司手裡奪得石油利潤和石油資源所有權，飽經領袖犧牲、政權傾覆乃至公開戰爭的浴血奮鬥。<sup>98</sup> 石油資源國有化，雖然有領導入修官邸、買軍火，畢竟堅持了全體公民人人有份的法理。

### 1.3 歷史終結的終結

人人有份的法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從越來越多的東歐國家實行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到柏林牆倒塌，共產黨下臺，東歐易幟，蘇聯解體，兩大陣營對壘的冷戰結束了。福山熱烈歡呼資本主義的輝煌勝利，暢銷書《歷史的終結》

引吭高歌，人類社會的進步最終完成。手舞足蹈欣泰時，移風易俗王化基。接下來的年代裡，百川歸海而且滄海橫流了。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經濟一體化，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不僅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而且強調政府參與的東亞模式灰頭土臉，甚至連歐洲資產階級苦心經營的福利國家也難以為繼了。<sup>100</sup> 市場經濟的邏輯簡明扼要：一旦資本掙脫國家政權的枷鎖束縛，你英國、德國、法國工資高、福利好、抽稅重，禁止童工、法定最低工資、八小時五天工作、帶薪休假、公費醫療、退休失業社會保障地多多關照勞工，我資本就上中國了。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用腳投票，一句“多餘的話”都沒有。吸引不到資本，外資引不來，內資流出去，就業和發展無從談起，安定團結都成問題，設計再好的制度也維持不下去。於是乎，各國政府不得不循著放任自由的方向深化改革，廣化開放，爭先恐後，減少對資本的各項限制和稅收，減少對勞工的各項社會保障和福利開支，以留住內資，吸引外資。優待資本，虐待勞工，成為世界新潮流。空前規模和速度的兩極分化，是不請自來的全球化社會結果。<sup>100</sup>

兩大陣營對壘，一球兩制。社會主義迫使資本主義注重公平，資本主義迫使社會主義追求效率。這個歷史一旦終結，資本和資本家唯利是圖的本性，成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天經地義。唯利是圖推動物欲橫流，物欲橫流引發信仰危機，信仰危機強化唯利是圖。離開了理想和信仰的道德約束，弄虛作假、以權謀私、貪污腐敗，自然成為謀私利的最佳捷徑。<sup>101</sup> 如今，人類社會以美國為龍頭，由馬克思描述過百分之多少利潤就可

以殺人的動力所驅使，唯利是圖的貪婪，以權謀私的腐敗，物欲橫流的奢靡，帶來全球一體化的信仰危機。就是在美國，整個社會面臨著“道德原則和習慣的淪喪、對當局和社會公共機構尊重的喪失、家庭的瓦解、禮儀的衰退、高尚文化變得粗俗以及大眾文化的品位降低。”<sup>102</sup>

1964年，四分之三的美國公眾說他們大多數時間都信任聯邦政府做的事是正確的。1970年以後，大約還有四分之一的公眾擁有這種信任。……過去30年間，公眾對許多主要的社會公共機構的信任程度下降了一半：對大學從61%下降到30%，對大公司從55%下降到21%，對醫學界從73%下降到29%，對報紙雜誌從29%下降到14%。<sup>103</sup>

福山在歡呼《歷史的終結》五年之後，匆忙急就《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驚呼道德淪喪不能熟視無睹，疾呼唯利是圖不能肆無忌憚，大驚小怪，對《歷史的終結》發出無可奈何的哀嘆。<sup>104</sup> 接著1999年，福山又手忙腳亂攢了一本《大分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光看書名就知道，短短十年不到的時間，《歷史的終結》帶來了《大分裂》，道德淪喪迷失了人類本性，唯利是圖搗亂了社會秩序，需要“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福山博士加教授，滿紙呼天搶地的胡言亂語，歇斯底里而不知所云，從《大分裂》中間提煉出“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重建”的命題，徹底否定了“歷史終結”的哲學邏輯。<sup>105</sup>

## 註釋：

- <sup>13</sup> 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第11卷下冊，第1180頁。
- <sup>14</sup> 納賽爾在《革命哲學》中強調阿拉伯民族主義、伊斯蘭教和社會主義三位一體，立志在埃及建立“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民主合作制度”（藍埃：《非洲社會主義小詞典》第14頁）。1962年，《民族憲章》確認埃及信奉科學社會主義。1964年，《臨時憲法》規定埃及是以勞動人民力量為基礎的民主國家，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88頁）。
- <sup>15</sup> “敘利亞復興黨所提倡的社會主義，不管是米歇爾·阿弗萊克的非宗教的社會主義，還是哈菲茲·阿薩德的溫和的社會主義，都被認為既不是科學社會主義，也不是民主社會主義，甚至也不是伊斯蘭社會主義，它被稱之為阿拉伯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不提倡工人階級專政，允許私有制的存在，但在生產工具和土地方面實行合作化，財政、金融、工商業實行國有化”（蔡德貴：《當代伊斯蘭阿拉伯哲學研究》第18頁）。1970年底，阿薩德政變掌權，通過新憲法，規定敘利亞是“民主的、民眾的、社會主義國家”（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第365頁）。
- <sup>16</sup> 伊拉克通過革命掌權的也是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早在1953年，伊拉克復興黨的地下報紙由《新阿拉伯》改名為《社會主義者》；復興黨人自稱復興社會主義者。1968年頒佈《臨時憲法》，規定伊拉克是“人民民主國家”，經濟上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全球變局：美國與伊拉克》第98頁）。“薩達姆”的意思是“堅定不移的戰鬥者”。他說：“列寧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我最欣賞他的著作，因為他以一種充滿生氣的態度對待生活。我也讀毛澤東的著作。……我們的夢想不僅是要進行阿拉伯民族鬥爭以達到阿拉伯的團結，而且要建立一個統一的阿拉伯社會主義民主國家”（殷罡、秦海波：《薩達姆·侯賽因》第7、244、256頁）。
- <sup>17</sup> 50年代，布爾吉巴的憲政黨改名為社會主義憲政黨，通過《社會主義綱領》，宣佈要“實現‘新憲政黨的社會主義’或‘突尼斯的社會主義’，即‘愛國主義加突尼斯傳統’，通過社會各階層的對話，採取私人、國家、集體為一體的所有制，使突尼斯成為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



(彭樹智：《阿拉伯國家通史》第320頁)。布爾吉巴1957年執政，1987年底才卸任。突尼斯1961年開始搞“憲政社會主義”，國家、集體和私人經濟三種經濟成分並存(楊魯萍、林慶春：《突尼斯》第101~105頁)。

- <sup>18</sup> 1969年，尼邁里軍事政變掌權。1972年，成立社會主義聯盟，為蘇丹唯一合法的政治組織，全面推行植棉場、工商企業和金融機構國有化(彭樹智：《阿拉伯國家通史》第295~297頁)。
- <sup>19</sup> 本·貝拉的立論是：“對社會主義的嚮往是不發達國家人民的根本目標。不發達國家的落後，它們的政治與經濟結構是殖民帝國主義造成的。一旦殖民統治被消滅，人民群眾中就會再次出現這種嚮往，就要為它尋求出路。……我們要建設一個考慮到了我們阿拉伯和伊斯蘭傳統的革命的社會主義”(《本·貝拉言論集》第4、20頁)。1964年，《阿爾及利亞憲章》規定：“阿爾及利亞國家是社會主義的，……阿爾及利亞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是1954年11月1日革命的深入和必然結果”(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137頁)。“一切重要的民族革命必然會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阿爾及利亞的社會主義就是要消滅一切人剝削人的形式，實行土地改革和自管制度”(藍瑛：《非洲社會主義小詞典》第22、60~61頁)。
- <sup>20</sup> 1969年，西亞德·巴雷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任索馬里民主共和國最高革命委員會主席，1976年任總統、索馬里革命社會主義黨總書記。西亞德·巴雷說：科學社會主義“在任何方面都不會與我們的好風俗、積極的習慣、偉大的傳統和伊斯蘭教發生抵觸，……伊斯蘭教義中有社會主義的基礎。……我們把社會主義不是當作一種宗教，而是當作一種經濟和政治制度，藉以迅速發展我國的經濟。我們要在索馬里證明，社會主義是能夠與宗教和諧一致的。採取社會主義原則，使之適應現實(宗教就是索馬里的一種現實)，就能使科學社會主義這個東西區別於教條主義”(唐大盾等：《非洲社會主義》第25頁)。“索馬里決心使宗教和社會主義相協調一致，……我們的宗教是伊斯蘭，我們的人民是穆斯林，我們發展經濟的政策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有伊斯蘭教為伴的社會主義萬歲！”(金宜久：《當代伊斯蘭教》第188頁)
- <sup>21</sup> 桑戈爾標榜“民主”和“社會正義”，認為“應當把社會主義納入我們的精神標準，既宗教標準”(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148頁)。
- <sup>22</sup> 真納相信：“巴基斯坦應以社會正義和強調人的平等與兄弟情誼的那種

伊斯蘭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什麼主義——為穩固的立國根基”（金宜久：《當代伊斯蘭教》第 185~186 頁）。1949 年，總理阿里汗宣佈：“我們祇有一個主義，即伊斯蘭社會主義。概括地說，它意味著在本國內每個人在分配的食物、住所、衣服、教育和醫藥福利方面有平等的權利”（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 133 頁）。

- <sup>23</sup> 蘇加諾說：“真正的伊斯蘭主義包括社會主義的特徵。雖然社會主義的特徵並不需要馬克思主義的解釋，雖然我們知道伊斯蘭教的這種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不是一回事，因為伊斯蘭教的社會主義建立在精神原則之上，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建立在唯物主義的原則之上；即便如此，如果我們證明真正的伊斯蘭教是社會主義的，這對我們的目的顯然是有意義的”（金宜久：《當代伊斯蘭教》第 183~184 頁）。
- <sup>24</sup> 本·貝拉偏蘇聯模式，布邁丁指責他推行“不按客觀實際，任意發揮的廣告性的社會主義”，提出實行有阿爾及利亞特色的社會主義，把“工人自管制”改成“社會主義管理”，強調生產資料國有化，主張“勞動人民參加企業管理”，建立“以社會主義民主規律為指導的新型社會主義企業組織形式”（藍瑛：《非洲社會主義小詞典》第 15 頁）。布邁丁說：“當我們試圖從各種不同的社會主義吸取教益時，不應該忘記社會主義的本質祇有一個，其目的是要把人從剝削中解放出來，使生產者掌握經濟和政治權力”（《布邁丁言論集》第 77 頁）。1976 年通過憲法，規定“建設具有民族和伊斯蘭價值的社會主義，……為建設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為公民的阿拉伯伊斯蘭個性解放和發展創造條件”（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第 225 頁）。
- <sup>25</sup> 非洲 50 多個國家陸續獨立，42 個搞社會主義。尼赫魯不信伊斯蘭，在印度搞的還是社會主義。
- <sup>26</sup> 直到 21 世紀，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之後，霍梅尼的繼承人、伊朗總統穆罕默德·哈塔米博士依然一往情深：“儘管社會主義的原有目標並沒有得到實現，但是，它卻使千百萬殖民地受苦受難的人民擺脫了殖民主義的統治及其壓迫。社會主義令人神往的口號使得各受壓迫的民族對自己的未來產生了希望，並使他們也找到了自己遭到踐踏的人格與尊嚴，同時也使他們傷痕纍纍的心得到了慰藉”（穆罕默德·哈塔米：《從城邦世界到世界城市》第 162 頁）。
- <sup>27</sup> 1962 年，納賽爾提出埃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五項區別：“第一個區別是，我們信仰宗教，馬克思主義否認宗教，我們相信哈里發，馬克

思主義否認哈里發。第二個區別是，我們說過我們要從反動派專政過渡到全民民主，共產主義即馬克思列寧主義卻要從反動派專政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個區別是，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規定土地國有化。我們沒有規定土地國有化，我們相信在合作範圍內的土地私人所有制。第四個區別是，共產主義不相信私有制。我們說過，我們把所有制分成剝削的所有制和非剝削的所有制，我們相信私有制，但我們不相信剝削的所有制，我們說過，我們正在消滅剝削的所有制。第五個區別是，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列寧主義規定要通過暴力無情地消滅和粉碎資產階級或者說是我們所說的反動派，我們不這樣做，我們說過，我們要在不使用暴力消滅統治階級的情況下，通過和平方式來解決衝突和矛盾”（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140~141頁）。

<sup>28</sup> 埃及1961年頒佈“社會主義法令”規定：“凡擁有一萬埃鎊以上股票的資本家或擁有200費丹土地以上的地主被稱為壟斷資本家和封建地主，屬反動力量陣營，係剝削所有制；在此數量以下的資本家或地主被稱為民族資本家和非封建地主，屬勞動人民範疇，係非剝削所有制”（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93頁）。

<sup>29</sup> 1952年9月，埃及頒佈《土地改革法》，規定地主不得擁有100費丹以上的土地。多出的土地，政府以四倍地租的地價強行徵購，然後賣給農民，貧雇農優先，地價分30年償還（納忠：《阿拉伯通史》下卷，第588~589頁）。1952~1965年，經過三次土改，佔地上百費丹的大地主絕跡，佔地50費丹以上的大地主的佔地面積從34.2%下降到12.6%，佔地5~50費丹的中小地主和富農的佔地面積從40.4%下降到30.3%，中農和貧農的佔地面積從35.4%上昇到57.1%。“未分得土地的大部分佃農也因地利幾乎長期固定不變而增加了收入，成了事實上的半自耕農。”到1970年，埃及農村合作社發展到5049個（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100~151頁）。

<sup>30</sup> 到1965年，“國家掌握了全部銀行、保險公司、重工業、中間工業、採礦業、進口業和四分之三的出口業以及相當一部分輕紡工業。1966年，公營企業產值佔全國工業增加價值的64%，佔10人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價值的90%”（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100~111頁）。

<sup>31</sup> 金宜久：《當代伊斯蘭教》第189頁。

<sup>32</sup> 唐大盾等：《非洲社會主義》第101頁。

<sup>33</sup> 譬如，卡扎菲“提出的經濟原則主要有：第一，任何人不能擁有大量資本，剝削他人，在伊斯蘭社會主義社會中不存在僱傭勞動者，大家都是兄弟夥伴；第二，禁止人們從事謀取自身需求以外的任何經濟活動；第三，人人都平等地參加生產和分配產品；第四，對所有制的主宰和管理應屬於全體人民。從上述原則出發，卡扎菲領導的利比亞伊斯蘭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有四個方面：其一，國家在一定範圍內實行企業國有化政策，將外國石油公司、銀行、保險公司和其他大的工礦企業收歸國有；其二，頒佈《天課稅》，規定完納‘天課’為法定義務，責成財政部、司法部徵收；其三，修改商法等經濟法律，在法律中明文規定禁止在商業交易中支付、收取利息；其四，在精神文化消費領域進行‘革命’，禁毀反經、訓的‘有害’書籍，封閉放映色情片的電影院，搗毀酒吧、夜總會等傳播西方生活方式的場所”（劉天明：《伊斯蘭經濟思想》第 191 頁）。

<sup>34</sup> “1958~1959 年，許多馬克思主義者被關進監獄，被當做民主的敵人和外部大國的代理人而受到壓制”（蔡德貴：《當代伊斯蘭阿拉伯哲學研究》第 531 頁）。

<sup>35</sup> 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 1962 年成立，納賽爾任主席。赫魯曉夫訪問埃及時，肯定埃及“正走上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1965 年，民族解放運動和埃及共產黨在蘇聯影響下宣佈自行解散（楊瀨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 142~143、161~192、445 頁）。

<sup>36</sup> 列寧曾著“社會主義和宗教”一文，專門討論布爾什維克如何看待宗教——東正教：“對於工作一生而貧窮一生的人，宗教教導他們在人間要順從和忍耐，勸他們把希望寄託在天國的恩賜上。對於依靠他人勞動而過活的人，宗教教導他們要在人間行善，廉價地為他們的整個剝削生活辯護，廉價地售給他們享受天國幸福的門票。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列寧全集》第 10 卷，第 62~63 頁）。

<sup>37</sup> 伊斯蘭不是猶太教和基督教否定，而是繼承和發展。伊斯蘭與猶太教和基督教共奉一個上帝，充分肯定所有六位先知。“安拉即是上帝（即耶和華），安拉是 al-Ilah 的縮寫，……有近百段《古蘭經》經文反映出猶太《法典本文》與《註釋》的精神。《古蘭經》上關於天使、復活、天堂等的記述，是做自猶太《法典》而非《舊約》。佔了《古蘭經》四分之一篇幅的各種故事，也可以從《猶太法典》的注解裡的註文或寓言裡尋找脈絡經緯”（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第 4 卷上冊，第 263 頁）。《古蘭經》

包括大量《聖經》的故事，93 次提到耶穌。“事實上，在猶太教、基督教、回教的典故中，從亞當到亞伯拉罕這一段完全相同”（21 世紀研究會編：《民族的世界地圖》第 193 頁）。伊斯蘭祇是強調穆罕默德是最後一位先知，強調不搞“以物配主”的偶像崇拜，不要任何人為的中介，直接崇拜真主（孫承熙：《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大綱》第 122~141 頁）。“當時，麥加的大多數居民都是基督徒和猶太人，他們認為穆罕默德的佈道是最純正、最徹底地歸依猶太人和基督徒的上帝的方式，因而真誠地予以接受”（黑體加重是筆者所為，小約翰·威爾斯：《1688 年的全球史》第 397~398 頁）。所以，當代原教旨主義大師、蘇丹穆斯林兄弟會領袖、政府人民議會議長——哈桑·圖拉比說，自從有了人類，上帝通過一個又一個先知更新天啟。先是亞伯拉罕在阿拉伯傳教，然後是摩西從埃及到巴勒斯坦，然後是耶穌革新宗教，最後是穆罕默德集大成，把猶太、基督一鍋燉在伊斯蘭了（王京烈：《面向 21 世紀的中東》第 167 頁）。所以，湯因比說：“伊斯蘭教不是與預言家耶穌存有爭端，而是與基督教會有爭端。基督教會由於向異教的希臘多神教和偶像崇拜的投降而欺騙了羅馬尼亞人。從對這種唯一真正的上帝的啟示的可恥背叛中，伊斯蘭人恢復了亞伯拉罕的純潔的宗教”（湯因比：《文明經受考驗》第 66 頁）。“現今的穆斯林學者認為，如果穆罕默德當時就熟悉佛教、印度教、澳洲的原住民或道地的美國人，則《古蘭經》也會認同這些宗教的聖人”（凱倫·阿姆斯壯：《伊斯蘭》第 75 頁）。

<sup>38</sup> “沙里阿地強調，伊斯蘭較任何其他信仰都來得有活力。從伊斯蘭使用的詞彙，就足以窺其進步趨向。在西方，‘政治’一詞源自希臘字 polis（即城市之意），那是種靜態的行政單位；惟伊斯蘭的相應詞彙 siyasat，就字義言卻是‘馴服一頭野馬’，意味著經過努力奮鬥以帶出既有完美的過程”（凱倫·阿姆斯壯：《為神而戰》第 73、367 頁）。

<sup>39</sup> 穆罕默德·哈塔米：《從城邦世界到世界城市》第 81~82 頁。所以伏爾泰說：“《古蘭經》已成為一切伊斯蘭教國家的法典和教規”（伏爾泰：《風俗論》上冊第 310 頁）。

<sup>40</sup> 凱倫·阿姆斯壯：《為神而戰》第 73 頁。

<sup>41</sup> 凱倫·阿姆斯壯：《穆罕默德》第 118 頁。

<sup>42</sup> 《聖訓》第 16 章 35 條，第 22 章 29、55 條（張文建：《信主獨一》第 421、413 頁）。

<sup>43</sup> “真主既是天地之主，就同時也是國家和宗教社團的主宰。國家的金庫

和軍隊就是真主的金庫和軍隊”(弗里德里希·希爾：《歐洲思想史》第122頁)。

<sup>44</sup> 黑體加重是筆者所為。戈特沙爾克如是說：“伊斯蘭教是政治的宗教或宗教的政治。伊斯蘭教雖然作為一種宗教組織而創立，但它具有政治特徵。穆罕默德作為先知也處理國家事務，政治與宗教是合一的。穆罕默德一方面努力為伊斯蘭教贏得信徒，同時又追求一種政治目標。在他看來，這兩者是一個整體”(戈特沙爾克：《震撼世界的伊斯蘭教》第51頁)。因為除了穆罕默德，“沒有一個教派的創始人是征服者”(伏爾泰：《風俗論》上冊第294頁)。

<sup>45</sup> “社會正義乃是伊斯蘭極重要的美德。穆斯林所受到的指示是，他們的首要任務在於建立一個‘穆斯林社區’(ummah)，此社區主要特色是具備有實質的同情心，有公平的財富分配，而這項特色遠比神的原則性教義更為重要。”所以，“政治對穆斯林而言，並不是次要的事情，我們知道，政治是他們宗教訴求的場所。”所以，“在穆斯林世界中，世俗主義通常隱含著蠻橫地抨擊宗教與宗教人士”(凱倫·阿姆斯壯：《伊斯蘭》第72、225頁)。

<sup>46</sup> 黑體加重是筆者所為(劉靖華、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第253頁)。“對虔誠的穆斯林來說，政治就像是基督徒口中的聖儀。換句話說，這是他們為了親近神，必當履行的職責”(凱倫·阿姆斯壯：《為神而戰》第74頁)。正如王新中、龔開運說霍梅尼，“霍梅尼強調伊斯蘭教本身就是完美的政治學說。……霍梅尼關於‘伊斯蘭教同政治不可分離’的思想，揭示了伊斯蘭不同於其他宗教的本質特徵，**在精神和物質、靈魂和世俗、天國和塵世、來世和今生、出世和入世等問題上，它不祇是並重，而是更重後者**”(黑體加重是筆者所為，王新中、龔開運：《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第339頁)。班納也說過：“我們相信伊斯蘭教法和教導是全面的，它包括了人們今世和來世的事務。那些相信這些教導祇同生活中的精神生活方面有關的人是錯誤的。伊斯蘭是意識形態也是禮拜，是家庭也是民族，是宗教也是國家，是精神也是工作，是書也是劍。”蔡佳禾指出：“其實，所有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想的先驅者都強調了一個基本原則：必須把伊斯蘭作為伊斯蘭社會和政體的基礎”(蔡佳禾：《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第27頁)。

<sup>47</sup> 劉靖華、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第119頁。

<sup>48</sup> 林長寬：“穆罕默德——亞伯拉罕宗教的最後先知”(凱倫·阿姆斯壯：

《穆罕默德》第 9、11~12 頁)。

- 49 “常有人說，基督教是‘愛的宗教’，伊斯蘭教講究的卻是社會正義：在基督徒眼中，‘愛你的鄰人’是真實信仰的試煉。《古蘭經》對宗教精神的定義或許不及基督教的雄心萬丈，卻可能更為務實：正當的行為是信仰阿拉、末日、天使、經典和使者，出於敬愛阿拉而施捨你們的財產給近親、孤兒、需要救濟的人、旅行在外的人和乞求援助的人，以及為奴隸贖身、堅守拜功、繳納天課(《古蘭經》第 2 章 117 條)。<sup>49</sup>‘人人平等’是穆斯林社群的基本原則：每個人必須擔負同樣的責任義務，沒有菁英分子，也沒有階級井然的教士或修道士。繳納天課是縮小貧富差距的一項努力，釋放奴隸更是善行。基本上，穆斯林社群的每個人都應當被平等對待：‘愛’固然無法風行草偃並強制執行，公平正義卻可以立法落實。《古蘭經》和其後的伊斯蘭法似乎確實有助於穆斯林培養深刻的平等精神”(凱倫·阿姆斯壯：《穆罕默德》第 301、360~361 頁)。
- 50 張錫模：《聖戰與文明》第 107 頁。
- 51 路易斯：《中東：激蕩在輝煌的歷史中》第 73、93 頁。“最早的穆斯林當中有許多人是麥加城內的弱勢者，奴隸和婦女從伊斯蘭教的訊息中找到了希望。……階級意識濃厚的中世紀時期，不乏有人批評伊斯蘭信仰，認為穆罕默德賦予奴隸和女性等‘人下人’太大權力。……單是婦女可以作證或是有權繼承財產就已經是石破天驚的想法了。我們也必須回顧，在歐洲的基督教世界，婦女要到 19 世紀才能享有類似的權利：即便如此，法律上仍舊嚴重地重男輕女”(凱倫·阿姆斯壯：《穆罕默德》第 138、53、299~300 頁)。“《古蘭經》賦予婦女繼承權與離婚的權利，這比起西方婦女得以享有這些權利，還要領先數百年”(凱倫·阿姆斯壯：《伊斯蘭》第 83 頁)。
- 52 施賓格勒：《西方的沒落》第 591~592 頁。
- 53 “沒有一種宗教不要求人們施舍財物。但祇有伊斯蘭教把這定為一條法定的、絕對必須實行的教規”(伏爾泰：《風俗論》上冊第 313 頁)。“天課”作為穆斯林的五功之一，決不等同於一般意義的慈悲施舍。“佈施是與神的契約”(21 世紀研究會：《伊斯蘭的世界地圖》第 53 頁)，是體現財產最終所有權歸真主的重要教規，與信仰的真誠程度相聯繫：同時履行社會財富再分配的功能。“《古蘭經》提及天課多達 80 餘處。……天課由專門機構徵收，其收入通常由宗教機構掌管，不納入國家財政預算、決算”(金宜久：《當代伊斯蘭教》第 320、330 頁)。清真寺徵收

的“天課”與中國寺廟的香火錢不同，不能用於寺廟本身的開支，必須大力施捨出去。“賑款祇歸於貧弱者、赤貧者、管理賑務者、心被團結者、無力贖身者、不能還債者、為主道工作者、途中窮困者；這是真正的定制”（《古蘭經》第2章60條）。遍佈世界各國的清真寺，在穆斯林履行收繳“天課”和發放施捨的職能。基於伊斯蘭對天課和施捨的格外強調，卡扎菲認為：“施捨，基本上是伊斯蘭教的社會主義精神的核心。……施捨基本上是走向社會主義的起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卡扎菲和利比亞》第145頁）。

<sup>54</sup> 所以，“天課與斷食明顯地表現出伊斯蘭特有的正義與平等觀。……天課與斷食，清晰地反映出伊斯蘭具有濃厚平等主義性格”（張錫模：《聖戰與文明》第64~65頁）。“齋戒在好幾個民族，在猶太人和基督徒中原已奉行。穆罕默德把它規定的極為嚴格，並把齋戒期延長為一個太陰月”（伏爾泰：《風俗論》上冊第313頁）。“為了恪守《古蘭經》的嚴謹教義，穆斯林必須將其收入的固定比例以‘佈施’名義捐給窮人，而穆斯林也在伊斯蘭曆9月進行齋戒，以使提醒自己勿忘窮人的困苦，因為窮人是無法依自己選擇的時間飲食”（凱倫·阿姆斯特壯：《伊斯蘭》第72頁）。

<sup>55</sup> “穆斯林皆兄弟”的平等原則，典型表現在最重要功課——朝聖。“朝聖活動對所有曾親歷過的穆斯林而言，都是最銘心刻骨的宗教經驗”（凱倫·阿姆斯特壯：《為神而戰》第75頁）。“朝聖期間，朝聖者不分皇帝、平民還是高官、百姓，人人披一塊白布，圍一塊白巾，穿一雙草鞋，相互間毫無差別，體現出穆斯林之間的平等”（張銘：《現代伊斯蘭復興運動》第69頁）。不僅如此，整個朝聖活動，沒有一個偶像高高在上，沒有一個領袖發號施令，沒有一個人上人需要眾人服從。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習慣的各色人等，操各種語言，從世界各地而來，兩百萬規模的集體活動，全憑朝聖說明手冊規定的程序自律和當地向導引導，這是任何世俗儀式和宗教儀式，不僅沒有而且不能想像的事情。因此，幾乎對每一個穆斯林，不管對伊斯蘭教義熟悉到什麼程度，參加麥加朝聖，都會發生巨大的心靈震撼。“然後已完成朝聖者，就懷著建構一個公義社會所不可或缺的精神自覺，回到這個世界。這當中的理性努力，即有賴於神話與儀式所喚起的精神力量”（凱倫·阿姆斯特壯：《為神而戰》第366頁）。

<sup>56</sup> 凱倫·阿姆斯特壯：《伊斯蘭》第240頁。

<sup>57</sup> 蔡佳禾：《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第280頁。《古蘭經》說：“天地



萬物，確是真主的”(第 24 章 64 條)：“天地的庫藏，祇是真主的”(第 63 章 7 條)。

<sup>58</sup> Koth：《伊斯蘭教的社會正義》第 105~106 頁。

<sup>59</sup> 《古蘭經》說：“你們應當信仰真主和使者，你們應當分舍他所委你們代管的財產，你們中通道而且施捨者，將受重大的報酬”(第 57 章 7 條)。

<sup>60</sup> 伏爾泰對此困惑不解：“禁止各種賭博可能是唯一的在其他宗教中沒有先例的教規。它更像修道院的清規，而不像普遍加於一個民族的法律”(伏爾泰：《風俗論》上冊第 314 頁)。

<sup>61</sup> 《古蘭經》說：“真主准許買賣，而禁止重利”(第 2 章 275 條)。鼓勵債權人“放棄餘欠的重利”(第 2 章 278 條)。“如果債務者是窘迫的，那末，你們應當待他寬裕的時候；你們若把他所欠的債施捨給他，那對於你們是更好的”(第 2 章 280 條)。“且違禁而取重利，並藉詐術而侵蝕別人的錢財，我已為他們中不信道的人而預備痛苦的刑罰”(第 4 章 161 條)。“所有財富皆歸阿拉，因此以財富為本錢放款生利，是不可赦免的。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因此真主賜予的財富也應平等分配。天課的觀念由此而生”(21 世紀研究會：《伊斯蘭的世界地圖》第 55 頁)。

<sup>62</sup> 《古蘭經》說：“你們應當吃，應當喝，但不要過分，真主確是不喜歡過分者的”(第 7 章 31 條)。“不義的人們曾追隨他們所享受的豪華的生活。他們是犯罪的人”(第 11 章 116 條)。“你不要揮霍，揮霍者確是惡魔的朋友，惡魔原是辜負主恩的”(第 17 章 26~27 條)。

<sup>63</sup> 《古蘭經》第 51 章 19 條。《古蘭經》還說：“析產的時候，如有親戚、孤兒、貧民在場，你們當以一部分遺產周濟他們”(第 4 章 8 條)。

<sup>64</sup> 《聖訓經》中記載穆罕默德說：“假如一個人沒有理由地三年不使用他所佔有的土地，那麼他就沒有權利再繼續佔有它”(劉天明：《伊斯蘭經濟思想》第 18 頁)。這與中國政府當前對房地產開發商的土地使用政策道理一樣。法理是土地所有權歸政府；地產開發商祇有經營權。不經營，即收回。

<sup>65</sup> 《古蘭經》第 9 章 34~35 條。

<sup>66</sup> 《古蘭經》說：“不分晝夜，不拘隱顯地施捨財物的人們，將在他們的主那裡享受報酬，他們將來沒有恐懼，也不憂愁”(第 2 章 274 條)。

<sup>67</sup> 1959 年，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總訓導師——穆斯塔法·西巴儀作如是說。他認為“真主既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主宰者，當然也是它們的真

正的和最終的所有者。這意味著人世間一切財物的佔有、使用和處分必須符合‘主命’。真主又允許世人佔有和利用原本屬於真主的財富，由此引伸財富的實際所有權觀念。這意味著人類可以隨意佔有和利用人世間的一切財物，而且每一個個人和群體皆有同等的權利。因此，伊斯蘭教承認私有財產的合法性，但同時又認為，勞動是獲取財富最正當的手段。作者指出，佔有財富本身並非目的，財富的佔有、利用必須正當得體，必須有益於個人和社會的進步”（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第 292~293 頁）。

<sup>64</sup> 馬哈茂德·謝爾塔特指出：“《古蘭經》把財富看作一件好事，但前提是財富由合法途徑獲得並用於造福他人，而且它本身不是一種目的，僅僅是一種手段。……致富是一項社會功能，其目的是確保社會的幸福，滿足社會的需要與利益。”60 年代，謝爾塔特任埃及愛資哈爾大學校長，著《社會主義與伊斯蘭教》，與穆斯塔法·西巴儀的《伊斯蘭社會主義》齊名（劉天明：《伊斯蘭經濟思想》第 174~175 頁）。

<sup>65</sup> 《古蘭經》說：“各人祇得享受自己的勞績”（第 53 章 39 條）。

<sup>70</sup> 《古蘭經》說：“在給養上，真主使你們中一部分人超過另一部分人”（第 16 章 71 條）。

<sup>7</sup> 即便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法理上，也沒有什麼“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規定（崔之元：“財產權與憲法之關係的比較研究”，《香港傳真》No.2003~9）。

<sup>72</sup> Kotb：《伊斯蘭教的社會正義》第 110 頁。該書第六章“伊斯蘭的經濟理論”，是關於伊斯蘭財產權理解的展開闡述（第 100~138 頁）。

<sup>73</sup> 蔡德貴：《當代伊斯蘭阿拉伯哲學研究》第 204 頁。

<sup>71</sup> 錢學文：《當代沙特阿拉伯王國社會與文化》。

<sup>75</sup> 納賽爾為了論證國有化的合法性，引用“聖訓”中說“人們共享三種物品——水、牧草和火”，說明社會的基本物品必須歸國家所有，個人不得壟斷，硬說“穆罕默德是第一個實施國有化政策的人”（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 98 頁）。

<sup>76</sup> 金宜久：《當代伊斯蘭教》第 187 頁。

<sup>17</sup> 布倫蒂·萊西特：《卡扎菲傳》第 107 頁。

<sup>78</sup> 卡扎菲還說：“社會主義就是不知疲倦的集體勞動……引導我們走向平

等和正義的社會。……我們的社會主義是伊斯蘭教的社會主義。是真正宗教信仰的社會主義。是在我國人民的祖產和信條中生根發芽的社會主義。……我們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就是源起於真正的伊斯蘭教和《古蘭經》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政府將社會主義理解為‘社會正義’”（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卡扎菲和利比亞》第144頁）。

<sup>79</sup> 布托還說：“巴基斯坦如果沒有伊斯蘭教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就不可能存在。社會主義政府不會去爭那個最高的權威。相反，社會主義要把全體人民都變作伊斯蘭價值的衛道士。”布托1971年掌權，全力推動伊斯蘭社會主義（唐吳、彭沛：《巴基斯坦、孟加拉》第132頁）。

<sup>80</sup> 伊克巴爾把馬克思稱為“未經過啟蒙的摩西”、“未曾在十字架上遇難的耶穌基督”，認為馬克思著作“幾乎具有宗教經典似的啟示作用。”伊克巴爾之後，西哈瓦維找出伊斯蘭與科學社會主義的五點共同之處：“禁止特權階層壟斷社會財富；由國家來組建社會經濟結構以保障社會福利；全體社會成員機會均等；社會的集體利益優先於個人特權；通過社會革命消滅階級，消除剝削者與被剝削者、有產者與無產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差別”（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第272、277頁）。

<sup>81</sup> 湯因比：《文明經受著考驗》第240頁。因為這個原因，湯因比困惑道：“伊斯蘭地區這種不接受共產主義的現象，我實在感到不可理解”（《展望21世紀》第221頁）。

<sup>82</sup> 19世紀末，當代泛伊斯蘭主義宗師阿富汗尼喊出“全世界穆斯林聯合起來”（張銘：《現代伊斯蘭復興運動》第112頁）。

<sup>83</sup> 蘇聯是最早承認以色列的國家之一。第一次中東戰爭，以色列“祇能從捷克斯洛伐克得到武器補給”（21世紀研究會：《伊斯蘭的世界地圖》第69頁）。埃及全面倒向蘇聯以後，第三次中東戰爭，美國全力以赴支持以色列，蘇聯為了避免和美國正面衝突，對埃及補充軍火和購買尖端武器的要求半推半就，阿拉伯慘敗，從此埋下薩達特日後倒向美國，在一週內驅逐1.7萬名蘇聯專家的種子（彭樹智：《阿拉伯國家通史》第284頁）。

<sup>84</sup> 《綠皮書解釋》。利比亞還出版了卡扎菲《綠皮書》的語錄本，成為人手一冊的“綠寶書”（蔡德貴：《當代伊斯蘭阿拉伯哲學研究》第495~497頁）。

- <sup>85</sup> 布倫蒂、萊西特：《卡扎菲傳》第 135、149 頁。
- <sup>86</sup> 卡扎菲：《綠皮書》第 3~87 頁。
- <sup>87</sup> 布倫蒂、萊西特：《卡扎菲傳》第 135、149 頁。
- <sup>88</sup> 裡通外國者除外。
- <sup>89</sup> 1993 年，利比亞四百萬人口，各類行政人員 70 萬。等因奉此，人浮於事。卡扎菲改革政府，成立公社。“公社由人民大會和人民委員會組成。人民委員會由各部門秘書組成，每一部門的秘書可以同總人民委員會相應秘書直接聯繫。但由於公社數目多，距離遠，總人民委員會秘書難以與各公社人民委員會秘書同時聯繫。為此，在總人民委員會與公社委員會之間設數十個中間聯繫點，稱為重要點。在每個重要點建立人民社會領導機構，這些機構享有總人民委員會所享有的許可權，同公社有關人民委員會直接聯繫”（時延春：《中東風雲人物》第 128~129 頁）。
- <sup>90</sup> 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 142 頁。
- <sup>91</sup> 布倫蒂、萊西特：《卡扎菲傳》第 149 頁。
- <sup>92</sup> 劉天明：《伊斯蘭經濟思想》第 191 頁。
- <sup>93</sup> 蔡德貴：《當代伊斯蘭阿拉伯哲學研究》第 496 頁。巴基斯坦的伊克巴爾也說：“祇有通過伊斯蘭教的精神和倫理原則，才能實現最高的社會主義任務”（金宜久：《當代伊斯蘭教》第 184 頁）。當蘇聯改革陷入困境之際，霍梅尼甚至給戈爾巴喬夫寫信，“勸告他求助伊斯蘭教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以尋求本國問題的答案”（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 297 頁）。
- <sup>94</sup> 伊拉克公營部門的比例，石油工業從 0.4% 上升到 100%，製造業從 41% 上升到 51%，商業從 11% 上升到 53%，外貿從 41% 上升到 89%，農業從 1% 上升到 29%。到 1975 年，全國農村還建立了 103 個農村工業中心，756 個掃盲中心，234 個社會中心和 234 個鄉村圖書館。小學入學率超過 100% 是因為男女入學率均包括超齡人口和外籍兒童（黃民興：《中東國家通史：伊拉克卷》第 270、277、282、279 頁）。
- <sup>95</sup> 張俊彥：《中東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研究》第 127 頁。
- <sup>96</sup> 殷罡、秦海波：《薩達姆·侯賽因》第 118 頁。受經濟發展的鼓舞，“薩達姆也修改了‘沒有阿拉伯統一便沒有社會主義’的傳統觀點，指出盛

產石油的伊拉克能夠自力更生，高速度地‘一國建成社會主義’”(黃民興：《中東國家通史：伊拉克卷》第 293~294 頁)。

<sup>97</sup> 布倫蒂·萊西特：《卡扎菲傳》第 131~138 頁。

<sup>98</sup> 江紅著《為石油而戰》，用充分翔實的事實材料，生動描述了這個驚心動魄的歷史過程。理解石油政治和中東政治，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必讀書。直到 70 年代，西方公司仍然控制中東石油產量的 87.6%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全球變局：美國與伊拉克》第 295 頁)。1972 年，伊拉克政府堅決實行石油國有化，“從而開了將外國石油公司國有化的先河”(江紅：《為石油而戰》第 369 頁)。

<sup>99</sup> “充分就業與收入平等化的和諧共存，是戰後時代的特點，而現在這種共存似乎不再可能了。許多人都相信，北美的積極的就業成績祇能通過放鬆管制和開放市場來達到，而這兩者又轉而報賞勝利者，懲罰失敗者：從而加深了工資和家庭收入的不平等，提高了貧困率，甚至可能是‘下層階級’重新出現”(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轉變中的福利國家》第 5 頁)。約翰·格雷用“劣幣驅逐良幣”的原理，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是“最惡劣的資本主義”驅逐“優良的資本主義”(約翰·格雷：《偽黎明：全球資本主義的幻象》第四章)。

<sup>100</sup> 80 年代，“與中等收入者相比，10%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在美國減少了 11%，在英國減少了 14%，在加拿大減少了 9%，在澳大利亞減少了 5%”(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轉變中的福利國家》第 22 頁)。

<sup>101</sup> 薩達姆講話：“當一個人失去了信仰和激勵的時候，就會開始頹廢”(馬塔爾：《薩達姆·侯賽因》第 237 頁)。

<sup>102</sup> Himmelfarb：《一個國家兩種文化》第 20 頁。

<sup>103</sup> 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第 127~128 頁。

<sup>104</sup> 福山哀歎：“美國大約有 1%以上的人口被關在監獄裡。……至 90 年代中期，白人社區中的單親家庭比率已經接近 30%。……在許多內陸城市的街區，黑人單親家庭已上昇到 70%。……美國個人主義以犧牲社團精神為代價而不斷膨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基本的一個原因就是資本主義本身。……理性的欲望或多或少與新古典主義經濟的理性功利最大化相對應：無止境地積累物質財富，滿足不斷增長的欲望和需求”(福山：《歷史的終結》第 13、61、312、357 頁)。

<sup>105</sup> 福山的《大分裂》分三篇，即“大分裂”、“論道德體系”和“大重建”。除

了重復《信任》一書中對道德淪喪、家庭破裂、犯罪猖獗、社會動亂的哀嘆之外，最後的結束語是：“在政治和經濟領域，歷史看上去是向前進的，而且是有方向的：在 20 世紀末，歷史在自由民主方面達到了頂點。但在社會和道德領域，歷史似乎呈現出週期性，社會秩序在數代人間有過一輪又一輪的興衰漲落。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確保這種循環始終保持向上的趨勢。我們懷有希望，唯一的理由就是人所具有的那種十分強大的重建社會秩序的能力。而此種重建的成功則決定了歷史之箭向上運行的方向”（第 350 頁）。“歷史在自由民主方面達到了頂點。但在社會和道德領域”，是社會大分裂和道德淪喪，所以要“重建社會秩序”。——說什麼呢？



## 第二章

# 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2.1 社會主義開放改革

2.2 原教旨主義反思





社會主義失敗，資本主義勝利，原教旨主義復興。

1967 年阿以戰爭慘敗，整個西奈半島淪陷敵手，納賽爾風靡一時的民族主義加社會主義，被實踐檢驗得一敗塗地。媒體公開批評說：“納賽爾的社會主義是貧窮的社會主義。它分配的是貧窮。”<sup>106</sup> 1970 年，納賽爾英年早逝。薩達特經過第四次中東戰爭站穩腳跟之後，全面改弦更張。

## 2.1 社會主義開放改革

在國際關係外交上，埃及從蘇修倒向美帝，經過美國斡旋，單獨與以色列和談。為此，埃及被開除出阿拉伯國家聯盟和伊斯蘭國家會議，原本設在開羅的阿拉伯聯盟總部，也搬到突尼斯；埃及幾乎被趕出不結盟運動。<sup>107</sup>

在國內經濟體制上，薩達特指責納賽爾“非常愚蠢地搬用了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全面改革僵化的計劃體制，成立“阿拉伯資金和自由區”，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改革國有企業，鼓勵私營經濟，獲得經濟增長的巨大成就。在納賽爾搞社會主義的時候，“1961~1965 年是埃及歷史上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年均增長 5.5%。1967~1973 年由於爆發了兩次中東戰爭，損失巨大，軍費負擔沉重，經濟陷入困境，年均增長降為 3.5%。1974 年以後，一方面實行了開放政策，吸收了幾十億埃鎊資金，另一方面同以色列媾和後可以把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用於發展經濟，因此，經濟增長速度加快。經濟增長率不僅大於前一時期，而且超過歷史上最好時期。自 1975 年至 1981/82 年度年

均增長 8.4%。”<sup>108</sup>

與此同時，公營工業產值從 1971 年的 80% 降到 1981~1982 年度的 62%，私營和合資企業的比重上昇到 38%。經濟增長帶來生活水平提高。1974~1980 年，進口香煙和手錶增長了十倍，家用電器增長 12 倍，高檔食品增長 18 倍，進口汽車增長 20.5 倍（1973~1981 年）。“60 年代小汽車在開羅大街上可以輕而易舉找到停放處，實行開放政策以後，小汽車日益增多，充斥大街小巷，要找到一個合適的停放處越來越難。”<sup>109</sup>

薩達特的改革開放，一方面帶來經濟高速增長，一方面產生日益嚴重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急功近利的“短平快”投資，迅速造成街面上的繁榮景象，卻不可能從研究開發的基礎層面上，提昇產業的競爭能力，經濟增長缺乏持續發展的後勁。外資和私營經濟集中在賓館、房地產、金融和服務業。到 1982 年，全社會已投產項目中，工農業生產型項目佔全部項目資金的 26.4%；金融服務業等非生產型項目佔了 68.7%。豪華旅館過剩，奢靡之風盛行。遍地開花的外資銀行，自有資本加外國存款，祇佔負債總額的 17%。外資銀行祇拿 42% 的埃及存款用於當地投資，其餘大多匯出國外。<sup>110</sup>引進外資變成內資外流。

更致命的是，從計劃到市場的改革開放，“非法致富成為令人矚目的社會問題。”黑市走私、貪贓枉法、偷稅漏稅，以權謀私，非法經營猖獗，貪污腐敗盛行。

商業資產階級同當局的关系日益密切，富室巨家上臺為官，政府大員下野經商，有的人甚至一身兼二任，亦官亦商，

類似的現象相當普遍。1976 年一位作家披露：在商業代理以及從事進口貿易或承包等大商人中，有兩位前總理和 22 位前部長，以及數十名前國營企業董事長、國務秘書或省長。他斷定，“大部分‘重要交易’都是通過這些人做成的。”“投資和自由區總組織”的一位原官員在職時兼任數家外國銀行和公司的董事。公營公司的一些職員常在離任前就開辦私營企業，有時還利用公營公司的設備和人員為自己的企業服務，然後再把企業生產的低劣產品高價賣給公司。

1975 年 10 月海卡爾評述道：“你們已經看到開羅有好多新汽車。一個新的階級正在崛起。……它是一個寄生階級。他們以寄生活動、黑市、非法貿易、傭金、賄賂為生，創造了一種十分奢侈、庸俗的消費模式。”<sup>111</sup>

非法致富嚴重破壞了埃及的社會風氣。貪污的“普遍性使例外成為慣例，慣例成為例外。貪污腐化成為慣例，誠實成為例外。”政府要員、銀行和公營部門的高級職員，“仰仗權勢、金錢和關係網，結交權貴和金融家，通過種種不正當的手段，轉眼間成為暴發戶。”1974~1981 年、短短七年時間，埃及的百萬富翁增加了 90 倍。“多數埃及人對那些非法致富的富豪憤恨不已。”他們“從零開始，一夜之間積聚了數以百萬埃鎊計的巨大財富。”有議員說：“埃及現在有 1.7 萬個百萬富翁，其中七千人可能祇是因為通貨膨脹使他們的土地或其他財產增值而致富的，另外一萬人新增的財富則不能認為是合法的。”<sup>112</sup>

這樣生產少而分配多的財富集聚，必然導致貧富分化的社會後果。“埃及中產階層佔國民收入的比例由 1965 年的 40.2%

下降到 1976 年的 21.52%，佔人口總數 60% 的低收入階層，其收入由 60 年代中期佔國民收入的 28.7% 下降到 1976 年的 19.93%，同時，佔人口僅 10% 的富有階層的收入由佔國民收入的 31.1% 上昇到 58.55%。”<sup>113</sup> “1977 年，農業資產階級每戶年均收入為 8727 埃鎊，貧苦農民每戶年均收入僅 472 埃鎊，祇有前者收入的 5.4%。而農業資產階級的上層，每戶年收入高達 3.6 萬埃鎊，是貧苦農民每戶收入的 75 倍多。”到 1980 年，44% 的農村人口和 33% 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sup>114</sup>

## 2.2 原教旨主義反思

從社會主義公平到資本主義效率，社會實踐的巨大反差，引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反思。<sup>115</sup> 從埃及發起的穆斯林兄弟會，迅速成長為當代最大的原教旨主義組織，掀起了新一輪伊斯蘭復興運動。繼埃及之後，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約旦、伊拉克、蘇丹、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科威特，乃至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都有兄弟會組織。“埃及等阿拉伯國家政府相信有一個國際性的穆斯林兄弟會的領導機構，負責協調各分支組織的活動。”<sup>116</sup> 不僅大名鼎鼎的阿拉法特是兄弟會出身，大名鼎鼎的哈馬斯——伊斯蘭抵抗運動，也是兄弟會的一個分支。<sup>117</sup>

值得注意，兄弟會興起之初，並不是見誰都呲牙的極端好戰組織。他們以扶貧濟困為己任，到處興建清真寺，為窮人辦學校，為工人辦夜校，為公務員辦考試補習學校，到農村創辦

鄉村診所和醫院，改善貧困農村的衛生設施和健康教育。“兄弟會還創立現代工會，指導工人爭取自身權利。他們揭發某些極惡劣的苛待勞工的案例，還藉由自辦在印刷、紡織、工程諸領域的工廠、事業，來積極創造就業機會。”

兄弟會的非凡成功，可說是出人意料地證明了以下事實：即不論知識分子與博學之士如何定論，埃及民眾大多卻想過著虔誠生活。此外這也顯示出，伊斯蘭也可以是進步的。他們並未原原本本的回歸七世紀時的生活實踐。兄弟會對沙特阿拉伯新興的瓦哈比王國極力批判，並譴責它對截斷竊賊手掌或向通姦者擲石至死等伊斯蘭律法的字面解讀。兄弟會對伊斯蘭國度未來應有的政體型態，並無一個明確想法，但強調為忠於《古蘭經》與聖行的精神，沙特王國應有較當時更公平的財富分配。他們的這類一般性想法，確與時代同步：統治者應由選舉產生（一如穆斯林的早期生活），還有，誠如諸正統哈里發所言，統治者必須對人民負責，而不應肆行獨裁統治。<sup>118</sup>

穆斯林兄弟們不僅積極參與民族解放運動，而且為社會主義革命搖旗吶喊。一方面，兄弟會在宗教信仰上與無神論不共戴天。<sup>119</sup> 另一方面，兄弟會創始人哈桑·班納始終相信：“世界最終是要走向大同的，這是毫無疑問的，祇是時間早晚的問題”。<sup>120</sup> 他贊許“共產黨制度最大的價值在於加強平等觀念，譴責階級差別以及同財產——差別的根源——的權利主張作鬥爭。”<sup>121</sup> 1947年，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發動工人認股興辦工廠，口口聲聲“恢復伊斯蘭社會主義的嘗試”。<sup>122</sup> 敘利亞的穆斯林兄

弟會則乾脆名稱“伊斯蘭社會主義陣線”。<sup>123</sup>

除了無神論，社會主義與伊斯蘭教另一個咬不上茬的是公有制。1959年，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的總訓導師穆斯塔法·西巴儀著《伊斯蘭社會主義》，展開論證實行公有制的宗教合法性。核心思想是財產管理是一種社會功能，國家不能允許把它當成剝削和壓迫的手段。為了國家利益，或者當某種財產的佔有會成為剝削時，應當實施國有化。<sup>124</sup>“1958年，埃敘合併後，敘的兄弟會像其它政黨和埃及的兄弟會一樣被宣佈為非法，它的領袖西巴儀也被囚禁（60年代初死於獄中）。”<sup>125</sup>兄弟會慘遭嚴厲鎮壓，西巴儀大義凜然，為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鳴鑼開道，幾乎成為伊斯蘭世界有關社會主義的必讀書，多次再版印刷。<sup>126</sup>納賽爾高興地稱其為“對埃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表述。”<sup>127</sup>伊斯蘭對公平社會的強烈追求，與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經濟制度和助人為樂的道德規範，理論上殊途而同歸，理念上異曲而同工。<sup>128</sup>

當社會主義實踐呈現集權、特權、吃大鍋飯等種種弊端，特別是薩達特的改革開放，外交上與以色列媾和，內政上與資本家勾結，自由化釋放出貪污腐敗，非法致富，越來越多的穆斯林兄弟與世俗政權的既得利益漸行漸遠，在理論層面上，沿著卡扎菲繼續革命的邏輯方向脫穎而出，回歸伊斯蘭聖賢原著了。溯本求源，社會主義是無神論的唯物主義，躲不開講究物質利益的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國際關係上唯利是圖的帝國主義。祇有伊斯蘭既是政治又是宗教，同時滿足人類的物質享受和精神需求。堅持公平社會的理想追求，從根本上說，還得堅

定信仰，回到《古蘭經》諄諄教導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兩手都要硬。

伊斯蘭認為，世間一切經濟問題，都是由於人的無窮欲望與有限物質之間的矛盾引起的。經濟學研究經濟人，怎麼研究也解決不了無窮欲望與有限物質的矛盾。祇要人們具備了伊斯蘭教義所要求的誠實、公正、承擔社會責任和利他主義的品質，現實經濟生活中的一切矛盾都不難解決。<sup>129</sup> 所以，伊斯蘭的所謂“聖戰”，不僅僅是對外改造社會，更重要的是對內鬥私批修，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修身養性，淨化靈魂，與自己行為上、思想裡不符合教義的私心雜念作鬥爭。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是一場更艱難、更持久、更廣泛、更深刻的聖戰。<sup>130</sup> 所以要一天五次早請示午檢查晚匯報，直接面對真主反省自新，警心滌慮，不厭其煩。割禮淨身、忌口戒齋、頌經禮拜、“天課”施捨，理論聯繫實際，力學篤行，如切如蹉，如琢如磨。<sup>131</sup>

改造主觀世界與改造客觀世界，是相互依存的對立統一。穆斯林越是積極熱情修身養性，越是培育政治上的激進主義，增強反抗壓迫和打造公平社會的強大動力。這一點，倒是有些類似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積極入世精神。<sup>132</sup>

戰爭與穆斯林社群的靈修生活是如此緊密相扣，因此他們從不認為退隱山林是靈修至高無上的義務：他們必須從事“吉哈德”，但不是以一種過時的復古精神或狂飆怒吼的心態，而是秉持自我犧牲、勇敢堅忍的精神從事這項奮鬥。……在隱修生活中遺世苦修並非真正的“放下自我”，真正的“放下自我”是



要全心全意為捍衛神的子民而奮鬥，即使受苦、犧牲生命都在所不惜。<sup>133</sup>

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對立統一總結經驗，哈桑·班納講話：“我們犯的第一個錯誤就是忘記了這個原則，使政教分離了。雖然在我們的憲法中明確規定伊斯蘭教是國教，但是這樣的憲法條文並沒有能夠阻止政府領導人和政黨領袖去敗壞伊斯蘭的崇高原則，破壞它在人們心目中的純潔形象，因為他們一再宣稱，由於政治的需要，他們必須離開宗教的有關教導。這也就是軟弱和腐敗的主要根源。”<sup>134</sup> 換言之，離開了信仰的道德約束，是腐敗蔓延的主要原因。

繼哈桑·班納之後，巴基斯坦的毛杜迪成為伊斯蘭復興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毛杜迪用階級分析為武器，在《人類的經濟問題和伊斯蘭的解決方法》中，深揭猛批資本主義：

使社會分化為兩個階級：一個小的階級，他們擁有超越基本要求龐大生活財富，並利用這些財富去獲得更多的生活財富；另一個是大的階級，僅擁有基本的需求財富，或擁有比基本需求要少的財富，或一無所有。這兩個階級的利益不僅相互衝撞、對立，而且不可避免地導致相互的鬥爭和衝突。……隨著鬥爭的發展，窮人的階級在不斷增加，富人的階級卻逐步減少數量，相互鬥爭的非常自然的結果是一個富裕的人用他的財富力量將擁有比他財富少的人的財富吸收過來，後者被拋入較低的階層中。這個世界的生活財富用這種方法正在一天天逐漸地集中和限於愈來愈少的人口手中。較大部分人口必然逐漸地趨向絕對貧苦或完全隸屬於富有階層。……通過國際交易，一

小撮銀行家、經紀人、工業和商企經理完全集中控制全人類所依賴的全世界被減少的經濟資源。……每個人都被迫成為那些工業頭領和財金寡頭的眾多勞動者、僕人和奴隸。……正確和錯誤、公正和不公正之間的區別在生活財富的獲得之中已幾乎沒有。一個人用掠奪或毀滅其他人的每一種使自己富有的方法，從法律的角度來看是被允許的。酒可以被釀造和出售，不道德的中心可以被建立，不道德的電影可以被生產，淫穢的作品可以被出版，宣揚情欲內容的畫被用作廣告，投機買賣可以成為合法，獲取利息和高利貸的機構可以被建立，新的賭博方法被發明。<sup>135</sup>

面對蘇聯、東歐以及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種種弊端和挫折，毛杜迪毅然主張復興伊斯蘭，高唱原教旨主義的《國際歌》：

要通過伊斯蘭聖戰首先在一個伊斯蘭國家取得勝利，然後再向其他伊斯蘭國家和社會發展，然後走向世界。讓伊斯蘭擔負起世界道德、思想和政治的先鋒和領導。

對於一個穆斯林來講，反對資本主義文明的鬥爭是生死存亡的鬥爭，它要比一個共產黨員反對資本主義鬥爭嚴峻得多，尖銳得多。因此我們必須完全徹底根除資本主義道德，資本主義思想，資本主義制度。<sup>136</sup>

埃及穆斯林兄弟會領袖庫特卜，一輩子謀反、坐牢、生病、寫作，最後在法庭上慷慨陳辭，“在納賽爾個人的堅持下”被判刑絞死。<sup>137</sup> 庫特卜在監獄裡目睹警察對穆斯林兄弟們慘無

人道的嚴刑拷打，殘酷迫害，迸發出激進革命的思想，被譽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靈魂”。<sup>138</sup>“庫特卜稱得上的是遜尼派基本教義派的創始人，往後幾乎所有的激進伊斯蘭分子，都有賴於他在獄中發展出來的這套意識形態。”<sup>139</sup>他把整個世界（包括主客觀世界）一分為二，把不符合伊斯蘭教義的主客觀世界，包括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政權形態、哲學思想和個人頭腦裡的私心雜念，統稱為蒙昧狀態——“賈希利亞”。穆斯林的任務是嚴格按照伊斯蘭教義，對“賈希利亞”展開不妥協的鬥爭，包括奪取政權、改造社會的聖戰，也包括個人修養上的聖戰——鬥私批修。<sup>140</sup>庫特卜一分為二的兩個世界，同時對非伊斯蘭文化和非穆斯林人群產生巨大壓力，指責他是非此即彼的思想極端。庫特卜對物慾橫流的醜陋現象深惡痛絕：

人類今天正生活在一處大妓院裡！祇要看一眼時下的報刊、電影、時裝表演、選美賽、舞廳、酒吧和廣播電視，你就知道我所言不虛！要不也可以去觀察世人對裸體的瘋狂欲念、動輒擺出來的挑逗姿態，以及文學、藝術和大眾媒介當中，既病態又令人想入非非的訊息！不僅如此，那刺激人類對金錢的貪欲並造就財富不當積累與投資的高利貸制度，還有欺詐、詭騙及勒索手段，全都披上了法律的外衣。<sup>141</sup>

在批判資本主義的同時，庫特卜竭力貶低蘇聯東歐的實踐，力圖讓伊斯蘭擺脫共產主義的光芒籠罩，成為高居二者之上的唯一正確：

共產主義與伊斯蘭的意識形態雖然是相似，但並不完全一

致。……伊斯蘭教是一種社會哲學，也是一種經濟制度，是獨立存在的。它的某些外形也許與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相似，但實際上，與這兩種制度完全不同。它兼有兩種制度的各種優點，而又不包含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所有的錯誤和墮落。伊斯蘭教並不贊同個人主義發展到令人討厭的地步，就像西方認為那樣，個人的一切是社會法律的基礎，以及個人利益必須在任何情況得到保護，甚至連侵犯了公共利益時也不例外。這種病態在西方自由滋長，因而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所謂個人自由的概念，實際上建築在侵犯，剝削別人，包括培養他的團體。伊斯蘭教強調社會重要性時，也不像東歐國家那樣，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們堅持社會是人類生活的基礎，個人僅是毫無意義的一份子，存在與否跟大眾無任何聯繫。由此，祇有社會團體可享受自由和權力，個人卻根本無權過問他的上級，或要求得到最基本的權力。這樣，共產主義掌握了國家的全部權力和命運，隨心所欲地決定個人的全部生活。

伊斯蘭教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極端中的一種平衡。<sup>142</sup>

不管怎麼說，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決非簡單宗教意義上的懷舊遁世、神秘復古，具有反對資本主義的強大現實意義。

穆斯林和歐洲人都承襲了西方的遺緒，西方世界所有的問題都源自中世紀：現代語言、商業都市、資本主義經濟（以及隨之而起的銀行、支票和基本利率）都是中世紀的發明。中世紀時期，我們目睹現代軍隊的崛起、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的興起、帝國議會以選舉代議會的形式選舉日耳曼皇帝、超自然聯

邦概念的形成、貧富間的抗爭、異端邪說或意識形態分歧的觀念，甚至我們此刻對愛情的觀念，認為愛是苦樂參半、深具毀滅性的，這一切的開端都在中世紀。我甚至可以加上教會與政府的衝突、工會勢力的崛起（雖然當時是以社團的模式組成）、科技誕生後勞力模式的轉型。

所以，阿姆斯特壯說：“誠然，穆罕默德所宣講的或許未能全然切合近代西方社會主義的觀念，但我們若深入分析，就會發現他確實是個社會主義者，為所謂‘伊斯蘭精神’留下無法抹滅的印記。”<sup>143</sup>或許正是在這種現實意義理解的基礎上，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被北約的參謀長稱作“新共產主義”，<sup>144</sup>也有俄國人稱“綠色共產主義”。<sup>145</sup>——“伊斯蘭成為共產主義邪惡帝國最適當的繼承人。”<sup>146</sup>埃及著名的政治評論家穆罕默德·海卡爾同意說：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最貧窮的地區蓬勃發展並從貧困中得到滋養並不是偶然。如果你是一名年輕的阿拉伯人，如果你受了教育，又回到了你的村莊，但是找不到工作，你自然有可能變成激進分子。在過去，你可能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而如今你會成為一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sup>147</sup>

從1928年哈桑·班納創建穆斯林兄弟會伊始，原教旨主義立下了與世俗政權勢不兩立的宗旨。<sup>148</sup>儘管如此，穆斯林兄弟會與民族解放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先後都有過同路一段的經歷。50~60年代的社會主義高潮過去，70年代末以降，原教旨主義從埃及向世界各國穆斯林迅猛蔓延。從少數人的地下

活動，轉變成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從合法選舉加非法暗殺，轉變成伊朗、阿富汗、蘇丹、阿爾及利亞的群眾運動加武裝鬥爭式的社會革命。1960~1997年，世界20%最富人口與20%最窮人口之間的收入差距，從30比1擴大到74比1。<sup>149</sup>貧富分化愈演愈烈，原教旨主義復興愈演愈烈。特別是80年代末以後，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資本主義全球化橫行，往伊斯蘭復興的乾柴烈火上火上澆油。唯利是圖席捲乾坤，社會進步歷史終結。只剩下最後一本《古蘭經》還在繼續嘟囔：

一切為了不致使財富祇在你們富人中間流通。<sup>150</sup>

#### 註釋：

<sup>146</sup> 《國際穆斯林新聞》(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163頁)。

<sup>147</sup> 從第一次中東戰爭以後，阿拉伯國家定下與以色列不承認、不談判、不媾和的“三不”原則。埃及與以色列建交媾和，被指責為叛變行為。1977年，伊拉克、敘利亞等國和巴解組織成立“拒絕陣線”，宣佈凍結同埃及的外交和政治關係。敘利亞宣佈薩達特訪問以色列的日子為“全國哀悼日”。1979年3月，埃及和以色列簽定和約後，18個阿拉伯國家外長和財長舉行會議，決定同埃及斷絕一切政治和外交關係，停止所有援助，實行石油禁運，中止埃及的阿盟成員資格。後來，除了蘇丹、阿曼和索馬里，其餘阿拉伯國家都同埃及斷交，巴解組織也關閉了在開羅的辦事處。5月，伊斯蘭國家外長會議通過決議，中止埃及參加伊斯蘭國家會議的資格(楊瀨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308~321頁)。9月，不結盟運動在哈瓦那會議，幾乎當場把埃及代表驅除(布特羅斯·加利：《埃及通往耶路撒冷之路》第278~299頁)。

<sup>148</sup> 楊瀨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351、361頁。

- 109 1973 年，開羅小汽車 15.7 萬輛；1985 年增加到 76.2 萬輛（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 369~370 頁）。
- 110 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 368 頁。
- 111 穆罕默德·海卡爾曾任納賽爾政府的外交部長、新聞部長和《金字塔報》主編（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 371~377、426~427 頁）。
- 112 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 371~380、427 頁。
- 113 蔡德貴：《當代伊斯蘭阿拉伯哲學研究》第 166 頁。
- 114 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 426~430 頁。
- 115 第三次中東戰爭慘敗以後，薩達特改革開放，從蘇聯倒向美國，為了推行非納賽爾化的“糾偏”運動，從獄中釋放兄弟會成員，利用他們來打擊納賽爾主義的左派勢力，促成宗教勢力發展（金宜久、吳雲貴：《伊斯蘭與國際熱點》第 160~163 頁）。
- 116 21 世紀研究會：《伊斯蘭的世界地圖》第 71 頁；曲洪：《當代中東政治伊斯蘭》第 128~130 頁。
- 117 “哈馬斯是‘穆斯林兄弟會’的一個分支，擁有大批成員、支持者和同情者。據以色列有關人士估計，到 1992 年，其成員約有兩萬人，加沙地帶約有 50% 的人支持它”（左文華、肖憲：《當代中東國際關係》第 359 頁）。1994 年又發展到三萬人（陳嘉厚：《現代伊斯蘭主義》第 468 頁）。現在就更多了。
- 118 凱倫·阿姆斯壯：《為神而戰》第 324~325 頁。
- 119 從宗教信仰出發，哈桑·班納認為共產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危險，因為前者是無神論，後者畢竟是一神論的基督教。他甚至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當時很多從蘇聯移民以色列的猶太人、立志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猶太復國運動聯繫起來，認為共產主義是猶太人的學說——馬克思是猶太人（楊灝城、朱克柔：《當代中東熱點問題的歷史探索》第 347 頁）。“巴勒斯坦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一直帶有比較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其領導人中有不少是來自東歐的社會主義者，使蘇聯當局感到與之意識形態方面比較接近。當時巴勒斯坦猶太社團是中東地區唯一共產黨處於合法地位的地方，蘇聯甚至希望未來的猶太國家能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成為一個親蘇國家”（肖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第 125 頁）。

- <sup>120</sup> 蔡德貴：《當代伊斯蘭阿拉伯哲學研究》第 181 頁。
- <sup>121</sup> 哈桑·班納：《伊斯蘭世界的復興》（仲躋昆：《阿拉伯：1002 夜》第 317~318 頁）。
- <sup>122</sup> 金宜久：《當代伊斯蘭教》第 185 頁。
- <sup>123</sup> 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第 291 頁。
- <sup>124</sup> 西巴儀論証說：“財產是一種社會功能：國家不允許利用它來作為一種壓迫和剝削的手段。……財富牽扯到社會責任：合法施捨、給親屬的補助金、社會互助。……對社會所必需的商品和物品可以實施國有化，但祇有當某人或某些人對這些東西的佔有牽扯到對社會的剝削時，還必須由經濟專家們同意，這樣做顯然是為了國家利益的情況下，才可以進行。……在承認私有財產的合法性質時伊斯蘭社會主義允許那些具有才幹的人參與建設性的競爭，因為這是推廣文明和發展生產的一個基本條件。……伊斯蘭社會主義實際上符合人類的本性。它滿足了所有公民的尊嚴以及他們的利益。對於工人，它提供體面的生活水準和有保障的前途；對於資本家，它開闢了在國家控制下進行生產的廣闊天地”（劉天明：《伊斯蘭經濟思想》第 173 頁）。
- <sup>125</sup> 金宜久、吳雲貴：《伊斯蘭與國際熱點》第 127 頁。
- <sup>126</sup> “當時埃及與敘利亞的關係已告破裂。一位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時稱‘伊斯蘭社會主義陣線’）領導人的著作能在‘兄弟會’已被取締的鄰國埃及出版發行，這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情。它使人聯想到伊斯蘭教與阿拉伯社會主義以及埃及之間種種複雜的關係。其值得注意的背景有二：一是穆斯林兄弟會一向以創建一個公正合理的社會制度為根本目標，其成員欲把這一理想與社會主義認同並非難事，祇須把社會主義原則作宗教的解讀、貼上宗教標籤就足夠了。二是 50 年代晚期埃及穆斯林兄弟會與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在鬥爭策略上存有分歧。埃及的一支主張以暴力推翻納賽爾政府，而敘利亞的一支傾向於以和平手段向敘利亞復興社會黨政府周旋”（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第 291 頁）。
- <sup>127</sup> 埃及 1961 年頒佈《社會主義法》，開始全面推行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革命”（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 140 頁）。
- <sup>128</sup> 哈桑·班納的社會主張是：“改革目前各階層之間存在的巨大差別的不合理現象，縮小差別，要消滅豪富和赤貧；反對放貸；徵收天課；向



商人以資本(不是利潤)累進制徵集稅收，窮人免稅，把徵集的稅收用在提高貧苦人的生活水平方面；鼓勵慈善事業，鼓勵在齋日和伊斯蘭節日施捨，接濟窮人；改變農村土地擁有量存在的巨大差別的不合理現象，徵收大地主的部分土地財產，給他們一定的合理報酬，把政府擁有的土地合理分配給農民；鼓勵土地私有制；等等”(蔡德貴：《當代伊斯蘭阿拉伯哲學研究》第184頁)。

<sup>129</sup> 劉天明：《伊斯蘭經濟思想》第250頁。

<sup>140</sup> 伊斯蘭學者堅決反對把阿拉伯語的“吉哈德”——Jihad 翻譯成英語的“聖戰”——holy war。阿姆斯壯認為應當翻譯成“奮鬥”、“努力”(凱倫·阿姆斯壯：《為神而戰》第73頁)。張錫模認為應當翻譯成“神聖的奮鬥”(張錫模：《聖戰與文明》第109頁)。關鍵原因在於，伊斯蘭教既提倡英勇戰鬥的“小吉哈德”，更強調靈魂淨化的“大吉哈德”。而後者比前者艱難、重要、偉大得多。

<sup>141</sup> 湯因比同樣強調過這個意思：“人的本性是貪欲。而這種貪欲祇要沒有受到限制，就會導致巨大的不幸。因此，我相信，在與人類其他所有活動相同的經濟活動中，祇有自我克制才是自我解救的唯一途徑。……利他主義是通過自我修養，自我克制，自我否定，甚至必要時自我犧牲的道路，才能實現。……要消除對於人類生存的威脅，祇有通過每一個人的內心的革命性變革。並且，為了能夠產生必要的意識力量，將困難的新的理想付諸實行，這種心靈的變革也無論如何要藉助宗教來實現”(《展望21世紀》第138、387、59頁)。

<sup>142</sup> 13世紀，蒙古鐵騎蹂躪出禁欲苦修的蘇菲主義。“蘇菲主義一向是改革運動的先鋒，對於反抗任何危及穆斯林社群的事物，無論是對抗蒙古大軍這樣的外侮，或是反抗未能遵循伊斯蘭教原則的統治者，蘇菲主義者更是從不缺席；他們從不曾像基督教修士一樣遺世獨立”(凱倫·阿姆斯壯：《穆罕默德》第410~411頁)。

<sup>143</sup> 凱倫·阿姆斯壯：《穆罕默德》第411~412頁。“換言之，在特殊的神權政治體制之外，同時導入了信徒(穆斯林)皆兵制的原理”(張錫模：《聖戰與文明》第68頁)。

<sup>144</sup> 蔡德貴：《當代伊斯蘭阿拉伯哲學研究》第178~179頁。

<sup>145</sup> 劉天明：《伊斯蘭經濟思想》第243~244頁。

<sup>146</sup> 黑體加重是筆者所為(毛杜迪：《伊斯蘭覺醒與文明對抗》；蔡德貴：

《當代伊斯蘭阿拉伯哲學研究》第 196~197 頁)。

<sup>137</sup> 凱倫·阿姆斯壯：《伊斯蘭》第 237 頁。

<sup>138</sup> 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蘭教研究室：《中國伊斯蘭教基礎知識》第 280~283 頁。

<sup>139</sup> 凱倫·阿姆斯壯：《為神而戰》第 346 頁。“每一個遜尼派的基本教義運動都受到庫特的影響，……塔利班於 1994 年在阿富汗執政，也受到庫特的思想的影響”(凱倫·阿姆斯壯：《伊斯蘭》第 237 頁)。

<sup>140</sup> 霍梅尼經常強調：“比物質、政治鬥爭還要來得困難、關鍵與吃力的，其實是自我內心的征服，和在社會裡實踐正義及真正的伊斯蘭價值”(凱倫·阿姆斯壯：《為神而戰》第 348 頁)。

<sup>141</sup> 凱倫·阿姆斯壯：《為神而戰》第 348 頁。

<sup>142</sup> 庫特卜：《伊斯蘭——被誤解了的宗教》第 106、15 頁。“庫特卜分析說，共產主義雖然與伊斯蘭關於宇宙、人生的基本想法有矛盾，但在經濟方面，共產主義與伊斯蘭是有不少共同點的。社會主義能夠實現社會正義，但他認為社會主義是唯物論的，使人的抱負祇限於吃的、喝的。而能實現社會正義的祇有伊斯蘭。他強調說，伊斯蘭必須進行統治，因為伊斯蘭是唯一的積極的創造性的宗教，伊斯蘭吸收基督教和共產主義而形成一種全面的結合，保證實現它們的全部目標，還增加了均衡、協調和正直”(蔡德貴：《當代伊斯蘭阿拉伯哲學研究》第 203 頁)。伊斯蘭不認同共產主義，無神論和公有制，是兩個根本癥結。實踐中，伊斯蘭反對共產黨，經常與蘇聯的霸權實踐有關。譬如，霍梅尼有著名的“七反對”：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西方化、世俗化、猶太復國主義和共產主義。“霍梅尼認為共產主義是一個衰敗的學派：信奉共產主義的人會把國家引入蘇聯的懷抱，會對自己的民族發動戰爭，會為外國人賣命；信奉共產主義的人所主持的政府是世界上最獨裁最專制的政府；共產黨最傑出的領袖斯大林獨裁專制，壓迫人民；共產主義的蘇聯侵略阿富汗、壓迫阿富汗穆斯林，只對伊朗人民犯罪；信奉共產主義的伊朗人民黨親蘇賣國，大搞破壞！共產主義的無神論會讓伊朗人民偏離真主指引的道路”(王新中、葉開運：《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第 341 頁)。

<sup>143</sup> 凱倫·阿姆斯壯：《穆罕默德》第 42、136 頁。

<sup>144</sup> “北約秘書長把伊斯蘭教作為新共產主義來談論，一度引起風波。這

言論由於遭到批評，後來匆忙收回”（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 3 頁）。

<sup>145</sup> 薩塔諾夫斯基：“恐怖主義的全球化及其後果”，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 70 頁。

<sup>146</sup> Peter Van deer Veer：“Political religion in the 21 century”（張錫模：《聖戰與文明》第 21 頁）。

<sup>147</sup> 《泰晤士報》1996 年 1 月 3 日（蔡佳禾：《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第 13 頁）。

<sup>148</sup> 1948 年，穆斯林兄弟會暗殺了下令解散兄弟會的埃及首相納克拉希。為此，1949 年，哈桑·班納被警察暗殺。1954 年，因暗殺納賽爾未遂，1.8 萬人被捕，五名兄弟會重要領導人被處死，哈桑·胡達比被判終生監禁。1965 年，又有七百多人以暴力推翻革命政權的指控而被捕。1966 年，庫特卜和另外三名兄弟會領導人被判絞刑。薩達特接班之後，著力緩和與穆斯林兄弟會的關係。但是，到 70 年代後期，兄弟會對外反對和以色列媾和，對內反對經濟自由化帶來的腐敗和貧富分化，展開越來越激烈的暴力活動。1977 年，聖戰-A 集團 80 多人被捕。1981 年 9 月，聖戰-B 集團幾百人被捕，法拉吉等五名領導人被處死。10 月 6 日，聖戰-B 集團的“贖罪與遷徙”組織槍殺了薩達特（劉靖華、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第 217、222 頁）。

<sup>149</sup> 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第 3 頁。

<sup>150</sup> 庫特卜在《伊斯蘭——被誤解了的宗教》中（第 104 頁）引《古蘭經》第 59 章 7 條。馬堅的《古蘭經》譯本足：“城市的居民的逆產，凡真主收歸使者的，都歸真主、使者、至親、孤兒、貧民和旅客，以免那些逆產，成為在你們中富豪之間周轉的東西。”

## 第三章

### 少數人提前超級現代化

- 3.1 少數人暴富起來
- 3.2 產業發展少
- 3.3 嚴重兩級分化
- 3.4 廉價服務業大發展
- 3.5 階級鬥爭更激烈
- 3.6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普遍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引進西方教科書式的自由放任發展模式，經常帶來速度更快、程度更極端的貧富分化和難以遏制的腐敗奢靡，與西方老牌資本主義社會相比，具有若干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顯著特徵。

### 3.1 少數人暴富起來

第一，少數人暴富和少數城市率先現代化。簡單通過批地——地下石油開採權，放駱駝的部落酋長，不僅可以在一夜之間先富起來，而且可以與福特、卡耐基、洛克菲勒一類奮鬥幾輩子的西方產業資本家誇富、鬥富，住進富麗堂皇的宮殿，左擁右抱三妻四妾，這還不夠，還要從西方大鼻子富翁身旁，與穿金戴玉的好萊塢明星，擦出一道又一道飛躍千山萬水和“文明衝突”的愛情火花。先富起來的超級富豪們不僅住豪宅，包二奶，而且下館子、逛商店、上劇院、住賓館、做美容、洗桑拿、玩夜總會。於是乎，與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相對應的，必然是一部分城市率先實現現代化。一幢幢連美國、英國都少見的超豪華賓館飯店、超豪華購物中心、超豪華摩天大樓、超豪華度假娛樂場所、超豪華機場車站，從漫天沙塵裡拔地而起，鱗次櫛比，燈紅酒綠，帶動一片海市蜃樓般的繁榮景象。諸多圍繞都市富豪的白領、藍領，鞍前馬後，熙熙攘攘，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廣大農村居民還在胼手胝足，為生存、為溫飽而苦苦掙扎，缺醫少藥，失學失業；城裡的寵物商店、寵物醫院、寵物美容生意興隆。城鄉差別、貧富差別以遠遠超過老牌資本

### 主義國家的速度急劇擴大。<sup>151</sup>

譬如，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首都迪拜，過去是一個窮漁村，發現石油以後，帆船狀的阿拉伯塔，內裝修用去 37 吨黃金，前臺大庭高達 180 米，總統套間 780 平方米，是世界上最豪華的飯店。接著還要投資五億美元，修建世界第一家海底飯店；投資十億美元，修建世界第一高塔——500 米高的迪拜塔；一期投資 60 億美元，修建世界最大的人工島，島上建 49 家五星級飯店，2500 棟別墅。<sup>152</sup>

在發展中國家，包括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過去不作價或者作低價的種種資源和資產，礦山土地、廠房設備、企業產權等等，拿來投入市場交換，經常可以理清產權，盤活資產，憑空掙出許多財富。地下的石油，西方跨國公司不去開發，從部落酋長到平頭百姓，都祇能繼續放駱駝。一經內外勾結地盤活，天上掉下一大塊餡餅，酋長們分配得再不公平，從好萊塢討回的小老婆再漂亮，也解釋不成是盤剝當地百姓的不義之財。譬如 1974~1979 年，五年時間裡，阿拉伯國家石油收入近五千億美元。沙特一國拿回兩千多億美元。<sup>153</sup> 1980 年，沙特、科威特、阿聯酋和卡塔爾的人均 GDP 分別為 15322、21118、29342 和 32614 美元，把美、英、德、法、日遠遠甩在了後邊（表~1）。一猛子衝上發達國家排行榜的最高端，居然是山登絕頂我成峰，一覽眾山小的神仙境界。部落酋長沒偷沒搶，花天酒地沐猴而冠，與國際富翁接軌，財大而氣粗，<sup>154</sup> 理直且氣壯。<sup>155</sup>

大多數有錢的科威特人家不惜用大馬士革或保加利亞出口的礦泉水來做飯和洗澡。不少王公貴族們，甚至用牛奶或

羊奶洗澡。

他們不僅在城內擁有一棟別墅住宅，在海邊上還另有避暑別墅，冬季在沙漠裡還搭起臨時“帳篷別墅”。城內的住宅是花園洋樓別墅。有的王室成員在宅院修建“地下宮殿”，過著“天方夜譚”式的豪華生活。他們擁有多輛嶄新豪華的小轎車。平時若車輛受到一點損壞，就棄掉另購新車。因此，許多被棄掉的車輛，在沙漠裡堆成了一座“汽車山”。

每逢周末或節假日，全家人乘小汽車來到這“帳篷別墅”裡度假。白天男人在沙漠打獵賽馬、放鷹狩獵。晚上在帳篷裡縱情歌舞。這時，有些來自黎巴嫩和埃及的“肚皮舞”女，被高價帶到帳篷裡，供主人尋歡作樂。<sup>156</sup>

### 3.2 產業發展少

第二，財富集聚多而產業發展少。通過分配手段，重新配置資源，產生財富集聚，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自然而然。與傳統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相比較，關鍵在於社會財富的集聚能否直接促進生產，而不僅僅是通過少數人的高檔消費促進跨國公司的生產。都是圈地運動，都是“羊吃人”，滿清入關後圈地與英國工業革命前圈地，時間前後腳，圈出的結果完全不同。一個後退，一個前進。

資本主義的早期發展，把農奴剝奪成為一無所有的無產者。無論原始積累怎麼殘酷，資源重新配置出社會分工和大機器生產。祇要發展生產是財富增加的主要途徑，隨著機器不停



運轉，不斷更新，生產力不斷發展，藉助產業、特別是軍工產業的發展，開展海外殖民，開拓國際市場，從國外大賺而特賺，雖然貪婪的資本家不會主動給工人讓利，財富總量不斷增長，可供分配的餅在不斷做大。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通過持續不斷地鬥爭，總還有相對改善經濟和政治地位的可能。

發展中國家的圈地運動，噴薄欲出的石油開採也好，狂飆猛漲的房地產也好，少數人利用關係、職務的便利巧取豪奪，暴富之後心浮氣燥，是人之常情。更何況，多數發展中國家所以是發展中國家，恰恰因為在科學技術、企業管理、社會制度諸多方面，缺乏產業發展的物質基礎和心理準備。“結果是以石油收益為來源的公共開支和私人消費投向服務業和建築業，國民經濟結構嚴重失調。這主要體現在：耐用消費商品及奢侈品消費的過度擴張，豪華住房業的投資過量，不動產總體的投資過量，固定資產方面投資不足。”<sup>157</sup>

肯定有政治家、企業家立志細水長流，努力想把區位優勢、資源優勢(包括廉價勞動力資源)，轉變成持續發展的產業優勢。無奈，在外部，有跨國公司你死我活的激烈競爭；在內部，成就暴富的社會環境本身，成為提高企業競爭效率的桎梏。中東石油國家一直在想方設法，從簡單出賣資源向石油化工產業延伸。譬如科威特，1986年，油運自給率達到65%；1989年，石油加工自給率達到57%。80年代末，沙特上百億美元投資的項目投產，石油化工產品佔全世界的5%。<sup>158</sup>

經不起推敲的是，海灣國家發展民族工業的偉大成就，還是靠石油收入堆出來的。“70年代，在海灣地區建立石化工廠

的成本是在歐洲和日本建同樣工廠的 2~3 倍；80 年代初，臺灣地區一些工廠的建設成本是歐洲、日本等地的 1.5 倍。”裙帶關係和貪污腐敗，“不僅對各種發展工程和項目造成損害，而且由於他們對裙帶關係和濫用職權的認可乃至依賴，又加劇了這一現象的蔓延，造成惡性循環。”翻譯過來是說，腐敗促成工程，工程滋潤腐敗，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部落酋長與現代工廠雜交而出獨具特色的騾子——“貝都因官僚主義”、“謝赫官僚主義”。<sup>154</sup> 這種非驢非馬（不可持續）的情形不改變，哪天石油收入枯竭了，哪天民族工業難以為繼。

保羅·貝羅克有套說法：西方的工業化導致世界其他地區的非工業化。西方的強大，從根本上說，靠的是以軍工為龍頭的製造業強大。1928 年，西方國家佔全世界製造業產值的 84.2%。<sup>160</sup> 80 年代以來，雖然發展中國家製造業產值大大增加，但是，從質量內容上講，西方工業化導致其他地區非工業化的命題，不僅繼續適用，而且西方產業對全球經濟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強。1999 年，西方七大國的 GDP 佔全球的 68%，貿易額佔全球的一半。佔世界人口 80% 以上的 180 個發展中國家，GDP 總和不到全球的 20%，貿易額不到全球的 25%。<sup>161</sup> 西方的強大，仍然是因為製造產業強大。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引述了一系列西方保持強大的基本特徵，包括“擁有和操縱著國際和金融系統，控制著所有的硬通貨，是世界上主要的消費品主顧”，“主宰著國際資本市場，對許多社會發揮著相當大的道義領導作用，有能力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干預，控制著海上航線”，所有這些，靠的是“提供了世

界上絕大部分製成品”，“進行著最先進技術的研究和開發，控制著尖端技術教育，控制著宇航技術，控制著航太工業，控制著國際通訊系統，控制著高科技武器工業”。<sup>162</sup> 在金字塔型的產業結構中，軍工永遠是技術進步的最尖端，製造業從來構成綜合國力的骨幹。

80 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一個普遍而明顯的成果是，西方列強支持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大手筆整合產業分工體系。部分資源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移；主要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的研究、開發和製造，向發達國家大規模集中。<sup>163</sup> 跨國公司的產業競爭能力空前加強，分散的發展中國家經受不住強大競爭的擠壓，在工業化的質量上，大踏步後退。或者成為西方產業主導的附庸，替跨國公司打工，加工零部件；或者乾脆退回去，簡單出賣資源（包括廉價勞動力資源），購買跨國公司產品。<sup>164</sup> 結果是出賣資源掙點錢，進口產品還回去。或者是利用廉價勞動力，出口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價值產品掙點錢，進口技術密集型、高附加價值產品還回去。

中東地區廉價出口石油、高價進口軍火，早已成為西方列強生存發展的固定生態。2002 年，全世界軍費開支 7940 億美元；<sup>165</sup> 2003 年，9560 億美元。<sup>166</sup> 一個老布什打伊拉克，刺撓得中東地區的軍火年進口額超過千億美元（1990~1992 年）。<sup>167</sup> “據美國軍備控制和裁軍總署估計，1992~1994 年中東的武器進口量佔世界武器總進口量的 43%，八個海灣國家佔整個中東武器進口額的 70%。”<sup>168</sup> 這還是嚴格定義的軍火。如果考慮到幾

乎所有重要的技術開發都是從軍工轉移到民用產品，考慮到與軍工發展直接相關的高科技、高附加價值製造業的龐大系列——包括冶金、化工、機械、航太、航空、造船、電子、醫藥等，考慮到全世界發展中國家對軍火和高科技產品從頭到尾的進口依賴，一定能在“誰養活誰”的層面上，對加入跨國公司國際分工的價值鏈，得出更清醒的認識。<sup>169</sup> 更別提發展中國家各國政府為了穩定匯率，一頭用高回報吸引外商投資，一頭買回大量低回報的美元資產了。<sup>170</sup>

表~1：1980~2001年，部分海灣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年人均GDP（單位：美元）

| 國家  | 1980  | 2001  | 年均遞增(%) |
|-----|-------|-------|---------|
| 沙特  | 15322 | 8753  | -2.6    |
| 阿聯酋 | 29342 | 19403 | -2.0    |
| 科威特 | 21118 | 15041 | -1.6    |
| 卡塔爾 | 32614 | 27907 | -0.7    |
| 美國  | 12286 | 35351 | 5.2     |
| 英國  | 9525  | 23730 | 4.4     |
| 德國  | 10503 | 22530 | 3.7     |
| 法國  | 12706 | 21530 | 2.5     |
| 日本  | 9170  | 32753 | 6.2     |

資料來源：<http://www.econstats.com>。

實踐証明，發展 GNP、GDP 都不是硬道理。真正的硬道理是發展軍工為龍頭的製造業。1980 年，沙特的人均 GDP 高達 15322 美元，比美國多 3036 美元，幾乎高出四分之一 (24.7%)。到 2001 年，美國發展成 35351 美元，沙特祇剩 8753 美元了，不到美國的四分之一 (24.8%)。英、德、法、日，一個個從頭躍

過。<sup>171</sup> 20 年時間的出入乘除，當然有人口增長、石油收入下降種種客觀理由。缺乏真正的產業發展，是無可推託的根本。照這個趨勢現代化下去，曾經高居發達國家榜首的海灣國家，沐猴而冠花天酒地之後，早晚還得回去放駱駝。沒有軍工為龍頭的製造業，一旦石油天然氣油盡燈枯，祇會留下一片人去樓空的“石屎森林”。<sup>172</sup> 由此可見，發展中國家通過資源重新配置集聚財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要想像英國當初的原始積累一樣，轉變成生產發展，走上現代化之路，決非自然而然。

### 3.3 嚴重兩級分化

第三，自然而然的是貧富嚴重兩極分化。以軍工為龍頭、以製造業為骨幹的產業發展不起來，研究、開發、教育和技工、熟練產業工人組成的中產階級不會迅速增加。少數暴發戶和多數臨時工式的簡單廉價勞動力，自然而然，構成兩極化社會的組成群體。附表~1 的數據顯示，在西方發達國家，美國的基尼係數是最高的 (40.8)。在人均 GDP 少於一萬美元的 61 個發展中國家中，基尼係數大於 (等於) 美國的 36 個。美國最富 10% 的人口佔有全國 30.5% 的收入或消費，45 個發展中國家超過美國。美國最窮 20% 的人口僅佔有全國 1.8% 的收入或消費，26 個發展中國家比美國還低。<sup>173</sup> 財大氣粗的沙特阿拉伯，號稱一手拿《古蘭經》，一手拿美元，照樣貧富懸殊，現代化城市中的貧民窟不斷擴大，“全國約有 2~3 成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sup>174</sup> 2003 年，“兩手緣”的沙特政府紆尊降貴，第一次

頒佈了《國家反貧困戰略》。<sup>175</sup>

據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專家維廉·溫加尼 1997 年 5 月發表的講話，中東地區 25% 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另據聯合國 1996 年底的報告，阿拉伯世界有 7300 萬人生活貧困（約佔總人口的 28%），一千萬人遭受飢餓（約佔總人口的 3.8%），農村地區一半人口飲用不衛生的水，三分之一的人沒有基本醫療保證。近年中東國家失業人口居高不下，平均失業率為 11.5%。<sup>176</sup>

### 3.4 廉價服務業大發展

第四，城市化超前和廉價服務業大發展。少數城市的基礎建設和少數富人享受的生活服務，迅速超過發達國家的國際標準，不斷吸引農村勞動力湧進城市謀生。廣大農村停留在貧困落後，不斷為城市勞動密集型的建築業和服務業，提供臨時工式的廉價勞動力。城市繁榮的吸引和農村貧困的逼迫，推動城市化超前和廉價服務業大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新觀點。

譬如，歐洲大陸人均 GNP 達到 650 美元，城市人口達到總人口的 21%；發展中國家人均 GNP 剛剛 340 美元，城市人口已經達到相同比例。譬如，1856 年，法國製造業就業佔就業總人口的 29%，城市人口佔總人口的 10%。到 1870 年，這兩個數據分別為 30% 和 12%。前者與後者，大致是 3 比 1 的關係。20 世紀 70 年代，菲律賓製造業就業佔就業總人口的 15%，城市人口卻達到總人口的 34%。巴西這兩個數據分別為 20% 與 61%。<sup>177</sup> 比例關係幾乎倒過來，成了 1 比 3。早期工

業化國家，製造業就業比重達到 24% 時，第三產業就業達到 21%。後起發展中國家，製造業就業剛剛達到 10%，第三產業就業就達到同等水平。<sup>178</sup>

必須承認，技術發展水平不同時期的現代化，城市化水平和就業結構不宜直接對比。今天的現代化進程，對城市化和第三產業發展，提出明顯高於資本主義早期歷史的新要求。即便充分考慮了這個因素，除了南韓這樣極少數成功者，多數發展中國家能夠看到的，通常是現代化骨幹骨質酥鬆——製造業缺鈣；城市化超前不等於現代化——大片貧民窟、工人棚戶區和簡易住宅；第三產業就業增加不等於第三產業現代化發展——多為簡單勞動、低附加價值的廉價服務業。

任何繁榮的社會都將製造業作為其重要核心。其中的道理是：製造業中平均 100 個職位可以創造出另外 422 份相關的工作，服務業祇能創造出 147 份，零售業祇有 94 份。儘管現代化生產具有效率高的特征，就像 100 年以前的農業那樣。但它正在重新分佈。<sup>179</sup>

城市繁榮和農村貧困的兩極分化，形成就業結構的兩極分化：一頭與國際發達接軌，高薪聘請少數外籍專家和“海歸”，經營國內人材玩不轉的超級現代化；一頭與農村貧困接軌，低薪僱傭無限供給的廉價簡單勞動力，從事低檔勞動密集型的建設和服務。缺乏製造業機器生產，不成比例的人群，集中在重體力勞動的建築業和保安、保潔、保健等低附加價值的廉價服務業。男的建築、保安，女的保潔、保健。譬如，1980~1985

年，非沙特籍勞動力佔沙特勞動力總數的 59.8%。<sup>180</sup> 1989 年底，外來打工者佔勞動力總量的比例，在科威特為 86.1%，在卡塔爾為 84.4%。在服務業和建築業，外來打工的比例高達 97.4% 和 97.9%。<sup>181</sup>

依靠嚴格的戶籍管理，外來勞工不得購置產業，必須在規定的年限內離開。需要注意的是，阿拉伯人民並不認同現代邊界。看過一兩部阿拉伯或伊朗故事片就能明白，那裡的當地人與外來打工、投親靠友的穆斯林兄弟，打招呼搭訕，聊天問長問短，根本不是對外國人，而是對外地人的態度。所以，外籍穆斯林流動勞工的心態，類似中國大陸西部貧困地區青年到東南沿海打工，貧富懸殊照樣產生嚴重的社會心理反應。譬如 1979 年的麥加事件，處決 63 人，19 名外國人。<sup>182</sup> 1984 年以後，麥加朝聖期間，連續不斷發生外來穆斯林的大規模示威和騷亂，迫使沙特當局不得不出錢請大批巴基斯坦軍人，免費朝聖的同時幫忙維持治安。<sup>183</sup>

美國的窮人在發達國家也算是窮的。<sup>184</sup> 即便是在美國，哪裡看得見那許多髮廊浴室，桑拿按摩洗頭揉腳，從上到下地忙活？一般賓館飯店，哪裡有那許多服務人員齊聲吆喝，端茶送水，顛前跑後，上個廁所都有人低三下四，噓寒問暖？服務員著不同服色，分成三六九等，從招呼停車開始，門口鞠躬的不管領位，領位的不管開票，開票的不管端盤子，等而下之的連點頭哈腰的資格都不夠，祇能一趟一趟地打掃衛生？能有幾家大款雇得起私人保鏢看家護院？一般寫字樓、機關、小區，哪裡看到見各色保安成群結隊？又有幾家中產階級雇得起專職小



阿姨買菜作飯，家庭教師幫孩子補習功課，接長不短來一趟足療按摩？廉價勞動力帶來各種廉價服務業繁榮鼎盛，在發展中國家發展出某種磁懸浮式的超級現代化。一方面，財富的增加和集聚，無比真實。少數暴富、巨富揚眉吐氣，盡情享受西方發達國家老牌資產階級消費不起的豪華奢靡。一方面，比物質享受更豐富的人上人的感覺，無比真實。直接臉對臉、手把手地盡情消費物美價廉的人，通過保安、保潔、保健的身心服務，讓大多數窮人每天品嚐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切膚之痛。人們在海灣國家耳聞目睹：

大部分人則是出賣苦力的建築工人、勤雜工、清潔工、售貨員、護士和家庭傭人。他們絕大部分來自南亞各國，其社會地位低下，工資收入相對較少，住房條件也很差。其中的建築工人，均住在沙漠上的木板工棚裡，衛生條件極差。而那些家庭傭人絕大多數是年輕的婦女。她們承擔著繁重的家務勞動，低三下四地伺候男女主人，一不如意即遭受辱罵和毒打，甚至受到男主人的人身侮辱。<sup>185</sup>

在這些國家裡，最廉價的商品是香煙……和非本國公民的尊嚴。<sup>186</sup>

### 3.5 階級鬥爭更激烈

恩格斯撰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時候，資本家主要通過生產過程剝削僱傭工人，很多手忙腳亂在生產線上的工人，恨的是機器。發展中國家現代化，資源再分配出來的少數富人，

暴富的速度和程度，超過西方靠生產過程剝削工人致富的產業資本家。<sup>187</sup> 少數城市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同時，電視和通訊的普及，把廣大農村的貧困落後現代化了。大量農村廉價勞動力湧進城市謀生，把懸殊的城鄉差別搬遷進城，集中立地展現貧富懸殊的叢林生態。蜂擁而來的窮人、集中就業在不用機器的低級服務業，靠權眉折腰忍氣吞聲混口臨時飯，積聚起來的不滿，自然不是衝著機器去了。在這個經濟基礎上加速實現少數人提前超級現代化，即使 GDP 持續高速增長，三大差別更加急劇擴大，加上政治腐敗，暴發戶鍾鳴鼎食地張揚，發展中國家的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必然比傳統生產型資本主義社會更尖銳、更激烈。

進入 70 年代以來，中東和阿拉伯產油國仰仗巨額的石油收入迅速走上現代化道路。<sup>188</sup> 但是，石油經濟崛起的一個連鎖反應卻又造成了各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少數王公貴族、部落酋長、軍政要員中飽私囊，廣大中、下層穆斯林獲利甚微，社會腐敗和不公正現象加重。<sup>189</sup>

對沙特王國的廣大穆斯林來說，在急劇變革時期，沙特社會出現的日趨嚴重的兩極分化、貧富不均和社會不公正現象，以及統治階級上層普遍存在的腐化墮落和傳統倫理道德淪喪，則成為他們不斷滋長逆反心理的更直接的原因。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沙特王國迅速積累起來的大量石油財富大多落入王室家族、新生貴族和新暴發戶的私囊。<sup>190</sup> 而廣大穆斯林卻沒有得到他們應得的實惠，儘管其中多數人的生活確有改善。這同伊斯蘭教義所倡導的“均貧富”思想形成明顯反差。因此，他們對

當權者產生強烈不滿，並渴望按照伊斯蘭教平均主義的原則，重新分配社會財富，來改變自身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地位。

經濟的迅猛發展還在沙特社會產生了某些負面效應，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石油繁榮和經濟大發展所帶來的大量石油美元多數流入王公貴族、軍政要員、富商大賈和新生暴發戶的私囊。……他們揮金如土，不僅在國內大興土木，廣建宮宇，而且到國外頻繁購買和修建宏大的別墅，同時購飛機、置遊艇，極盡享樂之能事。與豪門巨富相比，普通百姓的生活則相形見绌，特別是大批的外籍勞工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從事沙特人所不屑一顧的粗活、髒活和重活，並在精神和肉體上承受著各種歧視與折磨。外籍勞工實際上是代替了過去的奴隸。沙特社會的這種現狀導致兩極分化和貧富懸殊日益加劇，引起廣大穆斯林群眾的強烈不滿。

貧窮的阿拉伯國家普遍對富有的海灣君主國的王公貴族和新生暴發戶的奢侈生活強烈不滿。許多阿拉伯人甚至認為，石油是阿拉伯人的共同財富，應當用於阿拉伯民族的共同事業，並由阿拉伯人共同分享。海灣戰爭後，中東貧國與富國、窮人與富人之間的矛盾依然如故。貧國的經濟狀況日益嚴峻，以至於它們得出西方是代表富裕的穆斯林來同貧窮的穆斯林作戰的，富國的統治者已徹底淪為西方國家的幫兇和西方利益的保護者這一結論，從而加深了對沙特王室及其政府的仇恨。<sup>191</sup>

窮人在城市中結鄰而居，這些地區基本上就是現代城市中傳統的貧民窟；低收入的中產階級雖然從城市所提供的教育和工作機會中受益，然而他們卻由此經常遭受更深刻的文化衝擊，因此，無論是窮人還是低收入的中產階級都在宗教的復興

中找到了某種快感和安全感。<sup>192</sup>

1988年沙特阿拉伯王儲阿卜杜拉說，對他的國家構成最大威脅的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青年中的興起。<sup>193</sup>

### 3.6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如果說，埃及納賽爾是在蘇聯支持下走“紅色”社會主義道路，伊朗巴列維國王號稱“白色革命”的改革開放，則是在美國支持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典型。<sup>194</sup>改革提出要把伊朗建成世界第五強國，實行土地改革，資源、交通和骨幹工業國有化，工人入股，婦女解放，對外開放，引進外資，購買先進武器。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農村，從1963年開始，土地改革全面鋪開。到1971年，92%的農戶有了自己的耕地。<sup>195</sup>全國2.69萬地主的土地被國家徵購，3600個清真寺的土地賣給了農民，1.1萬處清真寺的公地長期租給農民，519個王室村庄的土地賣給了農民。約250萬戶農民分期買到了土地，70%的農戶成為小土地所有者。在土地改革的基礎上，到1973年，全國建成農業合作社8361個，207萬人。<sup>196</sup>同時，政府在農村興修水利和鄉村道路，推廣使用農業機械和化肥，引進和培育良種，建立現代儲存糧庫。1963~1974年，政府先後派出十萬名知識青年，到農村掃盲了上百萬兒童和55萬成人。1958/59~1972年，農村小學生從2.3萬人劇增到150萬。1965~1973年，政府先後派出9780人到農村建設醫療體系，到1976年，建成1422個農

村醫療所、400 個實驗室和相當數量的門診部。與此同時，水源、森林、牧場和漁業實現國有化。

在城市，一方面實現了石油、天然氣和鐵路國有化；一方面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在企業制度建設上，大力推行工人入股分紅。1963 年政府法令規定：“(1) 企業主必須同工人簽訂集體契約，根據工人節約開支，減少損耗等表現給工人分紅；(2) 不同意簽訂集體契約的企業主也要讓工人分取 20% 的純利，分配辦法可按工齡、技術、熟練程度和原有工資等因素來考慮。1973 年又規定僱傭 20 人以下的小企業也要讓工人分紅，對不執行國家法令的企業主嚴懲不貸。”到 1972 年，國營企業股份的 99% 和私營企業股份的 33~49% 可向人民出售，該企業職工有權優先優惠購買，款項從工資或年終分紅裡分期扣除。<sup>197</sup>

在社會，1963 年以前的《選舉法》規定：“下列人員不得參加選舉：婦女；沒有法律能力和被監護的人；破產者；精神病患者；乞丐及以不正當手段謀生的人；罪犯、小偷以及其他做了壞事並違反了伊斯蘭法規的人。”1963 年頒佈新《選舉法》，規定婦女有權選舉。1967 年又頒佈《保護婦女法》，規定離婚必須經法院審理和判決方能生效。取消丈夫隨意休妻的特權，婦女獲得提出離婚的平等權力。同時規定男子祇能娶妻兩人，而且必須徵得第一房同意。1968 年再頒佈《婦女社會服務法》，改革婦女就業的種種限制。<sup>198</sup>

所有這些大快人心的改革，招招緊扣現代化的脈搏。為了取得民意支持，國王舉行全民公決，90% 以上的選民投贊成票。<sup>199</sup>

改革的進步意義毋庸置疑，當然極大解放生產力。1963~1972年，伊朗 GDP 的年均增長速度高達 11.5%，可以和世界任何經濟奇蹟相媲美。<sup>200</sup> 1970 年，外國投資五百萬美元；兩年後，高達五億美元。<sup>201</sup> “國王的這番成就，受到西方世界的熱烈歡迎：伊朗儼然成為中東地區代表進步與神智清明之燈塔。”<sup>202</sup>

在國王的領導下，石油收入被用於白色革命，一個野心勃勃的現代化方案，目標是到 21 世紀實現伊朗的現代化轉變。伊朗擁有一支中東裝備最精良的軍隊，與美國和歐洲保持著密切的關係。這樣的一位國王竟然會被推翻是不可思議的；巴列維王朝竟然會在由一個蓄著長鬍子、被流放的阿亞圖拉領導下的一次革命中被推翻，並且是在伊斯蘭的名義下領導的革命中被推翻，同樣是不可理解的。<sup>203</sup>

伊朗大刀闊斧的改革開放，觸及諸多既得利益和保守思想。譬如，“在土改以前，地主利用佔有水源這一條，增加農作物分成之中 20%，以此剝削農民”。<sup>204</sup> 水源國有化，地主不高興。工人入股分紅，企業主不高興。婦女原來和小偷、乞丐、精神病同等待遇，任人驅使，低眉順目，忽然間蹬鼻子上臉，要和男人平起平坐，大眼瞪小眼。鶯歌燕舞的幸福生活，硬要改成包二奶還得先由大奶點頭，改革阻力之廣泛而深厚，不問可知。為此，改革不僅需要極大的決心、勇氣、魄力和心計，而且需要強大的專政力量，粉碎和壓制保守勢力。

意味深長的是，巴列維從一開始，就把改革叫作“國王和人民的革命”。顧名思義，現代化進程，不僅人民受益，還得國王佔便宜；而且是國王在先，人民在後。這一下，在“為什麼人”

的根本問題上發生了錯位。推動改革必不可少的強權，變成貪污腐敗難以遏制的溫床。腐敗的口子一開，事事有得通融，通融必然謀利，於是乎，本應是廣大人民受益的改革措施，迅速演變成少數富人率先實現超級現代化的工具。

“僅佔全國人口 1% 的皇親國戚、大官僚、大資本家佔有全國 80% 的財富。國王和王族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國王專機上裝飾著價值一億多美元的金廁所”。<sup>205</sup> 1971 年 10 月，為了慶祝波斯帝國 2500 周年，國王從海外定購無數奢侈消費品，65 座進口帳篷一字排開，以巴黎馬克西姆餐廳的豐盛宴席為主軸，長達一周時間狼吞虎嚥，歌舞昇平，夜以繼日，一次慶典揮霍 2.5 億美元。<sup>206</sup>

《大學》有話：“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有國王帶頭揮金如土，必然有皇親國戚窮奢極欲，王公大臣貪得無厭，文武百官欲壑難填。改革開放解放出再多生產力，也架不住諸多特權與民爭利。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社會持續高速分化。1963~1972 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城市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長 6.1%，農村僅為 0.03%。城鄉差距擴大的懸殊程度，超出經濟學家的想象力。城裡人也不是共同富裕，還是緊著國王先富起來。“王族投資的對象有：18 家銀行與保險公司，29 家工廠，11 家企業，45 家建築商行，43 家農牧業和食品公司，十家商業公司，39 家服務公司，八家礦業商行。”<sup>207</sup> 1973~1978 年，每年 20 億美元的出口收入一半落入王族口袋。<sup>208</sup> 從王公貴族到貪官污吏，衮衮諸公，層層受益，家家鉢豐盆溢，個個腦滿腸肥，硬是把持續高速的經濟發展吃乾喝盡了。

國王本人就是億萬富翁，據估計他的財產為 200 多億美元。在伊朗，形成了以國王為首的，包括王室成員、高級官吏和將軍、大資本家、大地主在內的號稱“伊朗 2000 家”的豪門巨富。他們依仗權勢，巧取豪奪，利用各種手段，聚斂了大量財富。他們揮金如土與貧民的啼飢號寒，形成了鮮明的對照。<sup>209</sup>

1974 年對 2779 家不同類型企業 22.4 萬工人調查，73% 的工人收入低於法定最低生活工資。1966~1976 年，城市就業從 260.29 萬增加到 411.26 萬，怎麼說也是經濟發展的巨大成果。<sup>210</sup> 但是，農村廉價勞動力大量湧入城市謀生，激化就業競爭，惡化城市工人狀況的整體水平。1973 年，政府承認的城市失業佔人口的十分之一。<sup>211</sup> 人民生活水深火熱，暴發戶一擲千金，豪宅名車與貧民棚戶區天壤之別。這時候，霍梅尼發出教令：“被剝削者必須造反。”<sup>212</sup>

總結伊朗改革的經驗，基辛格、埃斯波西托和阿姆斯壯概括得到位：

伊朗國王基本上採用了西方所有比較“先進”的書本上的條條。連他忽視政治制度這一點也是來源於西方關於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之間關係的想法。美國有關經濟發展的理論很大一部分反映了馬歇爾計劃的經驗。據認為政治穩定會隨著經濟發展而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認為，而伊朗國王也就相信，政府祇要提高生活水平，就能得到人民的贊許。換句話，經濟發展本身就有助於政治穩定。事實證明這個理論是個災難性的錯誤。<sup>213</sup>

儘管在教育、健康、農業改革方面取得了成就，現代改革的利益不合比例地歸於一個人數很少的和不斷增長的現代城市



精英階層。現代化城市燈火輝煌的一面模糊了伊朗的城市貧民和鄉村裡的大眾的實際狀況。……那些盼望過上更好的生活從農村湧入城市的人們，由於缺乏必要的就業技術，變成擁擠不堪的貧民窟裡的失業的居民。……對於他們來說，石油的景氣並未解除貧困，而祇是使貧困現代化了。<sup>214</sup>

國家變得富裕，人民卻變得更加貧窮。上層社會恣意揮霍，而小資產階級和都市裡的窮人卻面對腐化與剝削。……鄉區移民並未成功整合入都市生活，他們住在城郊一帶的陋屋區裡，從事著腳夫、計程車司機或街頭小販等不安定的營生。由是德黑蘭遂分裂成現代化與傳統的兩大部分：西化的上流、中產階級，紛紛從舊城區遷入新住宅區或城北一帶的商業區。那裡有酒吧、賭場，女人也穿著歐式服裝，和男人在公共場合裡自由地互動往來。這對還窩在舊城區和附近城南一帶的市集居民與貧者來說，簡直就像是外國了。<sup>215</sup>

1979年，薩達姆對伊朗的霍梅尼革命作如是說：

對近來的這種宗教覺醒的解釋是腐敗在今天阿拉伯世界比過去更加廣泛了。某些政權就是腐敗的典型。……它首先是一個伊朗民族和社會運動，它的產生是為了回答廣泛蔓延的腐敗，這種腐敗不僅出現在國王及其隨從中間，也出現在伊朗社會的許多階層。國王下臺前，伊朗社會是腐敗的具體化例子。伊朗國家知道存在於各級機構的腐敗，也知道存在著所有其他伊斯蘭國家中獨一無二的貧困和階級差別。<sup>216</sup>

附表~1：世界各國的貧富差距

| 國家     | 年人均<br>GDP<br>(美元) | 調查<br>年份 | 基尼<br>係數 | 佔收入或消費的比例 (%) |              |              |               |
|--------|--------------------|----------|----------|---------------|--------------|--------------|---------------|
|        |                    |          |          | 最貧困<br>1/10人口 | 最貧困<br>1/5人口 | 最富有<br>1/5人口 | 最富有<br>1/10人口 |
| 中東及北洲  |                    |          |          |               |              |              |               |
| 土耳其    | 6,600              | 1994     | 41.5     | 2.3           | 5.8          | 47.7         | 32.3          |
| 突尼斯    | 5,200              | 1990     | 40.2     | 2.3           | 5.9          | 46.3         | 30.7          |
| 阿爾及利亞  | 4,600              | 1995     | 35.3     | 2.8           | 7.0          | 42.6         | 26.8          |
| 約旦     | 3,500              | 1997     | 36.4     | 3.3           | 7.6          | 44.4         | 29.8          |
| 摩洛哥    | 3,200              | 1998~99  | 39.5     | 2.6           | 6.5          | 46.6         | 30.9          |
| 埃及     | 2,850              | 1995     | 28.9     | 4.4           | 9.8          | 39.0         | 25.0          |
| 毛里塔尼亞  | 1,890              | 1995     | 38.9     | 2.3           | 6.2          | 45.6         | 29.9          |
| 也門     | 740                | 1992     | 39.5     | 2.3           | 6.1          | 46.1         | 30.8          |
| 中亞     |                    |          |          |               |              |              |               |
| 多美尼加   | 5,000              | 1996     | 48.7     | 1.7           | 4.3          | 53.7         | 37.8          |
| 哈薩克斯坦  | 3,100              | 1996     | 35.4     | 2.7           | 6.7          | 42.3         | 26.3          |
| 烏茲別克斯坦 | 2,500              | 1993     | 33.3     | 3.1           | 7.1          | 40.9         | 25.2          |
| 吉爾吉斯斯坦 | 2,200              | 1997     | 40.5     | 2.7           | 6.3          | 47.4         | 31.7          |
| 巴基斯坦   | 2,000              | 1996~97  | 31.2     | 4.1           | 9.5          | 41.1         | 27.6          |
| 土庫曼斯坦  | 1,630              | 1998     | 40.8     | 2.6           | 6.1          | 47.5         | 31.7          |
| 東南亞    |                    |          |          |               |              |              |               |
| 南韓     | 12,600             | 1993     | 31.6     | 2.9           | 7.5          | 39.3         | 24.3          |
| 馬來西亞   | 10,300             | 1995     | 48.5     | 1.8           | 4.5          | 53.8         | 37.9          |
| 泰國     | 6,100              | 1998     | 41.4     | 2.8           | 6.4          | 48.1         | 32.4          |
| 中國     | 3,600              | 1998     | 40.3     | 2.4           | 5.9          | 46.6         | 30.4          |
| 菲律賓    | 3,500              | 1997     | 46.2     | 2.3           | 5.4          | 52.3         | 36.6          |
| 印度尼西亞  | 2,830              | 1996     | 36.5     | 3.6           | 8.0          | 44.9         | 30.3          |
| 斯里蘭卡   | 2,500              | 1995     | 34.4     | 3.5           | 8.0          | 42.8         | 28.0          |
| 越南     | 1,770              | 1998     | 36.1     | 3.6           | 8.0          | 44.5         | 29.9          |
| 印度     | 1,720              | 1997     | 37.8     | 3.5           | 8.1          | 46.1         | 33.5          |
| 孟加拉    | 1,380              | 1995~96  | 33.6     | 3.9           | 8.7          | 42.8         | 28.6          |
| 老撾     | 1,260              | 1992     | 30.4     | 4.2           | 9.6          | 40.2         | 26.4          |
| 尼泊爾    | 1,100              | 1995~96  | 36.7     | 3.2           | 7.6          | 44.8         | 29.8          |
| 柬埔寨    | 700                | 1997     | 40.4     | 2.9           | 6.9          | 47.6         | 33.8          |

| 國家      | 年人均<br>GDP<br>(美元) | 調查<br>年份 | 基尼<br>係數 | 佔收入或消費的比例(%)  |              |              |               |
|---------|--------------------|----------|----------|---------------|--------------|--------------|---------------|
|         |                    |          |          | 最貧困<br>1/10人口 | 最貧困<br>1/5人口 | 最富有<br>1/5人口 | 最富有<br>1/10人口 |
| 拉丁美洲    |                    |          |          |               |              |              |               |
| 智利      | 12,500             | 1994     | 56.5     | 1.4           | 3.5          | 61.0         | 46.1          |
| 烏拉圭     | 8,600              | 1989     | 42.3     | 2.1           | 5.4          | 48.3         | 32.7          |
| 委內瑞拉    | 8,500              | 1996     | 48.8     | 1.3           | 3.7          | 53.1         | 37.0          |
| 墨西哥     | 8,300              | 1993     | 53.7     | 1.4           | 3.6          | 58.2         | 42.8          |
| 巴拿馬     | 7,300              | 1997     | 48.5     | 1.2           | 3.6          | 52.8         | 35.7          |
| 哥斯達黎加   | 6,700              | 1996     | 47.0     | 1.3           | 4.0          | 51.8         | 34.7          |
| 哥倫比亞    | 6,600              | 1996     | 57.1     | 1.1           | 3.0          | 60.9         | 46.1          |
| 巴西      | 6,100              | 1996     | 60.0     | 0.9           | 2.5          | 63.8         | 47.6          |
| 厄瓜多爾    | 4,800              | 1995     | 43.7     | 2.2           | 5.4          | 49.7         | 33.8          |
| 秘魯      | 4,300              | 1996     | 46.2     | 1.6           | 4.4          | 51.2         | 35.4          |
| 危地馬拉    | 3,800              | 1989     | 59.6     | 0.6           | 2.1          | 63.0         | 46.6          |
| 巴拉圭     | 3,700              | 1995     | 59.1     | 0.7           | 2.3          | 62.4         | 46.6          |
| 薩爾瓦多    | 3,000              | 1996     | 52.3     | 1.2           | 3.4          | 56.5         | 40.5          |
| 尼加拉瓜    | 2,500              | 1993     | 50.3     | 1.6           | 4.2          | 55.2         | 39.8          |
| 洪都拉斯    | 2,400              | 1996     | 53.7     | 1.2           | 3.4          | 58.0         | 42.1          |
| 牙買加     | 3,300              | 1996     | 36.4     | 2.9           | 7.0          | 43.9         | 28.9          |
| 玻利維亞    | 3,000              | 1990     | 42.0     | 2.3           | 3.6          | 48.2         | 31.7          |
| 非洲      |                    |          |          |               |              |              |               |
| 南非      | 6,800              | 1993~94  | 59.3     | 1.1           | 2.9          | 64.8         | 45.9          |
| 津巴布韋    | 2,400              | 1990~91  | 56.8     | 1.8           | 4.0          | 62.3         | 46.9          |
| 巴布亞新幾內亞 | 2,400              | 1996     | 50.9     | 1.7           | 4.5          | 56.5         | 40.5          |
| 萊索托     | 2,400              | 1986~87  | 56.0     | 0.9           | 2.8          | 60.1         | 43.4          |
| 中非      | 1,640              | 1993     | 61.3     | 0.7           | 2.0          | 65.0         | 47.7          |
| 塞內加爾    | 1,600              | 1995     | 41.3     | 2.6           | 6.4          | 48.2         | 33.5          |
| 肯尼亞     | 1,550              | 1994     | 44.5     | 1.8           | 5.0          | 50.2         | 34.9          |
| 幾內亞     | 1,180              | 1994     | 40.3     | 2.6           | 6.4          | 47.2         | 32.0          |
| 烏干達     | 1,020              | 1992~93  | 39.2     | 2.6           | 6.6          | 46.1         | 31.2          |
| 布基納法索   | 1,000              | 1994     | 48.2     | 2.2           | 5.5          | 55.0         | 39.5          |
| 尼日爾     | 970                | 1995     | 50.5     | 0.8           | 2.6          | 53.3         | 35.4          |
| 尼日利亞    | 960                | 1996~97  | 50.6     | 1.6           | 4.4          | 55.7         | 40.8          |

| 國家    | 年人均<br>GDP<br>(美元) | 調查<br>年份 | 基尼<br>係數 | 佔收入或消費的比例 (%) |              |              |               |
|-------|--------------------|----------|----------|---------------|--------------|--------------|---------------|
|       |                    |          |          | 最貧困<br>1/10人口 | 最貧困<br>1/5人口 | 最富有<br>1/5人口 | 最富有<br>1/10人口 |
| 莫桑比克  | 900                | 1996-97  | 39.6     | 2.5           | 6.5          | 46.5         | 31.7          |
| 贊比亞   | 880                | 1996     | 49.8     | 1.6           | 4.2          | 54.8         | 39.2          |
| 馬里    | 790                | 1994     | 50.5     | 1.8           | 4.6          | 56.2         | 40.4          |
| 坦桑尼亞  | 730                | 1993     | 38.2     | 2.8           | 6.8          | 45.5         | 30.1          |
| 馬達加斯加 | 730                | 1993     | 46.0     | 1.9           | 5.1          | 52.1         | 36.7          |
| 衣索比亞  | 560                | 1995     | 40.0     | 3.0           | 7.1          | 17.7         | 33.7          |
| 塞拉利昂  | 530                | 1989     | 62.9     | 0.5           | 1.1          | 63.4         | 43.6          |
| 發達國家  |                    |          |          |               |              |              |               |
| 美國    | 31,500             | 1997     | 40.8     | 1.8           | 5.2          | 46.4         | 30.5          |
| 瑞士    | 26,400             | 1992     | 33.1     | 2.6           | 6.9          | 40.3         | 25.2          |
| 挪威    | 24,700             | 1995     | 25.8     | 1.1           | 9.7          | 35.8         | 21.8          |
| 比利時   | 23,400             | 1992     | 25.0     | 3.7           | 9.5          | 34.5         | 20.2          |
| 丹麥    | 23,300             | 1992     | 24.7     | 3.6           | 9.6          | 34.5         | 20.5          |
| 日本    | 23,100             | 1993     | 24.9     | 4.8           | 10.6         | 35.7         | 21.7          |
| 奧地利   | 22,700             | 1987     | 23.1     | 4.4           | 10.4         | 33.3         | 19.3          |
| 法國    | 22,600             | 1993     | 32.7     | 2.8           | 7.2          | 40.2         | 25.1          |
| 加拿大   | 22,400             | 1994     | 31.5     | 2.8           | 7.5          | 39.3         | 23.8          |
| 荷蘭    | 22,200             | 1994     | 32.6     | 2.8           | 7.3          | 40.1         | 25.1          |
| 德國    | 22,100             | 1994     | 30.0     | 3.3           | 8.2          | 38.5         | 23.7          |
| 澳大利亞  | 21,200             | 1994     | 35.2     | 2.0           | 5.9          | 41.3         | 25.4          |
| 英國    | 21,200             | 1991     | 36.1     | 2.6           | 6.6          | 43           | 27.3          |
| 意大利   | 20,800             | 1995     | 27.3     | 3.5           | 8.7          | 36.3         | 21.8          |
| 芬蘭    | 20,100             | 1991     | 25.6     | 4.2           | 10.0         | 35.8         | 21.6          |
| 瑞典    | 19,700             | 1992     | 25.0     | 3.7           | 9.6          | 34.5         | 20.1          |
| 愛爾蘭   | 18,600             | 1987     | 35.9     | 2.5           | 6.7          | 42.9         | 27.4          |
| 以色列   | 18,100             | 1992     | 35.5     | 2.8           | 6.9          | 42.5         | 26.9          |
| 新西蘭   | 17,000             | 1991     | 43.9     | 0.3           | 2.7          | 46.9         | 29.8          |
| 西班牙   | 16,500             | 1990     | 32.5     | 2.8           | 7.5          | 40.3         | 25.2          |
| 希臘    | 13,400             | 1993     | 32.7     | 3.0           | 7.5          | 40.3         | 25.3          |
| 俄羅斯   | 4,000              | 1998     | 48.7     | 1.7           | 4.4          | 33.7         | 38.7          |

資料來源：CIA: World Factbook 1999;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 註釋：

- <sup>151</sup> 譬如，沙特阿拉伯建國之初，80%的土地是貝都因遊牧部落的牧場，以遊牧作為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貝都因人佔總人口的70%以上(仲躋昆：《阿拉伯：1002夜》第232頁)。到1995年，在英國排名前五百巨富中，五名阿拉伯人榜上有名，分別排第14、45、96、259和361(王京烈：《面向21世紀的中東》第134~135頁)。譬如，1987年，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祇有六名億萬富翁，6~7年以後增加到42名。拉丁美洲的貧困人口從60年代的九千萬增加到90年代的1.9億(李慎明：“全球化與第三世界”，《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第9頁)。
- <sup>152</sup> 徐惠喜：“‘七星級飯店’什麼樣？”《經濟日報》2003年8月27日，第7頁。
- <sup>153</sup> 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235頁。
- <sup>154</sup> 譬如，2003年6月，阿聯酋航空公司一次定購空中客車21架雙層大飛機A-380和20架A-340，以及26架波音-777。小小阿聯酋，67架大飛機，190億美元，堪稱財大氣粗之典型案例(“阿聯酋190億美元購67架新客機”，香港《信報》2003年6月17日，第8頁)。
- <sup>155</sup> 譬如，“卡塔爾在阿里執政時期(1949~1960)，規定石油收入的四分之一歸統治者，四分之一為王族儲備金，四分之一歸王室家族的其他謝赫，剩餘四分之一才用於公共開支。巴林的統治者哈利發家族人數祇有四百人，而全國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卻歸他們所有”(安維華、錢雪梅：《海灣石油新論》第275頁)。
- <sup>156</sup> 張文建：《走進阿拉伯》第58~59、63、72頁。
- <sup>157</sup> 仲躋昆：《阿拉伯：1002夜》第157頁。
- <sup>158</sup> 王京烈：《面向21世紀的中東》第184頁。“非石油化工的產值佔GDP的比例已達10%以上”(時延春：《中東風雲人物》第295頁)。
- <sup>159</sup> “由於傳統價值觀及思維方式的影響，在現代官僚主義之外，以至出現了‘貝都因官僚主義’(al-badwaqratiya)和‘謝赫官僚主義’(al-shaikhraqratiya)等專門學術術語”(仲躋昆等：《阿拉伯：1002夜》第172頁)。“貝都因”意為“住帳篷的游牧民”。
- <sup>160</sup> Baut Bairoch：“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s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982 年第 11 期, 第 296~334 頁。

<sup>161</sup> 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當代第三世界透視》第 34 頁。

<sup>162</sup>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75~76、81~83 頁。

<sup>163</sup> 1980~1991 年, 世界貿易量極大擴張。亞洲出口佔全球出口的份額從 9% 上升到 15%。與此同時, 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出口份額從 63% 增加到 72% (威廉·格雷德：《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瘋狂邏輯》第 31 頁)。2003 年, 中國消耗的原油、原煤、鐵礦石、鋼材、氧化鋁和水泥, 分別為世界消耗量的 7.4%、31%、30%、37%、25% 和 40%, 創造的 GDP 相當於世界總量的 4% (“內地石油對外依存度超過三分之一”, 香港《信報》2004 年 4 月 16 日, 第 16 頁)。“發達國家的發明件數佔世界總數的 99%, 發展中國家僅佔 1%; 專利申請數發達國家佔世界總數的 94%, 發展中國家僅佔 6%, 而發展中國家所申請的專利又有 84% 來自發達國家。……國際上的先進技術轉讓, 幾乎全被發達國家所壟斷, 其中僅美國、西歐、日本等發達國家就佔 80% 以上。……發達國家壟斷著全球每年高技術產業約 70% 的巨額利潤: 在信息產業, 這一比例更高”(胡聯合：《當代恐怖主義與對策》第 304 頁)。

<sup>164</sup> 筆者在《產業重組時不我待》一書中描繪了美國政府直接領導的軍工產業大規模重組。特別是波音兼併麥道的案例, 典型說明美國政府從國家利益出發, 主導和參與市場競爭的重要作用。筆者還在“中國航空工業何去何從?”一文中, 敘述了中國航空製造工業改革開放以來, 與麥道和空中客車的合作計劃先後夭折, 呈現明顯的“非航空工業化”——從高科技的航空製造, 蹣跚成汽車、摩托車製造; 從研究開發製造整機, 蹣跚成給跨國公司加工零配件。與此同時, 中國大陸進口大型客機, 佔波音年銷售額的 10% 左右 (《參閱文稿》No.99~11)。

<sup>165</sup> 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據, 2002 年, 全球軍費開支相對當全球 GDP 的 2.5%, 人均 128 美元 (“2002 年世界軍費開支增幅驚人”, 《參考消息》2003 年 6 月 19 日, 第 5 頁)。

<sup>166</sup> 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據, 2003 年, 全球軍費開支相對當全球 GDP 的 2.7%, 比 2002 年增長 11% (“去年全球軍費開支大幅增長”, 《參考消息》2004 年 6 月 11 日, 第 5 頁)。

<sup>167</sup> 東方曉：《伊斯蘭與冷戰後的世界》第 101 頁。

<sup>168</sup> 安維華、錢雪梅：《海灣石油新論》第 401 頁。

- <sup>169</sup> “在美國，約有三分之一的企業與軍工生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據稱，僅美國要向臺灣出售‘宙斯盾’驅逐艦一項，就涉及全美 49 個州 1938 個承包商的利益”（宋海英：“軍工集團牽扯全美利益”，《環球時報》2002 年 1 月 25 日）。
- <sup>170</sup> 崔之元：“擴大內需是一場深刻的革命”，《香港傳真》No.99~8。按當代常規理論，為了保持匯率穩定和貨幣安全，一國的儲備金應該相當於其以美元計算的短期外債；或者相當於 4~8 個月的進口支付。2002 年，美國國庫券的利率為 1.75%。換言之，發展中國家用商業利率借進多少外債，或者用高於商業銀行利率的盈利承諾引進多少外資，就得購買相同數量或更大比例利率僅為 1.75% 的美國債券。“現在，全球大約有兩萬億美元的儲備，每年還在增加 1~2 千億美元”（斯蒂格利茨：“亞洲經濟一體化的現狀與展望”，《比較》2002 年第 1 期，第 60~62 頁）。美國國庫券，韓國持有 950 億美元，日本幾乎四千億，中國接近兩千億。全世界國際儲備中，美元和美元資產佔 75% 以上。裡外裡，美國人什麼也不用幹，單憑美元霸權，坐收巨額利潤（麥金農：“世界美元本位和東亞匯率困境”，《比較》2002 年第 1 期，第 71 頁）。
- <sup>171</sup> 1996 年沙特阿拉伯人均國民收入 6900 美元，按照世界銀行貧富國家 7620 美元的分界線，已經跌出了富裕國家行列（安維華、錢雪梅：《海灣石油新論》第 400 頁）。
- <sup>172</sup> 香港俗稱水泥為“石屎”。人們形象地戲稱一片片密集的高樓大廈是“石屎森林”。
- <sup>173</sup> 另有類似的統計是：“民主先進國家財富分配最懸殊的美國，前 10% 的人口，擁有 28.5% 的收入，……巴西最富裕的前 10% 的人口，擁有 48% 的收入。肯尼亞、南非與辛巴威次之，前 10% 的人口，擁有 47% 的收入。智利、哥倫比亞、危地馬拉與巴拉圭，前 10% 的人口，擁有 46% 的收入。非洲幾內亞比索共和國、塞內加爾與獅子山，則是 43%”（哈瑞森、亨廷頓：《為什麼文化很重要》第 IX 頁）。1991 年，中國大陸基尼係數 28.8；2000 年為 45.8。“10% 的富裕家庭，佔有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 45%。最低收入 10% 的家庭，財產總額僅佔全部居民財產的 1.4%”（“大陸貧富分化加劇”，香港《信報》2003 年 6 月 19 日，第 22 頁）。
- <sup>174</sup> “撇開聯合國，美國廢油組”，香港《信報》2003 年 5 月 23 日，第 2 頁。
- <sup>175</sup> 沙特阿拉伯失業率的官方數據是 8%，民間經濟學家的數據是 13%，加

上沒有獨立門戶的青年，沙特政治學家的數據是 25% (Kim Murphy : "Saudi's quakesand of poverty", *Los Angeles Times* 2003 年 5 月 16 日)。

<sup>176</sup> 埃及、約旦、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失業率高達 15% 以上，阿爾及利亞、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失業率高達 20% 以上，阿富汗、也門、蘇丹和毛里塔尼亞的失業率高達 30% (王京烈：《面向 21 世紀的中東》第 135~136 頁)。

<sup>177</sup> 高佩義：《中外城市化比較研究》第 36、56 頁。1947~1987 年，城市人口的比例，阿爾及利亞從 25% 猛增到 67%，利比亞從 20% 到 65%，伊朗從 20% 到 50%，伊拉克從 35% 到 68%，約旦從 25% 到 60%，沙特從 10% 到 70%，埃及從 33% 到 50%。到 70 年代中，開羅居住人口 1600 多萬，佔埃及全國 3810 萬的 42% (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 283 頁)。

<sup>178</sup> 貝羅克：《城市與經濟發展》第 278 頁。

<sup>179</sup> 威廉·格雷德：《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瘋狂邏輯》第 271 頁。

<sup>180</sup> “這些外籍人絕大部分是為逃離內戰而來沙特謀生的也門人，其次是在歷次阿以衝突中喪失家園的巴勒斯坦人。還有一部分人來自埃及、敘利亞和黎巴嫩等國” (王鐵錚、林松業：《中東國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第 231、211 頁)。“據國際貨幣基金說，從整個波斯灣地區看，外籍勞工佔該地區勞動力的一半以上” (曹建、曹軍：《奧薩瑪·本拉登》第 13 頁)。

<sup>181</sup> 仲躋昆：《阿拉伯：1002 夜》第 180、190~191、173~174 頁。

<sup>182</sup> 其中十名埃及人、七名也門人、一名蘇丹人和一名伊拉克人。三百多名穆斯林兄弟武裝份子佔領大清真寺，沙特當局出動上萬軍隊，經過兩週血戰才平息 (仲躋昆：《阿拉伯：1002 夜》第 173~174 頁)。

<sup>183</sup> 邢東田：《當今世界宗教熱》第 24~30 頁。

<sup>184</sup> “日本最貧困的 20% 的人口，比美國最貧困的 20% 的人口還富足 50%。美國收入分配中佔最低位的 10% 的人口，與其他先進國家相應貧困的人相比，其平均收入佔第 13 位” (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第 141 頁)。

<sup>185</sup> 張文建：《走進阿拉伯》第 75 頁。

<sup>186</sup> 穆罕默德·加尼姆·魯邁希：《海灣不是石油——發展與統一問題研究》



(仲躋昆：《阿拉伯：1002 夜》第 191 頁)。

<sup>187</sup> “有關機構對當今大陸榜上有名巨富的發家過程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一是啟動的資金大都少的可憐；二是文化水平普遍較低。1994 年的統計數字表明，當時的 30 名億萬富翁中，70% 出身農民，70% 祇有小學文化。三是發家的速度極快，多數祇用了十年，甚至更短。比較而言，倒是國外富翁的發家速度較慢，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富翁積攢數百萬美元資產平均要幾十年；至於西方社會和海外華人，往往更要經過三代人的努力”(葉春生、麥可明：“周正毅——是民企巨富還是金融人騙”，香港《信報》2003 年 6 月 24 日，第 12 頁)。

<sup>188</sup> 1996~1997 年兩年平均，石油收入佔政府總收入的比例，沙特阿拉伯為 77%，阿曼為 76%，科威特為 74%，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為 72%，也門為 70%，卡塔爾為 66%，阿爾及利亞為 63%，巴林為 61%，伊朗為 58%，利比亞為 57%，敘利亞為 45% (安維華、錢雪梅：《海灣石油新論》第 490 頁)。

<sup>189</sup> 彭樹智：《阿拉伯國家通史》第 424 頁。

<sup>190</sup> 譬如，“王室的五千余名親王，按規定每人每月可從王國的石油收入中得到六萬美元以上的俸祿，除此還有大量名目繁多的補貼”(安維華、錢雪梅：《海灣石油新論》第 451 頁)。

<sup>191</sup>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王鐵錚、林松業：《中東國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第 238、260~261、272~273 頁)。

<sup>192</sup> 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 18 頁。

<sup>193</sup>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121 頁。

<sup>194</sup> 美國支持伊朗的理由非常理性：“在波斯灣，伊朗國王已經為冷戰中的美國發揮了兩個非常有價值的作用。第一，伊朗沒有受到阿拉伯石油禁運的影響，確保了美國的石油供應。第二，他提出利用伊朗新發現的財富，在蘇聯南部側翼創建一隻與德國軍隊一樣強大的現代化武裝”(理查德·克拉克：《反擊一切敵人》第 35 頁)。

<sup>195</sup> “土改共使 250 萬戶農戶近千萬人受益”(王新中、冀開運：《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第 312 頁)。

<sup>196</sup> 另外還有分散經營者的土地收歸國有的農業公司，原來的農民變成農業工人。到 1976 年，全國有 89 家這樣的農業公司，包括 813 個村庄，30 多萬人口和 40 多萬公頃土地(安維華、錢雪梅：《海灣石油新論》第

457~458 頁)。“政府在農村建立了若干農業股份公司和農業合作社，凡獲得土地的農民都有義務加入農村的合作組織”(王京烈：《面向 21 世紀的中東》第 179 頁)。

<sup>197</sup> 1972~1977 年，兩萬多工人成為股東(王新中、冀開運：《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第 317~318 頁)。

<sup>198</sup> 1960/61 年，在校女大學生相當於男生的 13%；十年後提高到 20%(王新中、冀開運：《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第 319~320 頁)。

<sup>199</sup> 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第 415 頁。

<sup>200</sup> 譬如，在南美洲，1968~1974 年，巴西經濟平均增長率達到 10.2%，被稱為“巴西奇蹟”；在非洲，科特迪瓦 60 年代的平均增長率達到 8%，70 年代達到 6.7%，被稱為“西非奇蹟”；在亞洲，60~80 年代，“四小龍”平均增長速度約 9%，被稱為“東亞奇蹟”(程光泉：《全球化理論譜系》第 359 頁)。

<sup>201</sup> 王新中、冀開運：《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第 321~322 頁。

<sup>202</sup> 凱倫·阿姆斯特壯：《為神而戰》第 354 頁。

<sup>203</sup> 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 131 頁。

<sup>204</sup> 王新中、冀開運：《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第 318 頁。

<sup>205</sup> 邢東山：《當今世界宗教熱》第 18 頁。

<sup>206</sup> 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 135 頁。另外的說法是“從法國定購 62 座帳篷，配備 165 名廚師，這次活動總共耗資達一億美元。而他的首相胡韋達‘從荷蘭買花，從法國買礦泉水，從東地中海購買野味，從非洲購買水果來佈置他的餐桌’”(王新中、冀開運：《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第 330 頁)。

<sup>207</sup> 王新中、冀開運：《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第 332~333 頁。

<sup>208</sup> 陳嘉厚：《現代伊斯蘭主義》第 311 頁。

<sup>209</sup> 張俊彥：《中東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研究》第 97 頁。

<sup>210</sup> 王新中、冀開運：《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第 340 頁。

<sup>211</sup> 張銘：《現代伊斯蘭復興運動》第 163 頁。

<sup>212</sup> 王新中、冀開運：《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第 340 頁。

<sup>213</sup> 基辛格：《白宮歲月》第四冊第 1598 頁。

<sup>214</sup> 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 133 頁。

<sup>215</sup> 凱倫・阿姆斯壯：《為神而戰》第 426、354 頁。

<sup>216</sup> 馬塔爾：《薩達姆・侯賽因》第 232~233 頁。

## 第四章

### “鐵拳鎮壓”，逼上梁山<sup>217</sup>

4.1 政治兩級分化

4.2 伊斯蘭扶貧濟困

4.3 鐵拳鎮壓，逼上梁山





在貧富懸殊的經濟基礎上，薩達特大刀闊斧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開放黨禁報禁，實現新聞自由，推行多黨政治。政治上的兩極分化，是經濟上兩極分化的必然結果。

## 4.1 政治兩級分化

一方面，少數先富起來的人群，在政治上要求保護和鞏固取得的經濟成果。“薩達特推行經濟和政治開放政策，促進了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了一批新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渴望參政，要求建立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政黨。老資產階級分子也躍躍欲試。兩股勢力迅速匯合。革命後被取締的資產階級政黨——華夫脫黨旋即企圖東山再起。”到 1978 年，已經有 98 萬人申請加入新的華夫脫黨（執政黨有兩百萬黨員）。更便捷的途徑是直接加入現成的統治集團。雖然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大部分領導人反對“社盟”向資產階級各派開放，<sup>218</sup>“人資產階級中有些人當了議員，有人出任部長。”農村資產階級“中間的一些人當上了議員、出任部長、副議長和執政黨農民書記處書記等。”<sup>219</sup>

另一方面，多數沒有富起來的窮人，更希望通過政治上的努力，改變國家向資本傾斜的經濟政策和制度安排，扭轉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分化趨勢。窮人永遠是大多數。祇要開放黨禁，允許窮人組織起來，原教旨主義組織迅速蔓延。到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發展到上百萬人，同情者超過兩百萬。<sup>220</sup>

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少數富人從右的方向要求實行民主政

治，反對政府；多數窮人從左的方向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反對政府；必然帶來執政黨內部四分五裂。執政黨先是分成左、中、右三個“論壇”，接著裂變出五花八門 40 多個“論壇”。“論壇”從事政黨活動，最終導致執政黨分崩離析，名存實亡。到 1978 年，薩達特不得不成立新黨——民族民主黨，原來的執政黨——社會主義聯盟宣佈併入新黨。雖然新黨的口號是“大家有飯吃，大家有房住，大家生活幸福”，還是沒有回答清楚什麼人吃什麼飯、怎麼吃的根本問題，繼續受到華夫脫黨和穆斯林兄弟會左右兩個方向的窮追猛打，繼續執政的權力基礎岌岌可危。<sup>221</sup>

華夫脫黨依仗強大的經濟實力登堂入室，得寸進尺，走議會道路奪取政權，咄咄逼人。薩達特饑不擇食，恢復穆斯林兄弟會的合法地位，以為制衡。<sup>222</sup> 可惜的是，左右兩個方面分別代表不可調和的階級利益。尤其是穆斯林兄弟會，一朝出籠，即成下山猛虎，從宗教信仰層面上，展現出與貧富懸殊、貪污腐敗勢不兩立的不妥協性。隨著多黨政治逐步展開，反政府的呼聲日益高漲，執政黨的選擇餘地日益侷促，不得不採用強制手段，對來自不同方向的反政府運動，施加限制和鎮壓。大道理反正是說不清楚了，祇能是誰反對政府就限制誰，誰破壞社會穩定就鎮壓誰。

## 4.2 伊斯蘭扶貧濟困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腐敗蔓延，與政府的行政效率呈反比，“反對政府”的概念定義自然膨脹。伊斯蘭復興運動大力舉

辦各種濟苦憐貧的慈善互助事業。政府對少數人的鎮壓，經常激發出不成比例的社會反彈。

不受政府控制的獨立的私人清真寺在發展伊斯蘭運動上已被證明特別重要。這些清真寺給伊斯蘭組織及其擴展提供了一個中心。它們也為伊斯蘭好鬥分子提供了集會的場所和組織中心。70年代期間，私人清真寺的數量從大約兩萬座增長了近一倍，達四萬座。埃及的4.6萬座清真寺中，宗教基金部僅控制了六千座。私人清真寺和教職人員在政治和金融上獨立，這和國家資助的清真寺完全相反。宗教權力機構和政府操縱的傳媒經常為私人清真寺的傳奇式的教職人員所作的激烈措辭的宣道所嚴重損害。

像聖戰組織這樣的集團通過教育和社會福利設施的網絡擴大影響。這個網絡包括虔信者開辦的《古蘭經》學習班，提供食品、衣物，以及在擁擠不堪的都市地區為窮人得到住處提供幫助的社會中心。大學的學生組織以提供免費書籍、衣服（包括為婦女準備“伊斯蘭服裝”），授課指導和解決住房等籠絡人心。<sup>223</sup>

引進市場機制，企業唯利是圖，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馬上成為政府突出的重要職能。一旦政府機構腐敗蔓延，財政撥款的公益、福利、扶貧職能，馬上變成比投機倒把還容易賺錢的謀利捷徑。大多數勞動者迅速變成無助的弱勢群體。自發組織起來的慈善、互助和自救，自動帶上反對政府的嫌疑。私人清真寺和宗教組織大辦不收利息的伊斯蘭銀行，濟困扶危的住房投資、法律服務、醫院、門診所、學校、託兒所以及各種類型的互助合作商店和工廠，在政府稅收之外廣泛募集信徒的贊



助——“天課”和施捨，聘用虔誠的信徒解衣推食，一個窩頭掰兩半，向貧窮百姓廣施援手，與勞苦大眾廣結善緣。廉潔奉公的真誠和效率，與政府扶貧機構的顛預腐敗，形成鮮明對比。<sup>224</sup>特別是高舉公平正義的道德旗幟，團結動員大批具有宗教信仰和同情心、願意抽空幫助窮人的專業人士和退休幹部，穆斯林兄弟會組織起勢力龐大的法律、教育、醫務、工程、金融和社會服務人員等 20 多個專業協會，廣泛組成知識份子與工農大眾的緊密結合。“儘管許多伊斯蘭協會是非政治性的，可是這些組織和活動都明白無誤的指示出對埃及政府不能滿足社會需要的政治批評”。埃及社會學家評論：

伊斯蘭行動主義這股力量已經開始採取具體的伊斯蘭措施來取代國家和資本主義企業的社會經濟機構。伊斯蘭社會福利機構比國家公益事業的同類機構要管理得更好，更少官僚氣味和更講人情。……它們確實更面向基層，更注重效益，而薩達特政權的開放政策下搞的機構卻很奢侈。70 年代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的政府機構祇向全國總人口的 5% 中上層階級提供服務。非政治性的伊斯蘭行動主義真正發展了社會經濟實體，通過這些實體，伊斯蘭行動主義成功地使埃及國家和其他世俗勢力相形見绌。<sup>225</sup>

### 4.3 鐵拳鎮壓，逼上梁山

伊斯蘭雪中送炭，老百姓感恩戴德。這種情況下，政府對少數居心叵測者施加限制和鎮壓，往往殃及真誠、效率的慈善

互助，邏輯上使無助的弱勢群體越發無助，大面積激化群眾的逆反心理和對立情緒。這樣收拾一點、惹惱一片的整治，結果是工人運動、學生運動走上街頭，罷工、罷課、集會遊行，乃至全國範圍的群眾性騷亂此起彼伏。對此，軍人出身的薩達特施展了一次又一次的鐵拳鎮壓，嚴厲打擊，取締各種反對政府的政治組織，大規模逮捕異見人士，動用軍隊開槍彈壓街頭運動的群眾，在大城市實施宵禁，造成一起又一起規模越來越大的流血事件。街頭運動，嚴厲鎮壓，流血衝突，社會動蕩，惡性循環的局面越來越難以收拾。

1981 年 9 月，薩達特毅然決然，一舉取締兄弟會為首的 13 個“威脅國家統一”的宗教團體（撤銷包括兄弟會機關報的七種報刊的發行許可證），一舉把四萬個清真寺收歸國有，一舉逮捕 1500 多名兄弟會成員和宗教極端分子。<sup>226</sup> 10 月 6 日，年輕時因為從事暗殺而成為風雲人物的薩達特，最終倒在兄弟會極端組織明火執仗的槍口下。<sup>227</sup>——與納賽爾被蘇聯冊封“蘇聯英雄”相對稱，薩達特像戈爾巴喬夫一樣，榮獲諾貝爾和平獎，<sup>228</sup> 被西方奉為“我們時代的一位偉大的領導人。”<sup>229</sup>

在伊朗，從巴列維國王復辟開始，在美國軍方和中央情報局直接幫助下，政府組建了強大的專政機器，對各種反改革勢力實行有效壓制。<sup>230</sup> 依仗這部機器，國王對來自工人和知識份子的不滿，順著慣性強力鎮壓，包括逮捕和流放霍梅尼。1978 年 1 月 7 日，因為官方報紙匿名文章攻擊霍梅尼，庫姆神學院四千名學生遊行抗議。警察開槍，釀成 70 死、400 傷的“庫姆慘案”。根據伊斯蘭傳統，人死 40 天後悼念。2 月 18 日，

12 個城市遊行示威。在大不里士，軍隊開槍，釀成一百多死、六百多傷的“大不里士慘案”。再 40 天，又悼念，12 個城市又遊行，又開槍，又死傷。再 40 天，又悼念，35 個城市又發生騷亂……9 月 8 日早 5 點，政府宣佈在 12 個城市實行六個月戒嚴；三小時以後，1.5 萬人在德黑蘭賈勒赫廣場示威。軍隊開槍，釀成 87 死、205 傷的“黑色星期五”。11 月 6 日，國王毅然決然，換軍人當首相，全面實行軍管。四天以後，德黑蘭上百萬人遊行示威。霍梅尼發佈的戰鬥號召響徹雲霄：“伊斯蘭站在窮人一邊，站在農民一邊！”

這樣鎮壓、悼念、軍管、遊行，折騰了整整一年。終於，1979 年 2 月，在德黑蘭的空軍軍校學生上街了。帝國衛隊趕來鎮壓，伊斯蘭敢死隊和伊斯蘭聖戰者參戰反抗。到這時候，美式武裝的強大政權呈辛亥革命狀，不是瓦解而是土崩了。號稱世界第五大軍事力量的伊朗政權，祇打了三天，原教旨主義奪取政權。

在這一階段，城市無產者從軍械庫得到大量武器，這些城市無產者多是從農村流入城市的無技術專長的窮人，他們是現代化中受歧視的城市邊緣人，他們又是狂熱的穆斯林。他們掌握了武器，成為伊斯蘭共和國的支柱。<sup>231</sup>

在阿爾及利亞，布邁丁去世以後，沙德利政府按照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方案改革開放，減少政府支出，改革國有企業，鼓勵私營經濟，吸引外商投資。貧富分化愈演愈烈，原教旨主義復興。<sup>232</sup> 又是反對政府腐敗加大辦扶貧濟困：

它帶來了組織水平和意識形態承諾(這為社會的其他部門所缺乏)，以及頗有影響的醫療診所和慈善協會網絡向最貧窮者和最擁擠的城區街道提供服務，在清真寺裡提供免費教育，提供住房，開設商店，創造就業機會，清掃街區等。

獨立的清真寺(不受政府控制的)和社會福利機構網絡在80年代後半期，由於國家機器的軟弱無能而變得日益重要了。鑒於伊斯蘭教在民族主義運動和革命中的歷史作用，它在大眾文化和非精英社會階層中的根基，伊斯蘭主義者提供了一種在民眾中頗有吸引力的信息。他們宣佈以伊斯蘭來取代政府的失敗和阿爾及利亞西化的世俗精英的失敗。他們的社會服務也是對政府失敗的含蓄的批評。1989年，當阿爾及利亞遭受地震災害時，伊斯蘭主義者最先採取行動，並在救災中做得那麼有效率。是他們，而不是政府，提供了毯子和藥品。這樣，他們的威望進一步上昇，而政府的缺乏效率的形象則更加明顯。<sup>233</sup>

按照國際慣例，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必須配套政治體制改革。1989年2月，政府宣佈取消一黨專制，實行民主政治。過去處於地下狀態的伊斯蘭拯救陣線，在1990年6月的地方憲政選舉中旋即崛起，馬上勝出，贏得55.42%的選票(執政黨得31.64%)。<sup>234</sup> 為了防止“伊陣”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奪取政權，1991年5月，政府頒佈帶有針對性限制的新選舉法，“伊陣”號召全國總罷工。6月，政府宣佈進入“緊急狀態”，軍警鎮壓，死傷三百多人，包括“伊陣”正副主席在內的八千多人被捕。9月，“緊急狀態”解除。12月，國民議會選舉，“伊陣”

大獲全勝，在 231 個席位中包攬 188 席，社會主義力量陣線得 26 席，執政黨僅得 16 席。議會總共 430 個席位，距離超過半數的組閣要求祇差 28 席了。剩餘 199 個席位的爭奪，將在 1992 年的第二輪選舉中見分曉。“伊陣”以絕對壓倒優勢奪取政權，板上釘釘。<sup>235</sup> 1992 年初，軍方出面迫使沙德利總統辭職，組成五人委員會接管政權，取消第二輪選舉，引發波及全國的抗議和大規模流血衝突。2 月，五人委員會頒佈《緊急狀態法》；3 月，宣佈在合法選舉中幾乎奪權的“伊陣”為非法組織，強令解散，機構被關閉，報紙被查封，資產被沒收，大批“伊陣”領導人和骨幹遭到逮捕和嚴刑拷打，上萬人被關進撒哈拉沙漠裡的集中營。<sup>236</sup> 6 月，國家元首布迪亞夫將軍遇刺身亡。再度轉入地下的“伊陣”派生出諸多激進極端，展開南昌起義式的武裝鬥爭。到 1993 年 4 月，已有兩百多名恐怖份子被擊斃，3800 多名被逮捕。<sup>237</sup> 1992~1994 年，阿爾及利亞遭暗殺的死傷者 1.25 萬人，縱火、爆炸等破壞事件 2775 起。1990~1997 年，到伊斯蘭救國軍宣佈放下武器時，十萬人死亡，上百萬人受害。<sup>238</sup> 接下來還沒完，僅 2002 年 1~7 月，全國發生恐怖爆炸數百起，850 人死亡。<sup>239</sup>

## 註釋：

<sup>210</sup> “鐵拳鎮壓”為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6章第2節之小標題（403頁）。

<sup>211</sup> “當權者，包括社盟大部分領導人和所謂的工農代表反對多黨制，……反對社盟向資產階級各派開放”（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388頁）。

<sup>212</sup> “官僚資產階級的勢力相對有所削弱，但是仍然佔據統治地位。政府和公營部門基本上掌握在他們手中。……官僚資產階級的核心約幾千人，包括正、副部長、公司和企業的董事長和經理以及省長等。他們的年薪人均約四千埃鎊。70年代中期，全體高級官員每年所獲得的各種津貼總共約1500萬埃鎊。而一個普通職員的年工資，1975年為144到540埃鎊之間。二者相比，差距甚遠。此外，高級官員在納賽爾時代享有的種種特權基本上得到保留”（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428-432頁）。

<sup>213</sup> 與此同時，兄弟會控制了65座清真寺和一千多個宗教組織（反恐怖研究中心：《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第291頁）。

<sup>214</sup> 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387-401頁。

<sup>215</sup> 1987年大選，新華夫脫黨得8%的選票，勞工黨、自由黨和穆斯林兄弟會聯盟獲得12.5%的選票。兄弟會九名成員成為埃及議會議員（劉靖華、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第225頁）。

<sup>216</sup> 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179頁。

<sup>217</sup> 在這個問題上，亞歷山大·達拉索夫對車臣問題的說法發人深省：“問題的實質並非車臣的地位問題，而是一個被毀壞的、被炸平的、處於飢餓的車臣形式上無論具有什麼地位，它都會對俄構成威脅。相反，為使車臣不構成威脅，需要使車臣的工廠、學校、醫院、商店、交通設施等都運轉起來，要讓車臣人民在這些企業、機關工作，並以此為生。也就是說，需要消除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事實上，用於車臣的撥款均被瓜分（大部分在莫斯科便被瓜分）。談到此事，普京總統自己也無助地表示：都被瓜分了，怎麼也追不回來了”（亞歷山大·達拉索夫：“恐怖主義——小規模擴散戰爭”，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

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240頁；黑體加重是筆者所為）。“車臣總人口不到一百萬，有人估計，四年中，車臣戰爭已經造成10~30萬生靈塗炭”（陳彥：“反恐大潮下的車臣慘劇”，香港《信報》2003年2月19日，第10頁）。

<sup>225</sup> 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171頁。

<sup>226</sup> 藍瑛：《非洲社會主義小詞典》第70頁。薩達特說逮捕了1536人。也有人稱被捕的文職人員五千人，軍官50名，遭軟禁者達四萬人（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420頁）。

<sup>227</sup> 暗殺薩達特的阿布達爾·薩拉姆·法拉伊，是聖戰運動的重要理論家，曾著《被忽視的教規職責》一書（劉靖華、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第58頁）。

<sup>228</sup> 有意思的是，1978年，薩達特與以色列總理貝京分享諾貝爾和平獎。兩人年輕時均因從事恐怖活動而遐邇聞名。

<sup>229</sup> 基辛格作如是說（基辛格：《白宮歲月》第四冊第1617頁）。1981年，福特、卡特和尼克松參加薩達特的葬禮。“我們一致認為薩達特勇敢果斷，眼光遠大，足智多謀，精明能幹。……薩達特的生活比納賽爾豪華得多，他有十座總統別墅，……他本人衣著講究，抽的是進口煙絲。……薩達特是一個大膽的革新者”（尼克松：《領導者》第437~438頁）。

<sup>230</sup> “1954年，美國給伊朗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總額相當於伊朗政府當年財政支出的60%。”石油漲價之後，伊朗外匯收入大增。1972~1977年，伊朗軍火支出增加了六倍，購買美國軍火從10.1億美元上升到近80億美元，1978年再增加到95億美元。伊朗成為波斯灣的頭號強國（江紅：《為石油而戰》第415~416頁）。

<sup>231</sup> 王新中、龔開運：《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第344~348頁。發人深省，尼克松的經驗總結別具一格：“與廣為流傳的關於巴列維國王垮臺原因的奇談怪論相反，他垮臺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冷酷無情的暴君，事實恰恰証明，這種奇談怪論是錯誤的。他之所以垮臺，原因之一是他急躁冒進，他可能太急於求成了；原因之二，這也是同樣重要的，就是他鎮壓威脅國家穩定的勢力不夠果斷。當危機出現時，如果他不是草率地對敵手作出種種妥協讓步，而是及時予以鎮壓，那才是挽救伊朗免於陷入當前黑暗與混亂的最好辦法”（尼克松：《領導者》第445頁）。

- <sup>232</sup> 1988年，80%的公營公司虧損。5%的富人擁有45%的社會財富(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第481~482頁)。1987~1988年，通貨膨脹率高達42%。全國150萬人失業，70%是青年。低收入者上千萬，無收入者430萬，分別佔全國人口的40%和17%(曲洪：《當代中東政治伊斯蘭》第151~152頁)。1989年2月，阿爾及利亞公民投票，73.4%的人贊成通過新憲法，刪去原憲法中關於社會主義的條款(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137頁)。
- <sup>233</sup> 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228、219頁。
- <sup>234</sup> “伊斯蘭拯救陣線1989年3月成立，僅一年時間就發展到三百萬成員”(劉靖華、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第269、315頁)。
- <sup>235</sup> 劉靖華、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第315頁。
- <sup>236</sup> 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230~234頁。
- <sup>237</sup> 彭樹智：《阿拉伯國家通史》第316頁；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第484頁。
- <sup>238</sup> 阿爾及利亞通貨膨脹率為20%，失業率為30%。全國3200萬人口中，1200多萬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社會動亂與經濟崩潰形成正反饋的惡性循環(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144~157頁)。1992~1997年，“因宗教極端分子發動的恐怖活動造成的人員傷亡數高達七萬名(胡聯合：《當代世界恐怖主義與對策》第53頁)。
- <sup>239</sup> 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全球變局：美國與伊拉克》第178頁。





## 第五章

# 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

- 5.1 滿世界利益均沾
- 5.2 騙人的“和平路線圖”
- 5.3 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





全球“反恐”鑼鼓喧天之際，張藝謀拍電影《英雄》，引起網民一片譁然。甚至有人說，電影是在為布什收拾本·拉登張目。這恐怕是過高估計老謀子拍電影，唯利是圖的政治覺悟了。因為小布什與秦始皇，雲泥霄壤之別，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秦始皇的天下，是真實的天下。滅六國，六國人民均為大秦子民，理論上和法律上一視同仁。橫徵暴斂的苛政，書同文、車同軌的方便，原來的秦國百姓，和被征服的六國百姓一體享用。別看美國打遍了天下，卻是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布什在西點軍校說得多真實：“美國並不是一個需要擴張的帝國，也不準備建立一個烏托邦。”美國“沒有領土野心，我們並沒有建立一個帝國的企圖。我們的國家是為了自己與其他人的自由而奮鬥的。”<sup>240</sup>

## 5.1 滿世界利益均沾

美國所以強大，當然有制度的優越性。民主、自由成為舉世嚮往、努力學習的榜樣。但是，當美國打下一片天地，國土規模和自然資源足夠稱霸世界之後，就非常理性地“孤立主義”了。50個州的聯邦子民不再增加。“移民國家”發簽證，要警惕“移民傾向”了。<sup>241</sup>真正自給自足，安居樂業，倒也無可厚非，招人恨的是滿世界“利益均沾”，民主、自由、人權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常常是謀私利的藉口。

伊朗民主選舉出摩薩台，因為主張石油國有化，被美國中央情報局插手推翻，代之以巴列維國王的獨裁專制。<sup>242</sup>危地馬拉民

主選舉出阿本斯，因為主張比較激進的土地改革，被美國中央情報局插手推翻，代之以阿馬斯的獨裁專制。智利民主選舉出阿連德，因為主張社會主義，被美國中央情報局插手推翻，代之以皮諾切克的獨裁專制。印度尼西亞民主選舉出蘇加諾，因為主張民族運動、伊斯蘭和共產黨結成“人民聯合陣線”，被美國中央情報局插手推翻，代之以蘇哈托的獨裁專制。<sup>243</sup> 美國在中東的朋友，包括沙特、阿聯酋、科威特、卡塔爾、巴林、阿曼，全是不學美國的一夫多妻、穿長袍、蓄鬍鬚的部落酋長家族世襲統治。<sup>244</sup> 美國在中東的對頭，包括(過去的)埃及、敘利亞、利比亞、伊拉克，淨是土地改革、工業國有化、婦女解放、真的假的學習美國的政黨政治和民主選舉。<sup>245</sup>

固然，學習美國再認真，嚮往美國再強烈，誰也甯想變成美國的第 51 個州。既然如此，美國在世界各地建立 750 多個軍事基地為哪般？<sup>246</sup> ——誰敢不聽話，不甘心讓美國“利益均沾”，就“人權高於主權”地整治誰。一方面，美軍不遠萬里，三拳兩腳打下主權國家阿富汗，是典型的帝國主義；另一方面，被解放了的阿富汗人民成了美國的負擔。<sup>247</sup> 即便“今夜美國人”一類崇美、愛美、媚美的燭光晚會天天辦，大使館簽證處照樣嚴防死守“移民傾向”。窮山惡水出刁民，該挨餓挨餓，該受窮受窮，誰也圓不了自由民主的美國夢——人家美國不當帝國。

沒有領土要求，不要割地賠款，是美國與其他老牌帝國主義之間，最原則、最慈善的標誌性區別。倘若當年秦始皇也向美國學習，不要滅六國，不是一統天下，而是分而治之，充分利用各國內部民族宗教、血緣族親的種種矛盾，用強大軍事力

量直接打擊加間接威懾、把六國解放成十國、20 國、30 國，不是修長城捍衛鐵桶江山，而是建基地維持國際秩序，不提什麼普天之下王土王臣，一門心思滿世界利益均沾，熱情扶持各國親秦政權，專心致志為秦國謀私利，憑著嬴政的雄才偉略和扶蘇的仁愛之心，哪裡致於二世而亡，還要揸上千古罵名呢？

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祇佔帝國主義的便宜，沒有帝國的負擔，是比當帝國的英聯邦殖民地更自私、更不負責、從而更實惠、更赤裸裸的強盜邏輯，是當代帝國主義的高級形態——佔便宜還能賣乖，當婊子還能立牌坊。一方面，“美國被廣泛地看作代表著未來，是一個值得欽佩和仿效的社會。”<sup>248</sup> 另一方面，老師總是揍學生，而且是誰學得越好，越有可能國強民富，老師就揍得越狠、越歡。在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時候，美國政府高舉反專制、反侵略和民主自由的旗幟，與真誠的美國人民一道，為捍衛部落酋長的腐敗專制而流血犧牲。<sup>249</sup> 在更多的時候，任何一個統一強大的國家或地區崛起，都是對美國世界霸權的挑戰，遭到美帝國主義的遏制、阻撓、顛覆，直至發動戰爭。對此，美國政府從來直言不諱：

為保護和實現美國的利益，美國政府必須有能力影響其他國家的政策和行動。這就要求美國保持在國外的參與，尤其是那些使美國最重要的利益處於危險的地區。<sup>250</sup>

在美洲如此，在亞洲如此，在非洲如此，在中東這個“使美國最重要的利益處於危險的地區”，更是如此。——老布什打伊拉克，在海灣部署了美國 75% 的現役戰術飛機、42% 的現代

化作戰坦克、46% 的航空母艦、37% 的陸軍兵力和 46% 的海軍陸戰隊人員。<sup>251</sup>

## 5.2 騙人的“和平路線圖”

中東問題，根本不是畫一張什麼“以巴和平路線圖”所能化解。<sup>252</sup> 阿拉伯民族兩億人口，1370 萬平方公里土地，“阿拉伯統一一直是阿拉伯傑出人物夢寐以求的夙願”。<sup>253</sup> 薩達姆上臺伊始，接受記者長時間採訪，概括闡明實現民族統一、社會主義和民族復興的關係：

我們的問題並不簡單：有瓜分的問題，反對猶太復國主義鬥爭的問題以及反對階級差別的問題。

“統一、自由、社會主義”的排列是有意識的。阿拉伯人必須為民族真理而鬥爭，沒有民族主義為阿拉伯統一所進行的鬥爭，他們不可能獲得真正的自由。……黨的綱領是基於下述事實，即一個阿拉伯人必須成為一個民族主義者才能達到真正的自由。這最終必須導致統一，並由此達到社會主義。……在當今集團和超級大國對峙的世界上，鯊魚在我們周圍的海洋中漫遊，因此很難說伊拉克在國際政治中的自由就如同它作為一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中的一部分所享有的自由。……如果今天我們都統一成一個阿拉伯民族，那麼一個伊拉克公民享有的自由將會不同。因為現在他的自由是與外部世界的關係聯繫在一起的。

這個地區的穩定不可能通過創立一個巴勒斯坦國來實現。

真正的穩定將隨著作為一個統一體的阿拉伯民族的解放而到來。<sup>254</sup>

加州、紐約作為統一美國之一部分；臺灣、香港、廣東、上海，作為統一中國之一部分；在國際政治經濟生活中所能享受的自由，與分頭獨立成主權國家所能享受的自由，當然明顯不同。無論從安全、軍事、政治還是經濟發展上說，足夠規模的領土、人口、資源和市場，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布熱津斯基世紀末講話：“民族國家仍是國際關係的基本單位。……地理位置仍是民族國家對外政策優先目標的出發點。國家領土面積的大小也仍是衡量其地位和力量的主要標準。”<sup>255</sup>

設身處地替阿拉伯民族著想，倘若當年大不列顛足夠強大，阻止美國侵略墨西哥，干涉美國北方武力解放南方，今天誰還會擔心和美國搞不好關係？——幾乎整個西部，包括加利福尼亞、亞利桑那、德克薩斯、新墨西哥、內華達、猶他、科羅拉多，當年都是主權國家墨西哥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南北戰爭前，南方各州明明都是民主議會依法投票表決脫離“美麗尖”合眾國。

中國沒有中東一般的石油蘊藏，卻有 13 億人口。所以，中國要想解放臺灣，美國不能袖手旁觀。<sup>256</sup> 不止臺灣應當獨立，而且最好香港主權換治權；內蒙、外蒙統一還原，獨立門戶；西藏囊括青海、四川、雲南、甘肅各省週邊的藏區，連皮帶肉攢成“雪山獅子國”；<sup>257</sup> 恢復愛新覺羅的滿州國；新疆分裂出去，加入“東突厥斯坦”；寧夏、青海、陝西、甘肅的回民凝聚成一個“回回國”；華北成立自治政府；上海學新加坡拉鐵絲



網獨立成發達國家；東南聯省自治，家家都夠中等收入國家的資格。倘若當年共產黨聽了蘇聯的，與國民黨劃江而治；倘若實現李登輝的理想，中國分成七塊、八塊；你有石油，我有煤炭，不當帝國的列強各霸一方，利益均沾；中央政府在首都向八國聯軍正式宣戰，三大總督東南自保，在上海與交戰國擅自談判；日俄戰爭在東北大打出手，滿清政府在北京宣佈中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恐怕再也無從談起。所以，統一是大民族躋身世界民族之林、周旋西方列強之間的安身立命之本。所以，列寧在“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中指出：

馬克思主義者是反對聯邦制和分權制的，原因很簡單，資本主義為了自己的發展總是要求有一個盡可能集中的國家。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覺悟的無產階級將始終堅持建立更大的國家。……在各個不同的民族組成一個統一的國家的情況下，並且正是由於這種情況，馬克思主義者是決不主張實行任何聯邦制原則，也不會主張實行任何分權制的。中央集中制的大國是從中世紀的分散狀態向將來全世界社會主義的統一的邁出的巨大的歷史性的一步，除了通過這樣的國家（同資本主義緊密相聯的）外，沒有也不可能有的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sup>258</sup>

所以，卡扎菲嗷嗷叫得不無道理：

巴勒斯坦是不能靠消極的辦法來收回的。不能靠劃分階級的辦法，也不能靠別人恩賜的辦法。它祇能靠擺脫了枷鎖、限制和狹隘地方主義的阿拉伯廣大群眾的進軍。兄弟們，當我們把妨礙阿拉伯人民戰鬥團結的障礙推倒以後，我們就會達到巴

勒斯坦。當我們抹掉我們的邊界和區劃的時候，我們就會達到聖地。當阿拉伯世界形成一條堅強陣線的時候，我們就會解放巴勒斯坦。<sup>259</sup>

統一阿拉伯的努力，從來是阿拉伯民族持續奮鬥的核心內容。三落三起的沙特王國，藉助原教旨主義開疆拓土，兵鋒直逼巴格達和大馬士革。<sup>260</sup> 一戰期間，哈希姆家族圍繞《大馬士革議定書》，以侯賽因和麥克瑪洪通信的形式，與英國談判，戰後建成統一的阿拉伯國家，囊括北緯 37 度以南的敘利亞、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島。<sup>261</sup> 1941 年，英國在阿拉伯統一問題上的態度稍有軟化，伊拉克和約旦分別提出“肥沃新月”計劃和“大敘利亞”方案。<sup>262</sup> 1945 年，剛剛獨立六個阿拉伯國家，馬上成立阿拉伯國家聯盟。<sup>263</sup> 接下來，不僅所有陸續獨立的阿拉伯國家都參加了聯盟，而且和平統一和武力解放的努力此起彼伏，綿綿不絕。

譬如，1956 年，埃及、敘利亞、沙特、也門和約旦組建“阿拉伯防禦體系”；1958 年，埃及和敘利亞合併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sup>264</sup> 伊拉克和約旦合併成“阿拉伯聯邦”，<sup>265</sup> 摩洛哥、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制定“馬格里布國家聯邦”計劃；60 年代初，埃及和沙特分頭參與也門內戰；<sup>266</sup> 1963 年，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決定實施“阿拉伯聯邦”計劃；1971 年，埃及、蘇丹、利比亞和敘利亞統一組成“阿拉伯共和國聯邦”；<sup>267</sup> 1974 年，利比亞和突尼斯達成建立“阿拉伯伊斯蘭教共和國”的協議；<sup>268</sup> 1978 年，敘利亞、伊拉克簽署了《民族行動聯合憲章》，準備合併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sup>269</sup> 1980 年，利比亞和敘利亞宣佈兩國第

二次統一；<sup>270</sup> 1981 年，利比亞與乍得簽署兩國實現完全統一的聯合公報，<sup>271</sup> 六個海灣國家成立“海灣合作委員會”；1984 年，埃及、約旦、也門和伊拉克成立“阿拉伯合作委員會”；1989 年，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利比亞、毛里塔尼亞組成“阿拉伯馬格里布聯盟”，<sup>272</sup> 等等，等等，一直鬧到 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且繼續沒完沒了。譬如，卡扎菲向東吃不開了，轉身投入非洲。1997 年 8 月，敘利亞、蘇丹、乍得、尼日爾、馬里和布基納法組成“撒哈拉阿拉伯國家聯合體”。<sup>273</sup>

作為一個民族，阿拉伯人在這片荒漠的土地上放牧，不同部落之間，從來沒有現代國家意義的明確邊界。在民族統一問題上，阿拉伯人內部，始終存在走什麼道路、按什麼模式、舉什麼旗幟和誰當老大的反復爭鬥。但是，沙特的瓦哈比原教旨主義，納賽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卡扎菲的伊斯蘭社會主義，薩達姆的統一自由社會主義，霍梅尼的原教旨主義，無論什麼主義，從來沒有把西方殖民者劃分的國家主權，真正放在眼裡。<sup>274</sup> 追求阿拉伯的民族統一，是伊斯蘭教義的題中應有之義。<sup>275</sup> 至於說廣大老百姓，共同悠久的歷史文化，共同應用的語言文字，共同遵循的風俗習慣，共同強烈的宗教信仰，長得模樣都差不多，相互之間沾親帶故，更是弄不明白為什麼一定要相互隔絕的道理。在前蘇聯，在前南斯拉夫、在臺灣、西藏，西方列強不是大力提倡人民公決嗎？如果整個阿拉伯民族來一次人民公決，會是什麼結果呢？——1971 年 9 月，埃及、敘利亞和利比亞就三國合併舉行公決，98.3% 的公民投了贊成票。<sup>276</sup>

### 5.3 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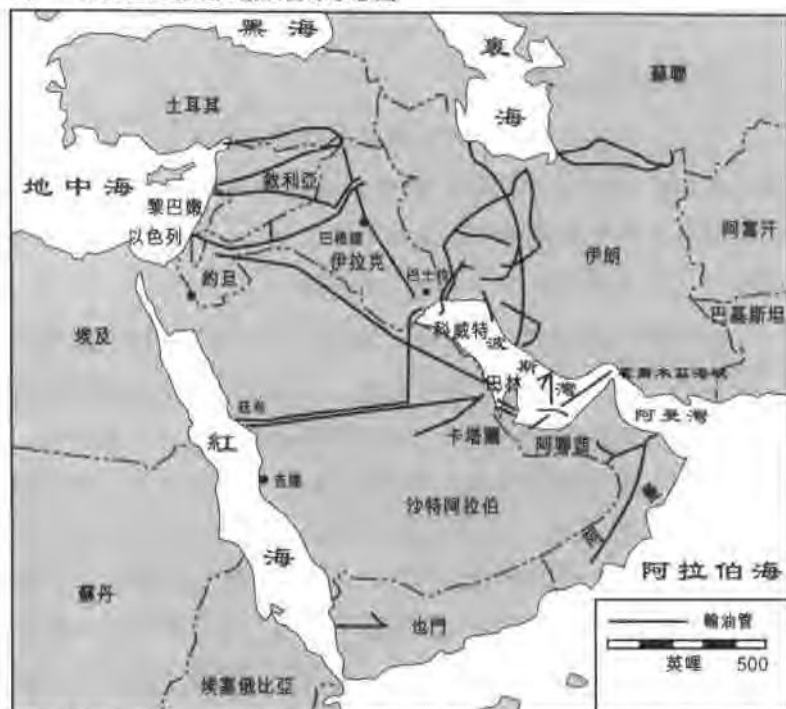
亨廷頓說得多麼清楚：

在阿拉伯世界中，現存國家的合法性頗成問題，因為它們大多數是歐洲帝國主義任意（即便不是反復無常地）製成的，它們的邊界甚至常常與種族集團的界線不一致，如柏柏人和庫爾德人。這些國家把阿拉伯民族分隔開來。<sup>277</sup>

如果問題僅此而已，實現中東和平太容易了。聯合國主持召開會議，阿拉伯人充分發表意見，集思廣益，把各國邊界線重新畫畫，愿意合併的合併，該歸堆兒的歸堆兒，一團和氣，和平發展，誰的事也不礙，哪里用得著一代又一代人流血犧牲？真正的難題是，所有這些在阿拉伯人眼裡“可笑的邊界線”，<sup>278</sup>表面上看起來漫不經心，實際上都是根據地下的油田、地上的輸油管，運河、海峽通道和港口分佈劃分的；都是西方列強反復爭奪殖民地的結果；都是西方列強不得不退出殖民統治，為了加強控制而製造矛盾，根據分而治之的原則精心設定的。<sup>279</sup>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美國支持的以色列，猶如一把尖刀，深深插在阿拉伯的腰眼上——命門。<sup>280</sup>另一個對稱的典型是庫爾德人。海灣幾國，小小卡塔爾，本國人口 16 萬；小小巴林，人口 49 萬；小小阿聯酋，本國人口 59 萬；<sup>281</sup>壓根儿都是阿拉伯，英國人硬讓紛紛獨立成“神聖不可侵犯”的主權國家。<sup>282</sup>曾經戰勝十字軍東征的民族英雄薩拉丁是庫爾德人。<sup>283</sup>庫爾德兩千多萬人口，在中東是繼阿拉伯、土耳其和波斯之後的第四

圖-1：伊拉克周邊地區輸油管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殷望、秦海波：《薩達姆·侯賽因》扉頁。

大民族，從來就有庫爾德斯坦地區。<sup>284</sup> 因為盛傳地下有石油，被五馬分屍在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和高加索，成為“世界最大的無國家民族”。<sup>285</sup> 原本朝著一個中心的凝聚，從此轉換成五個方向的造反，人為製造出一個人人插手利用、人人頭痛的老大難。<sup>286</sup>

就連不肯安分守己的伊拉克，也是西方處心積慮唯利是圖的

產物。不想應驗了“悖入悖出”的因果報應，成了今天美國佔領軍推行民主制度一籌莫展的泥淖。<sup>287</sup> 金融家索羅斯瞧著泄氣：

伊拉克沒有民主的經驗，充滿了種族和宗教衝突的潛在危機。它和中東地區許多國家一樣，是奧斯曼帝國瓦解後，西方列強人為製造出來的一個國家，俾使西方列強仍能發揮最大影響力。奧斯曼帝國的三個省組成為伊拉克。在北方居於多數的庫德族人被分散在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三國。在巴格達附近佔多數的遜尼族和在巴拉斯及沼澤區居多數的什葉族，都被拉進來。……鑑於種族和宗教信仰如此分歧，導入民主很容易使國家陷入分崩離析局面。<sup>288</sup>

圖~2：12世紀末薩拉丁治下的庫爾德斯坦



資料來源：武光誠：《從地圖看歷史》第159頁。

在這個背景下，因為懷疑你可能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就用我早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去消滅你。道理何在？眾所周知，在全世界，擁有最多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是美國。<sup>289</sup>在中東，擁有最多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是以色列。<sup>290</sup>公開叫板的薩達姆，一輩子反美反以，八年兩伊戰爭之後，<sup>291</sup>遭老布什一頓收拾，又經歷了14年之久的經濟制裁，武器核查加狂轟濫炸，奄奄一息，苟延殘喘，<sup>292</sup>怎麼也扯不上威脅了美國的安全。<sup>293</sup>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與其說擔心伊拉克的武器向本·拉登輸送，不如說硬是要直接掌握中東石油，軍事佔領伊拉克，扶持

圖-3：庫爾德人分佈區域



資料來源：武光誠：《從地圖看歷史》第157頁。

傀儡政權，牽制伊朗和沙特，構造更加有利的戰略格局，<sup>294</sup> 徹底掐滅阿拉伯民族統一死灰復燃的任何可能。當年伊拉克與敘利亞、約旦幾度幾乎合併成功，雖然不過是“肥沃新月”的老調重彈，離整個阿拉伯統一相去甚遠，卻足以對以色列的生存和美國控制的中東格局發生致命威脅。<sup>295</sup> 薩達姆沒完沒了宣揚阿拉伯統一，雖然色厲內荏，心有餘而力不足，卻是當今“泛阿拉伯主義”最後希望的火星。<sup>296</sup> 就這個意義說，美國今天打伊拉克，與當年支援伊朗打伊拉克、支援伊拉克打伊朗，道理是一貫的。1994 年，美國政府發表《國家參與和擴展安全戰略》說：

從較長遠的時期來看，隨著國內資源的逐漸枯竭，美國對外國石油的依賴程度越發嚴重。自第一次石油衝擊以來，美國經濟增長了大約 75%，在此期間我們的石油消耗幾乎沒變，石油產量卻下降了。這些事實表明，必須繼續持久地依靠充分利用和節約能源，尋找其他能源資源。儘管採取節約能源措施，美國仍然對無障礙地獲取這種重要的資源抱有極大的興趣。<sup>297</sup>

1997 年，布熱津斯基發表《大棋局》，闡述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核心思想是：

在歐亞大陸的地圖上加強和永久保持地緣政治普遍的多元化符合美國的利益。這促使人們重視縱橫捭闔，以防止出現一個最終可能向美國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戰的敵對聯盟，且不說防止任何一個特定國家試圖向美國挑戰的微弱的可能性。<sup>298</sup>

對這一點，本·拉登看得一清二楚：“他們努力想把伊拉克、沙特、埃及和蘇丹像地圖上的標誌那樣地分離開，並且通



過他們的分裂和虛弱以保證以色列的生存和繼續他們對半島的殘酷侵略和佔領。”<sup>299</sup> 所以，在民主選舉的南斯拉夫，是人權高於主權；到了部落酋長的科威特，就成了神聖主權不容侵犯了。祇要油田管線分佈不對，科威特過去是伊拉克的一個縣也不行。<sup>300</sup> 一方面，以色列幾十年如一日，霸佔的全是主權國家不容侵犯的神聖領土。一方面，阿拉伯民族統一的強烈訴求，被妖魔化成“泛阿拉伯主義”的癡心妄想。<sup>301</sup> 老布什收拾伊拉克，海灣六國和埃及、摩洛哥、敘利亞、巴基斯坦、孟加拉的穆斯林弟兄趁火打劫，沙特的將軍居然當上聯軍副司令。穆斯林團結似有還無，阿拉伯統一計窮途拙，薩達姆雞群野鶴，欄杆拍遍，欲哭無淚：

各國在阿拉伯世界的捲入太多了。這肯定限制了像布尼甲尼撒和薩拉丁（他們存在於自己民族的思想中）這樣的偉大領袖的出現。<sup>302</sup>

其實，就算是出現了薩拉丁，又能怎麼樣呢？單純從軍事角度看，不在特定的國際環境，缺乏大國的有力支持，孤立小國抗暴戰爭難有勝算。倘若沒有蘇聯的支持，特別是中國的直接參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的勝利不可想象。阿富汗十年抗蘇聖戰，“在整個戰爭期間，沙特阿拉伯提供援助的總數至少與美國提供的 30~33 億美元相等，甚至可能超過它。”<sup>303</sup> 80 年代中，阿富汗的 GDP 每年平均 2.5 億美元左右。<sup>304</sup> 換言之，不算巴勒斯坦、敘利亞、伊朗等眾多穆斯林國家的大量援助，僅美國和沙特兩國的資助，每年都是阿富汗全國 GDP 的兩倍

多，而且是直接援助大量西方的先進武器。<sup>305</sup> 這是阿富汗穆斯林取得抗蘇聖戰勝利的重要原因。加拿大專家平可夫的分析發人深省：

今天美軍在阿富汗使用的超大規模空中打擊武器並非歷史罕見或者首次使用，所享有的空中優勢，甚至可以稱作“空中絕對優勢”從朝鮮戰爭以來便無人真正挑戰過。“鋪路者 I 型”（Pave Way I）導彈實施的鐳射制導炸彈精確轟炸、B-52 的地毯轟炸、1.5 萬磅真空炸彈的叢林毀滅性轟炸、AC-130 的航空機關炮掃射是發明在越南而非阿富汗！在朝鮮戰爭中，B-29 曾經把志願軍控制的小小的上甘嶺山頭陣地削平了三米，打擊地下目標的能力不比今日的 GBU27/24 鐳射制導炸彈弱多少。

面對同樣的轟炸，為什麼伊拉克軍隊、塔利班、“基地”成員一聽到飛機轟鳴“腳便發抖”？而中國人民志願軍和越南人民軍卻讓美軍發抖？越戰甚至成了美國的傷口，讓全體美國人發抖？結論是，軍人的戰鬥意志完全不同。志願軍、越南人民軍在與美國對抗之前已經擁有了 20 年以上與強敵作戰的經驗，一直處於“敵強我弱”的狀態，作戰經驗豐富，吃苦耐勞性強，思想意志堅定。……

更為重要的是，朝鮮、越南、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戰爭是在不同的大國際環境下進行的，結局也自然不一樣。在對阿富汗塔利班人員的具體採訪過程中發現，“孤立感”是造成他們怕戰、怯戰的主要原因，最後以致輸掉“心理戰爭”，地面美軍不戰而勝。冷戰政治構造的終結、蘇聯的崩潰、中國的

“韜光養晦”使美軍在今日區域衝突中不再擔心蘇聯和中國因素。隨著戰爭的殘酷深入，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塔利班開始感到孤立無援，政治上缺乏支持，武器裝備得不到迅速補充，逐步喪失作戰意志。“戰爭的結局沒有希望！”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指揮官正是在這樣的心理下臨陣脫逃返回故鄉的。於是，出現了戲劇性的結局：越軍、志願軍的傷亡遠遠大於南斯拉夫、阿富汗塔利班，前二者卻取得了戰爭的主動權。<sup>306</sup>

嗚呼哀哉，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頭是哺育現代化的廉價石油汨汨流淌，“美國今天的汽油價格在扣除通貨膨脹等因素外，竟然低於 40 年前的水平！”<sup>307</sup> 一頭是東周列國式的分崩離析，再出幾個氣吞山河的秦始皇，也扛不住美帝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來回攪和。現有分散小國與龐大美帝單打獨鬥，孤立無援，不要說戰略縱深了，連四渡赤水一類的戰役迴旋都缺乏施展空間。雖然能征善戰的薩拉丁，一直和伊斯蘭教一道，活在阿拉伯人心裡，和平統一和武力解放的努力統統失敗。侯賽因、費薩爾、納賽爾、卡扎菲、布邁丁、阿薩德、薩達姆、霍梅尼，一個又一個心懷大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原教旨主義地百般努力，深謀遠慮，縱橫捭闔，心狠手辣，南征北戰。民族統一寸步難行，英雄事業身敗名裂。

對這種命運，尼克松總結得特別清楚：“納賽爾失敗之處正是薩達特成功之處，因為薩達特把埃及民族而不是‘阿拉伯民族’的幸福看作是自己的首要任務。”納賽爾“不僅把自己看作是埃及的領袖，還儼然以阿拉伯世界的領袖自居。他始終想把阿拉伯國家組成泛阿拉伯統一體，由他自己當領袖。他被這強烈

的願望所趨使，干涉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內政，發動政變，策劃暗殺。”薩達特俯首就範於分而治之的邊界線，匍匐前進，向各個擊破的“中東和平邁出了最偉大和最勇敢的一步”。失敗的納賽爾猝然去世，群眾悼念如喪考妣。成功的薩達特猝然被殺，福特、卡特、尼克松三屆美國總統集體趕來參加葬禮。“可是，我們到達埃及後發現街上幾乎空無一人，與 11 年前納賽爾逝世時人民瘋狂湧上街頭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照。”<sup>308</sup>

失敗的納賽爾與成功的薩達特，“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照”。巴林的神聖主權和庫爾德的五馬分屍，“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照”。捍衛科威特古代酋長世襲專制與嚴禁伊拉克現代復興黨，“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照”。阿拉伯統一民族的分裂與美國移民社會的統一，“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照”。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滿嘴人權民主，全球唯利是圖，“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照”。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第三世界的政黨，我們就會發現，它們最黑暗的時刻是這裡的民族一分為二或一分為三：朝鮮、越南、德意志等等，但是從來也沒有一個民族被分割成 22 個部分，他們已經把我們的民族分成 22 塊，而他們仍覺得有必要再做分裂。<sup>309</sup> 這隱含著我們這個民族的重要性，……現存的阿拉伯格局是建立在許多不相適應甚至互相對立的小實體之上的。22 個國家、22 種政策、22 位領導人——這就是目前阿拉伯聯合行動的狀況。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又怎能為民族行動制定出必要的策略呢？<sup>310</sup>

祇可憐了巴勒斯坦人。聯合國劃給巴勒斯坦的土地，第一次中東戰爭就讓以色列和阿拉伯兄弟全部佔領。<sup>311</sup> 剩下勢單力薄的巴勒斯坦人自己，打，打不過；人民公決，230 萬人被以色列的恐怖屠殺嚇得魂飛魄散，四處逃生，留下來的人口還沒有蜂擁而至的猶太人多。<sup>312</sup> 阿拉法特惶惶然似喪家之犬，從巴勒斯坦到埃及，到科威特，到約旦，到黎巴嫩，直到天涯海角的突尼斯，九死一生，路近黃泉。<sup>313</sup> 巴勒斯坦人民連續 50 多年難民營生活，青年失業率高達 50%。<sup>314</sup> 半個多世紀生不如死，度日如年，無望絕境中的穆斯林青年，憤然萌發為正義而“求死”的渴望。<sup>315</sup> 伊斯蘭本是政治的宗教、宗教的政治。把“宗教的政治”封死、堵嚴、窒息，就祇有向“政治的宗教”昇華了——今生短暫不可改，來世永恆卻可求。同歸於盡的戰法，既是出世精神入世的身心投入，也是入世精神出世的靈魂解脫。<sup>316</sup> 更何況“伊斯蘭是以行動來表達的信仰。”<sup>317</sup> “伊斯蘭”這個詞，本來就是“放棄自己”的意思。<sup>318</sup> 按照巴勒斯坦人的說法：“我們是以恐怖活動求生存。”<sup>319</sup> 這話聽著別扭，平心靜氣想想，真是這麼回事。90 年代中，非洲盧旺達一次種族屠殺上百萬人，<sup>320</sup> 全球媒體陶醉在克林頓泡妞的緋聞，搖頭晃腦，如醉如癡。倘若真的沒有了哈馬斯前赴後繼的自殺炸彈，在“時間就是金錢”的今天，誰會有閒情逸致，關心什麼巴勒斯坦問題？

哈馬斯的前身是和平的慈善組織——穆加瑪，阿墨·亞辛因為扶貧濟困而聞名於世。作為現代伊斯蘭運動最著名的社會實踐，是“使現代福利能帶給在 1967 年 7 月戰爭後以色列佔領的領土內的巴勒斯坦人”。<sup>321</sup> 哈馬斯 1994 年開始發動自殺式恐怖

襲擊，變成中東和平最兇惡的殺手。<sup>322</sup> 2004 年，亞辛被以色列空軍炸死前不久，為自殺爆炸給出令人難以回答的辯解：

我們巴勒斯坦人祇能用有限的手段自衛，我們沒有 F-16 轟炸機，沒有“阿帕奇”……無論我們是否進行自殺爆炸，都會遭到以色列的殺戮。<sup>323</sup>

為此，湯因比義憤填膺：

如果把一個民族正義感奪走，而使他們陷於絕望，那是極其卑鄙的行為。對巴勒斯坦游擊隊就是這麼幹的。自 1917 年發表《貝爾福宣言》以來，全世界就把土著的巴勒斯坦民族看成是微不足道的人，看成是消耗品，是沒有任何價值的人。但是巴勒斯坦人也畢竟是人。他們——與越南人一樣——對這種處境感到憤怒，他們魯莽地訴諸於游擊戰爭和恐怖活動，以表達他們的憤慨。<sup>324</sup>

#### 註釋：

<sup>240</sup> 邁克爾·伊格納蒂夫：“負擔”，《香港傳真》No.2003~3。

<sup>241</sup> 除了想方設法吸引世界各國的科技人才。

<sup>212</sup> 于力人：《中央情報局 50 年》第 141~151 頁。1953 年 8 月 19 日，伊朗發生政變；9 月 5 日，美國給伊朗 4500 萬美元緊急贈款。在以後一年裡，美國再給伊朗五次、7900 萬美元經濟和軍事援助（東方曉：《伊斯蘭與冷戰後的世界》第 96 頁）。

<sup>213</sup> 于力人：《中央情報局 50 年》第 152~161、499~512、381~394 頁。

<sup>241</sup> 沙特是沙特家族，卡塔爾是薩尼家族，科威特是薩巴赫家族，巴林是

哈利法家族，阿曼是布·賽義德家族，阿聯酋的阿布扎比是努哈彥家族，迪拜是麥克土姆家族，沙迦和哈伊馬角是卡希姆家族，阿治曼是努艾米家族，烏姆蓋萬是穆阿拉家族，富查伊拉是沙爾基家族（仲躋昆：《阿拉伯：1002 夜》第 159 頁）。

<sup>245</sup> 直到 90 年代，祇有海灣六國和利比亞禁止黨派活動（王京烈：《面向 21 世紀的中東》第 25 頁）。直到老布什解放科威特，科威特才允許黨派活動。連亨廷頓都看見，當老布什打伊拉克的時候，“在那些政治更開放、言論更自由的阿拉伯國家裡，對薩達姆·侯賽因的支持也‘最強烈和最廣泛’”（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278 頁）。

<sup>246</sup> Fiachra Gibbons: “US is an empire in denial”, *The Observer*, 2003 年 6 月 1 日。

<sup>247</sup> “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為美國人民平等自由的價值觀念，帶來極大的困惑。邁克爾·伊格納蒂夫的“負擔”一文，表達得充分而典型（《香港傳真》No.2003~3）。

<sup>248</sup> 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第 11 頁。

<sup>249</sup> “海灣戰爭是冷戰後文明間發生的第一場資源戰爭。最關鍵的問題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儲備，將由依靠西方軍事力量保護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長國政府控制，還是由有能力並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對西方的獨立的反西方政權所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薩達姆·侯賽因，卻獲得了某種使海灣國家在安全上依賴西方的勝利，並擴大了和平時期在海灣的軍事存在。戰爭之前，伊朗、伊拉克、海灣合作委員會和美國曾為獲取對海灣地區的影響展開了競爭。戰爭之後，波斯灣變成了美國的內湖”（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282 頁）。

<sup>250</sup> 美國國防部長 1996 財年度《國防報告》，周建明、張曙光：《美國安全解讀》第 291 頁。

<sup>251</sup>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86~87 頁。

<sup>252</sup> 2003 年 6 月，52% 的以色列居民相信“和平路線圖”不會引導巴以雙方達成一項協議（Harvey Morris: “After Jrag, the US wants to show its determination in shaping a new architecture for the Middle East”, *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3 日，第 11 頁）。2004 年半年時間不到，英國《衛報》文章標題：“‘路線圖’已被遺忘”（《財經》2004 年 4 月 5 日，第 10 頁）。

<sup>254</sup> 蔡德貴：《當代伊斯蘭阿拉伯哲學研究》第 528 頁。

<sup>259</sup> 馬塔爾：《薩達姆·侯賽因》第 184~185、220 頁。

<sup>255</sup> 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第 50 頁。

<sup>256</sup> 布熱津斯基明確指出：“即使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可能還缺乏有效地脅迫臺灣的手段，北京仍必須懂得並信服，美國如果默認使用軍事力量強行統一臺灣的嘗試，那麼美國在遠東的地位將受到毀滅性的破壞，因此，如果臺灣那時候無力保護自己的話，美國決不能在軍事上無所作為。換句話說，美國將不得不進行干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第 245~246 頁）。

<sup>257</sup> 1998 年以前，美國已有 12 個城市通過所謂“西藏日”，每逢 3 月 10 日掛雪山獅子旗。1998 年，法國有 202 個城鎮在“西藏日”掛雪山獅子旗，2000 年增加到 214 個城鎮。1998 年，達賴集團“國際後援組織”360 多個，分佈 60 多個國家（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395~396 頁）。

<sup>258</sup> 黑體加重為原文所有（《列寧全集》第 24 卷，第 148~149 頁）。

<sup>259</sup> 布倫蒂·萊西特：《卡扎菲傳》第 85 頁。

<sup>260</sup> 第一沙特王國時，“1802~1812 年，瓦哈比軍隊三次威逼巴格達。1810 年，瓦哈比軍隊還劫掠了敘利亞大馬士革附近的 12 個村鎮，並向阿勒頗以南 40 英哩的部落徵稅”。19 世紀初，“從大馬士革和巴格達到也門和哈德拉毛，從波斯灣到紅海，遍佈瓦哈比派的信徒”（王鐵鈺、林松業：《中東國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第 74~75 頁）。“1803 年底，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一部分先後併入瓦哈比國家的版圖”（彭樹智：《阿拉伯國家通史》第 253~254 頁）。當伊本·沙特再次崛起，英國殖民者在外，利用伊拉克和敘利亞分化阿拉伯；在內，煽動支持叛亂，分裂沙特。沙特開疆拓土的雄心，被英國的頻繁干預所遏制。“如果當時不是英國的緣故，很有可能整個阿拉伯半島都會被伊本·沙特征服”（左文華、肖憲：《當代中東國際關係》第 31~32、69 頁；王鐵鈺、林松業：《中東國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第 118~127 頁）。

<sup>261</sup> 《大馬士革議定書》的主要內容為：“英國承認獨立的阿拉伯國家的版圖是：北起梅爾辛、阿達納、烏爾法、馬爾丁、阿馬迪亞至伊朗邊界一線；南到印度洋（亞丁除外）；東起伊朗邊界、波斯灣；西至紅海、地中海沿岸。”英國利用這個承諾，誘使阿拉伯起義軍配合英軍對奧斯曼



帝國作戰。在戰後的巴黎和會上，費薩爾作為阿拉伯人代表，要求協約國履行承諾。英法背信棄義，對阿拉伯地區實行分而治之的“委任統治”（彭樹智：《阿拉伯國家通史》第 269~277 頁；肖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第 77 頁；王新剛：《中東國家通史：敘利亞和黎巴嫩卷》第 155~171 頁）。著名小說改編的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以此為背景，獲若干奧斯卡金像獎。

- <sup>262</sup> 1941 年 5 月，英國外交大臣發表聲明：“許多阿拉伯思想家希望阿拉伯各國人民取得比目前更大程度的統一。他們希望得到我們的支持。他們的這種要求決不會被置之不理”。伊拉克的“肥沃新月”計劃以伊拉克為主，與敘利亞合併，包括約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約旦的方案是重提 1820 年費薩爾曾經建立的“大敘利亞”。兩個方案分別遭到埃及和沙特的反對。雖然阿拉伯各國各自打自己的算盤，但是，“兩個方案都主張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約旦合併組成一個‘大敘利亞’，然後再與伊拉克聯合組成一個‘阿拉伯聯盟’，其他阿拉伯國家都可以加入這一聯邦”（左文華、肖憲：《當代中東國際關係》第 70~71 頁）。由此可知，阿拉伯統一足民族大義，實際爭拗是誰當頭。

- <sup>263</sup> 當時參加聯盟的國家有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約旦和埃及（納忠：《阿拉伯通史》下卷，第 576 頁）。也門 1945 年，利比亞 1953 年，蘇丹 1956 年，摩洛哥和突尼斯 1958 年，科威特 1961 年，阿爾及利亞 1962 年，南也門 1967 年，巴林、卡塔爾、阿曼和阿聯酋 1971 年，毛里塔尼亞 1973 年，索馬里 1974 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1976 年，吉布提 1977 年，科摩羅 1993 年，先後加入阿拉伯聯盟（彭樹智：《阿拉伯國家通史》第 403 頁）。

- <sup>264</sup> 彭樹智：《阿拉伯國家通史》第 407 頁。1958 年 2 月，兩國統一。“在紅白黑三色旗中鑲嵌著兩顆星星，象徵著兩個已經聯合的國家。它留有很大空隙，企盼其他阿拉伯國家相繼加入。”同年 3 月 8 日，又與也門“建立聯邦式的聯盟，稱阿拉伯聯盟。”1961 年敘利亞發生政變後退出（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 76 頁）。

- <sup>265</sup> 針對埃及和敘利亞的統一，1958 年 2 月，約旦與伊拉克宣佈合併。五個月後，伊拉克發生政變，聯邦解體（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全球變局：美國與伊拉克》第 197 頁）。

- <sup>266</sup> 也門內戰持續八年時間。國王一方有沙特阿拉伯和美國支持，發動政變的“自由軍官組織”有埃及和蘇聯支持。埃及派到也門軍事為主的各類人

員最多達 7.2 萬(左文華、肖憲：《當代中東國際關係》第 119~120 頁)。

<sup>267</sup> 1969 年 12 月，三國簽署原則上同意實現統一的《的黎波里協議》。1970 年 11 月 9 日，三國宣佈合併。1971 年 4 月，敘利亞又加入聯邦。

<sup>268</sup> 布爾巴吉與卡扎菲簽署協議後，因突尼斯國內反對而沒有成功(時延春：《中東風雲人物》第 154 頁)。

<sup>269</sup> 當時成立了“兩個地區的聯合政治領導機構”，並正式提出“使約旦和(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加入進來”(馬塔爾：《薩達姆·侯賽因》第 46~54 頁)。

<sup>270</sup> 時延春：《中東風雲人物》第 154 頁。

<sup>271</sup> 當時利比亞出兵乍得支持古庫尼，控制了乍得首都及北部和中部一些地區。1981 年底敘利亞撤軍。1982 年，反對武裝——哈布雷反攻並佔領首都，當上總統，乍得與敘利亞關係緊張(時延春：《中東風雲人物》第 155 頁)。

<sup>272</sup> 埃及曾經試圖加入，一直未獲得同意(彭樹智：《阿拉伯國家通史》第 407 頁；王京烈：《面向 21 世紀的中東》第 10~11、226 頁)。

<sup>273</sup> 時延春：《中東風雲人物》第 156 頁。

<sup>274</sup> 譬如，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根據《民族行動聯合憲章》商討兩國合併的往來正式文件，口口聲聲“兩個地區”、“兩個地區的領導機構”，根本不說“兩國”如何如何，完全沒有國家之間往來交涉的外交辭令(馬塔爾：《薩達姆·侯賽因》第 47~65 頁)。

<sup>275</sup> 亨廷頓認為：“作為一種革命運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擯棄了民族國家，而贊成伊斯蘭的團結，正像馬克思主義擯棄了民族國家，而贊成國際無產者的團結一樣”(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190 頁)。這是類似當年說共產黨“共產共妻”的曲解。事實上，阿拉伯人有大量關於阿拉伯民族主義與伊斯蘭教普世性之間關係的討論。基本邏輯是，阿拉伯對伊斯蘭有特殊貢獻。實現伊斯蘭世界大同的理想，阿拉伯民族統一是一必由之路。“阿拉伯民族主義高於一切，祇有首先實現阿拉伯統一，才有可能實現世界穆斯林的統一，而否認或忽視民族差別的泛伊斯蘭主義祇是難以企及的一種善良願望而已。”在這樣認識的基礎上，1931 年，敘利亞的阿拉伯獨立黨發表《阿拉伯民族憲章》，提出：“阿拉伯國家是不容分割的整體，目前阿拉伯民族的分裂狀況是殖民主義造成的”。阿拉伯統一所謂“納賽爾主義”的核心。敘

利亞、伊拉克復興黨人的民族主義甚至更早於“納賽爾主義”，並且更加系統。1969年11月，利比亞《臨時憲法》宣佈：“利比亞的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和阿拉伯的全面統一”（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第196~217、301頁）。納賽爾逝世後，卡扎菲擔心利比亞與埃及的統一計劃要泡湯，居然主動辭職，發起“人民進軍”——帶領成千上萬的群眾走進埃及，以求實現兩國統一（時延春：《中東風雲人物》第150~153頁）。

<sup>276</sup> 布倫蒂·萊西特：《卡扎菲傳》第93~94頁。贊成率在埃及為99.9%，在利比亞為98.6%，在較多基督徒的敘利亞為96.4%（時延春：《中東風雲人物》第151頁）。

<sup>277</sup>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90頁。

<sup>278</sup> 庫特卜在《路標》中說：“有伊斯蘭信仰的社會，它祇建立在信仰的關係上，與民族、土地、膚色、語言、地緣和可笑的邊界線無關”（蔡德貴：《當代伊斯蘭阿拉伯哲學研究》第206頁）。“由於在自然條件上，中東大部分國家間的邊境地區多是沙漠，氣候惡劣，人煙稀少，有的甚至無人居住，這使得難以用自然地貌劃分邊界線，因此，各國之間的邊界就變得很不明確。即使那些業已存在的邊界也很少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加上中東的許多民族在歷史上長期過著游牧生活，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習慣，對現代國家和與國家相關的邊界領土概念缺乏認識。在殖民主義者把西方的民族國家邊界領土等概念帶到中東以後，邊界劃分的含義才有所不同，但對於阿拉伯人來說，這些概念依然淡漠”（左文華、肖憲：《當代中東國際關係》第362頁）。其實，“可笑”的根本原因在於，追求阿拉伯統一為現代國家的阿拉伯人，根本不認同這些殖民主義者為了製造分裂而人為製造的邊界線。

<sup>279</sup> 中東地區遺留的領土糾紛比比皆是。包括在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阿布穆薩島和大小通布島，阿拉伯河以及胡齊斯坦——阿拉伯斯坦的主權爭端，埃及與蘇丹之間關於哈拉伊卜的主權爭端，沙特與科威特之間關於卡魯和烏姆·馬拉蒂姆兩島的主權爭端，沙特與也門之間關於阿西爾、奈吉蘭和吉贊地區的主權爭端，巴林與卡塔爾之間關於哈瓦爾群島的主權爭端，等等。從二戰結束到90年代初，中東先後爆發60多次戰爭和大規模武裝衝突，由邊界領土爭端引起的戰爭有30次（左文華、肖憲：《當代中東國際關係》第361~364頁）。這是表面現象。更深層次的問題是，一個民族分割成諸多主權國家，即使是邊界線在

地圖上暫時畫得一清二楚，部落、種族、宗教、歷史的種種淵緣照樣糾纏不清。譬如，歷史上根本沒有過什麼黎巴嫩、約旦。1920年3月，費薩爾曾經建立包括敘利亞、黎巴嫩、外約旦和巴勒斯坦的“大敘利亞”。4月，被英、法“委任統治”一分為四。黎巴嫩獨立，敘利亞長期不予承認。巴以衝突中約旦趁機霸佔巴勒斯坦土地，1970年9月約旦軍隊攻擊並驅除巴勒斯坦游擊隊、敘利亞廣泛參與黎巴嫩內戰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內部事務等等，所有阿拉伯國家之間的衝突，**本質上都與一個民族內部永遠扯不清楚如何分裂才算合理有關**（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第221~252頁）。迪特馬·羅特蒙特的《殖民統治的結束》和赫爾穆特·麥切爾：《近東與中東危機》，是瞭解這一詳細過程的兩本好書。

<sup>240</sup> “這以色列可是伊斯蘭分子眼中，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分身”（凱倫·阿姆斯壯：《為神而戰》第424頁）。猶太人復國，自然首選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並不同意。理由是阿拉伯人從未迫害過猶太人。猶太人不應根據兩千多年前在這裡有過祖先提出領土要求。如果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復國的邏輯能夠成立，意大利則可以根據羅馬帝國向德、法提出領土要求，希臘則有權向埃及、土耳其和地中海沿海國家提出領土要求（孫正達等：《以色列國》第57頁）。如果沒有英美的先後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復國是難以想象的。猶太復國運動曾經先後考慮過在阿根廷、塞浦路斯、西奈半島、肯尼亞、烏干達等地復國，是很好的說明（肖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第56~62頁）。1948年5月14日，古里安發表以色列建國公告，鄭重承認：“**這個新國家——祇就她的誕生得歸功於強權政治的作用這一點而言——可以說，是在紐約誕生的，雖然這聽起來有點荒唐。**”14分鐘後，美國政府宣佈承認以色列（江紅：《為石油而戰》第369頁；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1950~1955年以色列的長期資本中來自美國的佔62%”（王京烈：《面向21世紀的中東》第245頁）。美國約有六百萬猶太人，超過以色列人口，是世界猶太人最多的國家。“約有50萬美國猶太人擁有以色列和美國雙重國籍，”在1998年選出的第106屆美國國會，有猶太裔眾議員23名（佔5.1%），猶太裔參議員11名（佔11%）。“猶太人在外交事務委員會所佔比例約為25%。在其下屬的中東分會中，猶太裔委員佔30%。……美國約有三百個全國性猶太團體和兩百個地方性組織”（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301~305頁）。

<sup>241</sup> 金育久：《當代伊斯蘭教》第32頁。

- <sup>282</sup> “1803 年底，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一部分先後併入瓦哈比國家的版圖”(彭樹智：《阿拉伯國家通史》第 253~254 頁)。1820 年，英屬東印度公司與巴林酋長簽訂《波斯灣總和平條約》，英國政府成為巴林一切權力的實際控制者。“伊朗認為巴林是它管轄下的領土，拒不承認英國強迫巴林酋長簽訂的所謂保護性條約，並且在 1957 年 11 月，宣佈巴林為伊朗的第 14 個省。”1971 年 8 月巴林酋長國宣佈獨立(左文華、肖憲：《當代中東國際關係》第 407 頁)。
- <sup>283</sup> 庫爾德(Kurd)意指“強人”(21 世紀研究會編：《民族的世界地圖》第 153 頁)。為了反抗十字軍，薩拉丁“散盡家產，分贈窮人，秉持伊斯蘭教的理念改革稅制，並切實做到親民愛民”(凱倫·阿姆斯特壯：《穆罕默德》第 407 頁)。1171 年，薩拉丁建立阿尤布王朝。1174 年，薩拉丁征服敘利亞。1175 年，薩拉丁獲得統治埃及、敘利亞、西阿拉伯和馬格里布的蘇丹王稱號。後奪取摩蘇爾，佔領美索不達米亞部分土地，征伐統一東方伊斯蘭小國，建立薩拉丁帝國。1187 年，薩拉丁先後攻克基督徒控制的提波里亞市和希丁城，收復由法蘭克人統治約百年之久的耶路撒冷。1189~1192 年，英、德、法三國聯軍第三次十字軍東征，被薩拉丁擊退。“阿尤布王朝版圖包括小亞細亞庫德人區西半部。至於東半部，薩拉丁決定讓當地庫德族自治，成為‘庫德斯坦’”(武光誠：《從地圖看歷史》第 158 頁)。
- <sup>284</sup> “面積約 40 萬平方公里”(王京烈：《面向 21 世紀的中東》第 297 頁)。“1920 年，歐洲列強與戰敗的奧斯曼蘇丹簽訂了《色佛爾條約》，將從亞美尼亞南部到伊拉克北部這一新月地帶劃為‘庫爾德斯坦’領土”(陳建民：《當代中東》第 151 頁)。
- <sup>285</sup> 庫爾德人沒有國家，“許多人認為，或許這是因為盛傳庫德族居住區地下有大量石油。”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把庫德居住區劃給土耳其人，土耳其則答應，將來若在當地挖到石油，就優先供應英國”(ROMU 國際：《閱讀世界紛爭地圖》第 85~86 頁)。
- <sup>286</sup> 庫爾德人有自己的語言。“據估計，目前人口大約 2400 萬，其中土耳其約有 1200 萬，伊朗約有 500 萬，伊拉克約 320 萬，敘利亞約 100 萬，在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約有 30 萬，還有少數庫爾德人散居在黎巴嫩、阿富汗等中東國家，另有一部分庫爾德人已定居歐洲，大約有 150 萬”。從 19 世紀後期開始，庫爾德人的民族獨立運動不僅從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帝國主義充分利用庫爾德人的獨立要求，給各國政府

搗亂。一次世界大戰，英、法為了肢解奧斯曼帝國，支持庫爾德人造反。1922年，土耳其的庫爾德人暴動，得到英國支持。二戰期間，蘇聯佔領庫爾德人地區，支持伊朗庫爾德人造反；1945年成立“庫爾德斯坦共和國”，獲得伊朗的石油利益之後，蘇軍撤走，共和國被殘酷鎮壓（金宜久、吳宏貴：《伊斯蘭與國際熱點》第382~402頁）。伊拉克、土耳其、伊朗、敘利亞、阿塞拜疆等國相互之間互相挑唆、支持別國庫爾德人造反、聯手鎮壓庫爾德人造反的故事，貫穿整個歷史。兩伊戰爭期間，“伊朗國內的庫爾德人協助伊拉克軍，伊拉克境內的民主黨和庫德愛國聯盟，則站在伊朗部隊一方。”海灣戰爭期間，美國中央情報局深入發動庫爾德人造反，給薩達姆搗亂（ROMU 國際：《閱讀世界紛爭地圖》第87~89頁）。小布什打伊拉克，土耳其參與出兵，根本考慮還是擔心庫爾德人被人利用造反。

<sup>287</sup> 《大學》有話：“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南懷瑾老師在《大學微言》中發揮出因果報應的歷史定律，博大精深，美輪美奐。

<sup>288</sup> 喬治·索羅斯：《美國霸權泡沫化》第50~51頁。

<sup>289</sup> 2002年，“按照市場匯率後，美國一家的軍費開支就佔全世界的43%”；2003年再增到47%（“2002年世界軍費開支增幅驚人”；“去年全球軍費開支大幅增長”；《參考消息》2003年6月19日，第5頁；2004年6月11日，第5頁）。

<sup>290</sup> 2002年，英國《金融時報》披露，俄國擁有9196枚核彈頭，美國擁有8876枚。以色列是世界第六大核武國家，擁有200枚核彈頭（“The weapons threat”，*Financial Times* 2002年7月11日，第7頁）。以色列“近年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出口，每年估計超過12億美元，佔其工業產品出口值四分之一左右。從事軍事工業生產和銷售的人員達14萬多。軍工出口產品有各種自動衝鋒槍、坦克、彈藥、滅火設備、電子遙控系統、導彈、海軍巡邏艇、戰鬥機等”（賀雄飛：《猶太人之迷》第336頁）。

<sup>291</sup> 歷時八年、傷亡上百萬的兩伊戰爭，號稱是二戰以後最慘烈的戰爭（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全球變局：美國與伊拉克》第218頁）。

<sup>292</sup> “到1999年，全國已有125萬人死於制裁”（黃民興：《中東國家通史：伊拉克卷》第341頁）。

<sup>293</sup> “在 1993 年 6 月報復以後的日子裡，美國政府的法律部門和情報部門再也沒有發現伊拉克情報部門捲入過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事件。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 2003 年我們入侵伊拉克為止。……我們入侵並佔領了對我們並不構成威脅的富有石油的阿拉伯國家”（理查德·克拉克：《反擊一切敵人》第 75、223 頁）。

<sup>294</sup> 魯仁：“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思考”，《當代思潮》2003 年第 4 期，第 46~52 頁。索羅斯看得真明白：“美國若要掌控自己的命運，或許最大的一項不利因素，就是它必須依賴外國進口石油。沙特阿拉伯已證明它是個狡猾的盟友，它藉著支持伊斯蘭極端分子在海外活動，來維持其國內的穩定。在 9.11 事件過後，沙特已經不可能兩面討好，王室政權很有可能步上伊朗國王的後塵，危疑震盪。伊拉克居於戰略要衝之地，它的石油儲藏量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沙特。若能佔領伊拉克，並把美軍基地由沙特轉移到伊拉克，美國就可以確立取代沙特油源的安全來源”（喬治·索羅斯：《美國霸權泡沫化》第 50~51 頁）。

<sup>295</sup> 巴格達不僅是古代巴比倫文明的搖籃，而且是阿拉伯的政治文化中心。從八世紀中到 1258 年蒙古人攻陷巴格達，巴格達一直是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哈里發統治發號施令的地方。埃及與以色列媾和以後，伊拉克成為阿拉伯對抗西方的中心，包括發起成立 OPEC 組織、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等。1978 年，薩達姆在巴格達召開反對埃及與以色列媾和的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有消息說，在會上，薩達姆威脅要進攻科威特；阿薩德警告沙特“我將會把戰爭轉移到你的臥榻邊去。”這才形成了 17 個阿拉伯國家同埃及斷交的“拒絕陣線”（Miller, Mylroie：《薩達姆與波斯灣戰爭》第 42 頁）。薩達姆曾經揚言用 50 年時間統一中東（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全球變局：美國與伊拉克》第 9 頁）。薩達姆當年把伊拉克與敘利亞的合併，看成是“通向阿拉伯聯合道路上的一塊醒目而關鍵的里程碑，……從而使這一聯盟成為阿拉伯聯合體的核心，……成為阿拉伯力量的先鋒”。薩達姆說：“我們必須引導民族鬥爭朝著促進民族聯合這一既定目標前進，不依靠任何國際因素，進行一場長期而艱苦的鬥爭。”1979 年，伊拉克宣佈：“巴格達首腦會議決定用於阿拉伯世界互助的 5.2 億美元中，伊拉克將支付 3.46 億美元”。1980 年，薩達姆發表著名的《民族憲章》，希望它“成為阿拉伯關係的一個憲章”，從而“為阿拉伯的統一鋪平了道路”（馬塔爾：《薩達姆·侯賽因》第 47~64 頁）。

<sup>296</sup> 第一次海灣戰爭開戰之前，“1991年元月，來自全球各地伊斯蘭主義諸運動的部分領袖們在巴格達集會，發表聲明支持薩達姆所稱的‘聖戰’，並在聲明中批評伊拉克與科威特的國界線是西歐帝國主義恣意的人為產物，而真正的伊斯蘭信仰應該超越國界。此外，在該次會議中，來自約旦的伊斯蘭長老塔米尼(al Tamimi)，甚至建議選舉薩達姆作為‘全球穆斯林共同體的哈里發’”(Bassam Tibi：《原教旨主義的挑戰》第15~16頁)。伊拉克佔領科威特之後，1991年8月10日，薩達姆發表講話：“阿拉伯人、穆斯林和信奉真主的人，不論你們在何處，現在是你們站起來並擺開陣勢保衛麥加的時候了。麥加今天處在美國人和猶太復國主義者刺刀之下。……真主已選擇了伊拉克在全世界傳播伊斯蘭教義。”同日，約旦的五千多名穆斯林兄弟會成員舉行遊行，支持薩達姆。也門首都薩那、蘇丹首都喀土穆也舉行了大規模支持薩達姆反對美國的示威遊行。約旦“國內三百萬人中一半以上是流亡的巴勒斯坦人，這些人都把重建巴勒斯坦國的希望寄托在薩達姆的身上”(左文華、肖憲：《當代中東國際關係》第297、296頁)。2000年，薩達姆組織百萬“耶路撒冷軍”，號稱隨時準備開赴巴勒斯坦反以前線。“動機雖然值得懷疑，但事實上卻對阿拉伯和穆斯林民眾具有相當的號召力”(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487頁)。“從巴勒斯坦人以自殺性炸彈襲擊以來，伊已向巴烈士家屬提供了一千多萬美元的撫恤金”(張維秋：《我在伊拉克當大使》第145~148頁)。

<sup>297</sup> 安維華、錢雪梅：《海灣石油新論》第351頁。

<sup>298</sup> 黑體加重為原文所有(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第259~260頁)。

<sup>299</sup> “拉登的《聖戰宣言》”，風梳柳：《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阿富汗》第241~242頁。

<sup>300</sup> 1871年，科威特曾為奧斯曼帝國巴士拉省的一個縣。1921年，英國在國際聯盟的支持下成立伊拉克，把科威特作為一個實體從巴士拉省分割出去。英國成為這兩個新國家的太上皇。1961年6月19日科威特獨立。7月14日，伊拉克駐華大使在北京舉行招待會，聲明“科威特是伊拉克共和國的一部分，正如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果阿是印度的一部分”(黃民興：《中東國家通史：伊拉克卷》第366頁)。“1961年6月科威特獨立時，伊拉克政府發表聲明，稱科威特在歷史上曾經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對科的獨立不予承認。8月30日，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行使否決權，阻止科威特申請加入聯合國”(左文華、肖憲：《當



代中東國際關係》第 138 頁)。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邊境線，是 1922 年英國考克斯爵士用紅鉛筆在地圖上畫出的(安維華、錢雪梅：《海灣石油新論》第 343 頁)。

<sup>301</sup> 赫爾穆特·麥切爾：《近東與中東危機》第 29~51 頁；弗阿德·阿扎米：“伊拉克與阿拉伯世界的未來”，《香港傳真》No.2003~11。實事求是，“阿拉伯民族”也是一個可以推敲的概念。“與伊斯蘭教誕生之初的阿拉伯人相比，現代的阿拉伯人早已大不相同。雖說如此，在伊斯蘭教由阿拉伯半島向現在的巴勒斯坦傳播的過程中，埃及人、敘利亞人等非阿拉伯人亦藉由改信伊斯蘭教、學習阿拉伯語而加入伊斯蘭共同體(Umma)，成為阿拉伯人的一份子。如此出現的阿拉伯人，被稱為‘新生阿拉伯人’，或許是因為意識到他們與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人有所不同。雖說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伊拉克、安曼、也門的阿拉伯人都統稱為阿拉伯人，但看多了之後，或多或少都可以感覺到這些人似乎‘不怎麼一樣’。……隨著伊斯蘭世界版圖的擴大，所謂‘阿拉伯’的意涵亦擴而大之，意指共同組成伊斯蘭共同體、同操阿拉伯語的人們：阿拉伯民族原本的含意日漸淡薄。因此，阿拉伯人與其說是一個民族的名字，不如說是一個文化概念還更貼切”(21世紀研究會：《伊斯蘭的世界地圖》第 27 頁)。

<sup>302</sup> 記者問：“我是否可以假定你也夢想成為一個這樣的英雄？”薩達姆答：“真主作證，我確實夢想並希望如此。夢想成為這樣一種角色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光榮的事情”(馬塔爾：《薩達姆·侯賽因》第 217 頁)。

<sup>303</sup>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276 頁。

<sup>304</sup> “80 年代中期，阿富汗聖戰者每年可從國外獲得大約五億美元的援助。這差不多相當於阿富汗年均 GDP 的兩倍”(陳聯璧等：《中亞民族與宗教問題》第 271 頁)。

<sup>305</sup> 1987 年，美國援助六億美元(理查德·克拉克：《反擊一切敵人》第 45 頁)。一國資助相當於阿富汗全國 GDP 的兩倍多。譬如，毒刺導彈“使是對蘇戰爭消長的關鍵。……毒刺是現時最有效的手持式防空飛彈，也是一種可鎖定直昇機或飛機引擎所散熱氣的‘發射就不管’的武器。毒刺型飛彈一部署，蘇聯原有的全面空中優勢立失。誠如馬蘇德所說的：‘阿富汗非要不可的東西祇有兩樣：《古蘭經》和毒刺飛彈。’……1986~1987 年間，提供阿富汗的毒刺飛彈在九百枚左右，到戰爭末期一共打下 269 架蘇聯飛機和直昇機”(彼得·柏根：《本·拉登的聖戰工廠》

第 100~101 頁)。

<sup>306</sup> “在對科索沃戰事進行的調查發現，美軍持續數月空襲之後，僅僅在科索沃地區找到三輛坦克的殘骸，其他均為偽裝武器裝備。塞爾維亞部隊最後在美軍的眾目睽睽之下大批撤出科索沃地區。俄軍事調查小組聲稱整個科索沃空襲所摧毀的塞爾維亞地面目標不超過 30 件。美軍的空襲是否萬能？但是，無可否認，空襲摧毀了米洛舍維奇的心理防線，而俄軍不會出兵。塞爾維亞人孤立無援，最後祇能接受撤軍的條件”(平可夫：“美軍反恐戰爭分析”，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鬥爭理論探索》第 304~305 頁)。

<sup>307</sup> 安維華、錢雪梅：《海灣石油新論》第 348 頁。

<sup>308</sup> 尼克松：《領導者》第 427、435~439 頁。“薩達特的葬禮，有一堆歐美王公貴族、政治人物及總統出席，但阿拉伯領導人卻一個都沒有來，街頭上也未出現群眾隊伍。薩達特死的那天晚上，開羅街道上竟寂靜得怪誕。埃及人並沒有為薩達特哭泣”(凱倫·阿姆斯特壯：《為神而戰》第 470 頁)。

<sup>309</sup> 薩達姆此說並非聳人聽聞。在法國“委任統治期間”，現在的敘利亞曾經被分裂成六個國家(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 78 頁)。美軍佔領的伊拉克之前，周邊國家普遍擔心伊拉克的主權完整。倘若繼續民主、公決地鬧下去，伊拉克勢必至少分裂成東北庫爾德、北方遜尼派和南方什葉派三個實體。

<sup>310</sup> 馬塔爾：《薩達姆·侯賽因》第 171、61 頁；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 76 頁。

<sup>311</sup> 約旦佔了約旦河西岸，埃及佔領加沙，說是表達了整個阿拉伯而不僅僅是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不共戴天。接著，埃及控制下的“全巴勒斯坦阿拉伯政府”在加沙成立，遭到約旦的堅決反對。約旦把約旦河西岸地區與外約旦合併，改名“約旦哈希姆王國”，阿卜杜勒自稱“全巴勒斯坦國王”(左文華、肖憲：《當代中東國際關係》第 82 頁)。第三次中東戰爭，兩地均被以色列佔領。應當說，在對付以色列的問題上，阿拉伯國家之間，既有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一面，又有同仇敵愾、相互支持的一面。譬如，1967 年，費薩爾國王倡議由沙特、科威特和利比亞每年提供 3.92 億美元，支援埃及、敘利亞、約旦和巴勒斯坦前線。1972 年，伊斯蘭國家第二次外長會議決定建立反對以色列的聖戰基

金。1974 年阿拉伯聯盟最高級會議之後，沙特每年捐款 10 億美元給阿拉伯前線國家。在最近十年裡，這些國家給“巴解”提供了近百億美元（蔡佳禾：《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第 77 頁）。“事實上，如果沒有來自海灣國家的強大經濟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抵抗運動將難以支撐，更不可能取得今天的發展”（安維華、錢雪梅：《海灣石油新論》第 304 頁）。

- <sup>312</sup> “根據最近的統計資料，西岸和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口為 243 萬，居住在約旦的巴勒斯坦人 100 多萬，此外還有 200~300 萬巴勒斯坦人散居在其他中東國家裡”（蔡佳禾：《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第 91 頁）。以色列建國時，猶太人口約 65 萬。其中祇有 40% 出生在巴勒斯坦，60% 是復國運動興起的外來移民。到 90 年代初，以色列的猶太人口 420 萬（肖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第 151、289 頁）。
- <sup>313</sup> 時延春：《鳳凰涅槃中的阿拉法特》。
- <sup>314</sup> 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104 頁。“居於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 320 萬巴人，大部分已失業二年以上，外國援助成為他們生存的唯一依靠。巴人失業率由 99 年的 10% 銳昇至目前的 53% 水平”（劉志勇：“暴力抗爭兩敗俱傷，經濟合作有利和平”，香港《信報》2003 年 7 月 2 日，第 16 頁）
- <sup>315</sup> Mernissi：《婦女和伊斯蘭》第 15 頁。
- <sup>316</sup> 《古蘭經》說：“為主道而陣亡的人，你絕不要認為他們是死的，其實，他們是活著的，他們在真主那裡享受給養”（第 3 章 169 條）。“保證陣亡者在他們的靈魂離開軀體後，就立刻進入天堂。這一點要比其餘的信徒得天獨厚，因為那些信徒期待天堂的幸福不得不等到世界的末日”（克雷維列夫：《宗教史》下卷，第 146 頁）。不僅如此，死者的親屬不僅得到社會尊重，而且依靠雄厚的財政支持，得到周全的生活照顧。譬如黎巴嫩真主黨，為死士遺孀“建立了一個無懈可擊的支援網絡。透過真主黨死士妻眷聯會，黎巴嫩約 2500 個死士家庭可每月領取工資，享有免費醫療和子女免費教育，每月總資助額達 1200 美元”（藍天問：“真主黨的寡婦”，香港《大公報》2003 年 10 月 8 日，第 B1 頁）。
- <sup>317</sup> 阿富汗尼作如是說。“沙里阿地認為：伊斯蘭必須以行動來作表達”（凱倫·阿姆斯壯：《為神而戰》第 241、366 頁）。
- <sup>318</sup> 湯因比作如是說（《展望 21 世紀》第 221 頁）。更多的說法是“皈依”、“順

從”、“和好”(凱倫·阿姆斯特壯：《穆罕默德》第 329 頁)。伏爾泰說是“服從真主的意志”(伏爾泰：《風俗論》上冊第 314 頁)。

<sup>119</sup> 崔國平、郭瑞芳：《21世紀戰爭透析》第 42 頁。

<sup>120</sup> 有意義的是，胡圖族穆斯林沒有和執行大屠殺的胡圖族民兵通力合作。“沒有人死在清真寺裡。……十年前盧旺達八百多萬人口中，全國穆斯林人口僅佔 1%，主要是在城市裡做生意的北非人。大屠殺後，盧旺達穆斯林人口猛增到 16%（“伊斯蘭教在盧旺達興起”，《生活週刊》2004 年第 16 期，第 44~45 頁）。

<sup>121</sup> “兄弟會運動已經成為許多伊斯蘭運動的特色——最著名的是在加沙由阿墨·亞辛所創立的伊斯蘭議會(Mujamah)——此一社會工作旨在建立福利帝國”(凱倫·阿姆斯特壯：《伊斯蘭》第 224 頁)。

<sup>122</sup> 從 2000 年 9 月到 2003 年 7 月，被巴勒斯坦武裝分子殺死的 742 名以色列人中，有 243 人死於哈馬斯之手(呂寧思：“誰能降服哈馬斯？”香港《信報》2003 年 7 月 2 日，第 21 頁)。

<sup>123</sup> “血染的‘路線圖’”，《三聯生活週刊》2003 年第 25 期，第 12 頁。

<sup>124</sup> 《展望 21 世紀》第 236~237 頁。



## 第六章

# 恐怖主義全球化

6.1 什麼是恐怖主義？

6.2 信仰危機全球化

6.3 恐怖主義全球化





曾幾何時，“全球化”和“私有化”，成為冷戰結束以後，學界媒體最時髦、使用最頻繁的兩個詞。十多年時間聲嘶力竭地喊下來，最終呼喚出“恐怖主義全球化”和“戰爭私有化”。甘盡苦來，克林頓的助理國防部長有點幽默：“私有化正在發展，恐怖主義是戰爭的私有化。”<sup>325</sup>

## 6.1 什麼是恐怖主義？

什麼是恐怖主義？“有人曾對世界各國政府、專家、學者對恐怖主義所下的定義作了一個統計，截止到 1999 年，共有 108 種。”<sup>326</sup> 胡聯合著《當代恐怖主義與對策》，比較了 159 種關於恐怖主義的不同定義，可謂洋洋大觀。<sup>327</sup> 籠而統之地說，不問意識形態，不管政治主張，手段上不宜而戰，目標上不分青紅皂白，傷害無辜平民，好像就是 9.11 事件以來，人人喊打的恐怖主義。可惜，這樣似乎道德的定義並不清晰。<sup>328</sup> 過去，美國往廣島、長崎兩座城市丟原子彈，一次屠殺數十萬平民，不是恐怖主義。<sup>329</sup> 如今，美國出兵侵略主權國家阿富汗、伊拉克，是“反恐”。在以色列，刺殺總理拉賓的右翼極端，不是恐怖主義。在巴勒斯坦，以色列空軍射導彈“定點清除”居家過日子的哈馬斯領導人，是“反恐”。<sup>330</sup> 兩伊戰爭期間，伊拉克軍隊射導彈擊中美國軍艦，37 名海軍官兵血肉橫飛，不是恐怖主義，道一聲“對不起”就沒事了。<sup>331</sup> 美軍幫忙伊拉克打伊朗，連民航客機都往下揍，290 名乘客無辜罹難，是“反恐”。<sup>332</sup> 能不能說，同樣的方法，更其的手段，強者收拾弱者是“反恐”；弱者回敬



過去些許，就是恐怖主義？這樣蠻不講理，連以色列猶太人民都通不過。2003年10月，“27名以色列飛行員發表公開信，拒絕執行清除巴勒斯坦極端份子的空襲任務”。<sup>333</sup>反對派上街遊行，抗議政府軍隊屠殺阿拉伯平民，更是家常便飯。

其實，正如薩依德所說：“幾乎每一種奮鬥前進的現代運動都會在某個階段訴諸恐怖活動，南非曼德拉的非洲民族議會是如此，猶太復國主義也不例外。”<sup>334</sup>二戰以後，在美國的支持下，以色列國父本·古里安（當時是“猶太辦事處”主席）公開宣誓，用“血腥的恐怖”和“持續的野蠻暴力”，摧毀英國在巴勒斯坦的統治。他們“襲擊英國軍警和行政機構，破壞鐵路、公路、橋梁和通訊設施，偷渡移民，走私軍火，後來甚至暗殺了英國的中東大臣莫因勳爵，炸毀了在耶魯撒冷的英軍司令部——大衛王飯店。”<sup>335</sup>三個地下軍事組織——哈加納、伊爾貢和萊希，<sup>336</sup>成為以色列建國的主要武裝力量。以後連任總參謀長、國防部長的達揚，曾經是哈加納的骨幹和領袖。當過總理的貝京，過去是伊爾貢的司令。當過總理的沙米爾，曾經領導斯特恩幫，1944年暗殺了莫因勳爵，1948年暗殺了聯合國和平協調官、瑞典人福爾克伯爵。<sup>337</sup>1991年，在老布什和戈爾巴喬夫主持的和談會議上，以色列總理沙米爾喋喋不休，大罵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搞恐怖主義。敘利亞外長反唇相譏，手舉沙米爾本人當年被英國作為恐怖分子通緝的老照片，向全場各國代表展示。<sup>338</sup>由此可見，“反恐”戰爭能否收效，前提是如何公平、準確定義“恐怖主義”。聽聽哈桑·圖拉比的抱怨，不無道理：

首先必須弄清楚恐怖主義的概念。法國人反對德國佔領時，你們有一個尊貴的名稱——抵抗運動，而巴勒斯坦人反對佔領他們的領土時，你們卻稱之為恐怖主義。<sup>339</sup>

1981 年，美國通過以色列向伊朗出售幾十億美元軍火，抵抗伊拉克的進攻（1986 年鬧成“伊朗門”醜聞）。<sup>340</sup> 1982 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緊急報告：“伊拉克處於崩潰邊緣。”<sup>341</sup> 里根政府“不能允許薩達姆·侯薩因被德黑蘭這個激進的反美的伊斯蘭政府擊敗。”美國急忙把伊拉克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名單上刪去。2003 年打伊拉克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1983 年是總統特使，親赴巴格達，謁見專制魔頭薩達姆，促膝商討“反恐”大計。1984 年，美、伊兩國恢復正式外交關係。<sup>342</sup> “1986 年當美國正同伊朗進行秘密武器交易的同時，也同伊拉克秘密達成向其提供美國偵察衛星拍攝的有關伊朗地面設施的協議。結果，這為伊拉克頻頻空襲伊朗目標提供了方便。”<sup>343</sup> 基辛格說得直截了當：“從華盛頓的觀點來看，兩伊戰爭的完滿結果是兩敗俱傷。”不僅如此，對美國來說，兩伊戰爭另外的副產品是，海灣產油國從此由美國駐軍直接保護，一箭三雕。<sup>344</sup>

誰反美，誰就是恐怖主義。今天想打誰，誰就是恐怖主義。明天不打誰，誰就不是恐怖主義。表裡不一，信口雌黃，唯利是圖，隨心所慾。美國如此這般“反恐”，打了阿富汗打伊拉克，接著再打伊朗、也門、朝鮮，沒完沒了地忙活，理論上好像是在逐一剿滅恐怖主義的庇護所，結果幾乎人人可以預見，來自弱者的反抗會因此而更激烈、更極端。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預測是：“從現在到 2015 年，恐怖主義的策略將變得

日益複雜並力圖製造大規模傷亡。我們預計恐怖主義攻擊的更大毀滅性的趨勢將繼續下去。<sup>345</sup>

不管美國領導的“反恐”戰爭多麼義無反顧，恐怖襲擊與日內瓦公約不承認的游擊戰爭、人民戰爭相類似，正在逐步演變成爲某種弱者（沒有能力打正規戰爭）反抗強者的戰爭形態。基地組織 2004 年在西班牙組織大爆炸，炸倒一屆政府，炸回派往伊拉克的軍隊，焉能不算戰爭成功（西班牙局部）的政治果實？<sup>346</sup> 1993 年的調查顯示：“85% 的以色列人擔心在日常生活中遭到攻擊”。<sup>347</sup> 以色列政府內部吵成一團，1949~1979 年，30 年時間發生 106 次內閣危機（平均每年 3.5 次）。<sup>348</sup> 四百多萬以色列猶太人，幾十萬各國移民持有多國護照，還會有上百萬人申請歐洲國家護照。一半年輕人表示將會離開這個國家。<sup>349</sup>——一方面鄭重其事“反恐”戰爭，一方面恐怖襲擊不算戰爭，祇算犯罪，簡單語言邏輯的混亂，發人深省。

## 6.2 信仰危機全球化

值得關注的是，資本主義唯利是圖全球化，帶來信仰危機全球化。1997 年，全世界新興宗教教派組織十幾萬個，信徒約 1.5 億。<sup>350</sup> 尋求精神寄託的新教、邪教、歪門邪道、歪理邪說，尚且雨後春筍；<sup>351</sup> 正宗名牌的幾大宗教，自然更是水銀泄地，無孔不入，四處蔓延。物欲橫流、信仰危機的結果是，不僅伊斯蘭，而且基督教、印度教蓬勃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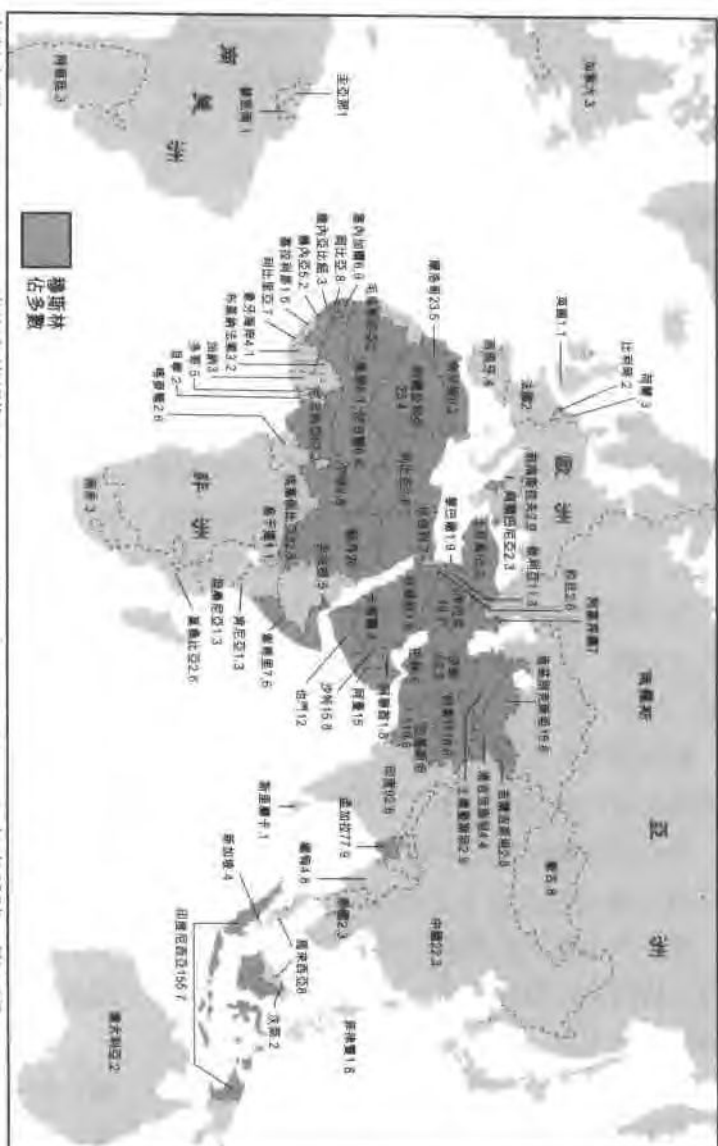
拉丁美洲天主教徒佔人口 88%。60 年代末拉美一些激進

的天主教神職人員提出“解放神學”，他們根據聖經上照顧弱小者和追求正義王國的教導，反省本地區廣大天主教徒受壓迫和剝削的社會現實，認為必須優先考慮窮人，廢除罪惡社會，建立人人平等的公正社會。在解放神學推動下，出現了大批新型基層教會組織如“基督教徒左派”、“革命基督教運動”、“人民教會”等。一些神父紛紛投入革命運動。亞洲、非洲的天主教也深受影響，成立了“亞洲普世神學會”和“非洲普世神學會”。解放神學是對正統天主教的一種反叛。<sup>352</sup>

伊斯蘭是僅次於基督教的世界第二大宗教。原教旨主義推動伊斯蘭復興運動突飛猛進。1965 年，全世界穆斯林人口不到六億，70 年代末發展到八億多。到麥加朝聖的人數，1965 年 23 萬；70 年代中期達到 150 萬，1980 年突破兩百萬。<sup>353</sup> 如今，26 個國家宣佈伊斯蘭為國教，22 個國家穆斯林人口佔全國人口多數，75 個國家參加了伊斯蘭會議組織，穆斯林總人口超過 12 億（圖~4）。<sup>354</sup> 亨廷頓預計，單靠生育繁殖，到 2025 年，穆斯林將佔世界人口的 30%。<sup>355</sup> 無論在歐洲還是北美，伊斯蘭都是發展最快的宗教。<sup>356</sup> 貧富懸殊、政治腐敗的發展中國家，更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極端組織發育的肥沃土壤。尤其是社會主義道路走不下去的國家，在東歐，美國政府親自下手，推動天主教捲土重來，全面復辟。<sup>357</sup> 在中亞，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阿富汗聖戰反蘇，各國穆斯林蜂擁而來，煽風點火，伊斯蘭死灰復燃，成燎原之勢。

“中亞國家陷入經濟危機，居民生活日益貧困，而少數人利用向市場經濟過渡大發橫財，許多政府官員以權謀私，聚斂

圖 4：穆斯林人口分佈(單位：百萬)



資料來源：Leon T. Hadar：“什麼災禍”(What green peril)，*Foreign Affairs* 1965年春季號，第25頁。

大量錢財，貧富差距現象日益嚴重。”<sup>358</sup> 從穆斯林展開阿富汗聖戰開始，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埃及、阿聯酋、約旦等伊斯蘭國家，大力支持中亞五國的伊斯蘭復興運動。蘇聯解體之後，各國更足爭先恐後，捐款修建清真寺、圖書館、學校，派遣志願人員傳教、教學，參與和組織政治反對派活動，參與和組織恐怖活動和大規模內戰。<sup>359</sup>

譬如，在哈薩克斯坦，60 年代初期，祇有 25 座清真寺，大約四萬名穆斯林舉行宗教儀式。到 1999 年初，清真寺發展到五千多座，穆斯林發展到 1100 萬，佔全國人口 65%。在烏茲別克斯坦，1987 年有大清真寺 87 座，1989 年 300 座，1993 年 2842 座。1996 年有大小清真寺 2.4 萬座。穆斯林佔全國人口 80% 以上。在吉爾吉斯斯坦，蘇聯時期祇有 15~20 座清真寺，1990~1993 年，三年時間，大清真寺從 39 座增加到一千座。穆斯林佔全國人口 85% 以上。在塔吉克斯坦，1989~1992 年，四年時間，清真寺從 70 座增加到 2870 座。穆斯林佔全國人口 86%。

隨著蘇聯解體，蘇共解散以及過去長期向人們灌輸的意識形態被斷然拋棄，使人們迷惑不解和思想混亂，……一些理想破滅了，又產生了另外一些理想。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特別是一些知識份子則認為，東方的馬列主義不行了，西方的意識形態也不行了，祇有伊斯蘭教才行得通。1992 年 2 月，被選為塔什干大穆提的穆罕默德·尤素福認為：“共產主義的崩潰，在我們地區和我們人民中造成了一個精神真空，唯有伊斯蘭教可以補充這一真空”。於是，一些人由從前信仰馬列主義

轉向伊斯蘭教。<sup>360</sup>

很難說得清楚，有多少共產黨員“由從前信仰馬列主義轉向伊斯蘭教”。但是可以肯定，“由從前信仰馬列主義轉向伊斯蘭教”，比轉向資本主義唯利是圖，轉向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順理成章得多多。更何況，“伊斯蘭教是唯有革命者才能理解的宗教。”<sup>361</sup>“伊斯蘭是那些願獻身於信仰、正義的好戰者的宗教。它也是追求自由、獨立者的宗教，亦是奮勇反抗帝國主義者的學堂。”<sup>362</sup>中國大陸著名作家張承志，從文化革命初期“紅衛兵”的創始人，轉變成全情投入的穆斯林，恐怕不是沒有絲毫典型意義。他用《心靈史》的“前言”向讀者呼喊，傾心吐膽：

不，不應該認為我描寫的祇是宗教。我一直描寫的都祇是你們一直追求的理想。是的，就是理想、希望、追求——這些被世界冷落而被我們熱愛的東西。<sup>363</sup>

在兩大陣營冷戰時期，“無論在西方國家，還是在東方國家，宗教對國家政治的干預以及對世俗社會的滲透都在客觀上被限制到最低限度。”<sup>364</sup>冷戰結束以後，與世界各國政府越來越西方化、美國化相對稱，各類蓬勃發展的宗教、新教、邪教，具有明顯政治化的趨勢。宗教信仰在邊界衝突、民族矛盾、內政外交、國體政體、意識形態、經濟政策等重大世俗問題上，日益表現出不是消極出世而是積極入世，執意干預和改造社會的戰鬥姿態。宗教和政治本來就是一回事的伊斯蘭，70年代末興起的復興運動，更突出表現出宗教發展與社會變革、政治動蕩水漲船高的顯著特徵。

好在穆斯林雖然人多勢眾，來勢凶猛，卻並非鐵板一塊，眾志成城。當年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群，從右到左，可以從歐洲當權的英國工黨、德國社會民主黨，走議會道路的法國共產黨、意大利共產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中國、朝鮮、古巴，一直數到柬埔寨的波爾布特，東南亞的游擊隊，南美的格瓦拉。同樣道理，席捲全球的伊斯蘭復興，從世俗政府到恐怖極端，也可以從沙特、阿聯酋、摩洛哥的部落君主，伊朗、蘇丹的政教合一，土耳其、埃及的資本主義民主，敘利亞、伊拉克的社會主義集權，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的東亞模式，一直數到阿富汗炸大佛的塔利班，巴勒斯坦打不死、煮不爛的阿拉法特，<sup>365</sup> 加沙的自殺炸彈哈馬斯，黎巴嫩明火執仗的真主黨，車臣、庫爾德沒完沒了的獨立運動，滿世界亂亂的本·拉登——阿拉伯人稱“當今的切·格瓦拉”。<sup>366</sup>

### 6.3 恐怖主義全球化

亨廷頓敏銳地觀察到：“就政治表現而言，伊斯蘭復興運動與馬克思主義有某種相似之處，它有經文，是對理想社會的描述，執著於根本的變革，拒絕現行政權和民族國家，以及有從溫和的改良主義到暴力革命的不同主張。”當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右到左，根據不同主張，分頭組成第二國際、第三國際、第四國際。“作為一種革命運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擯棄了民族國家，而贊成伊斯蘭的團結，正像馬克思主義擯棄了民族國家，而贊成國際無產者的團結一樣。……基督教、東正教、佛



教和印度教的各國政府都沒有基於宗教的國際組織，而穆斯林各國政府卻有。”<sup>367</sup> 伊斯蘭復興運動從溫和到極端，從官方到民間，根據不同主張、利益聯繫和專業領域，組成各種國際穆斯林組織。

官方的伊斯蘭會議組織，包括最高級、部長級和宗教組織三個層次，並先後建立伊斯蘭國際通訊社，伊斯蘭團結基金會，清真寺世界理事會，伊斯蘭國家廣播組織，伊斯蘭開發銀行，伊斯蘭經濟文化和社會事務委員會，伊斯蘭教歷史、藝術和文化研究中心，伊斯蘭國家統計、經濟和社會研究中心，伊斯蘭首都城市組織，伊斯蘭商業、工業和產品交換局，伊斯蘭技術和職業培訓中心，伊斯蘭國際紅新月委員會，伊斯蘭文明遺產國際保護委員會，科學技術合作常委委員會，經濟貿易合作常委委員會，情報與文化事物常委委員會，國際伊斯蘭教法委員會，伊斯蘭科學、技術和發展局，伊斯蘭船主協會，伊斯蘭法學會，伊斯蘭教科文組織，伊斯蘭民用航空理事會，伊斯蘭貿易發展中心。<sup>368</sup> 另外還有世界穆斯林大會、伊斯蘭世界聯盟、<sup>369</sup> 世界伊斯蘭組織最高協會委員會、伊斯蘭經濟國際會議、伊斯蘭工業國家會議、伊斯蘭銀行國際協會、國際伊斯蘭聖戰委員會等等。“伊斯蘭世界銀行”、“伊斯蘭經濟共同體”、“伊斯蘭北約”、“伊斯蘭聯合國”的呼聲甚囂塵上。<sup>370</sup>

1991 年，蘇丹原教旨主義政權召開“阿拉伯穆斯林人民大會”，來自 55 個國家的各類極端激進歡聚一堂。“會議決定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革命伊斯蘭主義國際組織。”<sup>371</sup> “被西方國家視為伊斯蘭國際，有的國家甚至將之定位為效命極端伊斯蘭運

動的恐怖主義國際。<sup>372</sup> 接著，蘇丹與伊朗結盟，簽署防務條約，並肩“輸出革命”。<sup>373</sup> 1998 年，伊斯蘭恐怖組織在阿富汗本·拉登的大本營聚會，宣佈成立伊斯蘭反猶太人和十字軍國際陣線。<sup>374</sup> 2000 年，在阿聯酋召開中東極端組織大會，準備籌建最高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國際組織。

在也門，以綁架西方人質而遐邇聞名的亞丁伊斯蘭軍，領導人是住在倫敦的埃及人阿布·哈姆扎。<sup>375</sup> 在巴勒斯坦，聖戰組織的重要成員在伊朗接受特殊軍訓。在黎巴嫩，伊朗先後向真主黨派遣三百多名教官。<sup>376</sup> 黎巴嫩什葉派運動的領導人是伊朗人穆薩·薩德爾。在伊朗，霍梅尼的兒子女婿曾在黎巴嫩，接受阿邁勒運動的秘密軍事訓練。阿邁勒的領導人穆斯塔法·卡姆蘭，革命成功後，出任伊朗最高國防委員會主席。<sup>377</sup> 在車臣，叛軍悍將哈塔布，是在阿富汗打完反蘇聖戰的沙特人。“車臣各反抗團體在互聯網上各設網址，從阿爾巴尼亞語到瑞典語，共有 12 種語言之多。”<sup>378</sup> 在伊朗，革命衛隊中的耶路撒冷旅、安全情報部、來自其他國家的外籍兵團和真主黨在繼續輸出革命。真主黨原是伊朗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建立的組織，後來發展到“在近至沙特阿拉伯、遠至巴西和烏拉圭等國建立分部。”<sup>379</sup> 在阿富汗，本·拉登的基地組織先後招募培訓世界各國的恐怖份子三萬多人。<sup>380</sup> “訓練營的結業生接著把恐怖主義和聖戰輸出到全球各個角落。”<sup>381</sup> 在德國，2000 年，安全總局發現 60 個恐怖組織（59700 人），包括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等伊斯蘭極端組織 19 個，成員 31450 人。“漢堡是 9.11 事件劫機犯（至少三名）及其助手活動的大本

營。”<sup>382</sup> 在加拿大，安全部門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發現黎巴嫩真主黨在蒙特利爾和圖蘭特建立了“伊斯蘭活動中心”，招募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在英國，情報部門發現曾在霍梅尼政府任職的穆拉·穆赫欣，1998年在倫敦創立“伊朗伊斯蘭中心”，招募大量伊拉克、巴勒斯坦、車臣、阿富汗、庫爾德和土耳其人，從事針對西方的恐怖活動。<sup>383</sup> “有的伊斯蘭人嘲諷地將倫敦稱作歐洲第一大阿拉伯城市。”<sup>384</sup>

跨國組織、跨國行動，已經成為當代恐怖活動的顯著特徵。伊斯蘭復興運動全球化，激進極端的恐怖主義，襲擊的範圍，活動的組織，也是全球化的。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講話：“今天，恐怖主義網絡形成了軍事全球化的一種新形式。”<sup>385</sup> 不僅軍事，而且經濟。原教旨主義復興包括“伊斯蘭金融運動”。<sup>386</sup> 根據不要利息的教規，上百家政府背景的伊斯蘭銀行，利用雄厚的資金實力，在全球編織了一個獨特的金融流通體系。<sup>387</sup> “伊斯蘭銀行的本質特征是取消利息，投資以利潤分成為基礎。”<sup>388</sup> 換言之，金融機構與本·拉登是利益共同體。美國記者心知肚明：“美國政府追查本·拉登資產的舉動，大部分祇是為求得自己安心的舉措而已，對他財務的影響其實微乎其微。”<sup>389</sup>

通常為這類資金轉帳的伊斯蘭銀行，都是黑箱作業，讓一般銀行或辦案人員難窺其奧，因為他們的利息計算或儲金報酬制度（由伊斯蘭律法管轄），根本與眾不同，所謂伊斯蘭銀行的作業手法，完全是伊斯蘭統合運動在金融機制中的另一種基本法則。<sup>390</sup>

另外值得注意，隨著穆斯林針對以色列和美國的恐怖襲擊向非洲、亞洲、澳洲擴散蔓延，世界各地一些有志難伸的非伊斯蘭組織，紛紛拍手稱快，摩拳擦掌，躍躍欲試。譬如，德國有 5.8 萬新納粹分子反猶、反美，與伊斯蘭激進極端同仇敵愾。“9.11 後的歐洲、尤其在德國正在出現另一種危險趨勢：白人右翼分子與伊斯蘭極端分子合流。”<sup>391</sup> 譬如，中國大陸的邪教——法輪功，組織自焚殉教抗議，利用高科技從臺灣搗亂大陸電視衛星，距離恐怖主義，祇有一步之遙。<sup>392</sup> 2003 年 2 月，反共份子王炳章被捕判刑，罪名是“組織、領導恐怖組織”。<sup>393</sup>——早在 1972 年，卡扎菲在群眾大會上公開宣佈，願意向任何反西方的革命者提供援助，包括愛爾蘭共和軍和美國黑人權利運動。早在 1973 年，日本赤軍和巴勒斯坦恐怖份子一起劫持 747 客機。飛往敘利亞的劫機者，要求釋放日本的恐怖份子岡本。<sup>394</sup>

#### 註釋：

<sup>325</sup> 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第 4 頁。

<sup>326</sup> 反恐怖研究中心：《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第 2 頁。

<sup>327</sup> 胡聯合：《當代恐怖主義與對策》第 2~17 頁。

<sup>328</sup> 美國人亨德森定義說：“‘恐怖主義’是指亞國家集團或秘密機構對非戰鬥人員實施的有預謀的、有政治動機的暴力行為，通常旨在影響其擁護者。”然而，戰爭屠殺平民，警察鎮壓群眾，特工暗殺持不同政見者，社會革命推翻反對派，使這個定義在實際應用中十分不清楚。“如果說恐怖主義與革命難以區別的話，那麼恐怖主義與游擊戰（或稱‘非正規戰爭’）的區別就更難說清了。”順便指出，亨德森強調中國的文化

大革命是“國家恐怖主義”的典型代表(哈里·亨德森：《全球恐怖主義》第1~7頁)。

- <sup>329</sup> 本·拉登在接受ABC採訪時說：“我們對穿制服的人和平民不加區別。他們都是這個教令中進攻的目標。要知道，美國在歷史上也不分平民和軍人，甚至殃及婦女和兒童。廣島的炸彈把兒童和軍人加以區分了嗎？”(反恐怖研究中心：《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第17頁)
- <sup>330</sup> 據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權組織統計，到2003年11月，以軍已發動157次“定點清除”行動，殺害309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定點清除’大事記”，《參考消息》2004年4月19日，第1頁)。
- <sup>331</sup> 當時美國軍艦斯塔克號到波斯灣，幫忙伊拉克油輪護航，被伊拉克空軍誤炸。事後，倒是無辜挨打的美軍艦長被審查了多日，算是做了交代(殷罡、秦海波：《薩達姆·侯賽因》第129~138頁)。
- <sup>332</sup> 克拉克說：“1989年，在與伊朗佈雷小艇作戰期間，美國海軍‘文森號’巡洋艦把一架伊朗國家航空公司的班機誤認為即將進行攻擊的戰鬥機，隨即發射導彈將其擊落，導致290名平民喪生。”290名平民，顯然是比戰鬥機大得多的龐然大物。美軍高科技雷達居然不能識別。有意思的是，“我們擊落伊朗客機的行為卻結束了戰爭。八年的戰爭把雙方的血都榨幹了，伊朗革命領袖一直在尋找一個借口結束戰爭，這是個現成的機會。他們對外聲明的理由是美國公開與其對壘，他們無法同時應付伊拉克和美國的進攻”(理查德·克拉克：《反擊一切敵人》第89~90頁)。
- <sup>333</sup> 以色列“總參謀長認為這是有政治目的的嚴重事件”(“任何軍人做出政治姿態都是非法的”，《亞洲週刊》2003年10月12日，第8頁)。
- <sup>334</sup> “但是，以F-16戰機與軍用直昇機濫炸沒有防衛的貧民，與傳統的民族主義者的恐怖活動，在架構與效果上並無二致”(薩依德：《遮蔽的伊斯蘭》第238頁)。
- <sup>335</sup> 左文華、肖憲：《當代中東國際關係》第77頁。
- <sup>336</sup> “以色列自由戰士組織”簡稱萊希，人民一般稱其為“斯特恩幫”(肖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第115頁)。
- <sup>337</sup> 賀雄飛：《猶太人之迷》第397、384頁。“據統計，僅1946年一年中，被殺害的英國軍事和文職人員就多達73人，另有93人受傷，猶太人方面的傷亡也有數百人。……英國國內的公眾對巴勒斯坦無休止的暴

力活動已感到厭倦了，認為英國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再繼續維持對巴勒斯坦的統治了”（肖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第 218、114~121 頁）。

<sup>338</sup> PBS DVD Video: *The 50 years war: Israel and the Arabs*。

<sup>339</sup> 反恐怖研究中心：《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第 18 頁。

<sup>340</sup> 黃民興：《中東國家通史：伊拉克卷》第 320 頁；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全球變局：美國與伊拉克》第 6 頁。

<sup>341</sup> 江紅：《為石油而戰》第 463 頁。

<sup>342</sup> 理查德·克拉克：《反擊一切敵人》第 38~39 頁。

<sup>343</sup> 左文華、肖憲：《當代中東國際關係》第 275 頁。

<sup>344</sup> 江紅：《為石油而戰》第 462~465 頁。

<sup>345</sup>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全球趨勢 2015：圍繞未來與非政府專家對話》，周建明、張曙光：《美國安全解讀》第 325 頁。多項民意調研顯示，美國民眾自己並不看好美國政府發動的“反恐”戰爭。馬里蘭大學“國際政策傾向調查”，64% 的回應者認為，美國在中東的軍事行動增加恐怖主義的可能性；77% 認為會擴大伊斯蘭世界對美國的反感，幫助恐怖組織招募人才。ABC 新聞的民意調查，48% 認為伊拉克戰爭增加恐怖襲擊美國的風險，祇有 40% 認為可以降低恐怖襲擊的威脅（Edward Alden: “US stance ‘making terrorism more likely’”, *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9 月 10 日，第 2 頁）。

<sup>346</sup> 關愚謙：“恐怖襲擊，竟炸出西班牙新政府”，香港《信報》2004 年 3 月 17 日，第 23 頁。

<sup>347</sup> 潘光等：《猶太民族復興之路》第 212 頁。

<sup>348</sup> “其中因宗教問題引發的危機就有 35 次”（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298 頁）。猶太教“正統派對任何形式的猶太復國運動都深感驚駭。”對於猶太復國的實踐，“正統派更是最激烈的話語來加以譴責。”根據教義，流放是上帝的懲罰，“唯有神可以為人類帶來救贖”。所以，“猶太人必須繼續維持他們在政治上的消極態度，因為這是流放狀態下的不得不然。……因猶太人的歷史已經清楚昭示，想要將神話具體化作歷史事實，將可能帶來致命危險。直到今天，猶太復國主義和它所催生的猶太國，對整個猶太世界所帶來的分裂衝擊，甚至超過了現代性本身。支持或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的存

在，正是驅動所有形式之猶太基本教義派發展的力量。……直到今天，耶路撒冷市內一處反猶太復國主義的社區裡，各家牆壁上張貼的海報和塗鴉，還在把以色列國的政治領袖拿來與希特勒相比擬。”猶太教原教旨主義認為：“復國主義者召喚猶太人回到歷史世界之舉，實已如同放棄了神的王國，進入一個對猶太人來說，根本就毫無存在感的狀態。他們不僅否定了自己的本質，並教唆猶太人走上一條注定毀滅的道路。……因他們早就認定，以色列國乃撒旦的傑作”（凱倫·阿姆斯特壯：《為神而戰》第 228~229、302~304 頁）。

<sup>349</sup> “據歐洲各國駐以使館的不完全統計，持德國護照的以色列人大概有十萬，持法國護照的有四萬，持英國護照的有 3.5 萬。但不少人相信，真實的數字要遠遠高於官方統計。歐盟駐以代表曾向新聞界表示，未來申請歐洲各國護照的以色列人可能達到一百萬”（“以色列人為何護照多”，《環球時報》2003 年 2 月 7 日，第 11 頁）。“約有 50 萬美國猶太人擁有以色列和美國雙重國籍”（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301~302 頁）。

<sup>350</sup> “約佔當時世界總人口的 2%。……據不完全統計，美國已經註冊的新興宗教團體約七千多個，歐洲 18 個國家有 1300 多個，其中英國有六百個，在日本 1994 年登記的有兩千多”（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5、118~119 頁）。

<sup>351</sup> “目前全球僅邪教就約有 26 類，全球神秘宗教團體超過一萬個”（胡聯合：《當代恐怖主義與對策》第 51 頁）。

<sup>352</sup> 邢東田：《當今世界宗教熱》第 2~3 頁。

<sup>353</sup> 肖憲：《當代國際伊斯蘭潮》第 44~45 頁。

<sup>354</sup> 米壽江、尤佳：《中國伊斯蘭教簡史》第 237 頁；金宜久：“是文明的衝突還是現實政治的選擇”，《新遠見》2003 年第 2 期，第 60~61 頁。

<sup>355</sup>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120 頁。

<sup>356</sup> 1981~1991 年，加入伊斯蘭教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裔英國人增加了一倍，其中有近一半是在英國出生的（Mandaville：《伊斯蘭跨國政治》第 121 頁）。“伊斯蘭教在美國、德國、意大利、法國等主要歐美國家均成為僅次於基督教的第二大宗教”。美國的穆斯林已達 620 萬（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91 頁）。

<sup>357</sup> 自波蘭籍教皇保羅二世上任，美國中央情報局與教會密切合作，支持

團結工會和葉利欽反共。1982年，保羅二世與里根密談。“里根和教皇一致同意開展一場秘密運動來加速這個共產黨帝國的瓦解。里根的第一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理查德·艾倫宣稱：‘這是歷史上最大的秘密聯盟之一’”（邢東田：《當今世界宗教熱》第58~81頁）。亨廷頓講話：“教皇是結束波蘭共產主義政權的主要力量。”到1994年，俄羅斯25歲以下的青年30%稱自己從無神論轉變為信仰上帝（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16、94頁）。1986~1989年，蘇聯每年開放的教堂數量為10個、16個、809個和2039個。軍人信教者從90年代初的10%左右上升到55%（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338、343頁）。

<sup>358</sup> 陳聯璧等：《中亞民族與宗教問題》第328頁。“中亞各國經濟下滑的總幅度超過獨聯體的平均水平，其中，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下降約50%，土庫曼斯坦約為40%，塔吉克斯坦約為70%”（徐亞清：《中亞五國轉型研究》第47頁）。高加索的達吉斯坦，約8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據俄羅斯官方統計，達吉斯坦的失業率為8.1%，印古什為32.4%。非官方數據達吉斯坦的失業率高達60%（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406~412頁）。

<sup>359</sup> 1992~1997年，塔吉克斯坦持續五年時間的殘酷內戰，得到阿富汗拉馬尼政府和馬蘇德軍隊的直接支持。“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等伊斯蘭國家也都向塔反對派源源不斷地提供經費、武器、彈藥和藥品”（陳聯璧等：《中亞民族與宗教問題》第273~289頁）。

<sup>360</sup> 陳聯璧等：《中亞民族與宗教問題》第255~263頁。

<sup>361</sup> 敘利亞復興黨人阿弗拉克作如是說（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第217頁）。

<sup>362</sup> 霍梅尼作如是說（凱倫·阿姆斯壯：《為神而戰》第369頁）。

<sup>363</sup> 張承志：《心靈史》第11頁。

<sup>364</sup> 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41頁。

<sup>365</sup> “阿拉法特所遭遇的未遂謀殺次數幾乎與他的年齡相等”（時延春：《中東風雲人物》第48頁）。

<sup>366</sup> 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61頁。

<sup>367</sup>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12、190~191頁。



- <sup>368</sup> 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 198~199 頁。
- <sup>369</sup> 世界穆斯林大會 1951 年在卡拉奇正式成立。1962 年，在第五屆巴格達大會上通過章程，67 個成員國。伊斯蘭世界聯盟 1962 年成立，1963 年在麥加大會通過章程，62 個成員國，在世界範圍有 30 個辦事處，以觀察員身份參加聯合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活動（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 184~185 頁）。
- <sup>370</sup> 譬如，土耳其繁榮黨領袖埃爾巴坎的理想是“一個伊斯蘭聯合國，一個伊斯蘭北約和一個伊斯蘭共同體”（孫振玉：《傳統與現實》第 158 頁）。早在 1949 年，由巴基斯坦穆斯林兄弟會發起的第三屆卡拉奇“世界伊斯蘭大會”上，“一位巴基斯坦領袖甚至提出建立一個在同一旗幟下、包括所有伊斯蘭國家的‘伊斯蘭斯坦’。……印度尼西亞聲明考慮先建立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斯里蘭卡、土耳其和部分阿拉伯國家在內的亞洲伊斯蘭聯合體”。1962 年，第五屆巴格達穆斯林大會上，又有建立“穆斯林聯合國”的建議，“伊斯蘭各國人民為穆斯林聯合國公民，主張成立世界穆斯林銀行，發行共同貨幣。”1964 年，第六屆摩加迪沙穆斯林大會政治決議：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以外有“第三世界——穆斯林世界”（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 130 頁；金宜久：《當代伊斯蘭教》第 156~157 頁）。
- <sup>371</sup> 哈桑·圖拉比宣稱：“這並不是個社團性的組織，也不是邀請蘇丹保護下的臣民參加的一個官方宴會。該組織的目的是制定一項總的行動計劃，以對抗西方暴君”（劉靖華、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第 297 頁）。
- <sup>372</sup> 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 58~59 頁。
- <sup>373</sup> 伊朗給蘇丹大量石油、財政和軍事援助，並派遣數千名革命衛隊幫助蘇丹訓練原教旨主義戰士（劉靖華、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第 297 頁）。
- <sup>374</sup> 後又派生出“伊斯蘭聖戰解放軍”（風梳柳：《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阿富汗》第 200 頁）。
- <sup>375</sup> “綁架可說是也門的家庭工業：1966~2000 年間，綁匪共綁架了 150 名人質，其中 122 名是外國人”（彼得·柏根：《本·拉登的聖戰工廠》第 226~234 頁）。
- <sup>376</sup> 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149~153 頁。

- <sup>377</sup> 劉靖華、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第 312 頁。
- <sup>378</sup> 彼得·柏根：《本·拉登的聖戰工廠》第 57 頁。
- <sup>379</sup> 理查德·克拉克：《反擊一切敵人》第 90 頁。
- <sup>380</sup> 風梳柳：《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阿富汗》第 199 頁。
- <sup>381</sup> “聞風而來者包括約旦人、土耳其人、巴勒斯坦人、伊拉克人、沙特人、蘇丹人、摩洛哥人、阿曼人、突尼斯人、坦桑尼亞人、馬來西亞人、孟加拉人、印度人、菲律賓人、車臣人、烏茲別克人、塔吉克人、中國境內的維吾爾人、緬甸人、德國人、瑞典人、法國人、阿拉伯裔美國人和非洲裔美國人。……從該組織主要活動地區來看：蘇丹、埃及、沙特阿拉伯、也門、阿富汗、巴基斯坦、波西尼亞、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突尼斯、黎巴嫩、菲律賓、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肯尼亞、坦桑尼亞、印度克什米爾和俄羅斯車臣。此外，基地組織也在美國的紐約、波士頓、德州、佛州、維吉尼亞州和加州，以及英國的倫敦和曼徹斯特吸引不少追隨者。本·拉登黨羽被捕的地方也散佈約旦、西雅圖、法國、烏拉圭和澳洲各地”（彼得·柏根：《本·拉登的聖戰工廠》第 45、251 頁）。
- <sup>382</sup> 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247~248 頁。
- <sup>383</sup> 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148~155 頁。
- <sup>384</sup> 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 98 頁。
- <sup>385</sup> 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第 88 頁。
- <sup>386</sup> “伊斯蘭金融運動是 70 年代以來出現的一件新事物，它的產生既有宗教因素，又有經濟因素。目前這一運動尚在發展之中”（金宜久：《當代伊斯蘭教》第 328 頁）。
- <sup>387</sup> 根據為真主管財產的基本理解，伊斯蘭反對單純儲蓄，更反對乘人之危、不勞而獲的高利貸。70~80 年代通貨膨脹，伊斯蘭反對超過通貨膨脹率的淨利息。伊斯蘭銀行提倡借貸雙方合作，共擔風險，分享利潤。“這種以投資利潤代替利息的金融原則，被稱為‘無息’伊斯蘭金融，現已在許多伊斯蘭國家付諸實施”（劉天明：《伊斯蘭經濟思想》第 8~9、259~262 頁）。譬如巴基斯坦，1981 年“全國所有商業銀行遵照國家法令改為無息伊斯蘭銀行”。伊斯蘭開源銀行（沙特）、巴林伊斯蘭銀行、馬來西亞伊斯蘭銀行、迪拜伊斯蘭銀行、埃及費薩爾伊斯蘭銀行、蘇丹費薩爾伊斯蘭銀行、孟加拉國際伊斯蘭銀行、伊斯蘭國際投

資開發公司(埃及)、約旦伊斯蘭金融投資銀行、伊斯蘭投資事務所、科威特金融事務所、土耳其科威特金融事務所、卡塔爾伊斯蘭銀行、沙特菲律賓伊斯蘭開發銀行、蘇丹伊斯蘭銀行等，為世界級著名伊斯蘭金融機構(金宜久：《當代伊斯蘭教》第316~329頁)。

<sup>388</sup> 金宜久：《當代伊斯蘭教》第321頁。

<sup>389</sup> “追蹤本·拉登的資金困難重重，原因在於《古蘭經》禁止‘高利貸’，因此他不用索利銀行。這不僅把99%的銀行排除在外”(彼得·柏根：《本·拉登的聖戰工廠》第136頁)。

<sup>390</sup> 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198頁。據美國人說，到2003年2月，全世界已經凍結1.3億美元“涉嫌恐怖主義活動的資金”(“美指與華反恐合作潛力大”，香港《信報》2003年2月20日，第10頁)。

<sup>391</sup> “他們擁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痛恨美國、以色列和猶太人。右翼分子中絕大多數舉雙手贊成9.11恐怖襲擊事件，稱‘這不是恐怖主義襲擊，而是反恐怖義舉’。9.11之夜，法國‘國家陣線’的年輕支持者們喝著香檳酒狂歡；捷克右翼分子簡·科普爾稱拉登‘是孩子們的楷模’；瑞士新納粹青年佩戴著拉登像章參加聚會；德國新納粹領袖馬里奧·舒爾茲在一次9.11後的集會上，帶頭焚燒美國國旗。9.11後，一向為右翼急先鋒、旅居波恩的瑞士人阿邁德·休伯在家裡掛起希特勒與拉登的頭像。休伯是‘納達管理’的負責人，據美國財政部稱，這家公司是拉登恐怖網的財政顧問。休伯也承認見過基地成員，但否認資助了基地的活動。9.11後，在接受一次採訪時他表示，正致力於在穆斯林與歐美新右翼份子之間建起溝通橋樑，聲稱作為納粹老兵，他感到與伊斯蘭極端份子‘有著共同的事業’。曾是希特勒私人衛士的一些老兵，2002年在巴伐利亞舉行啤酒聚會，主題是贊揚拉登向美國進行的‘英勇戰鬥’”(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叢書》第256~257頁)。

<sup>392</sup> 2003年5~6月，浙江省一名受過專業醫學教育的法輪功痴迷者——陳兆福，四次購買170包“毒鼠強”和11瓶甲胺磷農藥，先後毒死17人。陳兆福交待，為了練功，殺人越多越好(張奇志、張和平：“邪教的罪惡——浙江蒼南特大系列投毒殺人案紀實”，《人民日報》2003年7月15日，第4頁)。

<sup>393</sup> 自1996年以來，土炳章宣傳暴力恐怖主張，鼓勵實施暗殺，綁架，爆炸，破壞機場、公路、橋梁，同時積極發展恐怖組織。2001年2~7月，

王炳章兩次到泰國策劃爆炸中國大使館(“王炳章被判臺間諜終身監禁”，香港《信報》2003年2月11日，第9頁)。

- <sup>3/1</sup> 卡扎菲曾經援助愛爾蘭共和軍，包括提供經費、走私軍火和在敘利亞建立訓練基地(布倫蒂、萊西特：《卡扎菲傳》第95~96頁)。



## 第七章

# 戰爭私有化

7.1 政府支持恐怖主義

7.2 玩火者必自焚

7.3 恐怖主義的社會根源



雖然伊斯蘭極端份子捨身忘死，從事聖戰多年，過去的恐怖襲擊，通常歸屬“事件”範疇。直到 2001 年，布什總統把 9.11 事件正式說成是針對美國自由民主、乃至人類文明的戰爭，標誌著主流社會之主流，不得不放下身段，拾起一介白衣平民丟下的手套。<sup>395</sup> 聯合國通過“反恐”協議，全世界進入“反恐”鬥爭的歷史新階段。在這之前和之後，從歐洲到俄羅斯，從中東到中亞，從東南亞到澳大利亞，各國政府緊急動員，密切合作，交換情報，突擊搜捕，凍結恐怖資金，加大“反恐”力度。學界媒體齊聲喊，激昂慷慨，聲色俱厲。美國更是以支持或不支持“反恐”劃線、區分敵友，連續發動戰爭，大有滅此朝食之磅礴氣勢。<sup>396</sup> 籠而統之望過去，東躲西藏的恐怖主義，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與包括阿拉伯國家在內的全世界所有政府之強大軍力、警力、情報系統、特種部隊相對抗，焉有不旋即灰飛煙滅之理？

奇怪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9.11 事件之後，全世界“反恐”如火如荼，恐怖襲擊熱火朝天。在印度尼西亞的旅遊聖地，醉生夢死的夜總會，燃燒成火樹銀花的大炮仗。在肯尼亞的旅遊聖地，猶太大款的天堂海濱酒店，火海一片死亡地獄。在莫斯科，歌舞昇平的優雅劇院，改成關押人質的集中營。在以色列，爆炸、槍擊、石頭砸、滿大街沒吃沒喝無所事事的小夥子，哪個不是恐怖主義？<sup>397</sup> 在阿富汗，硝煙瀰漫過後，本·拉登毫髮無損，繼續組織恐怖襲擊，通過媒體大放厥詞。<sup>398</sup> 在肯尼亞，恐怖份子乾脆肩扛防空導彈，光天化日到機場打飛機，連劫持都嫌麻煩了。<sup>399</sup>



## 7.1 政府支持恐怖主義

“反恐”鬥爭能否取得勝利，實在看不見希望。根本原因在於，雖然各國政府眾口一詞地“反恐”，遠不是站在人類文明的立場上萬眾一心。反的都是於己不利之“恐”，對別人家裡的“恐”，不是幸災樂禍，而是大力支持唯恐不及。最起碼也是在自己家裡精心豢養起來，作為和對方就各種問題不斷討價還價的重要籌碼。在這方面，列強們自己，為各國政府“反恐”樹立了最好的榜樣。積極支持世界各地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從來是帝國主義製造分裂、控制他國的有力武器。從中東到中亞、到南亞、到東南亞，幾乎所有“可笑的邊境線”，都是列強們不得不退出殖民統治，製造矛盾、利用矛盾的結果。好端端的一個阿拉伯，分裂出 20 多個主權國家和一個永無寧日的糾紛地區。好端端的一個印度，分裂出三、四個主權國家和一個永無寧日的糾紛地區。<sup>400</sup> 英國人從南往北，佔領印度，控制尼泊爾，攬和雲南，進軍西藏，<sup>401</sup> 接著就利用穆斯林，在新疆演出一場“東土耳其斯坦”的鬧劇。<sup>402</sup> 日本人從東往西，恢復“滿州國”，實現“蒙古自治”，接著就利用穆斯林，要在甘肅、寧夏、青海、新疆搞出一個“回回國”。<sup>403</sup> 連現在人類文明的頭號公敵——本·拉登，都是美國支持阿富汗反蘇聖戰一手扶持起來的。<sup>404</sup>

在整個 20 世紀 80 年代，美國極力支持拉登反對前蘇聯。據有關資料披露，拉登曾在阿富汗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所謂半隱蔽行動領袖的訓練。至 1986 年，美國給予這些反蘇鬥士們大量援助，其中包括專門對付直昇機的“毒刺”便攜導彈。

據估計，在整個阿富汗戰爭期間，拉登集團獲得的美國軍事援助高達 2.5 億美元。<sup>405</sup>

美國不僅支持本·拉登在阿富汗抗蘇，而且支持本·拉登把聖戰引向中亞五國。<sup>406</sup> 一模一樣的原理，今天破壞中東和平的頭號公敵哈馬斯、二號公敵伊斯蘭聖戰組織，都是以色列為了給阿拉法特添亂、80 年代精心栽培呵護的碩果。

巴勒斯坦人民從 1987 年 12 月開始，在約旦河西岸與迦薩走廊以色列佔領區發動“起義抗暴”，這段期間以色列曾扶持“哈馬斯”與“伊斯蘭聖戰”兩個團體，以削弱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勢力。<sup>407</sup>

哈馬斯是以色列自己的福祿壽斯頓怪獸，在 80 年代，作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對立面扶持起來的，如今成為以色列普遍居民生命的最直接威脅。現在雙方都否認他們早期私通的意義。<sup>408</sup>

1999 年 10 月，德國在慕尼黑作東，2001 年 10 月，比利時在布魯塞爾作東，先後召開兩屆“東土耳其斯坦民族代表大會”。2000 年 11 月，愛沙尼亞在塔林作東，召開第三屆“維吾爾族青年世界代表大會”。<sup>409</sup> 即便是到了 9.11 以後，全球化“反恐”高潮一浪高過一浪。丹麥依舊大模大樣地作東，隆重召開“世界車臣大會”。<sup>410</sup> 遵照美國打伊拉克的邏輯，俄羅斯豈不更有理由進軍丹麥？

有說法道是，“世界上有據可查的恐怖主義有一千多個”。<sup>411</sup> 9.11 以後，美國喊打的僅僅是給美國搗亂的 25 個。後來因為

需要動員各國政府齊心協力，才不得不心不甘、情不愿地陸續補充。在印度尼西亞蘭巴厘島大爆炸的聖戰軍，基地組織直接訓練，一年多以後才勉強上了黑名單，<sup>412</sup> 車臣、東突、庫爾德就更別提了，原本就是明裡暗裡千絲萬縷的說不清道不明。<sup>413</sup> 英國對美國，多年夫唱婦隨，事事亦步亦趨。美國高官照樣在白宮，拿愛爾蘭共和軍頭目當政治領袖隆重接待，一點便宜都不放過。2002 年，在 9.11 事件的斷垣殘壁旁邊，紐約市熱烈歡慶“法輪大法弘傳十週年”，市議會隆重表彰“李洪志和法輪功對人類身心健康作出的貢獻”，宣佈這位沒有“移民傾向”的華人為“杰出公民”。<sup>414</sup>

難怪本·拉登總有說法：“我們不論觀察哪裡都會發現：美國才是世上恐怖活動的首腦、犯罪勾當的元兇。”<sup>415</sup>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有了美國這樣的“反恐”司令，各國政府都得向榜樣學習，打擊反對自己的恐怖主義，支持在別國搗亂的恐怖主義。這樣的“反恐”鬥爭，篤定不會勝利。不是說恐怖主義如何刁鑽難纏，祇是因為幾乎所有恐怖主義，都有各國政府公開或暗地裡的大力支持。<sup>416</sup>

從政策層面上說，恐怖主義全球化和戰爭私有化，是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實踐的必然結果。美國國防部宣稱：“為保護和實現美國的利益，美國政府必須有能力影響其他國家的政策和行動。”要做到這一點，美國足夠強大和各國足夠弱小，或者充分利用美國的強大迫使各國盡可能弱小，本是一回事。美國人心裡很清楚：“現今世界上有將近一萬個種族和語言集團，但祇有大約兩百個國家，民族自決原則會帶來大規模暴力。”<sup>417</sup> 有

消息說，“目前世界上有近 30% 的恐怖組織是由極端民族主義者組成的。20 世紀 90 年代，該類恐怖活動佔 35% 以上。”<sup>418</sup> 用民族宗教、政治制度等任何理由，導致潛在競爭對手的國家分裂，是實現美國“有能力影響其他國家的政策和行動”，當時立竿見影、事後長治久安的基本途徑。

1945~2002 年，聯合國大家庭從 51 個國家增加到 191 個。1990 年以來的 12 年時間裡，美國領導的全球化，為聯合國添加了 32 個新成員，幾乎平均每年有三個新國家從舊地圖中裂變而生。<sup>419</sup> 為了保護和實現美國的利益，美國支持本·拉登打蘇聯，支持霍梅尼打薩達姆，支持薩達姆打霍梅尼，與專制君主結盟，為腐敗酋長而戰，和好萊塢明星傍阿拉伯大款一樣，從來沒有什麼文明的衝突。在統一大國支持各種理由的人民公決，“人權高於主權”地製造國家分裂；在分散小國維護各種形態的專制腐敗，“神聖主權不容侵犯”地破壞民族統一；是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處理國際事務的基本邏輯。雙重、多重標準的口號，變幻莫測的旗幟，翻雲覆雨的理由，找到找不到的証據，背後始終一貫的是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美國利益。

一個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與美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鬆散的西歐聯盟，不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但是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國可能構成這種威脅。在必要時進行戰爭以阻止中國在東亞的霸權，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如果中國的經濟繼續發展，這可能是 21 世紀初美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唯一最嚴峻的安全問題。<sup>420</sup>

## 7.2 玩火者必自焚

從美國中央情報局花 30 多億美元支持阿富汗聖戰反蘇，到 9.11 事件房倒屋塌，應驗了中國的一句老話——玩火者必自焚。用美國人自己的話說：“這一仗到頭來是製造了伊斯蘭好戰份子的跨國部隊，將恐怖主義和游擊組織普及到全球各地。”<sup>421</sup> 同樣典型的案例是伊拉克的生化武器。美軍之所以在伊拉克沒完沒了地尋找生化武器，誰說沒有也不信，是因為各類無藥可醫的可怕菌種，都是美國在兩伊戰爭後期供應的。明明一撥撥賣了過去，怎麼會找不著了呢？<sup>422</sup>

讓人膽戰心驚的是，美國人今天玩的火，淨是高科技。科技進步日新月異，意味著尖端軍工技術向民用、向民間日新月異的普及。人類歷史以來，幾乎所有的重大技術發明，都是首先應用在軍工產業。從這個角度說“科技進步”，簡直就是軍工技術向民用轉移的同義語。以進步最快的信息處理技術為例，從 1954 年開始，電腦的價格每年下降五分之一，計算速度每 18 個月翻一番。現在普通家庭用微機的計算能力，相當於 70 年代的中大型電腦，價格還不到 70 年代的 1%。<sup>423</sup> 換言之，過去需要站崗警衛的軍事技術設施，現在孩子們用來玩遊戲。——玩出什麼花樣了？新西蘭的科技愛好者辛普森，在家裡製作巡航導彈，材料全部在商店採購，成本不超過五千元美元。<sup>424</sup> 其實，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早就發出警告：“攜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導彈被用來對付美國軍隊和利益的可能性，今天比冷戰期間大部分時間都大。”<sup>425</sup>

軍工推動的科學技術發展，從來不是中性的，更不是單純正面的，具有造福人類和毀滅人類的兩面性。原子能技術是最好的說明。印度頭天原子彈試爆成功，巴基斯坦第二天成功試爆原子彈；而且是你五顆、我五顆地比著幹。<sup>426</sup> 伊拉克武器核查還沒完，<sup>427</sup> 美國就猜測沙特也有核計劃，<sup>428</sup> 伊朗很快造出原子彈，<sup>429</sup> 一會兒說利比亞的核武源頭是中國，<sup>430</sup> 一會兒指控馬來西亞走私加速器部件。<sup>431</sup> 朝鮮的核武器試驗，更是明目張膽的挑戰，不久前還在擔心有沒有，轉眼已然是有多少顆的問題了。<sup>432</sup> 以色列是中東地區的核大國。<sup>433</sup> 第四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在開戰初期唯恐不敵對手，而將大約十枚核彈頭秘密從儲存庫中取出裝在發射架上。”<sup>434</sup> 1990 年，俄軍突然入侵阿塞拜疆，“原因是人民戰線這一組織手中掌握了前蘇聯在伊朗邊境安置的戰術核武器。”<sup>435</sup> 2003 年，BBC 報道說，本·拉登在阿富汗製造出簡易的核輻射裝置——“髒彈”。<sup>436</sup> 製造“髒彈”的原料——鈾-137，廣泛應用於工業和醫療。恐怖組織走私核原料屢見不鮮。<sup>437</sup> 美國核武器實驗室的機密資料多次失竊。<sup>438</sup> 美國核專家發表研究報告，幾乎可以肯定，恐怖分子將使用放射性武器襲擊美國。<sup>439</sup>

事實上，核擴散不可逆轉，是美國人都承認的既成事實。<sup>440</sup> 1996 年，美國成立核突發事件搜索隊，上千專業人員組成。到 2001 年，五年時間，上百次進入警戒狀態。該機構負責人說：“一次真正的核恐怖襲擊祇是一個時間問題。”<sup>441</sup> 自打有人類以來，從來沒聽說過那一個武器發明不在戰爭中使用，不在全世界擴散。真正值得一問的是，為什麼冷戰期間兩大陣營軍備競賽你

迫我趕，核武器沒擴散。冷戰結束了，核擴散反倒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sup>442</sup>

其實用不著直接掌握核武器，破壞民用核設施，就能達到恐怖襲擊的目的。“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材料，全世界有 438 個核反應爐；651 個供研究用的反應堆（其中的 284 個正在運轉）以及 250 個核發電廠，這些設施都儲存著大量的放射性材料。”<sup>443</sup> 2003 年，加拿大破獲一夥巴基斯坦的恐怖組織，天天訓練駕駛飛機，圍繞多倫多市邊上的皮克林核電站往返徘徊！<sup>444</sup>

軍工推動的現代高科技發展，一方面，使傳統的百姓造反、封建割據，在技術上越來越困難。另一方面，卻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越來越容易被少數私人掌握。譬如，生化武器號稱“窮人的原子彈”，成本極其低廉，生產極其簡單，運載極其方便，後果極其嚴重。<sup>445</sup>

根據加拿大情治單位自 1995 年起進行的一份年份較近的研究報告指出，策劃一場生化恐怖戰爭所需資金不會超過一百萬美元，比方祇要四百美元就可以生產一公斤 A 型肉毒桿菌毒素。這種病菌遠比現今全世界大部分軍隊不再使用的神經毒氣還更危險。同一份報告指出，生產毒素的技術輕而易舉，相較於複雜的核武製造技術可說是小巫見大巫。一個具有大學二年級科學常識程度的小規模研究小組，祇要謹慎點就可以在基本配備的實驗室中製造傳染病菌。更令人擔心的是，祇要到任何一個開放給大眾的理工大學圖書館，就可查到培養病菌的配方和方法。說的更明白一點，製造細菌武器不會比提煉海洛因或製造劣質假酒更複雜。<sup>446</sup>

在專家的指導下，“恐怖份子利用後院幾把泥土，和輕易可得的實驗室器材，就能製造殺人無數的細菌武器。”<sup>447</sup> “100公斤炭疽芽孢通過飛機、航彈、老鼠攜帶等方式散播在一個大城市，三百萬市民就會感染斃命。”不僅如此，炭疽芽孢有金剛不壞之軀，數十年不死，持續不斷傳染，而且極難清除。<sup>448</sup> 1983年，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了秘密製造蓖麻毒素的兩名美國人，繳獲30克蓖麻毒素，理論上足夠毒死兩千萬人。1995年，東京地鐵遭沙林毒氣襲擊，日本警察對奧姆真理教搜查，繳獲大批製造毒氣的設備和原料。用這些原料製造毒氣，“足以奪取三千萬人的生命！”<sup>449</sup> 如今，“有25個國家已經或正在研發生化武器，網絡及其他工具更加快相關技術的傳播。……細菌是可以直搗敵方大本營的‘戰略’武器，國家、團體、甚至個人都可以發動細菌戰。……本·拉登就訓練他的部屬使用生化毒素。”<sup>450</sup> 2004年4月，約旦破獲一起用20噸化學物質恐怖襲擊計劃，“如果襲擊成功，估計將造成至少八萬人死亡、16萬人受傷。”<sup>451</sup>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承認：“美國受到的化學和生物威脅將變得更加廣泛；這種能力比核武器更容易發展、隱蔽和部署。”<sup>452</sup>

技術進步最快的是計算機推動的信息處理技術，恐怖襲擊前景最方便、後果最可怕的也是信息處理技術。自從1979年15歲少年闖入美國北美防空指揮中心，類似的傳奇故事絡繹不絕。<sup>453</sup> 1988年，病毒“蠕蟲”在一個早晨，使包括美國國防部遠景規劃署、蘭德公司和哈佛大學在內的六千多臺軍用、民用電腦全部癱瘓。<sup>454</sup> 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十歲荷蘭少年進入五



角大樓，不僅把美軍情報公佈於眾，而且動手胡亂修改，“嚴重地擾亂了美軍的戰略部署。”1993年，16歲英國少年在七個月時間中，多次進入美國空軍最高指揮和控制機構，破譯大量機密不說，還植入了日後可以啟動的病毒。第二年，他把事情在網上公佈，大驚失色的美軍不得不“對數以百萬計的電腦通訊密碼全部進行重編。”“1994年，兩名黑客多達150次地滲透到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紐約控制中心設施系統裡，並控制了整個實驗室網絡，最後導致該網絡33個分網被迫停機脫網達數天之久。”1995年2月，凱文·米特因竊取文件數據，被美國司法部判為“電腦恐怖分子”。7月，不明黑客盜竊法國海軍行動力量參謀部的機密，包括幾百艘盟軍軍艦的聲音識別密碼和艦隻航行圖。9月，自稱“長槍黨武裝”的黑客打開意大利核物理研究所的電腦系統數小時之久，等等。<sup>455</sup>

1998年，華盛頓抱怨莫斯科的七個互聯網地址與五角大樓及國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機密失竊案有關，而俄羅斯政府的答復是：用來發動這些進攻的電話號碼是空號。我們無法知道俄羅斯政府是否參與了這起事件。有30多個國家已經制訂了進攻性的電腦戰計劃，但任何有電腦的人都知道，個人也能夠參與這場遊戲。祇要點擊幾下鍵盤，世界任何地方的某個不知名者都可以闖入美國城市的私人電力網或者政府的緊急反應系統。<sup>456</sup>

僅1994年一年時間，美國國防部受到23萬起涉及安全的網絡入侵。<sup>457</sup>美國國防部擔心，“社會和軍隊越來越依賴網

絡，導致了新弱點和機遇的出現。潛在敵人可能利用電腦網絡和定向武器攻擊這些新弱點。”<sup>458</sup> 9.11 事件是用美國飛機撞美國大樓。極而言之，或許早晚有一天，美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會落在美國人自己頭上。不是說信息通訊技術進步反對專制，帶來人類社會組織的“扁平結構”嗎？在這個涵義上，“歷史終結”的極端結果是，美帝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怎麼用、什麼時候用、往哪裡用、用多少，不光布什總統說了算，本·拉登也有發言權。面對這番黯淡前景，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淒涼無限：

要防範野蠻人更為困難。通訊成本的大幅度下降，超越國界的跨國產業(包括互聯網)的興起，技術民主化將大規模毀滅性力量(這一度為政府所獨佔)置於集團和個人手中，所有這一切都屬於歷史上的新鮮事務。……這類人在 21 世紀要比 20 世紀更加不受國家極限的約束，不必掌握工業能力就可以實施破壞。……很清楚，小集團甚至個人要想對他們視為敵人的人給予大規模殺傷，門檻是大大降低了。<sup>459</sup>

美國前白宮安全顧問淒涼無限：

在白宮的時候，記者們喜歡問我：“什麼事情讓你晚上睡不着？發生在我們頭上的最可怕的事情是什麼？”感謝上帝，最可怕的事情並不是最可能發生的。不過，至少有兩件可怕的事情是可能發生的：第一、由於生物武器導致大規模高傳染性疾病的爆發；第二、美國城市發生核爆炸。<sup>460</sup>

美國國防部的調查小組委員會淒涼無限：

恐怖份子使用核、生、化武器發動攻擊幾乎不可避免。這種攻擊不是可不可能的問題，而是什麼時間的問題。<sup>461</sup>

### 7.3 恐怖主義的社會根源

美國作家抱怨中國作家寫《超限戰》，為恐怖主義著書立說。<sup>462</sup> 正確的認識應當是，人類歷史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生產力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公平、平等、民主、自由方面的社會進步與時俱進。冷戰結束之後，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社會進步的歷史卻終結了。社會主義窮途末路，共產主義遙不可及。全球唯利是圖化回到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sup>463</sup>

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全世界 8.15 億人口食不果腹，營養不良，每年 3600 萬人直接間接死於飢餓（等於每年兩場中國八年抗戰）；直接對應的是全球通貨緊縮，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科技進步越來越快，對與之相適應的必不可少的社會進步，提出越來越急迫的歷史要求。唯利是圖的反動倒退，必然遭到戰爭私有化的懲罰。如今，全世界每七秒鐘餓死一個不到十歲的兒童。<sup>464</sup> 有說法是，在 9.11 當天，紐約世貿大樓裡呼天搶地，全世界無動於衷餓死 3.5 萬無辜兒童。<sup>465</sup> 試問，從這些“需求不足”的兒童中間，必然不斷產生多少奮不顧身的格瓦拉或本·拉登？怪不得有法國人跳出來仗義執言：

恐怖主義就像病毒一樣無所不在。……在世界範圍內，被剝削者和欠發達者與西方國家之間的仇恨已經悄然成為統治體

系內部裂痕的一部分。統治體系可以面對一切有形的對手。然而，面對已進入自己體內的宛如病毒的力量，它束手無策。恐怖主義便是這一無聲力量的衝擊波。

這並不是文明的衝突，也不是宗教的衝突，它甚至超出了伊斯蘭教和美國之間衝突的範圍。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們可將之稱為世界大戰，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戰，而是第四次，也是唯一的真正的世界大戰，因為戰爭的賭注就是全球化本身。……恐怖主義是不道德的，9.11 事件是不道德的，它們所針對的全球化也是不道德的。<sup>466</sup>

本·拉登一直在毫不掩飾地尋求擁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sup>467</sup>不管情願不情願，恐怖主義全球化和戰爭私有化，迫使人們從社會進步而不是“歷史終結”的角度，認真思索產生恐怖主義的根源。

我們乘著科技的雙翼，可以迅速進入 21 世紀，也可以同樣的速度重返石器時代。<sup>468</sup>

#### 註釋：

<sup>465</sup> 白宮 2003 年 2 月 14 日公佈《抗擊恐怖主義國家戰略》開宗明義：“2001 年 9 月 11 日在華盛頓特區、紐約市和賓西法尼亞州發生的恐怖主義攻擊事件，是對美利堅合眾國及其盟國的戰爭行動，是對文明社會這一理念本身的戰爭行動”（第 1 頁；網址：<http://sunfo.state.gov>）。

<sup>466</sup> 9.11 事件 10 天後，布什總統強調：“在反恐怖戰爭中沒有灰色地帶，要麼和我們站在一起，要麼與恐怖份子為伍”（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

所：《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第 19 頁）。

<sup>397</sup> 僅 2002 年上半年，以色列境內發生巴勒斯坦武裝人員襲擊事件 1071 起，238 人死亡；比 2001 年同期上昇 250%（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第 167 頁）。以色列佔領加沙。“祇要人在加沙市，便會感到那股揮之不去的怨氣。無論走在大街、或是陋巷，都會看到貼在牆上的‘聖戰者’、‘殉道者’海報，還有大幅的壁畫，血染一片，上面寫著：復仇！”。巴勒斯坦人講話：“我們這裡每個人都是哈馬斯，人人心中都有個炸彈，我們隨時準備做烈士”（張翠容：“加沙——中東的‘無間地獄’”：“以巴和平渺茫”：香港《信報》2004 年 5 月 25 日，第 26 頁；26 日，第 7 頁）。

<sup>398</sup> 2002 年 11 月，卡塔爾電視臺播出本·拉登的錄音帶；2003 年 1 月，英國的阿拉伯報紙《中東日報》報道本·拉登的聲明，號召全球回教徒反抗“十字軍聯盟”對穆斯林的進攻（“拉登發聲明籲回教徒團結抗敵”，香港《信報》2003 年 1 月 21 日，第 10 頁）。

<sup>399</sup> 2002 年 11 月，在肯尼亞蒙巴薩的天堂海濱酒店大爆炸前幾分鐘，恐怖份子在機場附近發射兩枚導彈，險些擊落以色列亞基亞航空公司的客機。事後，以色列籲請西方合作發展民航客機的反導彈襲擊系統，或者禁止肩扛式導彈的買賣，均因成本過高而無人回應（“商業軍事合流，世界更不安全”，香港《信報》2002 年 12 月 27 日，第 1 頁）。

<sup>400</sup> 15~18 世紀，莫臥兒帝國時期，伊斯蘭教在印度迅速傳播。“不少印度教徒特別是那些低種姓的印度教徒，由於傾慕該教教友平等的思想，紛紛改宗信奉”（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周邊地區民族宗教問題透視》第 167 頁）。英國殖民主義者分而治之，採取“拉印抑穆”的政策，“使印度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教派矛盾逐漸加深，甚至導致教派衝突，民族、宗教一體化的衝突有時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根據不同信仰，穆斯林領袖穆罕默德·伊克巴爾和穆罕默德·阿里·真納，1930 年和 1940 年先後提出“兩個民族”理論，被英國殖民地當局善加利用，1947 年正式實行印巴分治。如今，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穆斯林人口佔 77% 以上（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444~451 頁）。“孟加拉是世界第三大穆斯林國家，全國 88% 的人口屬於穆斯林（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周邊地區民族宗教問題透視》第 232 頁）。從 1923 年開始，甘地領導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民族獨立運動。1947 年斯里蘭卡（錫蘭）率先自治，“儘管錫蘭沒有為自由而戰”。1947 年印巴分治，儘

管“巴基斯坦立國領導人真納從未進行過反抗鬥爭，也沒有在英國人的監獄裡坐過一天牢。”當印度獨立運動終於取得勝利的時候，“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偉大領袖甘地認為沒有理由慶祝，國家分裂深深地震撼了他”（迪特馬·羅特蒙特：《殖民統治的結束》第 2~46 頁）。

<sup>301</sup> 高鴻志：《英國與中國邊疆危機》。

<sup>402</sup> 30年代初，中國軍閥混戰，百姓民不聊生。從 1931 年哈密暴動開始，人民武裝反抗軍閥苛政的鬥爭蔓延整個新疆。英國人趁機插手，1933 年 2 月，先在和田成立“和田伊斯蘭王國”。11 月 12 日，“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在喀什成立，樹藍色新月星星旗，按《古蘭經》立法，唱國歌，英國駐喀什領事館外交官親臨指導。三個月以後，被回軍馬福元等率兵剿滅（丁宏、張國傑：《百年中國穆斯林》第 275~313 頁）。1944 年 9 月，爆發“三區革命”，又是 11 月 12 日，在伊寧成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直到 1948 年，經過中國共產黨和維吾爾族愛國人士的持續努力，“東突厥斯坦”的名稱才廢止不用（李進新：《新疆宗教演變史》第 516~530 頁）。

<sup>403</sup> 1939 年，日軍委任回奸蔣若輝為“回軍總司令”駐包頭，進犯五原，準備西進，建立“回國”。傅作義率軍奮戰，奪回五原，蔣若輝僅以身免。更重要的是，中國廣大穆斯林愛國抗日，不僅正面抵抗日軍侵略，而且在敵後堅持抗戰（丁宏、張國傑：《百年中國穆斯林》第 92~124 頁；余振貴：《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第 424~428 頁）。

<sup>404</sup> “這座位於克斯特山區的原反政府武裝訓練營地，其實是 80 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出資 30 億美元修建的。現在，它成了本·拉登這位‘阿富汗老戰士’的根據地，而美國 8 月的飛彈襲擊，打的也是這裡”（曹建、曹軍：《奧薩瑪·本拉登》第 70 頁）。“本·拉登曾向外界透露，他本人的一個教官就是美國的‘越戰英雄’”（反恐怖研究中心：《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第 8~9 頁）。“美國則公開表示支持一場回教聖戰。推展援助阿富汗伊斯蘭戰士的工作，交由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卡塞（William Casey）親自負責。……根據今天獲得證實的消息，以色列曾進入阿富汗境內實地參與，在一些美國人不願意介入的情況中，支持道地而頑強的伊斯蘭極端派”（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 94~95 頁）。

<sup>405</sup> 崔國平、郭瑞芳：《21 世紀戰爭透析》第 39 頁。但是，親自採訪過本·拉登的美國作家彼得·柏根否認中央情報局直接支持本·拉登的種種

說法。原因是中央情報局對阿富汗聖戰的支持，全部是通過巴基斯坦進行的。整個 80 年代，美國援助阿富汗反抗軍 30 億美元（彼得·柏根：《本·拉登的聖戰工廠》第 88~94 頁）。亨廷頓的數據是 30~33 億美元。“巴基斯坦還是美國財政援助的代理人 and 輸送渠道，它有目的地將援助資金的 75% 給予了較強烈的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集團”（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276 頁）。

- <sup>406</sup> 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把中亞規劃成冷戰最後階段遏制蘇聯的南部戰線，明確指出：“美國直接援助阿富汗的民族抵抗運動使蘇軍陷入困境”（第 9 頁）。1984 年 10 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親臨巴基斯坦，佈置任務“把顛覆小分隊經由阿富汗送到蘇聯南部的回教共和國去，CIA 甚至為此準備了數千本《可蘭經》以及關於蘇聯在烏茲別克的暴行和烏茲別克民族主義歷史英雄事跡的小冊子”（曹建、曹軍：《奧薩瑪·本拉登》第 67 頁）。本·拉登不負美望，大力支持了中亞五國的伊斯蘭極端激進組織和恐怖活動（陳聯壁等：《中亞民族與宗教問題》第 320~328 頁）。

<sup>407</sup> 薩依德：《遮蔽的伊斯蘭》第 52 頁。

- <sup>408</sup> Harvey Morris: “Hamas stands at crossroads between war and peace”, *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13 日，第 14 頁。福阮肯斯頓 (Frankenstein) 是英國作家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著名小說中的主人翁。他是生理學研究者，用死屍的肢體和罪犯的頭腦合成創造了一個力大無窮的人型怪物，結果自己被怪物一路追殺。有好萊塢經典大片好看。加沙哈馬斯的前身是亞辛創立的宗教慈善組織——穆加瑪，“其資金來自穆斯林繳納的宗教捐、波斯灣產油富國和以色列政府，而後者的盤算，則是意圖借支持穆加瑪來瓦解巴解組織。此時亞辛仍無意對以色列展開武裝鬥爭”（凱倫·阿姆斯壯：《為神而戰》第 492~493 頁）。

<sup>409</sup> 崔國平、郭瑞芳：《21 世紀戰爭透析》第 35 頁。

- <sup>410</sup> 俄羅斯指責丹麥違反聯合國 2001 年關於打擊恐怖主義的 1373 號決議（謝榮：“俄指責丹麥支持車臣武裝”，《天津日報》2002 年 10 月 28 日）。丹麥還拒絕俄羅斯要求引渡車臣前總統特使的請求，俄羅斯強烈譴責“丹麥支持恐怖份子”（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叢集》第 424 頁）。

<sup>411</sup> 崔國平、郭瑞芳：《21 世紀戰爭透析》第 23~24 頁。

- <sup>112</sup> Amy Kazmin 等：“Us blacklists 20 Asians with links to Ji terror group”，*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9 月 6~7 日，第 4 頁。再譬如，在菲律賓擁有 1.5 萬武裝、與基地組織關係密切的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也不在美國的“反恐”名單上（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185 頁）。
- <sup>113</sup> “2001 年 3 月，美國國務院官員公然接見了車臣分離主義叛軍的高層人物。……俄一名高級官員憤怒地說：‘現在看來，華盛頓與車臣叛軍打交道帶來了極其嚴重的惡果，因為這使車臣恐怖份子認為有了支持的後臺，因而更恣意妄為，而其支持者正是華盛頓和布什政府’”（反恐佈研究中心：《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第 21 頁）。1990~2001 年，“東突”勢力在新疆製造了兩百多起恐怖事件，死 162，傷 440。2002 年 9 月，美國及聯合國將“東突伊斯蘭運動”正式列為恐怖組織。但是，“美國認定的恐怖組織‘東突伊斯蘭運動’祇是幾十個‘東突’恐怖組織之一。”“維吾爾聯盟”照樣在美國開會。美國還啟動所謂“新疆工程”，提出新疆地位未定論，強調新疆的問題主要是人權問題（潘志平：《中亞的民族關係》第 186、172~173、183 頁）。被中國公安部列為恐怖組織的“東突解放運動”、“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和“東突厥斯坦信息中心”，仍舊大模大樣地合法公開活動。“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和“東突厥斯坦信息中心”都是 1996 年在德國成立的。2004 年 4 月，“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與“東突厥斯坦國民議會”在德國慕尼黑舉行會議，宣佈合併組成“世界維吾爾會議”（“溫德促德遏疆獨”，香港《蘋果日報》2004 年 5 月 4 日，第 A25 頁）。
- <sup>114</sup>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第 226 頁。
- <sup>115</sup> 彼得·柏根：《本·拉登的聖戰工廠》第 34 頁。
- <sup>116</sup> 伊斯蘭復興運動內部教派紛爭，眾多極端組織之間歧見衝突，至少在“文明衝突”的層面上，具有意識形態的一致性。相比之下，面對世界各國政府之間貌似強大的“反恐”聯盟，手持美、蘇、英、法、德、意等多國武器的本·拉登，又怎能不在戰略上給予輕蔑的藐視呢？
- <sup>117</sup> 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第 163 頁。另外的說法是，全世界有兩千多個民族（陳聯璧等：《中亞民族與宗教問題》第 317 頁），六千種語言（21 世紀研究會編：《民族的世界地圖》第 42 頁）。80 年代末以來，蘇聯分裂成為 15 個獨立國家，南斯拉夫分裂成五個獨立國家，引起波黑戰爭、車臣戰爭、納卡流血衝突、格魯吉亞內戰、科索沃戰爭。前



蘇聯存在著 164 個“領土~種族要求和與邊境有關的衝突”，從蘇聯解體前到 1993 年，短短三年時間，已經有 30 個捲入了某種形式的武裝衝突(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17 頁)。

<sup>418</sup> 崔國平、郭瑞芳：《21 世紀戰爭透析》第 40~41 頁。

<sup>419</sup> 1990 年聯合國 159 個成員國 (<http://www.un.org/overview/growth.htm>)。

<sup>420</sup>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259 頁。竭盡全力促成中國分裂，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邏輯十分清晰：中國再反復重申“不稱霸”，統一、強大就是對美國安全的威脅；繼續發展就構成美國滿世界“利益均沾”最嚴峻的安全問題。換言之，中國祇有像歐洲那樣分裂成一個鬆散的聯盟，才能真正化解對美國安全的挑戰，與美國相安無事。

<sup>421</sup> 1986~1987 年，美國援助阿富汗聖戰九百枚毒刺飛彈，打下 269 架蘇聯飛機。餘下兩百多枚，本·拉登公開高價搶購。“美國官員就一直很擔心毒刺飛彈可能用來對付駐沙特的美軍運輸機。……這兩百枚流向不明的毒刺飛彈，象徵阿富汗反共戰爭惱人的遺產，這一仗到頭來是製造了伊斯蘭好戰份子的跨國部隊，將恐怖主義和游擊組織普及到全球各地。阿富汗戰爭的勝利對蘇聯威望乃至蘇維埃體系，固然是個重大打擊，對穆斯林世界也具有不凡的意義。……阿富汗反共戰爭勝利不啻是令人陶陶然的精神勝利：以阿拉之名擊敗超級強權。就阿富汗阿拉伯人和本·拉登而言，這是個重大的教益，本·拉登就是把這個教益用在下一場聖戰上——對付美國”(彼得·柏根：《本·拉登的聖戰工廠》第 101~102 頁)。

聖戰研究專家佩佩·埃斯科巴爾認為：“現在的‘聖戰’思想是從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巴基斯坦情報局在阿富汗發動‘聖戰’才開始為人所知的。在此以前，‘聖戰’一直默默無聞，而穆斯林進行的大多是民族主義戰爭。直到過去 20 年，人們才賦予‘聖戰’‘武裝鬥爭’的含義。前蘇聯及其東歐帝國解體後，‘聖戰’思想開始為伊斯蘭國家的窮人所接受”(佩佩·埃斯科巴爾：“是恐怖主義還是‘聖戰’”，反恐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 111~112 頁)。

<sup>422</sup> “1986 年 5 月，該中心曾經出售一些菌種給巴格達大學，包括三種不同的炭疽熱病菌、五種大腸桿菌，及三種可以造成動物疾病的布氏桿菌，巴格達大學也準備採購更多的其它菌種。”到 1988 年 9 月，“已有 11 種菌種從馬里蘭州運往伊拉克，其中包括四種炭疽熱病菌，更有

一種代號為 11966 的菌種，是戴特瑞克堡 1951 年為細菌戰研發的炭疽熱病菌。”直到 1989 年 2 月 23 日，“商務部下達禁令，禁止炭疽熱等病菌出口到伊拉克、伊朗、利比亞及敘利亞等疑似發展細菌武器的國家”。1990 年 11 月，美國海軍情報部門指出，伊拉克購買的“微生物營養基足以生產 740 億劑致命的肉毒桿菌細菌戰劑。……伊拉克還有 150 多枚攜帶細菌戰劑的炸彈和彈頭下落不明，另外 12 具可從直昇飛機上噴灑細菌的噴霧器也不知去向。伊拉克雖然宣稱銷毀 25 枚彈頭，但是沒有提出證據”（朱蒂·密勒等：《細菌戰》第 88~89、140、195 頁）。

<sup>423</sup> 徐萬賢：《微電腦原理》第一章，<http://www.nenu.edu.cn/departmen/dianjiao/xwx/zy/wjyljy.htm>。

<sup>424</sup> 導彈翼展 2.5 米，時速 640 公里，射程 160 公里，誤差 100 米之內，重 60 公斤，彈頭 10 公斤，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制導。辛普森說：“我製作這個導彈的目的就是為了警示世界：恐怖分子可以輕鬆地以低廉的價格製作出他們所需要的導彈。”2003 年 4 月 9 日，辛普森開通了個人網站：<http://www.interestingprojects.com>（《生活周刊》2003 年第 24 期，第 34~35 頁）。筆者到辛普森的網站瀏覽，煞有介事，不像是聳人聽聞。

<sup>425</sup>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全球趨勢 2015：圍繞未來與非政府專家對話》，周建明、張曙光：《美國安全解讀》第 332 頁。

<sup>426</sup> 1974 年，印度進行首次核爆炸。1989 年 5 月，印、巴雙方對著幹，分別連續五次核試驗（金宜久、吳雲貴：《伊斯蘭與國際熱點》第 376 頁）。

<sup>427</sup> 小布什講話：“如果不是海灣戰爭，伊拉克政權可能最遲在 1993 年就已擁有核武器”（“美國總統布什在聯合國大會發表的演說，2002 年 9 月 12 日”，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全球變局：美國與伊拉克》第 338 頁）。

<sup>428</sup> “美報猜測沙特也有核計劃”，《參考消息》2004 年 1 月 8 日，第 3 頁。2003 年，媒體報道巴基斯坦與沙特合作核武器（“傳巴沙秘密簽核合作協議”，香港《信報》2003 年 10 月 23 日，第 7 頁）。

<sup>429</sup> 俄羅斯專家估計，到 2006 年，伊朗的核武器和導彈足以對俄羅斯西南兩千萬人構成潛在威脅（Andrew Jack：“Iran missiles a potential threat to 20m Russians”，*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17 日，第 3 頁）。

<sup>430</sup> “郵報：利比亞核源頭是中國”，香港《信報》2004 年 2 月 16 日，第 5 頁。根據亨廷頓說法，中國是巴基斯坦、朝鮮、伊朗、敘利亞多國核

擴散的源頭(附錄一：亨廷頓“黃禍”加“綠禍”的世界大戰)。

- <sup>431</sup>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Tenet)指責馬來西亞替利比亞的核武計劃走私加速器部件，後者當然矢口否認(John Burton：“Malaysia denies role in nuclear smuggling”，*Financial Times* 2004年2月7~8日，第2頁)。
- <sup>432</sup> 2002年，美國人擔心朝鮮在幾個月時間內就可以製造出5~6枚核彈(“北韓數月內可製成5~6枚核彈”，香港《信報》2002年12月24日，第8頁)。2004年，美國情報部門“把北韓擁有核武的數目，由兩枚修改為八枚”(“北韓開口要彩色電視‘救援’”，香港《蘋果日報》2004年4月29日，第A27頁)。
- <sup>433</sup> “以色列政府至今未公開宣佈擁有核武器，也沒有簽署《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但據核不擴散專家分析，以色列已經擁有100~200件核武器。自1987年以來，聯合國大會和國際原子能機構通過了13項決議，要求以色列簽署《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但均遭到以方拒絕”(“巴拉迪促以色列放棄核武”，香港《信報》2003年11月28日，第16頁)。
- <sup>434</sup> 左文華、肖憲：《當代中東國際關係》第325、189頁。早在1969年，卡扎菲派人到中國買核武器。“周恩來總理禮貌地解釋了中國的原子彈是不出售的”(布倫蒂、萊西特：《卡扎菲傳》第90~91頁)。
- <sup>435</sup> 山內昌之：“伊斯蘭極端主義與美國”，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103頁。
- <sup>436</sup> “BBC稱‘基地’在阿富汗製造髒彈”，《參考消息》2002年2月1日，第2頁。“這種炸彈實際上是外殼用放射材料製成的一種小型常規炸彈。用普通的公事包即可以把它從甲地運送到乙地。這種公事包萬一在紐約的什麼地方爆炸，預計要導致高達十萬人的死亡，從而造成‘核恐慌’”(章楊：《美國的戰爭》第125頁)。
- <sup>437</sup> 1999年3月，一名印度籍走私客在孟加拉落網，身上帶著1.8公斤濃縮鈾和350公斤海洛因(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208頁)。2003年6月，一泰國公民因走私30公斤鈾-137而被捕。有消息說，這與泰國北部穆斯林分裂組織以及基地組織有聯繫(Amy Kazmin等：“Thai sting operation foils potential dirty bomb”，*Financial Times* 2003年6月14~15日，第3頁)。
- <sup>438</sup> “美核武器實驗室機密資料失竊”，香港《信報》2004年7月12日，第8頁。

<sup>439</sup> “‘骯髒炸彈’可能襲擊美國”，《參考消息》2004年6月20日，第2頁。

<sup>440</sup> 2003年1月28日，日本政府向國際原子能機構承認，206公斤鈾下落不明。1945年，美國生產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彈祇用了5~8公斤鈾元素（“日206公斤鈾失蹤”，香港《商報》2003年1月30日，第A7頁）。

<sup>441</sup> “因各種看起來是可信的謠報而全體動員約30次”，反恐怖研究中心：《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第77頁。

<sup>442</sup> 2003年，全球“軍費開支已很接近1987年冷戰時的最高水平”（“去年全球軍費開支大幅增長”，《參考消息》2004年6月11日，第5頁）。

<sup>443</sup> 萊克：“核恐怖主義威脅有多遠”，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150頁。

<sup>444</sup> 王菊芳：“歹徒苦練飛行本領，準備撞向核反應堆，911差點兒在加拿大重演”，《北京青年報》2003年8月27日，第150頁。

<sup>445</sup> “早在1969年，歐美研究小組在提交聯合國委員會的一份合撰報告就指出，鎖定方圓一平方公里的軍事行動，如果以傳統武器攻擊需要成本兩千美元；若使用核彈就下降到八百美元，神經毒氣祇要六百美元，如果是生物武器祇要花費一美元！”（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211頁）

<sup>446</sup> “沙林毒氣的製造方式很簡單，成本也比其他生化戰劑低得多。製造140公克沙林毒氣的成本不到50法郎，實驗室的器材設備也祇要投資4~5千法郎就夠了。基本原料可在商業市場取得，不過混合過程需要化學常識”。VX毒氣“毒性比沙林毒氣強十倍，成本同樣很便宜，幾公合(卅)不超過40法郎。祇要在廚房或車庫就可配製，不過同樣也需要一些化學常識才行”（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212、219頁）。

<sup>447</sup> “1999年3月，國防威脅遏制局派了一個小組，動支160萬美元和一些實驗室設備的型錄，開始採購全新和中古設備，在內華達試驗場興建小型細菌工廠。……到了2003年夏天，這個小組已經生產兩磅的模擬炭疽熱病菌。由此證明，恐怖份子或流氓國家祇要掌握必要的專業知識，可以輕易從現成的材料興建一座可製造炭疽熱細菌的工廠”（黑體加重為原文所有：朱蒂·密勒等：《細菌戰》第270~271、255頁）。別的不說，中國人領教過老鼠藥的厲害。中國近年來每年5~7萬人死於鼠藥中毒。廣泛流行的“毒鼠強”——四亞甲基二砷四胺，毒性比氰化物大上百倍。“一公斤原藥成本不會超過一千元。設備很簡單，祇

要一個鐵鍋，一把鐵鏟就可以了”(樓爽：“危情毒鼠強”，《財經》2003年1月20日，第99~100頁)。

<sup>448</sup> 崔國平、郭瑞芳：《21世紀戰爭透析》第18頁。

<sup>449</sup> 馬繼東：《生化武器和秘密戰爭》第108~114頁。生化武器的實際殺傷力取決於散播工具、天氣、風向等多種因素。上述引文單純強調生化武器的理論殺傷力，有聳人聽聞的誇大嫌疑。美國媒體曾經就這個問題專門有過討論(朱蒂·密勒等：《細菌戰》第195~197頁)。儘管如此，生化武器成本極低、後果嚴重的基本判斷不受影響。

<sup>450</sup> 黑體加重為原文所有(朱蒂·密勒等：《細菌戰》第211、213頁)。譬如，蓖麻毒素的毒性是有機磷神經毒劑 VX 的 385 倍，是氯化物的六千倍。有大量消息和證據表明，美、英國家的一些恐怖組織，伊拉克、車臣、格魯吉亞、阿爾及利亞的一些恐怖組織和本·拉登，都在積極研製並嘗試使用蓖麻毒素(王景林：“蓖麻毒素生物恐怖及其醫學防護”，《科技導報》2003年第7期，第35~37頁)。1998年，基地組織在前南斯拉夫購買了三家製造生化武器的工廠，並在阿富汗開辦一家工廠。“他們還招募了烏克蘭生物學家和化學家，並派人到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學習藥物學、醫學和分子生物學”(反恐研究：《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第16~17頁)。“蘇丹在喀土木區建立軍事工業，由本·拉登提供資助，並和俄、中、伊拉克及伊朗的企業合作製造生化武器”(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63頁)。

<sup>451</sup> “約旦粉碎驚天化武襲擊陰謀”，香港《信報》2004年4月28日，第10頁。

<sup>452</sup>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全球趨勢 2015：圍繞未來與非政府專家對話》，周建明、張曙光：《美國安全解讀》第333頁。

<sup>453</sup> 米尼克瀏覽了美國所有對準蘇聯的核彈頭的絕密資料，從容退出，美國軍方居然毫無覺察(崔國平、郭瑞芳：《21世紀戰爭透析》第19頁)。

<sup>454</sup> 喬良、王湘穗：《超限戰》第142頁。

<sup>455</sup> 崔國平、郭瑞芳：《21世紀戰爭透析》第20~21頁。

<sup>456</sup> 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第61頁。2002年10月，設在美國的13個管理互聯網尋址系統的根服務器遭到持續一個小時的“拒絕服務”攻擊。美國聯邦調查局和國土安全辦公室進行了調查，“初步判定這是一起嚴重的網絡恐怖襲擊事件”(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戰略

與安全形勢評估》第 247 頁)。

<sup>457</sup> 喬良、王湘穗：《超限戰》第 44 頁。

<sup>458</sup> 美國國防部：2001《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周建明、張曙光：《美國安全解讀》第 386 頁。

<sup>459</sup> “以美國的邊境管制為例。每年，有 4.75 億人、1.25 億輛車和 2100 萬船貨物從 301 個碼頭的 3700 個通道進入美國。檢查一個滿箱的 40 英尺貨櫃需要五個小時，每年要開箱五百萬次。此外，近年來有 270 多萬非法移民從墨西哥和加拿大進入美國。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恐怖主義份子輕而易舉地潛入了美國”(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第 182~183、60 頁)。

<sup>460</sup> 理查德·克拉克：《反擊一切敵人》第 220~221 頁。

<sup>461</sup> 朱蒂·密勒等：《細菌戰》第 181 頁。

<sup>462</sup> 約瑟夫·奈抱怨說：“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者對現代文化和技術相互作用的反抗，為恐怖主義和不對稱戰爭提供了新的選擇。例如，在策劃對付美國的戰略時，有些中國的中層官員提出了用恐怖主義、走私毒品、環境惡化和傳播電腦病毒的方法。他們認為，這些方法互相配合得越複雜，例如恐怖主義加上宣傳戰再加上金融戰，效果就越好。從那種觀點來看，‘無限制戰爭’就是把中國的經典著作《孫子兵法》與現代軍事技術和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第 91~92 頁)。2003 年，喬良、王湘穗的《超限戰》被翻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封面居然是 9.11 事件中狼煙滾滾的紐約世貿大樓和本·拉登頭像。

<sup>463</sup> 湯因比發問：“我們在技術方面取得的勝利，是否有相應的精神方面的勝利與之相平衡呢？如果沒有，取得這種平衡不正是今後要奮鬥的主要課題嗎？”(《展望 21 世紀》第 298 頁)

<sup>464</sup> Jean Ziegler："Every seven seconds, a child under the age of 10 dies from hunger", 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網址：[www.universalrights.net/people/stories.php?category=equal](http://www.universalrights.net/people/stories.php?category=equal)。

<sup>465</sup> 按七秒鐘餓死一個兒童計算，全世界每天平均餓死 1.2 萬不到十歲的兒童。按每年直接間接因飢餓死亡 3600 萬人計算，平均每天餓死 9.8 萬人(包括成人)。雖然不知道崔國平和郭瑞芳關於 9.11 當天餓死 3.5 萬兒童的數字依據，英國首相布萊爾知道，9.11 事件使這樣一個幻想破

滅：“西方可以過自己的美好生活，無需顧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狀況”（崔國平、郭瑞芳：《21世紀戰爭透析》第46頁）。布萊爾故意不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狀況”與“西方可以過自己的美好生活”之間，有什麼因果聯繫。

<sup>466</sup> 博德里亞爾：“恐怖主義的思想理論”，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57頁。

<sup>467</sup> 在一次對本·拉登採訪中，“問：美國曾說你在製造化學武器並打算購買核武器原料。這些武器的用途又是什麼呢？答：這可是個多重問題。它首先暗示我擁有這些武器，繼而想知道我們會如何利用它們。我祇能說，為捍衛回教世界買武器是一項宗教職責。力求擁有這些武器對付異教徒也是一項宗教職責。如果我真正得到了這些武器，那表示我已完成職責，我要感謝真主的幫助；如果我還在尋求得到它們，那我僅是執行我的職責。對回教徒而言，不設法擁有武器防止異教徒的傷害是罪孽行為。但如果我們有了這些武器，那怎麼用就由不得他人了，得由我們說了算”（曹建、曹軍：《奧薩瑪·本拉登》第235~236頁）。本·拉登說：“我們不認為試圖擁有核子、生物和化學武器是罪惡……我們有權自衛”（彼得·柏根：《本·拉登的聖戰工廠》第114頁）。

<sup>468</sup> “美國及前蘇聯經過十多年的嘗試錯誤，才在1950年代掌握這個秘密。30年後，伊拉克科學家祇花了幾年功夫就能製造數千加侖的炭疽熱和肉毒桿菌。……2001年2月，澳洲科學家宣佈，他們經過1998~1999年的實驗後，已經製成能夠破壞免疫系統的病毒，殺死幾十隻老鼠。科學家起初祇通知政府和軍方這項實驗。經過激烈的辯論之後，他們決定公開所有的發現。其他人也有權知道這種可能會危及人類的研究結果。……流氓國家或恐怖份子一旦掌握這項基因改造技術，那麼新型的天花病毒引起的致命情形，會使得人類的浩劫即將開始。……最後，政府高層決定，鑑於澳洲是盟邦，而且也沒有合理可靠的證據，顯示目前存在有這種外來威脅，鼠痘病毒也不在國防情報局的黑名單上，當前的問題祇是科學進步得太快了。……不過，在科學進步及政治紛擾下，細菌武器的威脅不但千真萬確，而且對我們的衝擊日增。從奧姆真理教的失敗案例可以知道，生物武器攻擊的成功要素不是尖端的實驗室或者有毒的微生物，最重要的是知識。這種專業知識愈來愈容易取得”（朱蒂·密勒等：《細菌戰》第211、271、256~257、270頁）。

## 第八章

# 為什麼人的大是大非

8.1 不患寡而患不均

8.2 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從任何一個社會當權者的立場出發，為了維護不管什麼樣的正常秩序，恐怖主義不能不堅決打擊。然而，面對今天的恐怖主義全球化，就算是美國放棄利用伊斯蘭分裂它國的一貫政策，全力以赴嚴厲打擊，能否遏制恐怖主義的猖狂勢頭，仍然值得懷疑。歷史上，教族合一的猶太教，不擇手段地反抗，曾經在埃及和塞浦路斯兩國慘遭種族滅絕的命運。<sup>469</sup> 伊斯蘭教超民族、超國家、超種族地全球化蔓延，即便實施最殘酷的種族滅絕，根本無從滅起。相反，面對龐大、並且日益越發龐大的穆斯林人口，美國發動“反恐”鬥爭，不致於使越來越多的穆斯林越來越反感得難以忍受，是“反恐”可能反到什麼程度的前提條件。當前的“反恐”戰爭，尚未演化成一場與 12 億人口為敵的“文明衝突”，已經是值得再三慶幸的事情了。

薛爾說：“所有的穆斯林每天在電視上看到美國佔領一個穆斯林國家，並且堅持要用人為的法律取代真主昭示的語言。他們竊取伊拉克的石油，為建立大以色列國家鋪平道路。”難怪，據民意調查，美國在穆斯林國家的聲望跌進了谷底。在穆斯林眼裡，美國就是要主宰穆斯林世界，保護以色列。

美國的政策促使穆斯林世界團結起來反對美國，同時分裂了西方陣營。在美國的反恐盟友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政府和民眾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sup>470</sup>

## 8.1 不患寡而患不均

值得思索的是，穆斯林覆蓋的 12 億人口，並非都是當今世界的貧窮落後。亞洲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達到中等收入水平。海灣國家更是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典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大多數穆斯林不同程度接受了現代教育。<sup>471</sup> 經歷過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實踐，他們具有相對自覺的能力，思考人世間的種種不平。

如今，在阿拉伯半島以外大多數城市裡的富人和未現代化的大眾人口，穿著不同的衣著、吃著不同的食物、按著不同的社會規範在生活。多謝西方的傳播媒介尤其是電影和電視，使得那些無福享有以上事物的大眾，每時每刻都比從前更為瞭解自己和有錢人之間的不同——特別是他們所沒有享用到的那些事物。<sup>472</sup>

薩達姆總結的不一定對：“如果我們回顧阿拉伯的歷史，就會發現，對社會主義的要求大多來自那些並非出身於被壓迫階級的人們。阿拉伯歷史上的社會主義計劃並非總是來自窮人，而是來自那些根本不知道壓迫並且成為窮人領袖的人們。”<sup>473</sup> 阿拉法特估計，1967~1970 年間，巴勒斯坦人死傷三萬。大多數犧牲了的突擊隊員，“既年輕又受過較好的教育。”<sup>474</sup> 專門從事自殺式襲擊的哈馬斯，三萬多成員，“他們主要來自社會中下層，其中許多人是青年，尤其是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但領導人均來自城鎮，且多半出身於中上階層，尤以經商者居多。”<sup>475</sup>

2002 年，美國公佈 9.11 事件的劫機嫌疑犯，大多生活富裕，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包括警察局長的兄弟和部落酋長的兒子）。<sup>476</sup> 他們並非飢寒交迫、目不識丁的“弱勢群體”，單憑那份兒駕駛人飛機的嫺熟技藝，這夥亡命徒完全可以掙一份幾十萬美元年薪的穩定工作，成為令人心羨的中產階級。他們圖什麼？他們視死如歸的心理素質從哪裡來？<sup>477</sup>

多少錢也買不到 9 月 11 日攻擊者所展現的紀律：沒有人吹噓自己的策劃多了不起，以致事機敗露，也沒有人因為微不足道的小罪被捕而遭驅除出境。有位曾經督導數十名探員的中央情報局高層官員，就對這些策劃者的“能耐”佩服不已。<sup>478</sup>

如大多數革命運動一樣，伊斯蘭主義運動的核心成份是學生和知識份子。……一項對埃及伊斯蘭教團體的好戰領導人的研究發現他們有五大特徵，這些看起來也是其他國家伊斯蘭主義者的典型特徵。他們年輕，大多數是 20 和 30 多歲；80% 的人是大學生或研究生；半數以上來自精英院校或來自智力要求最高的技術專業領域，如醫學和工程領域；70% 以上的人來自下層中間階級，即“中等而不貧窮的背景”，是他們家庭中第一代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他們在小城鎮和農村度過童年，但成了大城市的居民。

學生和知識份子組成了伊斯蘭運動中好戰的骨幹和突擊隊，城市中間階級構成了大多數活躍分子。……原教旨主義者在更大程度上屬於中間階級中更“現代”的部分。伊斯蘭積極分子“可能包括受過最好教育的、最聰明的各類年輕人中多得不成比例的數量”，醫生、律師、工程師、科學家、教師和文官。<sup>479</sup>

這些基本特徵，自然令人想起當年世界各國革命黨的骨幹構成。<sup>480</sup> 面對今天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回顧伊斯蘭崛起的歷史，不能不欽佩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分析。正如聖戰研究專家佩佩·埃斯科巴爾所說：

前蘇聯及其東歐帝國解體後，“聖戰”思想開始為伊斯蘭國家的窮人所接受。這些窮人對西方富人發起了階級鬥爭。“聖戰”變成了穆斯林國家窮人手中的一顆熱核炸彈。因此，假如馬克思還在世，他會指出新的階級鬥爭就是伊斯蘭窮人反對西方富人的鬥爭。或許馬克思不會同意這種觀點，因為他提倡不涉及宗教的階級鬥爭。但他會說，這是階級戰爭的一種形式，沒錯。<sup>481</sup>

沒錯，當年的文明衝突，與今天的文明衝突，具有某種相似性。所謂“文明衝突”的背後，是少數人暴富、巨富還是多數人共同富裕的衝突；是唯利是圖與精神文明的衝突；是優待資本、虐待勞工與追求沒有人剝削人、壓迫人之理想社會的衝突；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重蹈資本主義舊路走不通，還是另辟蹊徑，超越資本主義道路的衝突。近年來，受南亞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的嚴峻挑戰，世界第三大宗教——印度教，也原教旨主義復興了。<sup>482</sup> 與伊斯蘭大規模流血衝突激發出來的結論，還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深惡痛詆：

西方的生活方式是享樂的、滿足肉體歡樂的類型。

現世的享樂是西方文明的最高理想。他們的個人自由觀念就在於允許各種情感充分地放縱出來，而對心思不加以控制，

故使人自身這個奴隸變成了本能的獸性。<sup>483</sup>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995 年，座落在美國俄克拉荷馬的聯邦政府大樓被徹底炸毀。這是 9.11 以前，美國本土傷亡最大的一次恐怖襲擊。當時幾乎所有人都異口同聲，肯定是伊斯蘭極端組織幹的。最後逮住的兇手竟是純種白色美國人。臨上電椅，凶手邁克威夫 (Timothy McVeigh) 交代了作案動機：

我選擇炸聯邦大樓，是因為這樣幹比其他方法更符合多種理由。首先，爆炸是一次報復性襲擊——一個反擊，因為在前些年，聯邦特工參與了一系列 (包括但不僅限於韋科) 搜捕以及隨後的暴行和殘害。80 年代以來，聯邦特工組建了諸如聯邦調查局“解救人質”小組這類單位和其他突擊部隊，聯邦的行動變得日益軍國主義和暴力，韋科事件達到頂點……

為了各種企圖和目的，聯邦特工們已經變成了“戰士”(運用軍事訓練、戰術、技術、設備、語言、服裝、組織和理念)，並且這種趨勢還在持續加強。因此，這次爆炸也是對他們在聯邦大樓裡的指揮和控制中心，先發制人的打擊。當這些侵略者從一個運作基地持續發動攻擊，反擊敵人就是(我們的)軍事戰略。另外，針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我決定，通過炸毀政府大樓和大樓裡代表政府的政府雇員，向政府發出一個信息：敵意正在變得越來越強烈。炸 Murrah 聯邦大樓，在道義上和戰略上等同於美國襲擊塞爾維亞、伊拉克或者其他國家的政府大樓。基於對自己政府政策的觀察，我認為這個行為是可以接受的選擇。從這種認知看，發生在俄克拉荷馬城的事件，同美國歷來強加他人頭上的事情沒有什麼不同。最後，我的精神狀

態過去和現在都是冷靜而客觀的。炸 Murrah 大樓，並不比空軍、陸軍、海軍或海軍陸戰隊向(外國)政府設施和人員投放炸彈或發射巡航導彈，具有更多私人性質。<sup>484</sup>

## 8.2 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現代化必須發展市場經濟。祇要發展市場經濟，必然會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城市率先實現現代化。但是，承認這個現實，不等於放棄對公平社會的理想追求。湯因比說過：“沒有相當程度的個人自由和社會正義，人類的社會生活是不可能的。”<sup>485</sup>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真的是千古不易。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原教旨主義復興。犯罪猖獗，恐怖襲擊。祇要繁榮鼎盛，一定雞犬不寧。普遍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少數富人提前超級現代化也不可持續。連佔盡全球化便宜的索羅斯都明白：“市場是非道德的，……然而，社會不能在善惡不分的情況之下運作。……市場已經全球化，但國際政治與社會措施卻沒有顯著強化，造成非常偏頗的社會發展。”<sup>486</sup>

經過割地賠款的苦難歷史，經過文化革命的極端嘗試，經過改革開放的全球經濟一體化，人們越來越清楚看到，實現沒有人剝削人、壓迫人的理想社會，多麼不容易。但是，無論科技多麼發達，生活多麼富裕，到什麼時候，經濟上相對貧困、政治上相對無助的人民，永遠是人類的大多數。祇要多數人沒有共同富裕，人類社會的公平正義沒有大致實現，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好，社會主義陣營崛起也好，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

也好，基督教、印度教原教旨主義復興也好，多數窮人共同富裕的理想追求，永遠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主流。這才是少數人拗不過、擋不住的歷史潮流。

君不見，波瀾壯闊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席捲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加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另一個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加上印度教的原教旨主義復興，加上非洲多數國家的社會主義探索，<sup>487</sup> 加上南美一個又一個國家社會主義傾向的左派掌權，加上日本和南韓、新加坡小龍小虎們的東亞模式，加上歐洲《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sup>488</sup> 加上以色列種種“吃大鍋飯”的社會主義實踐，<sup>489</sup> 從全球範圍看，簡單唯利是圖的美國模式，始終是茕茕孑立的個案孤例。一時間不可一世，反彈回來的是日益廣泛和日益強烈的反美情緒。

極端的宗教勢力不再把蘇聯的共產主義當成主要的敵人。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在這個單極化的世界，這些極端的勢力重新找到了一個共同的仇恨對象和不共戴天之敵：美國。<sup>490</sup>

如日中天，日中則昃。老布什第一次海灣戰爭，乘著冷戰勝利的凱旋西風，為了一個專制腐敗的部落酋長，39國聯軍高舉聯合國大旗，以石擊卵，牛刀殺雞。小布什第二次海灣戰爭，拿美國國防部、世貿雙子星和世界各地一樁樁血肉橫飛的平民慘劇說事，聯合國不愛聽。除了土耳其猜忌美軍利用庫爾德，不僅沒有阿拉伯、穆斯林再趟混水，而且德、法、俄、日個個搖頭，八國聯軍都湊不起來了。仗還沒有開打，上千萬人



全球一體化反戰遊行。轉眼功夫，專制魔頭薩達姆變成了不畏強暴的漢子；人權總統布什的模型肖像被幾乎每一次群眾示威焚燒。軍事上勝之不武，政治上理屈詞窮。前後短短 13 年功夫，美國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全球獨霸，在阿拉伯、在穆斯林、在全世界失道寡助，形影相吊。就說純種白色美國人自己，先有邁克威夫在美國本土爆炸政府大樓，後有林德到阿富汗為塔利班英勇作戰，<sup>469</sup> 更有慘遭恐怖襲擊的紐約、華盛頓居民，強烈抗議美軍去伊拉克“反恐”，萬人空巷，民怨沸騰！

歷史前進的步伐，再次驗證了毛澤東的至理名言：“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sup>492</sup> 是維護、鞏固、強化少數暴發戶的既得利益，還是執政為民，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永遠是歷史前進中最根本的大是大非。

#### 註釋：

<sup>469</sup> 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98 頁。

<sup>470</sup> 趙景倫：“反恐戰爭三年總結”，香港《信報》2004 年 9 月 15 日，第 16 頁。

<sup>471</sup> 譬如，“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1980~1993 年，沙特阿拉伯男性文盲的比例由 70.1%降至 15%，女性文盲則由 97.9%降為 25%（仲躋昆：《阿拉伯：1002 夜》第 217 頁）。

<sup>472</sup> 路易斯：《中東：激蕩在輝煌的歷史中》第 509 頁。

<sup>473</sup> 馬塔爾：《薩達姆·侯賽因》第 181~182 頁。

<sup>474</sup> 布倫蒂、萊西特：《卡扎非傳》第 93~94 頁。

<sup>475</sup> 張銘：《現代伊斯蘭復興運動》第 172 頁。

- <sup>476</sup> “美國最新資料：9.11劫機犯大多出自沙特豪門”，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1/10/30/n145508.htm>。
- <sup>477</sup> 超級富豪本·拉登，生活極其儉樸，在巴基斯坦時、在阿富汗時、在蘇丹時，“屋裡什麼也沒有，人人席地而眠”（彼得·柏根：《本·拉登的聖戰工廠》第106頁）。
- <sup>478</sup> 彼得·柏根：《本·拉登的聖戰工廠》第138頁。
- <sup>479</sup>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14~115頁。
- <sup>480</sup> “埃及大學的學生會大多為伊斯蘭主義份子所控制，它同清真寺成為宣講反當局、反社會的講壇一樣，學生會組織成為伊斯蘭主義者活動的外圍組織”（金宜久、吳雲貴：《伊斯蘭與國際熱點》第164頁）。
- <sup>481</sup> 佩佩·埃斯科巴爾：“是恐怖主義還是‘聖戰’”，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111~112頁）。
- <sup>482</sup> 2000年，全世界宗教徒51.37億，佔總人口60.55億的84.8%。其中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東正教）19.99億，穆斯林11.88億，印度教徒8.11億，佛教徒3.59億。四大宗教佔當時信教總人數的88%（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叢焦》第4~5頁）。
- <sup>483</sup> 印度教原教旨主義宗師戈爾瓦卡爾如是說。“戈爾瓦卡爾強調，重建印度的關鍵，在於復興印度教的古代傳統，建設一個強大的印度教國家”（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叢焦》第505頁）。
- <sup>484</sup> Gore Vidal：《為永遠和平永遠戰爭》第108~110頁。當時美國輿論大嘩，眾多媒體認為這人肯定是精神病。經醫生反復診斷，法庭最後裁決兇手神志清醒，必須承擔法律責任，2001年判處死刑執行。
- <sup>485</sup> 湯因比：《歷史研究》下冊，第414頁。
- <sup>486</sup> 索羅斯：《索羅斯論全球化》第5頁。
- <sup>487</sup> “在50多個非洲國家中，曾由各類社會主義政黨先後執政過的有42個，目前仍由這類政黨繼續執政的有20多個；此外，還有一大批尚未執政的共產黨和其他類型社會主義政黨，在國內政治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可以說，非洲社會主義是當代非洲以至當代世界重大變化的一個重要標誌”（藍瑛：《非洲社會主義小詞典》第3頁）。
- <sup>488</sup> 法國原計劃署署長阿爾貝爾提出，冷戰結束之後，德國、日本萊茵模式的資本主義，與美國模式的資本主義展開競爭。前者強調集體主

義，後者強調個人主義（阿爾貝爾：《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英國的吉登斯，號稱布萊爾首相的智囊，強調冷戰結束之後，歐洲社會民主黨人應當繼續堅持既非美國式資本主義，又非蘇聯式社會主義之“第三條道路”的探索（吉登斯：《第三條道路》）。

<sup>489</sup> 1948~1977年，“以色列的公有制經濟成份一直佔國民經濟的60%以上，到80年代以後仍佔50%左右”（肖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第294頁）。“以色列宣告成立的當天，本·古里安就宣佈了立國的三個原則：猶太復國主義加社會主義加平等主義。他們想建立的是‘一個實現社會主義的猶太國家，自稱是一個實現‘猶太社會主義’的國家’。以色列始終生存在戰爭環境中，分散的農村居民需要守望相助，加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普遍實行集體農莊制度——基布茲。”基布茲過的完全是一種公社式的大家庭生活，土地、財產完全歸農莊所有，每一個成員都同工同酬，其大政方針由全體人員通過民主程序決定。基布茲所有成員都在集體食堂吃飯，內部不使用錢，成員的一切所需採用記帳方式，社員也沒有任何工資，每個月祇領取少量的零用錢供外出度假之用。此外，基布茲成員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甚至子女教育、文化娛樂等全部由基布茲統包下來，倘若單從這點上看，基布茲可以算是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賀雄飛：《猶太人之迷》第339~340、333頁）。以色列農村組織的另一種形式是莫沙夫：土地國有，家庭經營，在購銷和提供公共勞務方面集體合作，包括組織種子、化肥、飼料的購買，產品銷售，農機、車輛管理，教育、醫療服務。以色列有270多個基布茲和450個莫沙夫。大的基布茲有兩千多人，小的祇有100~200多人，共12萬人。莫沙夫平均規模60戶左右，共17萬人。在這樣集體經濟的基礎上，以色列創造了高投入、高科技和高效應的“三高農業”，建設起一座“沙漠中的花園”。基布茲佔全國耕地的35%，生產了全國農業產值的40%，小麥的50%，牛肉的55.4%，棉花的80.4%和工業產值的7%（孫正達等：《以色列國》第197~204頁）。近10~20年來，全國270多個基布茲，沒有隨人口增加而增加。“現在，很多基布茲基本上已成了一種完全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營的農、工、商、貿的綜合企業。……過去大家穿一樣的衣服，住一樣的房子，共同在公共食堂一起吃飯，孩子從小在幼稚園生活的做法已逐漸被小家庭生活所取代。……同一個基布茲內也出現了貧富差別”（肖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第298~299頁）。

<sup>490</sup> “美國國務院反恐怖主義小組的報告稱，20 世紀 90 年代世界範圍的恐怖主義活動中有 40% 是針對美國人及其設施的”（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叢焦》第 100 頁）。

<sup>491</sup> 20 歲的美國白人林德出生在華盛頓一個傳統天主教家庭。16 歲時，他讀了美國“伊斯蘭國”運動領導人馬爾科姆·X 的書，改信了伊斯蘭，改名阿卜杜勒·哈米德。“他的鄰居說，林德是一個好心又為他人著想的人。”2001 年 12 月，林德在阿富汗北方城市馬扎里沙里夫附近的一個要窩，作戰受傷被俘。他加入塔利班並參加戰鬥，是為了建立“純粹的伊斯蘭國家”。“據報道，塔利班士兵中有三名美國人”（BBC Chinese.com 2001 年 12 月 5 日，網址：[http://news.bbc.co.uk/1/hi/chinese/news/newsid\\_1693000/1693551.stm](http://news.bbc.co.uk/1/hi/chinese/news/newsid_1693000/1693551.stm)）。

<sup>492</sup>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 814 頁。



## 第九章

### ● 重新設計烏瑪<sup>493</sup>

9.1 什麼文明的衝突？

9.2 重新設計烏瑪

9.3 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

9.4 左右為難的困境



創建伊斯蘭教的阿拉伯民族，在人類文明歷史上，有過登峰造極的輝煌。與猶太教相比，教族合一的胸襟局限一目了然。<sup>494</sup>摩西帶領信徒走出埃及，半路上撒手而去，找不著北的猶太人滿世界流竄了幾千年。<sup>495</sup>與基督教相比，剛剛開始佈道，耶穌就被釘上十字架，徒子徒孫遭受連續幾百年的殘酷迫害。<sup>496</sup>要不是羅馬皇帝出於政治目的皈依天主，恩賜種種特權，教徒們祇能擱了左臉送右臉，整個一副受苦受難的可憐像。唯獨伊斯蘭，宗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宗教。不分階級，不論種族，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從一個小小的烏托邦社團，到強大國家，到龐大帝國，打遍天下無敵手，融合各色人等，包容諸多文明，版圖超過極盛時期的羅馬帝國。<sup>497</sup>——“幾乎佔領了西方社會原有領土的一半，祇差沒有使自己成為社會的主人。”<sup>498</sup>

## 9.1 什麼文明的衝突？

伊斯蘭帝國的強大，不僅僅表現在軍事征服上。思想文化上的博大胸襟，社會組織的凝聚力，政治制度的實用性，使不僅伊斯蘭教而且阿拉伯語和阿拉伯文化，甚至在帝國瓦解之後，通過包括蒙古人在內的一個又一個征服者的皈依，更加廣泛地傳播開來。

應當認為這樣一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即伊斯蘭教祇是憑藉聖戰強加於各民族的。……相反，在許多地方，居民們把征服者當作解放者來迎接。因為征服者加於異教徒和外部落



圖-5：7~9世紀的阿拉伯帝國



的賦稅一般比伊朗和拜占廷帝國的居民受本國壓迫者的盤剝還要輕些。<sup>499</sup>

穆斯林並未要求猶太教徒或基督徒皈依伊斯蘭教，而是允許他們在伊斯蘭政權下享受宗教自由，其後祆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與錫克教徒也都被視為“有經書的子民”。對穆斯林而言，與異教徒和平共存向來不是問題，基督徒和猶太教徒安然生活在伊斯蘭政權下有數百年之久，但是穆斯林和猶太教徒在篤信基督教的西歐世界卻幾乎毫無容身之處。<sup>500</sup>

在伊斯蘭崛起的中世紀，歐洲陷入教會統治的黑暗時代。是阿拉伯人翻譯、繼承和發揚了希臘、波斯的科學文化，創造了小數點、微積分、代數、解析幾何和誰也離不開的（印度傳來）阿拉伯數字。<sup>501</sup> 後來歐洲的文藝復興，西方文明奠基人的著作，包括亞里士多德、柏拉圖、歐幾里德、托勒密、阿基米德、蓋倫、希波克拉底，全是從阿拉伯文再翻譯回去的。<sup>502</sup> 通過阿拉伯流傳到西方的東方科學技術（包括中國的四大發明），更是數不勝數。<sup>503</sup> 伏爾泰講話：

繼羅馬帝國衰落、分裂以後，在我們所處的野蠻無知時代裡，我們的一切——天文學、化學、醫學，特別是比從希臘人和羅馬人那裡得知的更為溫和、更為有益身體的藥物，幾乎都是來自阿拉伯人。代數是阿拉伯人的發明，甚至我們的算術，也是由他們傳來的。……在訶倫統治時期，原來已經採用印度數目字的阿拉伯人把這些數字傳到了歐洲。在德國和法國，我們祇是使用了阿拉伯人的方法才認識日月星辰的運行。Almanach（歷書）一詞，就是另一個證據。……化學和醫學是由

阿拉伯人創立的。我們今天發展完善了化學，但化學原來是由他們傳授給我們的。……代數是阿拉伯人的一個發明。……總之，西方基督徒肯定從穆罕默德的第二個世紀開始，就拜穆斯林為師了。<sup>504</sup>

從八世紀中到13世紀初，伊斯蘭執人類文明進步之牛耳，長達四個多世紀。庫特卜講話：“當整個歐洲還在中世紀精神的黑暗深淵中摸索的時候，偉大的伊斯蘭教的光輝已照亮全球”。<sup>505</sup>

這般燦爛輝煌的伊斯蘭文明，與猶太教、基督教同宗同源，共奉一神，一脈相承。<sup>506</sup>原本應當比誰都更容易與猶大和基督溝通，怎麼忽然成了和整個人類文明過不去的“綠禍”？原教旨主義自然而然地邏輯理解是，不僅阿拉伯民族，而且整個穆斯林世界，之所以從昔日的輝煌一落千丈，貧窮落後，愚昧孱弱，任人瓜剖豆分，飽受凌辱奴役，歸根結底，是因為“五色令人目盲”——被五顏六色的各種西方現代化理論所干擾，就像當年被五顏六色的多神偶像所迷惑一樣。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地照貓畫虎，效顰學步，歧路亡羊。穆斯林的新生，祇能靠伊斯蘭復興。<sup>507</sup>當年不是也有兩大帝國持兩大主義（基督教和祆教）在中東爭霸？祇要真正遵循聖賢原著努力實踐，再造一個理想社會——“英特那雄耐爾”就一定能實現！

我們今天作為穆斯林所處的位置和立場，和早期的穆斯林沒有什麼不同。當時他們祇有一小批人，卻敢於同世界上最傲慢的、最強大的國家鬥爭。左邊是羅馬帝國，右邊是波斯王國。這兩個大國的人力、物力、戰術、軍事科學、政治要素，都比穆斯

林強大得多。但是，奇蹟出現了。這一小批穆斯林竟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內，打敗了凱撒和科斯羅。他們奪得了從印度洋到大西洋之間的大片領土。這個奇蹟是怎麼發生的呢？

歷史上沒有一種唯物主義的理論，能夠恰如其分的解釋這一奇蹟，祇有一件事可以闡明其中的奧秘，那就是宗教信仰。……正是這種信仰，幫助了早期的穆斯林。對現代的穆斯林來說，這種信仰仍然是他們可以得到幫助的唯一力量。<sup>508</sup>

## 9.2 重新設計烏瑪

令人遺憾的是，從瓦哈比原教旨主義與沙特合夥，武力統一阿拉伯半島開始，持續奮鬥了兩個多世紀，橫掃美帝蘇修的奇蹟，至今沒有實現。<sup>509</sup> 固然，原教旨主義復興屢敗屢戰，屢踏屢起，越多越打，越打越多，堪稱奇蹟。<sup>510</sup> 但是，人們期待的理想社會，輪廓始終未見分明。在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中，民族統一和現代化，兩個方面的挑戰交織在一起。儘管阿拉伯民族的統一，是所有各國、各派和廣大人民的共同心願，但是，通過什麼道路實現伊斯蘭的現代化，始終是沒有解決的根本性難題。

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人曾經立志在 22 個國家奪取政權，走社會主義道路，一舉解決民族統一和現代化兩道難題。納賽爾雙手揮舞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面大纛，幾乎風靡整個阿拉伯世界。然而，巨大的石油利益人為分割，美帝蘇修爭霸插手，使這個邏輯上成立的理想，在實踐中步履維艱。伊朗原教旨主

義革命成功，像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伊斯蘭復興帶來新的曙光。<sup>311</sup> 霍梅尼心潮澎湃，豪情滿懷，號召“推翻伊斯蘭世界的一切貪污腐敗和專制的政權”。<sup>312</sup> “輸出革命”還沒來得及真正起步，就被美帝攪和的兩伊戰爭打的焦頭爛額，精疲力盡。伊朗恢復伊斯蘭教法治國，處處面臨與現代化接軌的難題，跋前踖後，捉襟見肘，不得不重新改革開放。從四次中東戰爭，阿拉伯國家同仇敵愾，與美國斷交，實行石油禁運，<sup>313</sup> 到埃及與以色列單獨媾和，約旦驅除巴勒斯坦游擊隊，埃及火拼利比亞，兩伊戰爭，黎巴嫩內戰，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參加老布什的海灣戰爭，今天小布什再打伊拉克，OPEC 主動保證石油供應，……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既得利益，日積月累，沉澱成難以改變的既成事實。阿拉伯民族被“可笑的邊界線”分割得貌似而神離，被美帝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打擊和威懾得哭笑不得。伊斯蘭復興的康莊大道越走越窄，逼上一條恐怖主義的崎嶇山徑，黑燈瞎火，撲朔迷離。

復興往日輝煌的夢想，在一部分堅定信仰的人群中，越來越極端地集中體現在三個關鍵性概念上：“烏瑪”、“遷徙”和“聖戰”。<sup>314</sup> 歷史上，穆罕默德帶領一夥信徒，從麥加遷徙到麥地那，建立烏托邦式的共同體，通過持續不斷地聖戰，實現從社團到國家、到帝國的豐功偉業。這段歷史經典，成為原教旨主義極端的最後激勵。不僅奪取政權可以探索現代化道路，而且少數志同道合的兄弟湊在一起，通過“遷徙”——借用民族、宗教的理由，脫離現存腐敗社會，也可以建立“烏瑪”——教政軍民學的共同體，展開聖戰，由小到大，以弱勝強。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阿拉伯紀元就是從“遷徙”開始的。“麥地那”的意思是“那座城鎮”，原本不是什麼特定的地址。<sup>515</sup>

這種宗教信念，一方面，在理論上，為原教旨主義的分散探索，開拓了無限廣闊的實踐空間。鼓舞任何堅理想的人群，在宗教的旗幟下組織起來，在任何地方展開烏瑪、遷徙和聖戰的實踐。從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派生出來的伊斯蘭解放黨，<sup>516</sup> 流落歐洲，居然提議在英國組建一個伊斯蘭國家。<sup>517</sup> 說笑話了罷？30年代發軔於美國底特律貧民窟的黑人“伊斯蘭國”運動，從互助自救到武裝暴動，60年代末，與黑人人權運動裹在一起，演變成一場持續不斷波及全國的大規模騷亂。<sup>518</sup> 在非洲、南美、南亞、東南亞、中亞等貧富懸殊，民族、宗教和邊界矛盾衝突嚴重的發展中國家，穆斯林自然更有充分理由和各種機會揭竿而起。這樣的宗教信念，無異於向世界所有現存穩定秩序提出挑戰。無論是什麼現行體制，祇要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誰都可以烏瑪、遷徙加聖戰地折騰。不僅海灣國家的王權專制不能容忍，埃及的資本主義、利比亞的社會主義都有毛病。不僅薩達特死有餘辜，連阿拉法特與以色列和談，也是罪該萬死的投降主義。<sup>519</sup>

另一方面，這樣極端化的宗教信念，為伊斯蘭復興運動的分裂，開拓了無限廣闊的實踐空間。伊斯蘭原著畢竟產生在多年以前。禁賭、禁娼、禁酒、禁銀行利息，窖藏金銀的炮烙之刑，偷東西砍手，通姦用亂石砸死，一夫多妻，男人蓄須，女人蒙面，一天五次的禮拜，不吃不喝的齋月，種種教規、禮儀、法律、風俗，處處面臨如何跨越1400年歷史進程的現代化

挑戰。<sup>520</sup> 卡扎菲英姿颯爽，帶領女兵衛隊招搖過市一輩子，<sup>521</sup> 婦女解放的歷史任務，繼續任重而道遠。<sup>522</sup> 已經進入 21 世紀了，諸多穆斯林國家還在流行令人髮指的女性“割禮”陋俗。<sup>523</sup> 換言之，從宗教禮儀到生產交換，從男女平等到國體政體，方方面面的現代化，具有極其豐富的探索內容，同時也是產生歧見的肥沃土壤。缺乏整體框架的籠罩，各類事務不同觀點的分歧，沒有需要必須服從的大局，自然犯不上輕易妥協。誰都可以在任何地方盡情探索，誰都有權根據自己對教義的理解獨樹一幟，烏瑪、遷徙加聖戰。激進激發更激進，極端刺激更極端。即便是伊朗的原教旨主義革命，仍然有比霍梅尼更激進的反對派，被霍梅尼政府殘酷鎮壓。<sup>524</sup> 阿富汗十年抗蘇聖戰勝利，終於伊斯蘭法治國了，聖戰後代組成的塔利班“學生軍”，以更激進極端的姿態，從軍閥混戰中異軍突起；奪取政權之後掉頭準備與伊朗開戰！<sup>525</sup> 1976 年，菲律賓成立摩洛民族解放陣線，為獨立伊斯蘭國家而奮鬥；1978 年，分裂出更極端的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1991 年，再從中分裂出更更極端的阿布·沙耶夫游擊隊。<sup>526</sup> 這種缺乏理論框架的自由境界，使伊斯蘭復興運動在內部四分五裂；在外部成為帝國主義顛覆、分裂別國的有力工具。<sup>527</sup> 穆斯林國家和伊斯蘭國際組織根據不同利益和好惡，四處插手各地宗教組織的傳教、顛覆、分裂和暴力活動。穆斯林國家之間，伊斯蘭國際組織之間，伊斯蘭各教派之間，諸多極端激進組織之間，勾心鬥角，黨同伐異，更使這剪不斷、理還亂的錯綜複雜亂上添亂。<sup>528</sup>

### 9.3 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

展望未來，前景不容樂觀。今天所謂“文明的衝突”，一頭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運動在全球各地狼煙四起，烽火連天。不僅在埃及、在伊朗、在蘇丹、<sup>529</sup> 在阿爾及利亞，而且在沙特阿拉伯、<sup>530</sup> 在巴勒斯坦、<sup>531</sup> 在約旦、<sup>532</sup> 在黎巴嫩、<sup>533</sup> 在敘利亞、<sup>534</sup> 在海灣國家、<sup>535</sup> 在利比亞、<sup>536</sup> 在摩洛哥、<sup>537</sup> 在突尼斯、<sup>538</sup> 在阿富汗、<sup>539</sup> 在中亞、<sup>540</sup> 在南亞、<sup>541</sup> 在東南亞、<sup>542</sup> 在黑非洲、<sup>543</sup> 甚至在最早步入現代化進程，經濟、政治、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上最接近西方的土耳其，原教旨主義也已經奪取過政權了。<sup>544</sup> 可以說，在所有穆斯林國家和穆斯林人群中，越來越激烈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運動波瀾壯闊，無一例外。

另一頭是美國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針鋒相對，新保守主義一意孤行。9.11 事件吃了大虧，美國政府提倡先發制人，先飛機狂轟濫炸，後出兵軍事佔領。<sup>545</sup> 這樣一條道走到黑，恐怕又是事與願違，引火燒身，把原教旨主義的馬蜂窩越捅越大，把伊斯蘭復興之路越炸越窄，迫使極端份子反抗的途徑和手段越來越極端。

譬如，長達十多年的經濟制裁，伊拉克人民水深火熱。<sup>546</sup> 美國打下伊拉克，除非放棄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拿伊拉克人民當成美國公民，大把金錢投入，否則，不管扶持出什麼德行的新政權，都捂不住伊拉克的原教旨主義勃然崛起。歷史的諷刺是，美軍勞師糜餉推翻薩達姆專制，希圖按美式民主重建，眼看是白忙活一場，成了替原教旨主義復興做嫁衣裳。伊拉克



的伊斯蘭復興，早就是擋不住的大勢所趨。<sup>547</sup> 伊拉克 60% 的居民，與伊朗大多數居民一樣，是更具獻身精神的穆斯林什葉派，長期被薩達姆屬於的少數遜尼派所壓制。美軍推翻了薩達姆，多數原教旨主義什葉派，在伊朗政府的支持下捲土重來。<sup>548</sup> 美國解放科威特時，曾經煽動北部庫爾德人和南部什葉派揭竿而起。<sup>549</sup> 2003 年 7 月初，什葉派宗教領袖發出反抗外國軍隊的聖戰威脅。<sup>550</sup> 10 月底，美軍佔領伊拉克之後的死亡人數，就超過了推翻薩達姆的正規戰爭。<sup>551</sup> 2004 年，什葉派原教旨主義和遜尼派穆斯林反抗聯軍佔領的聖戰，在全國各地全面展開。到了 9 月，根據美國國防部的統計數據，美軍死亡人數突破千人，其中祇有 141 人是布什宣佈戰爭勝利以前喪生的。美軍“交權”以後的 8 月裡，美軍每天遭受襲擊 87 次。<sup>552</sup> 面對伊拉克反美的人民戰爭，亨廷頓追悔莫及，痛心疾首：

打這場戰爭的主意太糟糕了。美國人進入伊拉克，發生的是兩場戰爭：第一場是針對侯賽因、針對其政權和軍隊的戰爭。這場戰爭用一個半月就可以打贏。第二場戰爭將是一場針對伊拉克人民的戰爭。這場戰爭在侯賽因獨裁統治垮臺後就開始了，隨著伊拉克遜尼派穆斯林在費盧傑的反抗，戰爭爆發了。在這場戰爭，美國是永遠也打不贏的。<sup>553</sup>

同樣的道理幾乎適用於所有穆斯林國家。有了兩極分化、腐敗蔓延和信仰危機的全球化背景，幾乎每個發展中國家，政權勉強穩定的下面，家家都“是表面下悶燒已久的極度緊張與怨恨”，<sup>554</sup> 眼看捂不住的乾柴烈火。這些政權越來越不夠親近美

國，本是自家內部政治暗流洶湧、社會躁動不安的結果。沙特、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埃及、也門、阿爾及利亞、突尼斯、摩洛哥、土耳其、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揭開哪個蓋子，衝出來的恐怕都是原教旨主義復興。

美國人一直對 1979 年伊朗國王倒臺、反美神權政權上臺感到痛心，許多美國官員也擔心這一幕會在海灣對面的沙特重演。正是這種擔心，使得布什政府內的一些官員（包括切尼）決定發動伊拉克戰爭。他們相信推翻薩達姆後，美國可以找到另一個可靠的石油供應源，從而減少對沙特的依賴。……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對伊拉克的入侵，不僅使美國在沙特的支持減少了，而且沙特家族在國內的支持也下降了。<sup>555</sup>

如今，美國手握伊拉克石油的籠頭開關，祭起恢復經濟的法器，限產保價的 OPEC 壽終正寢（除了委內瑞拉，成員全是穆斯林國家）。<sup>556</sup> 沙特不可替代的盟友地位一去不返。<sup>557</sup> 9.11 事件 19 名嫌疑犯 15 位沙特人，原本是本·拉登處心積慮孝敬國王陛下的厚禮。<sup>558</sup> 海灣國家的君主政體、腐敗奢靡和親美政策，違背伊斯蘭教義，一直是阿拉伯人民詬病的眾矢之的。<sup>559</sup> 美軍撤出沙特，<sup>560</sup> 美沙關係持續微妙惡化，<sup>561</sup> 伊朗支持、本·拉登參與的沙特原教旨主義復興噴薄欲出。<sup>562</sup> 沙特穩不住陣腳，海灣小國的骨牌效應指日可待。海灣六國風雨飄搖，直接威脅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存在，勢必迫使美國進一步《為石油而戰》。<sup>563</sup> 接下來再接再厲誰？敘利亞、伊朗、<sup>564</sup> 蘇丹、也門、利比亞、巴基斯坦？

直到現在，本·拉登在巴基斯坦還是頗受歡迎的偶像。在巴基斯坦的一些清真寺和伊斯蘭學校，人們被灌輸著對美國人和其他非穆斯林的仇恨，和阿富汗交界的地區也不在巴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因此這些地區也依舊是塔利班和基地成員的底護所。……這樣的國家可能會成為本·拉登理想中的國度：被一群激進份子控制的伊斯蘭國家，許多人支持原教旨主義和恐怖主義，而且還擁有核武器。這樣的國家，可能會在和印度的仇恨戰爭中使用核武器，也可能把核武器提供給恐怖份子。<sup>565</sup>

美國軍力天下無敵，想打誰打誰。天上、地下、海洋、太空，外科手術式的精確打擊，明察秋毫，雷霆萬鈞！消滅塔利班，奧爾瑪沒找著；摧毀基地組織，本·拉登沒找著。按照擒賊先擒王的“斬首”願望，這後面的故事全沒完呢。<sup>566</sup>即便是軍事佔領伊拉克，費盡千辛萬苦，最後總算抓住了薩達姆，人民歡慶解放的錄像播了一遍又一遍，反美戰爭不僅沒有平息，反而比推翻薩達姆的正規戰爭更加廣泛、更加慘烈、更加不屈不撓、更加沒完沒了。<sup>567</sup>如今的巴基斯坦，早就是堅定不移的原教旨主義，<sup>568</sup>不僅是阿富汗塔利班的大哥大，<sup>569</sup>而且是朝鮮發展核武器的技術來源。<sup>570</sup>美國一直盯著想把她加進“邪惡國家”的黑名單。<sup>571</sup>1998年，巴基斯坦成功試爆原子彈。2003年，美國外交智囊給她加冕成“極端主義加核武國家”，懷疑巴基斯坦的核科學家與本·拉登密切過從來往。“布什政府中有人公開質疑美國是否應該繼續容忍巴基斯坦”。<sup>572</sup>巴基斯坦的原子彈，固然一時半會兒夠不著美國。“穆斯林核大國”這個新概念，不祥地預示出文明衝突下去的極端後果。<sup>573</sup>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

走上唯利是圖的不歸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寧要伊斯蘭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長風怒捲高浪。W·布什和本·拉登兩個方向背道而馳地極端激進，讓人不能不擔心，在 21 世紀，人類究竟要為不能沒有的社會進步付出多大的代價？<sup>574</sup>

在我們正在步入的世界歷史篇章裡，技術的不斷發展仿佛使我們的痛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強烈，使我們的罪產生更具破壞性的實際後果。這將是一個經受考驗的時代；我們如果明智，就應等待它的最後判決。<sup>575</sup>

2004 年，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發表暢銷書，“出版 10 天狂銷 50 萬”。最後結論部分，克拉克給出三年時間後的現實前景：

到 2007 年美國將面臨這樣的局面：擁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被一個類似塔利班一樣的政權控制，並且操縱著與之相類似的阿富汗衛星國，在全世界範圍內推廣類似基地組織的意識形態和恐怖活動；在海灣，擁有核武器的伊朗已經被伊朗式的真主黨意識形態所把持，而沙特家族在沙特阿拉伯倒臺後，這個國家建立起了 14 世紀式的瓦哈比神權政治。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即使在伊拉克建立了一個傑斐遜式民主的現代國家，美國和世界也不會有什麼安全，況且從 2004 年前幾個月的形勢來看，塑造伊拉克的將是宗教領袖阿亞圖拉·西思塔尼的什葉派宗教思想，而不是傑斐遜的民主思想。<sup>576</sup>

## 9.4 左右為難的困境

值得些許借慰的是，《科技屬於人民》。<sup>577</sup> 隨著知識的普及，特別是信息化的發展，尤其是在西方國家，正在發生“父親的伊斯蘭教向兒子的伊斯蘭教的轉變”，即所謂“伊斯蘭昇遷”。越來越多有文化的年輕人，超越清真寺的封閉局限，通過現代傳媒學習伊斯蘭教義，同時瞭解、比較各派學說，得出自己的獨立判斷。

傳統宗教學者們日益發現青年人正越來越多繞過他們而自行尋求宗教知識。……在年輕一代穆斯林看來，各種宗教學派之間的派系衝突及分歧是他們父輩的所信奉的伊斯蘭教的陰暗面。許多年輕的穆斯林將這種民族——神學的爭論視為是毫無意義和浪費時間，而且祇會製造異見。1989年，曼徹斯特清真寺成立時公開提出“為年輕一代提供純正的伊斯蘭教——沒有教派色彩的伊斯蘭教”。……更重要的是，人們不再注意日常的祈禱或伊斯蘭儀式中身體姿勢正確與否。他們現在關心的是穆斯林屬性的認同以及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的關係。

今日青年穆斯林追求的伊斯蘭應能解決現代西方社會困境和日常生活問題。……在美國甚至出現選舉產生宗教領袖的現象。……隨著流散穆斯林的領導權從老一代傳到年輕一代人手裡，所有跡象都表明，年輕一代穆斯林中將出現更強的團結意識。……而且他們相信，大多數激進和革新的伊斯蘭理念將從西方的穆斯林中產生。<sup>578</sup>

人們寄希望烏托邦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講話：“廢

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真正有希望的，恐怕還是穆斯林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理論聯繫實際的艱難探索。

接替薩達特的穆巴拉克，兩手都要硬。一頭嚴懲暗殺薩達特的兇手，逮捕嫌疑 2500 人，收繳武器 1.25 萬件。<sup>579</sup>一頭逮捕法辦薩達特親戚為首的五百多起經濟案件的案犯，關閉 18 家從事外匯投機的銀行，沒收上千名富商的非法所得，<sup>580</sup>大力清理前任政府的嚴重腐敗，釋放被薩達特逮捕的絕大部分人士，廢除限制群眾罷工和集會自由的法令。<sup>581</sup>針對納賽爾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和薩達特“大開大放型經濟”，穆巴拉克“擴大國營企業經濟管理權，使之享有國家給私營企業的一切優惠；鼓勵私人資本向生產部門投資；調整出口政策，使進出口合理化；鼓勵墾荒，提高農產品收購價；緊縮國家機關開支，削減物價補貼，整頓自由區，打擊非法投機商；發起反對鋪張浪費和營私舞弊運動，懲治經濟犯罪活動。”80 年代期間，“埃及的伊斯蘭運動一度趨於平緩。”<sup>582</sup>

然而，兩手都要硬，兩頭都得罪，裡外不是人，堅持下去談何容易。1993 年，外債的壓力，迫使埃及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方案徹底改革，包括國有企業私有化和開放金融市場。<sup>583</sup>伊斯蘭復興運動再度活躍起來，重新“對埃及政府構成嚴峻挑戰”。<sup>584</sup>1992 年，當局頒佈《反恐怖法》，明文規定“凡參加恐怖組織者，一律處以死刑”。<sup>585</sup>嚴刑峻法之後，“穆巴拉克總統遇到了埃及十年中最嚴重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暴力活動。”<sup>586</sup>

伊朗革命奪取政權，沒收國王、王公貴族和貪官污吏的財

產，把 27 家私人銀行和 16 家合資保險國有化，接著，把鋼鐵、冶金、化學、造船、飛機製造、汽車、礦山、外貿和與前王朝有特殊關係的 53 家企業國有化。<sup>587</sup> 國家政權全面伊斯蘭化，社會生活全面伊斯蘭化。恢復一夫多妻，女子結婚最低年齡從 16 歲降到 13 歲。全面實行兩性隔離之大防，不僅男女授受不親，而且男女不得同校，不得混集，不得同行，不得為對方理髮，男女混合雙打的體育比賽全部取消，還不得觀看異性的體育比賽。男人不許穿短袖衫，把婦女戴面紗作為政治行為加以推行，當局專門為女學生設計了帶頭罩的校服。偷東西砍手，通姦者亂石砸死。賣淫、吸毒、賭博、飲酒一掃而光。妓院、舞廳、賭場、酒吧、美容、夜總會統統關張。<sup>588</sup> 下棋、打撲克、跳舞、女人唱歌、老百姓聽音樂全面禁止。<sup>589</sup> 除了伊斯蘭音樂和革命軍樂，電視臺禁止廣播音樂。類似政策適用電影、戲劇、舞蹈、繪畫、雕刻、攝影等。1200 多種報刊中 800 多種被禁。剩下與政府有聯繫的 60 餘種，46 種免費分發。<sup>590</sup> 這樣極端革命的倒行逆施，與現代化接不上軌，造成神職政工幹部與實際運行部門激烈摩擦，大批專家和知識份子四處逃亡，百姓日常生活處處不便。<sup>591</sup> 八年兩伊戰爭，伊朗元氣大傷，狂熱浪漫的革命理想不得不向現實低頭妥協，重新轉入改革開放。特別是霍梅尼死後，伊朗政府全面改善對外關係，改革進出口制度，放開工農產品價格管制，國有企業私有化，發展私營經濟，建立自由貿易區，吸引外資。早在霍梅尼在世期間，下棋、打撲克、聽音樂，電視臺開播娛樂節目，電影裡女角色不戴面紗等等，逐一得到允許。如今，伊朗重新成為世界

電影生產大國。<sup>592</sup>

然而，伊朗一直在美國的黑名單裡名列榜首。伊朗執意發展核武器，原教旨主義向伊拉克兇猛滲透，繼續到處“輸出革命”，招來美國越來越大的政治、經濟和輿論壓力，引發國內保守派和激進派兩個對立方向的強烈反彈，重新改革開放的政府，重新陷入左右為難。大批學生和群眾走上街頭，示威抗議連續不斷。伊朗政局再次進入動蕩不安的前夜。<sup>593</sup>

埃及往右，深化改革開放，原教旨主義復興。伊朗往左，伊斯蘭革命大功告成，還得重新改革開放。傳統與現代，精神與物質，公平與效率，是擺平人類社會的永恆主題。不管怎麼說，用消極出世或者簡單復古，都很難解釋今天年輕人比老年人、有時婦女比男人，更強烈、更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復興。<sup>594</sup> 亨廷頓說得好：“像其他全球宗教復興的表現一樣，伊斯蘭教的復興既是現代化的產物，也是把握現代化的努力。”<sup>595</sup> 張銘說得更好：

伊斯蘭復興運動所具有的能量和感召力來源於整個社會在今天所遭受的重大挫折，來源於廣大民眾的普遍失望和忍無可忍，來源於作為伊斯蘭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的沉重反思。像近現代世界歷史中一切大規模的群眾革命運動一樣，伊斯蘭復興運動所反映的是一個民族或一個文化在轉型時期陷於滅頂之災時發出的抗爭吼聲。<sup>596</sup>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哈桑·班納要求穆斯林“同時具備玄學理性和科學理性的思維方式”。伊本·沙特宣佈：“任何新事



物，祇要和伊斯蘭精神不相抵觸，即使《古蘭經》沒有明文規定，也可以接受”。圖拉比聲稱：安拉沒有創造宗教的固定格式，“每當面臨新的問題時必須革新信仰”。<sup>597</sup> 連本·拉登都不願意被人叫作原教旨主義，專家冠以“新伊斯蘭主義”。<sup>598</sup> “新”在哪裡？——不是簡單復古，而是刻意創新。<sup>599</sup> 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平等原理實現現代化，不是比老牌資本主義更過分的少數富人提前超級現代化，而是廣大人民共同富裕，在科學技術進步日新月異的新世紀，探索超越資本主義的、更文明進步的、新的社會形態。

在公眾的眼裡，原教旨主義經常是指那些拘泥成說、渴望返回和重復過去的人。事實上，在中東幾乎沒有哪個個人和組織與這樣的陳規俗套相吻合。實在的情形是，許多原教旨主義領導人接受過最好的教育，在社會中擔當要職，並熟練地利用最新的技術宣傳他們的主張，創建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這樣一些可行的現代機構。<sup>600</sup>

特別值得反復一提，極端組織大辦濟苦憐貧的慈善互助，專門為窮人排憂解難，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運動的普遍模式。譬如，巴勒斯坦的“哈馬斯”，本來就是扶貧濟困的慈善組織。對外不斷發動自殺式襲擊，對內斥巨資興建醫院學校，不定期向窮人發放食品和救濟金，“包括提供診所、戒毒計劃、青年俱樂部、運動設施及《古蘭經》課程。”<sup>601</sup> 所以，領袖亞辛躊躇滿志地揚言：巴勒斯坦建國後，哈馬斯將通過選票奪取政權。<sup>602</sup> 英國《衛報》報導說：

“哈馬斯”遠非躲在暗處的地下組織，它已深深扎根於加沙社會的多個層面，因而很難消滅它。該組織採取了一種精明的政策，利用宗教和福利事業——日益心力交瘁的巴勒斯坦人對這兩方面的需求越來越迫切——來獲取人們的支持。生活在以色列槍口之下的120萬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生活條件越來越糟。失業率已猛增到70%左右。“哈馬斯”通過福利機構和清真寺向巴勒斯坦人提供當局通常不會提供的醫療保健、教育、食品、衣服和課本。它開辦的幼兒園也非常受歡迎。“哈馬斯”以誠實而聞名，這與巴勒斯坦當局極端的腐敗形成鮮明對比。巴勒斯坦內閣部長們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而“哈馬斯”領導人仍保持著儉樸的生活作風。<sup>603</sup>

因為這個原因，歐盟一再拒絕美國的要求，不同意將哈馬斯列入非法恐怖組織。2003年6月25日，歐盟委員會首席發言人雷約·肯皮寧在華盛頓的西方首腦會議上正式表態說：“不能說哈馬斯完全是一個恐怖組織。這顯然不是我們的立場。”不僅如此，“肯皮寧以該組織開辦診所和學校等社會福利活動為例，暗示資助這些活動的行為是合法的。”<sup>604</sup>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通過廣泛的社會活動來博取民眾的好感，諸如提供醫療幫助、社會福利救濟；建立幼兒園、學校、為大學生提供獎學金、設立研讀《古蘭經》的宗教學校；進行農業技術諮詢、災難救助，甚至在超級市場供給廉價的食品。換一個角度看，他們祇是在履行一個福利國家應該的責任，而這正是伊斯蘭國家結構臃腫、經常出現腐敗行為的官僚體制所無力承擔的。因此，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這個社會的許多人都

希望藉助伊斯蘭教的復興，來最終完成阿拉伯世界進入現代化的跳躍。<sup>493</sup>

蘇聯解體，東歐易幟，冷戰結束，歷史終結，天底下難道還有繼續這種探索的可能性？

#### 註釋：

<sup>493</sup> Mandaville：《伊斯蘭跨國政治》第六章。

<sup>494</sup> 猶太人自稱“上帝的選民”，獨佔唯一而絕對的上帝。伏爾泰批評猶太人：“穆罕默德及其繼承者們的事業在開始時跟猶太人完全一樣，為什麼他們的成就如此巨大，而猶太人的如此渺小？難道不是由於穆斯林極其注意時而使用武力、時而藉助說服的辦法使戰敗者皈依他們的宗教嗎？希伯來人則相反，他們很少使異族人接受其信仰。阿拉伯穆斯林使別的民族加入到自己中來，希伯來人則始終與別人格格不入。……希伯來人厭惡其他民族，總是害怕受人奴役，相反，阿拉伯人要把一切人吸引過來”（伏爾泰：《風俗論》上冊第 296 頁）。以色列立國，佔巴勒斯坦土地，用種族滅絕的恐怖屠殺，先後迫使 230 萬巴勒斯坦人四散流亡（21 世紀研究會：《伊斯蘭的世界地圖》第 72 頁）。交還霸佔的土地和允許巴勒斯坦難民返回家園，是巴勒斯坦和談的兩大主題。然而，直到 2003 年 5 月，沙龍仍在叫囂：以色列不能永遠保留佔領區內的 350 萬巴勒斯坦人（Harvey Morris：“After Jrag, the US wants to show its determination in shaping a new architecture for the Middle East”, *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3 日，第 11 頁）。以色列鷹派歷來主張盡可能驅除乾淨巴勒斯坦人，甚至不惜主張滅絕行動，以建立純種的猶太人國家，而不是多民族的民主國家。這份狹隘胸襟，是以色列復國折騰到現在消停不下來的重要原因（凱倫·阿姆斯壯：《為神而戰》第 485~486 頁）。1952 年，以色列通過《國籍法》，規定祇要在以色列建國前夕事實上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就能取得以色列公民權。但是，“一些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已提出，如果要允許

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一個條件就是必須把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人都遷移到這個新國家裡去。以色列到底是要作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還是要作一個猶太人國家？”（肖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第150、289頁）

<sup>195</sup> 伏爾泰揶揄摩西：“一個 80 老翁，要領導他根本無權領導的整個民族，這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手不能打仗，口不會演說，老態龍鍾，口齒不清。40 年中，他祇是帶領他的追隨者輾轉於可怕的荒漠地帶，他想使他們定居，但一個地方也沒有找到”（伏爾泰：《風俗論》上冊第 165 頁）。

<sup>196</sup> “照理說，一個尚且不能從困難中自救的神，又怎能把人類從苦難中拯救出來呢！”伊斯蘭教既然肯定耶穌的先知地位，不能不替耶穌道行有限、居然被凡人迫害致死而感到羞恥，因此編出說法：“由於當局的過錯，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是耶穌，而是另一個人。而耶穌本人則繼續執行上帝交給他的使命”（克雷維列夫：《宗教史》上卷，第 135 頁；下卷，第 162 頁）。《古蘭經》第 3 章 55 條說：“當時，真主對爾撒（耶穌）說：‘我必定要使你壽終，要把你擢生到我那裡，要為你滌清不遜道者的誣譏，要使信仰你的人，在不信仰你的人之上，直到復活日。’”印度伊斯蘭的阿赫墨底亞派，“還就《古蘭經》關於爾撒（即耶穌）從未被釘死十字架問題做了大量研究和論證並以此反對基督教的傳統說法，它提出，耶穌作為先知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他被人救出後，為逃避迫害，先後旅居波斯、阿富汗、尼泊爾和中國的西藏”（金宜久：《當代伊斯蘭教》第 372 頁）。

<sup>197</sup> “伊斯蘭紀元 14 年征服大馬士革；17 年征服敘利亞的全部及伊拉克；21 年征服波斯；56 年穆斯林達到撒馬爾罕。在西方，伊斯蘭紀元 20 年佔領埃及、馬格里布；至 93 年征服北非，奪取了西班牙”（艾哈邁德·愛敏：《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第 249 頁）。到八世紀上半葉，阿拉伯帝國最終形成，疆域西起大西洋的比斯開灣，東至印度河和中國邊疆，南到尼羅河下游，北達裏海和咸海南緣，統轄亞、非、歐三大洲的廣大地區，比極盛時期的羅馬帝國版圖還要大（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第 51 頁）。751 年，在今哈薩克斯坦南部城市塔拉斯一帶，阿拉伯軍隊大敗唐朝守將高仙芝，進入天山以南，伊斯蘭教在新疆廣泛傳播（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周邊地區民族宗教問題透視》第 48 頁）。伊斯蘭教重點否定導致分裂的多神崇拜，並不要求同樣崇

拜一個上帝的猶太、基督教徒改變信仰。“一律賦予各種基督教信仰同等的法定寬容。”加上伊斯蘭教本來就是猶太教、基督教的繼承，很容易被理解和接受，這是阿拉伯帝國和伊斯蘭教迅速擴張，在中亞波斯人、突厥人、北非黑人中廣泛傳播的重要原因(路易斯：《中東：激蕩在輝煌的歷史中》第 65~95 頁)。

<sup>498</sup> 湯因比：《文明經受著考驗》第 157 頁。

<sup>499</sup> 克雷維列夫：《宗教史》下卷，第 147、178 頁。

<sup>500</sup> 凱倫·阿姆斯壯：《穆罕默德》第 125 頁。對異教徒，《古蘭經》說：“對於宗教，絕無強迫。……我們信仰真主和我們所受的啟示，與易卜拉欣、易司馬儀、易司哈格、葉爾孤白和各支派所受的啟示，與穆薩和爾撒受賜的經典，與眾先知受主所賜的經典：我們對他們中任何一個，都不加以歧視，我們祇歸順真主”(第 2 章 256、136 條)。值得一提的是，伊斯蘭特別優待一脈相承的猶太教和基督教。穆罕默德規定：“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獲得伊斯蘭的保護，每年祇須繳納人丁稅一次。”阿拉伯和平佔領耶路撒冷，與居民達成歸降和約，“其要點是：保證個人生命和財產安全；保證教堂及財產和一切物品的安全；保證禮拜的自由；履行穆斯林納稅的義務”。“正如猶太政治家、學者埃班在《猶太史》中所說：新的穆斯林統治者，給猶太人(也包括基督教徒)以信仰、居住、職業以及無限的自由。猶太人得到了高級行政職位，首先在經濟領域裡贏得了威望。”猶太史學家塞西爾·羅斯在《簡明猶太民族史》中說：“在以後的若干世紀裡，伊斯蘭教的基本寬容政策(更注重實際而不是理論)在猶太歷史上一直是極為重要的因素之一。”一直到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帝國境內的非穆斯林居民根據內部自治制度享有宗教自由”(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第 18-22 頁)。

相比較而言，“基督教的卓越創立者，地位微賤，與世無爭，宣揚要寬宥侮辱自己的行為；然而他那聖潔而溫和的宗教卻由於我們的狂熱而成為最不寬容的宗教，因而也是最野蠻的宗教”(伏爾泰：《風俗論》上冊第 315 頁)。這方面，最有說服力的案例，莫過於猶太人在西班牙的遭遇變化了。“13 世紀初之前，西班牙為回教國家。當時西班牙住有許多猶太人，他們取了阿拉伯式的名字、使用阿拉伯語言，不論是擔任政府高官、學者、醫師、農民、商人或勞工，在社會各階層都非常活躍。然而，大約在西班牙成為基督教國家一世紀之後，亦即 14 世紀時，基督教徒開始迫害在社會上舉足輕重的猶太人。西班牙逼迫

猶太人選擇‘改變宗教或處死’，並掠奪或屠殺他們。此外，為了讓‘隱藏的猶太人’獻身，當局暗中調查是否有人不吃豬肉、遵守斷食日等猶太人習慣，嫌疑者不但會被拷問、沒收財產，還可能被放逐、處死。15世紀末，西班牙徹底天主教化，對所有猶太人發佈驅逐令。此時約有10~20萬名西班牙猶太人離散到歐洲各地”（21世紀研究會編：《民族的世界地圖》第198~199頁）。

<sup>501</sup> 阿拉伯數字原由印度學者首創。774年，印度學者到巴格達講學時傳來，經阿拉伯帝國大數學家花拉子密推廣傳開，被歐洲人當成“阿拉伯數字”（納忠等：《傳承與交融：阿拉伯文化》第279~290頁）。拉丁文正弦“sine”就是阿拉伯文“jayb”的直譯，英文代數（algebra）一詞源於阿拉伯文（al-jabr）。阿拉伯帝國在哲學、天文、物理、醫學、化學與煉金術等方面多有建樹（秦惠彬：《伊斯蘭文明》第400~423頁）。

<sup>502</sup> 王鉞等：《亞歐大陸交流史》。

<sup>503</sup>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1卷第2分冊。“這時阿拉伯語已經公認為研究學術的經典語言，所以凡是用阿拉伯語寫成的東西都是權威的，正如早期（和後來）時代的希臘語著作一樣”（丹尼爾：《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第73頁）。

<sup>504</sup> “從希吉來歷的第二世紀起，阿拉伯人卻在科學和藝術方面，成為歐洲人的老師，儘管他們的信仰似乎是與藝術不相容的”（伏爾泰：《風俗論》上冊第3、297、305~306頁）。

<sup>505</sup> “它的前途也會像其光榮的歷史那樣無限光明”（庫特卜：《伊斯蘭——被誤解了的宗教》第17頁）。西方史學家一頭霧水，怎麼也嚥不下這口氣：“為什麼日爾曼人五世紀入侵羅馬，西歐隨之而來的是長期野蠻、愚昧的‘黑暗時代’，而同樣阿拉伯人於七世紀也是入侵，但這一地區受其影響，各國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有所提高？”（桑德爾斯：《中世紀伊斯蘭文明史》第189頁）

<sup>506</sup> 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同宗閃米特族。世界三大一神教共奉一主，先後繼承，濫觴中東。耶路撒冷是三大宗教的聖城。為此，文明研究嘗滿全球的湯因比，把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統稱“猶太系宗教”（《展望21世紀》）。在描述當今世界上“四個殘留下的文明”時，他把東正教叫作“我們的姐妹文明”；把伊斯蘭叫作基督教的“表姐妹文明”。祇有“印度和遠東社會”，與西方文明沒有親戚關係（湯因比：《文明經受苦考

驗》第 133 頁)。湯因比還指出：穆斯林稱王稱霸的時候，把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當成“聖經的臣民”，給予特殊寬大(《展望 21 世紀》第 174 頁)。早期伊斯蘭，甚至把猶太教和基督教當兄弟。“《古蘭經》裡有時把‘穆斯林’(Muslim)一字通指一切服從安拉的人而言。所以凡順服安拉，服從歷代任何先知，統稱‘穆斯林’(Musulman)。伊伯拉欣(亞伯拉罕)、爾撒(耶穌)、穆罕默德的信徒都稱為穆斯林”(艾哈邁德·愛敏：《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第 76 頁)。

<sup>507</sup> 伊朗革命後，外交部大門口張貼的標語是：“既不要東方，也不要西方，祇要伊斯蘭”。

<sup>508</sup> 庫特卜：《伊斯蘭——被誤解了的宗教》第 111 頁。信仰的力量，不可小覷。當年穆罕默德說過：“即使你們右有太陽、左有月亮保護著朝我而來，我在我的道路上也決不後退”(伏爾泰：《風俗論》上冊第 292 頁)。

<sup>509</sup> “瓦哈比教派的形成拉開了近代原教旨主義運動的序幕，並成為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的思想淵源之一”(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141~142 頁)。沙特統一阿拉伯半島，靠的還是“烏瑪”式的軍屯組織。沙特以伊斯蘭教法立國，利用兩大聖地和石油收入，支持世界各地的伊斯蘭復興運動(王鐵鈺、林松業：《中東國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第 105~110 頁)。“沙特阿拉伯作為一個長期從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實踐的國家一舉成為伊斯蘭世界多少公認的盟主”(張銘：《現代伊斯蘭復興運動》第 155 頁)。所以，有 Davidson 把沙特與伊朗相提並論，稱伊朗是“革命的原教旨主義”，沙特是“非革命的原教旨主義”(Davidson：《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從 1740 年前後，瓦哈卜與酋長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相結合算起，原教旨主義已經奮鬥了兩個多世紀。如果從 1928 年穆斯林兄弟會成立算起，至今有半個多世紀。在美國的幫助下，在阿富汗用十年時間打敗了蘇聯，直接促成蘇聯解體，可以看成是當代伊斯蘭復興的重大勝利。但是，2003 年，阿拉伯的文明中心——巴格達被美軍佔領，至少暫時說明，奇蹟還沒有出現。

<sup>510</sup> 其中一個奇蹟是，清末民初趁勢而起的西北諸馬，都是從伊斯蘭貧民起義演化而來的原教旨主義。馬萬福從沙特阿拉伯取回瓦哈比原教旨主義的真經，被諸馬視為至寶，奉為上賓，在各地回教徒中強行推廣，組成教政軍民學共同體，自成體系，國中之國，獨霸一方，晚清、民國城頭變幻大王旗，屈居中央政府統統奈何不得。直到搞社會

主義的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西北各地回教徒才從諸馬手中得到解放（葛壯：《伊斯蘭教與中國社會》第 227~233、250~263 頁）。

<sup>511</sup> 路易斯說：“這場革命不管是在它的緣起，在它所具有的示範作用，甚至是它最終的結局方面，都可以拿來和法國大革命以及俄國革命相比擬”（路易斯：《中東：激蕩在輝煌的歷史中》第 499 頁）。阿姆斯壯說：“伊斯蘭革命是唯一由 20 世紀意識形態（俄羅斯與中國革命之根源均來自 19 世紀馬克思的觀點）所引發的革命。”“1978~1979 年的伊朗革命，無疑是一道分水嶺。它激勵了全球許多長久以來，早就感到其宗教備受攻擊的穆斯林。霍梅尼的勝利顯示，伊斯蘭並未注定毀滅：它仍足以抗衡強大的世俗力量，並且贏得勝利。同時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卻讓很多西方人滿懷恐怖、沮喪之情。野蠻之風，似已凌駕了啟蒙思潮。對許多堅定的世俗主義者來說，霍梅尼與伊朗，從此將作為所有宗教上的錯誤——甚至邪惡——之典型，而這主要是因為革命暴露了伊朗大眾對於西方，特別是對美國的仇恨”（凱倫·阿姆斯壯：《伊斯蘭》第 241 頁；《為神而戰》第 426 頁）。

<sup>512</sup> 左文華、肖憲：《當代中東國際關係》第 260 頁。

<sup>513</sup> 1956 年第二次中東戰爭，阿拉伯人封鎖了蘇伊士運河，炸毀從伊拉克到地中海的輸油管，使西歐的石油供應減少了 70%。“六·五戰爭”期間，阿拉伯國家正式啟用石油武器，石油產量下降 60%。“十月戰爭”期間，伊拉克把美國公司收歸國有，阿拉伯國家石油減產，並對美國、荷蘭實施禁運（因為荷蘭為美國運輸武器提供方便）。禁運持續了五個月之久。成效是歐共體不得不改變支持以色列的一貫立場（江紅：《為石油而戰》第 11 章）。

<sup>514</sup> Mandaville：《伊斯蘭跨國政治》第 69~79 頁。“ummah（穆斯林社群）和 imam（教長，Imam 則為教主）這兩項阿拉伯詞彙，都是源自 amm（決定而行）這個字根。所以教主就是把民眾帶到一個新方向的楷模，而穆斯林社群亦不僅僅是一群個體的集合，而是以目標為導向、已準備好不斷革命的群體。……‘遷徙’（hijrah）在穆斯林生命經驗裡所據的中央位置，也昭示著他們已隨時準備面對改變，更是讓穆斯林得以和嶄新狀態維持接觸之舉”（凱倫·阿姆斯壯：《為神而戰》第 367~368 頁）。

<sup>515</sup> 穆罕默德從麥加遷徙到的綠洲小鎮原名雅里布斯，後被人們簡稱“麥地那”，意思是“那座城鎮”（路易斯：《中東：激蕩在輝煌的歷史中》第 67 頁）。



- <sup>516</sup> 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周邊地區民族宗教問題透視》第 92 頁。
- <sup>517</sup> Mandaville：《伊斯蘭跨國政治》第 122 頁。“一些英國穆斯林創建了一個由議長和四名副議長（其中包括兩名婦女）組成的「大不列顛穆斯林議會」（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 278 頁）。
- <sup>518</sup> “伊斯蘭國”運動（NOI：Nation of Islam）是美國黑奴解放之後，在種族歧視和貧困潦倒中尋根，認祖歸宗成非洲穆斯林祖先被販賣到美國，所以要在美國重歸伊斯蘭，組成十萬多人的“烏瑪”社團，展開各種互助自救和宗教活動（Smith：《伊斯蘭在美國》第 80~99 頁）。“1960 年，信徒已逾十萬，分佈於美國的 29 個州，清真寺和傳教中心共 69 個”（金宜久：《當代伊斯蘭教》第 374 頁）。60 年代以後，“伊斯蘭國”開始與政府不斷發生暴力衝突。1965 年，領袖馬爾科姆·X 在黑人集會上被槍殺，引發全國各大城市黑人暴動。政府派兩萬正規部隊，才把洛杉磯的武裝衝突鎮壓下去。馬爾科姆·X 領導的黑人穆斯林運動，從互助自救走向“以暴抗暴，以牙還牙”，與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非暴力人權運動相輔相成。1968 年，馬丁·路德·金被暗殺，全國 168 個城鎮發生騷亂。“這場大規模的種族騷亂持續達半年之久”（張福運：《美洲黑奴》第 211~219 頁）。以後的“伊斯蘭國”運動，雖然轉趨溫和，卻一直沒有停止。1995 年在華盛頓召開近百萬人的集會（21 世紀研究會：《伊斯蘭的世界地圖》第 137 頁）。
- <sup>519</sup> 有消息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因貪污腐敗被指責，阿拉法特的個人財富估計有 3~10 億歐元之多（劉志勇：“暴力抗爭兩敗俱傷，經濟合作有利和平”，香港《信報》2003 年 7 月 2 日，第 16 頁）。
- <sup>520</sup> 譬如，伊朗、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等國家根據《古蘭經》教義，禁止商業銀行獲取利息，迫使銀行扮演債務人和教徒之間的中間交易者。“由此相關的程序就變得頗為複雜，即使虔誠的穆斯林也更偏愛傳統的、‘非伊斯蘭式’的銀行業務”（哈拉爾德·米勒：《文明共存》第 186 頁）。譬如，在上土耳其和突尼斯，一夫多妻已是違法。“阿拉伯諸國當中，在立法解放婦女一事上做得最深入的，是伊拉克和南也門，可是這兩個國家，都是由高壓政權所統治。婦女的立法解放在埃及遠遠落後，而埃及卻是阿拉伯社會中在許多方面算是最寬容而開明的”（路易斯：《中東：激蕩在輝煌的歷史中》第 508 頁）。
- <sup>521</sup> 2004 年，老年卡扎菲訪問歐洲認栽談和，女兵衛隊照舊前簇後擁。西方學者承認，卡扎菲在個人生活上，“節制幾近於禁欲主義”（布倫蒂、

萊西特：《卡扎菲傳》第 45 頁）。卡扎菲出國訪問必帶女兵衛隊，“並要求儘量在公開場合多亮相，其目的主要不是為了警衛，真正意圖是為了進行宣傳”，身體力行推動婦女解放、傳達實現伊斯蘭現代化的決心——婦女不僅和男人一樣可以到社會上拋頭露面，而且可以當兵。女兵分別來自利比亞、阿爾及利亞、突尼斯、黎巴嫩、敘利亞、巴勒斯坦等地，都是的黎波里女子軍事學院的學生（時延春：《中東風雲人物》第 144~149 頁）。

<sup>522</sup> 真納說過：“婦女若不能和男子完全平等，一個國家就不能達到光榮的頂峰”（博萊索：《真納傳》第 160 頁）。婦女解放始終是一夫多妻的伊斯蘭國家現代化的大課題。“在古代及中世紀初期，閃族的男性死亡率非常高，因此促成這種多妻制度。在閃族人的眼裡，滿足生物上的需要，幾乎可說是一種道德上的義務。……穆罕默德用多妻制度來平衡兩性間過高的死亡率”（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第 4 卷，第 245~257 頁）。顯而易見，一旦兩性死亡率的差距大幅度降低，一夫多妻制以及涉及婦女貞操的種種歧視性嚴格限制，不再具備過去所有的道德依據。

<sup>523</sup> 男性割禮——包皮環切，是伊斯蘭教講究衛生，從猶太教繼承的重要禮儀。女性割禮是為了降低性欲、保持貞操，切割女孩的性敏感部位。“有的切割整個陰蒂、小陰唇和部分大陰唇；有的切割陰蒂、外陰表皮和小陰唇；最輕的僅切除陰蒂的表皮。”雖然《古蘭經》沒有女性割禮的說法，但是，在埃及、蘇丹、毛里塔尼亞、吉布提、索馬里、坦桑尼亞、肯尼亞、利比里亞、岡比亞等國家仍然流行。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也有。“在埃及女孩一般 7~10 歲就接受割禮，目前有 75% 的女孩子要接受割禮。”1990 年，聯合國消除婦女歧視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專門通過決議，呼籲有關國家採取措施廢除女性割禮。英國、瑞典先後頒佈禁止女性割禮的法律。1996 年 7 月，埃及開始禁止在政府衛生服務機構實行女性割禮（仲躋昆：《阿拉伯：1002 夜》第 555~558 頁；哈瑞森、亨廷頓：《為什麼文化很重要》第 254~256 頁）。張文建在也門瞭解到，在哈達拉毛地區的農村，長期流行少女割禮的陋習，聳人听闻：“這裡的女孩長到五歲，母親請來接生婆，用小刀將女孩的小陰唇割去，並用針將其陰道口縫上，僅留下小便出口。這樣做以防止女孩在青春時期行為不軌，傷風敗俗。……等到女孩長到定婚之日，男方婆母要前來新娘家檢查新娘的陰道口，以確定未來的兒媳是

否是處女”(張文建：《走進阿拉伯》第142~143頁)。另外的說法是：“這項習俗實則起源於非洲，《古蘭經》裡從未提及。伊斯蘭教有四大教法學派，其中三個學派都不曾談及女性行割禮的規定，唯有源自北非的一派提及女性行割禮的規定，而這原本就是當地行之已久的習俗”(凱倫·阿姆斯壯：《穆罕默德》第17~18頁)。習俗之說，似乎有理。愛德華·吉本說：“在蒙昧時代，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埃及人一樣，從不吃豬肉；他們在他們的孩子剛成年時便割去包皮：這一習俗，未經《古蘭經》的指責或教導，不聲不響傳給了他們的後代和外族來歸的教徒”(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下冊第344頁)。伏爾泰顯然贊成習俗說：“至於法定的教規，諸如割禮、濯洗禮、禱告、朝覲麥加，就其實質而言，穆罕默德祇不過是適應業已形成的習俗而已。割包皮早在古代阿拉伯人、埃及人、科爾基德各民族以及希伯來人中便已實行。濯洗禮在東方從來就有，它是淨沽靈魂的象征”(伏爾泰：《風俗論》上冊第312頁)。

<sup>524</sup> 譬如，人民聖戰者組織由反對國王的下級軍官和士兵組成，以紅星、鐮刀和步槍為旗幟，主張馬克思主義與伊斯蘭教義相統一，提出“革命的伊斯蘭”，主張以激烈手段重新分配財富，建立集體農業，整個經濟國有化，反對霍梅尼。1981年6月，該組織用兩枚定時炸彈炸毀伊斯蘭共和黨總部，72名高級領導人被炸死。10月，霍梅尼政府殘酷鎮壓，逮捕七千多人，處決主要領導人在內的五百多人。“接著，伊斯蘭革命衛隊和真主黨鎮壓了伊朗民族陣線、‘為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的馬列主義組織’和‘馬列主義人民敢死隊組織’”(王新中、冀開運：《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第358~360頁)。

<sup>525</sup> 塔利班奪取政權後的口號是，要把阿富汗建成“世界上最純潔的伊斯蘭國家”(王儲國：《與槍口對話》第7頁)。“1998年9月，伊朗與塔利班武裝對峙，除受錯綜複雜的地區形勢影響外，也有教派對立的考慮，擔心塔利班武裝支持伊朗遜尼派反政府的‘人民聖戰組織’”(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73頁)。

<sup>526</sup> 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30~35頁。

<sup>527</sup> 用亨廷頓的話說是：“沒有凝聚力的意識是伊斯蘭虛弱的一個根源，也是它對其他文明構成威脅的根源”(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93頁)。

<sup>528</sup> 譬如，穆斯林國際組織對非伊斯蘭國家內部的伊斯蘭傳教和穆斯林分

裂活動，一貫公開大力支持，包括支持菲律賓的摩洛解放陣線、埃塞俄比亞的厄立特里亞穆斯林、泰國北大年穆斯林、塞浦路斯穆斯林和波黑穆斯林等。穆斯林國家之間互相支持對方的反對派，幾乎成為不團結的慣例。加上大國從中插手，每一個糾紛都有第二層、第三層參與者上下其手（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309~333 頁）。

<sup>29</sup> 1971 年，尼邁里粉碎親蘇共黨的未遂政變後，開始步埃及薩達特的軌道改革開放，以贏得海灣國家的經濟援助。穆斯林兄弟會領袖哈桑·圖拉比領導的原教旨主義復興。1985 年，尼邁里下臺。1989 年，哈桑·巴希爾軍事政變，1991 年全面實行伊斯蘭教法，號稱“非洲霍梅尼”的哈桑·圖拉比出任國民議會議長，全國伊斯蘭陣線大批幹部進入政府，控制政權。在西方眼裡，蘇丹成為繼伊朗革命之後，又一個原教旨主義掌權的國家（楊灝城、朱克柔：《當代中東熱點問題的歷史探索》第 135~167 頁）。“蘇丹是所有類型恐怖份子安全的天堂。”本·拉登到蘇丹，得到哈桑·圖拉比的热情接待。“這兩個激進的原教旨主義者是精神上的夥伴，擁有共同的價值觀，要在世界範圍內進行戰鬥，以建立一個純粹的伊斯蘭哈里發神權國家。這兩個人一天到晚在一起，相互去對方家裡吃飯”（理查德·克拉克：《反擊一切敵人》第 117 頁）。

<sup>30</sup> 沙特的王權和親美政策，令穆斯林激進組織深惡痛絕。沙特每年一度的朝聖，各種抗議示威和群眾騷亂頻繁發生。80 年代，沙特東部省份兩次發生什葉派穆斯林反政府騷亂。1991~1992 年，包括沙特著名宗教領袖在內的所謂“新伊斯蘭主義運動”，向國王遞交 57 人簽名的《請願書》和 107 人簽名的《勸戒備忘錄》，開動宣傳機器大造輿論，掀起反政府浪潮。1994 年，沙特政府將本·拉登驅逐出境，逮捕反政府運動的其他主要領導人（王鐵錚、林松業：《中東國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第 248、274~281 頁）。2003 年 5 月，沙特發生系列恐怖爆炸。不僅當地警方有人參與，而且“三名伊斯蘭知名學者，在警方搜捕恐怖分子無功而還後發出通告，號召凡是穆斯林就有責任保護被警方搜捕的人物”（“炸彈襲擊此起彼伏，美中東政策搖搖欲墜”，香港《信報》2003 年 5 月 21 日，第 8 頁）。2004 年，沙特阿拉伯發生的恐怖襲擊愈演愈烈。

<sup>31</sup> 1993 年，哈馬斯與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分道揚鑣，1994 年開始實施

自殺式恐怖襲擊，成功迫使巴勒斯坦議會通過伊斯蘭法治國的原則。2003年5月，美國提出以巴“和平路線圖”，哈馬斯、伊斯蘭聖戰、阿克沙殉教派、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公開聯合反對（“以巴和平依然渺茫”，香港《信報》2003年6月11日，第8頁）。2004年，以色列境內自殺爆炸天天不斷。

- 532 1989年，眾議院選舉，穆斯林兄弟會在80個席位中奪得23席，並有五名兄弟會議員進入內閣（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叢集》第146頁）。“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穆斯林兄弟會基本控制了約旦議會，迫使侯賽因國王親西方的立場不能不有所收斂”（張銘：《現代伊斯蘭復興運動》第236頁）。2003年6月，約旦第一輪普選。侯賽因國王贏得110個議會席位中的62個，“伊斯蘭主義者贏得22%的選票。”伊斯蘭行動陣線擁有20名議員（Nicolas Pelham：“King's supporters win big majority in Jordanian poll”，*Financial Times* 2003年6月19日，第3頁）。
- 533 黎巴嫩真主黨是伊朗支持的什葉派原教旨主義組織，1988年開始，公開主張建立伊朗式的伊斯蘭共和國。“1992年，真主黨在黎巴嫩的議會選舉中取得極大的成功”（東方曉：《伊斯蘭與冷戰後的世界》第11頁）。有專家估計，真主黨“每年預算經費逾十億美元，比黎巴嫩政府的還要多。”其中50%來自伊朗（藍天問：“真主黨的寡婦”，香港《大公報》2003年10月8日，第B1頁）。
- 534 1976年開始，穆斯林兄弟會走上暴力鬥爭的道路。1982年，在伊拉克和約旦的支持下，兄弟會與政府軍在哈瑪市戰鬥十餘天，政府出動武裝直升飛機、坦克、大炮等重武器，整個城市幾乎被夷為平地，死傷兩萬多人（肖憲：《傳統的回歸》第2頁）。
- 535 “巴林一半以上的居民是什葉派穆斯林，他們感到自己的公民權利被哈利法家族剝奪了。他們為伊朗提供了繁衍恐怖主義的沃土”（理查德·克拉克：《反擊一切敵人》第98頁）。80年代初，巴林兩次什葉派原教旨主義組織政變未遂。1983年，科威特的宣教黨在美國和法國大使館製造爆炸。“近年來，黎巴嫩‘真主黨’對來自沙特、科威特和巴林的伊斯蘭極端分子實行‘真主黨化’培訓，並組建了‘海灣真主黨’，旨在利用其打擊美國在海灣的利益。‘海灣真主黨’從黎巴嫩‘真主黨’那裡獲取大量的武器彈藥，同時，科威特、巴林和卡塔尔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利用合法註冊貿易公司之名，從事洗錢、走私及販毒等非法

活動”(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叢集》第 146、151 頁)。1992 年 10 月，科威特議會的 50 個選舉席位中，伊斯蘭主義者輕取三分之二(東方曉：《伊斯蘭與冷戰後的世界》第 11 頁)。

<sup>536</sup> “利比亞的伊斯蘭運動完全可以構成最明確的和具有最強大的潛在力量的大眾反對派”(範德瓦里：《卡扎菲未完成的使命》，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 109 頁)。《金融時報》分析家分析：“如果摧毀現存政權，取而代之的定是伊斯蘭極端”(Kim Ghattas：“Militant Islam on the rise in secular Syria”，*Financial Times* 2004 年 5 月 11 日，第 7 頁)。

<sup>537</sup> 摩洛哥長期實行君主制，經濟落後，政權腐敗，失業率高達 30%。兩大原教旨主義組織——伊斯蘭團體協會和公正與行善團體日益活躍。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馬格里布三國發生大規模示威遊行。第二次海灣戰爭，摩洛哥數十萬人遊行。2002 年 9 月大選，“伊斯蘭反對派奪得比往年多三倍的議席。”2003 年 5 月，首都發生針對以色列人的連環爆炸，敢死隊員全部來自貧民窟(“炸彈襲擊此起彼伏，美中東政策搖搖欲墜”，香港《信報》2003 年 5 月 21 日，第 8 頁)。

<sup>538</sup> “1984 年和 1987 年，突尼斯國內曾經兩度發生社會大騷亂，大批群眾蜂擁街頭，遊行示威，燒汽車，砸商店，築街壘，並提出了推翻政府的口號。政府不得不宣佈全國處於緊急狀態，實現宵禁，並逮捕了許多原教旨主義者及其領導人”(彭樹智：《阿拉伯國家通史》第 322 頁)。1989 年 4 月，突尼斯舉行全國選舉，儘管政府不允許伊斯蘭傾向運動或復興黨以政黨形式參加選舉，其成員仍然贏得了 17% 的選票，“在一些都市地區高達 40% 的選票”(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 197 頁)。

<sup>539</sup> 成千上萬阿富汗人到伊朗經商、打工。霍梅尼革命成功，阿富汗原教旨主義興起。伊朗輸出革命，支持阿富汗什葉派的“八黨聯盟”。擔心伊斯蘭復興通過阿富汗向中亞五國蔓延，本是蘇聯出兵阿富汗的重要考慮(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叢集》第 430~431 頁)。不曾想，美國直接支持的反蘇聖戰，把這個擔心變本加厲地實現了。美軍打垮了塔利班，卻沒有能力扶持出能夠維持國家正常秩序的新政權。阿富汗政治經濟一團混亂。2003 年 3 月，聯合國禁毒和預防犯罪辦公室的調查報告說：“全球 75% 的毒品和歐洲近 90% 的毒品都來自阿富汗”(“禁毒比反恐更重要”，《人民日報》2003 年 6 月 27 日，第 7 頁)。索羅斯的數據是，軍閥割據下的鴉片貿易佔全國經濟活動的

50%。2002 年，毒品交易所得 25 億美元，外來援助祇有 20 億美元（喬治·索羅斯：《美國霸權泡沫化》第 44 頁）。

- <sup>540</sup> 有消息說，本·拉登每年撥款 2.5 億美元支持獨聯體國家的政治反對派。中亞五國的伊斯蘭極端組織雨後春筍，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空前發展。2001 年春天，在烏茲別克監禁的六千多人中，至少有一半被認為是伊斯蘭革命黨成員。另外還有真主黨、正義黨、伊斯蘭解放黨、“吉哈德”（聖戰）等組織。塔吉克的伊斯蘭復興黨，成立不到兩年就發展到十萬多人。1991 年 9 月，在首都組織遊行，迫使共產黨領導人辭職。10 月迫使政府取消禁止成立宗教政黨的法律。11 月參與總統選舉，伊斯蘭復興黨副主席獲副總理職位。1992 年 5 月，伊斯蘭復興黨發動兩萬人武裝奪權，8 月底佔領總統府，接管政權。後來俄羅斯、烏茲別克等國軍隊的聯合干涉，塔吉克的伊斯蘭復興黨武裝被迫撤出首都，退到阿富汗交界處（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172~173、350~385 頁）。到 1997 年，持續五年多的內戰，造成六萬人喪生，80 萬人無家可歸（陳聯壁等：《中亞民族與宗教問題》第 283 頁）。

- <sup>541</sup> 在巴基斯坦，1977 年，布托的伊斯蘭社會主義倒臺，深受原教旨主義宗師——毛杜迪思想影響的齊亞·哈克，在全國推行“社會伊斯蘭化”運動，大面積實施伊斯蘭法，廢除所有商業銀行的利息，阿拉伯語取代英語作為國家的第一外語，甚至要求政府工作人員不得穿西服、打領帶（肖憲：《傳統的回歸》第 88 頁）。以後，除了短暫的貝·布托政權，軍人掌權與伊斯蘭化相得益彰。1994 年，在與阿富汗交界的馬拉根德發生大規模騷亂，政府派出軍隊穩定局勢。9.11 以後，穆沙拉夫政府協助美國打擊塔利班，極端組織和學生群眾連續遊行示威，對政府親美政策形成巨大壓力。2002 年，政府宣佈取締“正義之軍”等五個長期從事暴力和恐怖活動的宗教組織（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周邊地區民族宗教問題透視》第 191、199 頁）。2002 年 10 月，巴基斯坦原教旨主義色彩濃厚的伊斯蘭宗教政黨聯盟，在大選中異軍突起，成為第三大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第 153 頁）。2003 年 5 月，與阿富汗接壤的兩省領導再次要求實行塔利班式的徹底伊斯蘭化，正面挑戰穆沙拉夫（Farhan Bokhar："Musharraf cautions province's leaders against Islamic hard line", *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11 日，第 6 頁）。“伊斯蘭協會”領導人阿哈邁德說：“國家中存在著政治真空，人民感覺

到了改變的需要，布托和謝里夫都沒有能力管理這個國家。”他認為“舞臺已經為清廉、誠實和有宗教信仰的人搭好了，人民將加入這個運動。”這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政黨顯然已認為，他們上臺執政的時候正在到來(蔡佳禾：《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第193頁)。2004年5月，汽車炸彈炸到幫忙建築港口的中國工程師(“巴基斯坦爆炸汽車彈，三華人工程師亡”，香港《蘋果日報》2004年5月4日，第A28頁)。6月，再有恐怖組織掃射中國築路工人(Victoria Burnett等：“Chinese workers killed in attack on Afghan camp”，*Financial Times* 2004年6月11日，第2頁)。在孟加拉，90年代以來，原教旨主義復興運動興起，組成伊斯蘭大會黨，“全國不時掀起大規模的流血衝突”。校園暴力，全國規模的罷工遊行，包括與印度教徒的暴力衝突愈演愈烈(唐昊、彭沛：《巴基斯坦、孟加拉》第169~224、269~278、231~239頁)。

- <sup>542</sup> 在馬來西亞，儘管從1982年就正式宣佈實行“政府機構伊斯蘭化”(肖憲：《傳統的回歸》第90頁)，馬哈蒂爾仍然非常擔心，在他退休以後，任何政治暗鬥都會導致對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支持(John Burton：“Mahathir issues warning to party”，*Financial Times* 2003年6月20日，第1頁)。印度尼西亞有1.7億穆斯林，是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國家。“70和80年代，伊斯蘭教組織擴展到整個印度尼西亞。到80年代初，最大的一個名叫穆罕默迪亞(Muh-hammadiyah)的擁有六百萬名成員的組織，組成了一個‘世俗國家內部的宗教福利國家’，並通過一個精心建立的包括學校、診所、醫院和大專院校的網絡，為全國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服務”(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13~114頁)。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推翻蘇哈托政權和針對華人的全國性暴力騷亂，顯示出穆斯林對現實的強烈不滿和躁動不安。北部亞齊族穆斯林爭取獨立，為建立亞齊伊斯蘭國家與政府大打出手。26年時間1.2萬人喪生，數十萬人流離失所(“印尼軍管亞齊省清剿武裝叛亂”，香港《信報》2003年5月20日，第8頁)。在菲律賓，1976年成立爭取獨立的摩洛民族解放陣線；1978年以後，從中分裂出更極端的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要求建立伊斯蘭國家。在基地組織的直接支持下，亞洲金融危機以後，三國極端組織大發展，包括製造巴厘島大爆炸的聖戰軍、伊斯蘭教捍衛者陣線、馬來西亞聖戰者組織、伊斯蘭祈禱團等，大規模恐怖活動與日俱增(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叢



焦》第 30~31、179~181 頁)。在泰國，2004 年 4 月，南部伊斯蘭武裝同時襲擊 11 個警察站，政府軍警一口氣殺死 107 人(Amy Kazmin: "Bangkok says 107 'insurgents' shot dead", *Financial Times* 2004 年 4 月 29 日，第 1~2 頁)。

- <sup>543</sup> 伊斯蘭極端組織在塞內加爾、索馬里、衣索比亞、厄立特里亞、吉布提、烏干達、坦桑尼亞、肯尼亞、尼日利亞和南非等國家日益活躍。借著政治民主的實施，塞內加爾、衣索比亞和科摩羅等國的伊斯蘭政黨，已經要求合法化。在索馬里，穆斯林佔全國人口的 99% 以上。索馬里內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獲得很大發展。”在吉布提，穆斯林佔全國人口的 94%。“伊斯蘭極端組織主要受沙特、蘇丹、伊朗、利比亞和巴基斯坦等國伊斯蘭勢力的影響。”在尼日利亞，穆斯林佔全國人口的 47.2%。北方已有八個州實行伊斯蘭的“沙里亞法”，另外 11 個州也試圖效法。在塞內加爾，穆斯林佔全國人口的 90% 以上，從 70 年代開始，原教旨主義復興運動就在本土自發興起。在坦桑尼亞，坦噶尼喀約三分之一的居民信奉伊斯蘭，桑給巴爾 95% 以上是穆斯林。1998 年以來，恐怖爆炸不斷。在南非，穆斯林雖然祇佔全國人口的 2%，極端組織——伊斯蘭統一大會照樣呼籲在南非建立一個伊斯蘭共和國(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196~211 頁)。2003 年 6 月，毛里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剛剛鎮壓懷疑與薩達姆政權有關的伊斯蘭極端組織，接著發生軍事政變，親以色列的政權被推翻(“毛里塔尼亞軍事政變”，香港《信報》2003 年 6 月 9 日，第 8 頁)。

- <sup>544</sup> 奧斯曼帝國一戰慘敗，縮水而成的土耳其痛定思痛。1920 年開始，凱末爾領導世俗化的全面改革，1923 年成立共和國，1928 年修改憲法，徹底實行政教分離。土耳其“被人們譽為中東地區世俗化、現代化的一個樣板。”不曾想，凱末爾帶給國人“自尊、工作、信任”的訓誡，80 年代末以降，變成了“賺錢、欺騙、盜竊！”土耳其武裝部隊參謀長宣佈：“經濟危機的根源就是土耳其極其盛行的腐敗之風。……社會兩極分化日益嚴重，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從而為土耳其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的抬頭創造了條件。……土耳其已經實行了 70 年之久的世俗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1994 年，主張按伊斯蘭教法立國的原教旨主義政黨——繁榮黨，奪得首都安卡拉和伊斯坦布爾市市長，1995 年在土耳其第 20 次大選中成為第一大黨，1991 和 1996 年兩次組閣。儘管軍方明確反對，首都安卡拉市長組織的集會，仍然出現巴

勒斯州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的畫像和標語。1997年2月，軍方出動坦克和裝甲車，上首都大街“軍事演習”，用武裝示威的所謂“軟政變”，迫使繁榮黨政府辭職。土耳其軍方推動民族主義復興，對內鎮壓庫爾德人的民族獨立，對外鼓吹“泛突厥主義運動”，“夢想將土耳其、巴爾干地區、中亞地區乃至東方的突厥民族聯合為一體”，這才暫時蓋住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黃維民：《中東國家通史：土耳其卷》第389~390、335、308~324頁）。但是，認為伊斯蘭復興在土耳其從此偃旗息鼓，顯然不切實際。在重建“關懷、互助和道德生活”的旗幟下，繁榮黨得到廣泛的社會支持，“包括和伊斯蘭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控股公司、商業和工業界、工會、婦女、青年組織，此外，還得到了和傳媒有關的50餘家出版商、45家電臺、19個電視頻道和數百家音像生產供應商的支持”（張銘：《現代伊斯蘭復興運動》第217~219頁）。

<sup>515</sup> 崔之元：“布什原則、西方人文傳統、新保守主義”，《香港傳真》No. 2003~19。

<sup>516</sup> 解傳廣和王紅在《親歷伊拉克》一書中，有許多詳細而形象的描述。

<sup>517</sup> 海灣戰爭期間，伊拉克的國徽，已經加進宗教用語“真主保佑”。薩達姆的兒子烏代宣稱：“計劃宣佈伊拉克為伊斯蘭國家”。薩達姆在伊拉克“恢復了伊斯蘭教法所規定的一些刑罰（如對偷竊者砍手，對臨陣脫逃者割耳，關閉所有娛樂設施，禁止婦女塗脂抹粉等）。電視、廣播、報刊則向民眾反復報道薩達姆每日做五次禮拜，每逢週五去清真寺禮拜，報道他每日每夜研讀《古蘭經》”（金宜久、吳雲貴：《伊斯蘭與國際熱點》第142頁）。

<sup>518</sup> 為了支持霍梅尼給伊朗搗亂，薩達姆曾經接待霍梅尼在伊拉克什葉派教區流亡13年之久。後來，伊拉克什葉派原教旨主義成長壯大，矛頭指向不僅衝著伊朗，而且反抗伊拉克世俗政權，發動政教合一的伊斯蘭革命。為此，薩達姆驅除霍梅尼，展開對國內什葉派原教旨主義復興運動的嚴厲鎮壓，包括逮捕並處死什葉派領袖沙德爾——人稱“伊拉克的霍梅尼”。兩伊開戰前的15個月時間，五千什葉派穆斯林被當局殺害（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第140頁）。如今反抗美軍的聖戰領袖薩德爾，父親和兩個哥哥1999年被薩達姆政權暗殺。薩德爾的伯父是阿邁勒民兵運動創始人，被薩達姆關進監獄。阿邁勒民兵運動是伊朗直接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的前身。2003年6月，薩德爾等伊拉克什葉派領導人正式訪問伊朗（吳鑫：“薩德爾發

難”，《生活週刊》第 17 期，第 52~54 頁）。美《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薩德爾得到伊朗和真主黨的支持”（“誰在支持薩德爾”，《參考消息》2004 年 4 月 9 日，第 1 頁）。

- 549 但是，美軍解放科威特之後，“伊拉克的直昇機毫不留情地屠殺持不同政見者。而美國軍隊卻袖手旁觀。多年以後，什葉派穆斯林將會記住，華盛頓是如何煽動他們揭竿而起，又是如何在他們遭到屠殺時袖手旁觀”（理查德·克拉克：《反擊一切敵人》第 60、103 頁）。
- 550 Charles Clover：“Shia leaders feel heart of the people's anger”，*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7 月 2 日，第 3 頁。
- 551 2003 年 5 月 1 日，布什宣佈伊拉克戰爭勝利，美軍死亡人數 115（James Drummond：“US postwar Iraq deaths exceed those of invasion”，*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10 月 30 日，第 6 頁）。
- 552 許多城市成為美軍不得進入的禁區。“4 月間，由美國政府委託的一項民意調查表明，民眾有 61% 強烈反對阿拉維。此人強硬政策的支柱，由美國訓練和裝備的伊拉克軍隊、國民衛隊和警察即無戰鬥力，又不忠誠。……甚至配合起義軍的活動”（趙景倫：“反恐戰爭三年總結”，香港《信報》2004 年 9 月 15 日，第 16 頁）。
- 553 “亨廷頓：美國永遠打不贏伊拉克人民戰爭”，香港《信報》2004 年 5 月 5 日，第 8 頁。“在伊拉克打了一年多仗的美國第 82 空降師師長斯溫奈克少將承認，儘管從戰術上講美國仍在贏得地面戰鬥的勝利，但整體戰略上卻已處於敗退之中”（陳有為：“伊拉克戰爭還要打多久？”香港《信報》2004 年 5 月 18 日，第 12 頁）。
- 554 阿姆斯特壯對伊朗革命前的描述（凱倫·阿姆斯特壯：《為神而戰》361 頁）。
- 555 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主要反映了對沙特王室政權長期穩定性的擔憂”（理查德·克拉克：《反擊一切敵人》第 238、225 頁）。
- 556 伊拉克是五個 OPEC 發起國之一。1960 年，OPEC 在巴格達成立（江紅：《為石油而戰》第 260~262 頁）。近年來，OPEC 早已沒有當年制裁西方國家、製造石油危機的團結一致。分頭限產，維持油價，本來已經十分困難。美國佔領伊拉克，令產油國奮鬥幾十年的成果毀於一旦。從 70 年代至今，美國產油量下降了 51%。2000 年以來，美國平均每個油井日產油 300 桶，中東是一萬桶！美國產油量佔全球的 4.03%，消耗量佔全球的 30.72%（曹仁超：“投資者日記”，香港《信報》2003 年 5 月 23 日，

第 19 頁)。“據美國能源部一份報告指出，現在伊拉克石油總儲量可能高達 2500 億桶，超過沙特阿拉伯的 2200 億桶”(“撇開聯合國，美國廢油組”，香港《信報》2003 年 5 月 23 日，第 2 頁)。佔領伊拉克，美國在石油控制上的有利地位，大大加強了對歐洲、日本發號施令的籌碼，得罪的是穆斯林產油國，特別是阿拉伯產油國。油價便宜，歐洲、日本同時受益，卻不會高興自己的命運越發攪在美國人手裡。

<sup>557</sup> 伊拉克經受了十多年的石油禁運。本來該伊拉克生產出口的石油額度，多被其它產油國，特別是沙特阿拉伯用光了。美國恢復伊拉克石油生產和出口，馬上打破其它產油國、特別是沙特已經習以為常的利益格局。

<sup>558</sup> “鑒於美國在沙特、科威特長期駐軍，美海軍第五艦隊司令部駐地設在巴林，而且海灣國家政府都堅持親美立場，本·拉登等恐怖組織一直試圖利用這些國家存在的腐敗和貧富差距等激起民眾的憤怒，以贏得廣大穆斯林的支持，趕走美軍，推翻沙特政權，建立伊斯蘭國家”(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158 頁)。

<sup>559</sup> “霍梅尼‘輸出伊斯蘭革命’的首要對象就是海灣六國”(王京烈：《面向 21 世紀的中東》第 255 頁)。他說：“伊斯蘭教根本上就是反對所有關於君主制的觀念的。任何研究過先知建立伊斯蘭政府的方法的人都會看到，伊斯蘭的出現就是要摧毀暴君們的宮殿。君主制度是一種最無恥最不光彩的反動表現形式。”霍梅尼要求伊朗朝覲者把朝覲看作是“伊斯蘭起義”的機會，號召推翻沙特國王(蔡佳禾：《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第 59 頁)。“霍梅尼對沙特和海灣國家政府的譴責更為嚴厲，他把這些國家的政府痛斥為‘非伊斯蘭’的君主制，並輕蔑地把他們與美國的軍事和經濟關係描繪成‘美國的伊斯蘭’”(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 24 頁)。

<sup>560</sup> 佔領伊拉克以後，美國從沙特撤走原有駐軍(“美軍為何撤出沙特”，《北京青年報》2003 年 8 月 29 日，第 A15 頁)。

<sup>561</sup> 90 年代“美國領導的伊拉克戰爭幾乎使產油富國沙特破產，他們花費如此大量的資金資助美國和盟國的行動，隨後又從美國購買大量武器，以致於剩不下多少錢來做別的事，在償還外國投資者的欠款時也被落在後面。”所以，沙特“沒有告訴美國就開始與伊朗對話”(理查德·克拉克：《反擊一切敵人》第 102 頁)。

<sup>562</sup> 2003 年 5 月，沙特王室傳出不得不民主改革的消息。這對鞏固當局的

統治和維持沙特的社會穩定，恐怕不是一個吉祥的預兆(Roula Khalaf: "Saudi royal calls for strong reform message", *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5 月 27 日，第 6 頁)。

<sup>563</sup> 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存在，包括在巴林的第五艦隊司令部、在卡塔爾的中央司令部、在阿曼的空軍基地等，都在海灣國家。

<sup>564</sup> “在美國鷹派們眼中，核(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恐怖，這兩個曾作為美國攻打伊拉克的理由在伊朗身上同樣得到了體現。布什政府中的某些強硬派試圖通過軍事手段結束伊朗政權的‘威脅’。《巴基斯坦論壇報》稱，美國中情局(CIA)正在為伊朗足下一個軍事打擊目標作準備。《華盛頓郵報》報道說，布什政府正面對新保守派越來越大的壓力，要他向伊朗採取更大膽的行動”(吳鑫：“伊朗：神權政治的內憂外患”，《三聯生活週刊》2003 年第 25 期，第 10~11 頁)。早在兩伊戰爭期間，眼看伊拉克可能撐不住，美國就“研究”了兩伊戰爭昇級為‘美國-伊朗’戰爭的問題。”到克林頓時期，“白宮也一直在準備戰爭。”1996 年，“接連發生的一些事情幾乎使討論變成了美伊全面戰爭所必不可少的決定”(理查德·克拉克：《反擊一切敵人》第 39、104~105 頁)。

<sup>565</sup> 理查德·克拉克：《反擊一切敵人》第 236 頁。

<sup>566</sup> 不僅本·拉登，而且奧爾瑪也不是省油燈。在反蘇聖戰中，奧爾瑪驍勇善戰，多次負傷。一次與蘇軍激戰，奧爾瑪眼睛被彈片擊中，當場用手將眼珠挖出。他染滿鮮血的手，在離坎達哈 50 多公里的辛格查清真寺牆上擦拭。“這道鮮血痕跡日後被信徒視為聖物般崇拜”(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 72 頁)。“在阿富汗，美國和它的北約盟友的軍隊祇是控制著一小部分地區”(理查德·克拉克：《反擊一切敵人》第 233 頁)。2003 年 6 月，巴基斯坦的報紙消息說，奧爾瑪組成了十人領導的阿富汗聖戰委員會，協調全國反對外國軍隊和外國背景政府的聖戰。“一個復蘇的塔利班運動從巴基斯坦邊境的遠山在整個南部展開，並向北部蔓延。”嚇得阿富汗總統請來克林頓老婆，向美國和北約呼籲增派部隊(Victoria Burnett 等：“Taliban names Afghan holy war council”；Victoria Burnett：“Afghans' path to democracy strewn with danger”，“Call for more troops in Afghanistan”；*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25 日，第 7 頁；21~22 日，第 5 頁；11 月 28 日，第 2 頁)。“塔利班”是普什圖語，意思是“宗教學生”。重組後改名叫“阿富汗回教運動”，顯然有更加廣泛發動的意思。奧爾瑪說：“我們不認為阿富汗戰爭已經結束

了……(相反的)戰鬥剛剛開始，戰火剛開始燃燒起來。戰火會一直燒到美國白宮，因為那裡是無公正可言、專制稱道的中心點。……致於美國在阿富汗的未來，愿真主保佑，就像(前)蘇聯乃至更早的英國那樣，(他們面對的)將是烈火煉獄和徹底的失敗”(章楊：《美國的戰爭》第49、59、62頁)。

<sup>567</sup> 自從5月1日小布什宣佈美軍在伊拉克的主要戰鬥勝利結束以後，美軍不斷遭到襲擊。美國政府、情報部門和外交人員當時普遍認為，是薩達姆在搗鬼。他們相信祇要抓住了薩達姆，人民就會歡慶解放，伊拉克重建自然和平發展(Mark Huband等：“‘Small groups’ behind Iraqi attacks”; James Pliti等：“Saddam mystery stokes fears over security in Iraq”, *Financial Times* 2003年6月23日，第2頁；7月4日，第6頁)。“外交官們估計，現在伊拉克的失業率可能已高達50%。”社會動盪與經濟蕭條，已成惡性循環(“伊人失業示威演暴力衝突”，香港《信報》2003年10月2日，第8頁)。

<sup>568</sup> 毛杜迪1941年發起建立的“伊斯蘭協會”，在巴基斯坦具有強大的政治勢力。“巴基斯坦先後制定的三部憲法都規定巴是伊斯蘭國家，國民應根據《古蘭經》來安排一切活動”(唐昊、彭沛：《巴基斯坦、孟加拉》第269頁)。“目前，在這個國家裡估計有八千所伊斯蘭學校或學院。這些學校被各派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所控制，他們能從國外得到經濟資助，教育條件好於普通學校。各類伊斯蘭學校現在擁有250~300萬學生。伊斯蘭學校還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許多學生在80年代參加了阿富汗戰爭。近年來他們有的參加了克什米爾地區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有的參加了在巴境內活動的極端主義組織”(蔡佳禾：《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第193頁)。

<sup>569</sup> “在塔利班的士兵中，有20%(約一萬名)是巴基斯坦人”(金宜久：《當代伊斯蘭教》第265頁)。另有說法是，塔利班總兵力構成，60%是阿富汗人，20%是本·拉登手下的阿拉伯人，“巴基斯坦軍隊士兵和宗教學校派遣的學生兵各佔10%”(何平：《阿富汗史》第222頁)。塔利班也稱“神學士”、“學生軍”，是從巴基斯坦境內阿富汗難民營裡產生的武裝集團，大部分骨幹都讀過巴基斯坦的伊斯蘭神學院。“1995年這些位於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伊斯蘭神學院多達1686所，至1997年增至2500所，學生共計20多萬人。由於阿富汗社會沒落衰退且經濟蕭條，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學校得以乘勢興起，在阿富汗風靡一時”。所

以，“一些西方分析家認為，神學士組織其實是無所不在的巴基斯坦情治單位 (ISI) 在幕後操縱的傑作” (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 69~70 頁)。<sup>570</sup> 塔利班“實際上也不過是巴基斯坦化的塔利班，巴基斯坦化了的阿富汗而已。”“阿富汗的‘塔利班’事實上是巴基斯坦扶持的外來政權” (山內昌之：《伊斯蘭極端主義與美國》；平可夫：《美軍反恐戰爭分析》；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 101、304 頁)。<sup>571</sup> “塔利班”奪取政權後，巴基斯坦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繼續同它保持著密切關係。塔利班政權反過來又為巴基斯坦國內的激進分子提供了開展暴力活動和軍事行動訓練基地 (蔡佳禾：《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第 192 頁)。

<sup>570</sup> 根據美情報部門的情報，巴基斯坦核研究與開發的首席科學家 A·Q·汗博士“曾 13 次訪問朝鮮，曾幫助培訓伊朗核科學家，曾在 1998 年幫助伊拉克實驗核武器”。美國《洛杉磯時報》說：“如果國際社會為核擴散列個通緝名單，汗博士肯定名列第一” (“巴基斯坦擔心成為伊拉克”，《環球時報》2003 年 1 月 24 日，第 2 頁)。2004 年 2 月 3 日，與總統穆沙拉夫談話之後，巴基斯坦的“核彈之父”卡迪爾承認把核武器秘密洩漏給伊朗、利比亞和朝鮮，承擔全部責任。三天後，總統穆沙拉夫宣佈赦免卡迪爾 (“巴基斯坦‘核彈之父’承認泄密”；“巴‘核彈之父’獲赦免”；香港《信報》2004 年 2 月 3 日，第 6 頁；2 月 6 日，第 9 頁)。

<sup>571</sup> 1995 年，伊朗、伊拉克、古巴、利比亞、朝鮮、敘利亞被美國列入支持“恐怖主義活動的國家”的名單。“美國官員們還宣稱，巴基斯坦和蘇丹目前正受到嚴密注視，它們可能也會被列入這個名單之中” (曹建、曹軍：《奧薩馬·本拉登》第 3 頁)。2003 年，蘇丹赫然榜上有名。

<sup>572</sup> “瓦傑帕伊的最後一搏”，香港《信報》2003 年 5 月 22 日，第 25 頁。

<sup>573</sup> 2003 年 6 月，穆沙拉夫訪問英國時指出：巴基斯坦位於穆斯林世界的心臟，直接影響中亞和南亞，阿富汗和海灣地區，“是一個擁有 1.4 億人口和核武器的國家。這些要素不能被忽視。……不幸的是，當今世界上的所有政治衝突，無論是科索沃還是波斯尼亞、車臣、巴勒斯坦、克什米爾、伊拉克，都與穆斯林有關。一個不幸的結果是，穆斯林世界的人民已經開始思索，伊斯蘭作為一種宗教被當成了 (打擊) 目標” (Victor Mallet 等：“Musharraf stands up and hopes to be countered”，*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19 日，第 4 頁)。與其他一些國家相比，

巴基斯坦的政治制度不僅具有較強烈的伊斯蘭色彩，而且在相當長時間內，巴基斯坦沒有一種強烈反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政治力量。9.11以後，“穆沙拉夫總統不得不做出重大決定，支持美國決定打擊阿富汗塔利班政權。這一決定不僅意味著巴基斯坦必須切斷與塔利班的聯繫，而且必須壓制國內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激進勢力。西方擔心，這一決定甚至可能‘引發一場伊斯蘭革命’。激進勢力多次舉行全國性的抗議活動，還組織了暴力活動。幾百名激進分子在美國的軍事行動開始後還越界進入阿富汗，表示與阿共同戰鬥到底”（蔡佳禾：《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第194~195頁）。

<sup>574</sup> 2003年5月，安南制定“新聯合國”構想，提出聯合國放棄介入國際軍事安全問題，日後祇管人道主義援助，對美英撤開聯合國，悍然攻打伊拉克，表達出無奈的忿懣（“安南的‘新聯合國’構想及其困境”，香港《信報》2003年5月23日，第13頁）。儘管聯合國本來就是大國政治的擋箭牌、遮羞布，畢竟還有個怎麼“擋”、如何“遮”的爭頭。眼看著聯合國像當年國聯一樣撒手退出，世界就由著你們的興折騰吧。為此，俄國專家認為：“有能力消除危機的祇有頭腦簡單的布什和打算讓殉教者包圍整個地球的本·拉登。這樣的場景早晚會出現。有誰會知道15~20年之後，即當宗教狂擁有核武器之後會發生什麼。……穆斯林領袖和布什代表的是兩個極端，祇有通過相互讓步才能避免”（“俄專家主張布什與拉登和解”，《參考消息》2004年5月11日，第5頁）。

<sup>575</sup> 湯因比：《一個歷史學家的宗教觀》第328頁。

<sup>576</sup> 理查德·克拉克：《反擊一切敵人》第239~240、65頁。事實上，9.11以後，美國馬上打阿富汗，很難說沒有巴基斯坦被原教旨專權的深切擔心。“美國宣佈攻擊阿富汗之時，巴基斯坦政府選擇依附美國。但絕大多數的巴基斯坦國民對美國攻擊同為伊斯蘭國家的阿富汗一事，無不深表反感。而且巴基斯坦人與塔利班大多數都是普什圖人，巴基斯坦甚至組織普什圖義勇軍，自願投身阿富汗戰場。因此，如果能策動巴基斯坦發動政變，則巴國擁有的核子武器便有可能落入塔利班與本·拉登手中。當時據傳有這樣的危險性，情況因而十萬火急”（21世紀研究會：《伊斯蘭的世界地圖》第116頁）。

<sup>577</sup> 唐島：《科技屬於人民》。

<sup>578</sup> Mandaville：《伊斯蘭跨國政治》第124、133、122、134~135、185、132~133頁。



<sup>579</sup> 時延春：《中東風雲人物》第 169 頁。

<sup>580</sup> 劉靖華、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第 224 頁。

<sup>581</sup> 1982 年 10 月，法庭逮捕薩達特的弟弟，成為政府懲辦非法致富三大案件的第一案。1983 年 3 月，薩達特的三個侄子被法庭指責為“埃及的黑手黨”，犯有行賄、徇私、貪污公款、偽造官方文件、威脅和欺詐、在同一城市佔有一套以上住房、黑市交易和逃稅八大罪狀。案件涉及許多政府高官，僅判決書中指名道姓的就有三名現任部長以及國務秘書、前部長、前檢察長、前市長、電訊局董事長等。三天後，兩名現任部長被解職（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 374~375 頁）。

<sup>582</sup> 彭樹智：《阿拉伯國家通史》第 285~288 頁。

<sup>583</sup> 1991 年，西方債權國家願意分三階段免除埃及 50% 的債務，條件是必須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方案。1993 年 7 月，埃及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經濟改革計劃，30 億美元的西方債務得到調免（東方曉：《伊斯蘭與冷戰後的世界》第 103 頁）。

<sup>584</sup> 埃及伊斯蘭運動再度活躍在兩個方面。一是政黨力圖通過議會選舉奪取政權。二是恐怖襲擊昇級，包括 1990 年埃及議長被暗殺，1995 年刺殺穆巴拉克未遂，1997 年槍殺 60 名外國遊客，傷 25 人（彭樹智：《阿拉伯國家通史》第 285~289 頁）。“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控制著埃及 22 個最大專業協會，擁有幾十個診所、醫院和學校，除了拒絕使用武力以外，其目標與其他地下組織的目標是一致的”（東方曉：《伊斯蘭與冷戰後的世界》第 24 頁）。

<sup>585</sup> 陳嘉厚：《現代伊斯蘭主義》第 285 頁。

<sup>586</sup> *The Washington Post*（劉靖華、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第 317 頁）。僅 1992~1994 年初，“伊斯蘭聖戰組織”等製造的恐怖事件，已經造成 1200 人喪生（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叢書》第 145 頁）。英國《衛報》2001 年 10 月 8 日說埃及：原教旨主義者“對軍隊的滲透已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因為穆巴拉克沒能為其政府創建一個廣泛的群眾的基礎，所以沒有任何一支政治力量能與伊斯蘭分子相抗衡”（蔡佳禾：《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第 129 頁）。

<sup>587</sup> 伊朗革命“同財富積累和把財富抓在自己手中的少數人作鬥爭”。加上巴列維“白色革命”已經收歸國有的石油、天然氣、鐵路和漁業，“伊朗

的經濟命脈絕大多數掌握在國營經濟手中”(蔡德貴：《當代伊斯蘭阿拉伯哲學研究》第 213 頁)。

<sup>588</sup> 1980 年 5 月，政府摧毀了德黑蘭的紅燈區，上千名妓女另謀生路(安維華、錢雪梅：《海灣石油新論》第 465 頁)。

<sup>589</sup> 霍梅尼說“音樂和鴉片之間沒有區別”。

<sup>590</sup> “保留下來的大部分出版物平均發行量少於 1500 份，有的祇有 150 份”(王新中、龔開運：《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第 373 頁)。

<sup>591</sup> 譬如，德黑蘭大學原有兩千多名教職員，經過清洗、調離和逃亡，到 1982 年，祇剩四百人。流亡國外兩百多萬伊朗人中，世俗化較深的知識分子佔相當部分，流亡醫生就有兩萬多人，國內祇有 1.5 萬醫生(東方曉：《伊斯蘭與冷戰後的世界》第 141 頁；金宜久：《當代伊斯蘭教》第 214 頁)。

<sup>592</sup> 王新中、龔開運：《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第 350~375、409~414 頁。

<sup>593</sup> 與總統關係密切的改革者 Mostafa Tajzadch 說：“動蕩對伊朗和美國都沒有好處，祇能幫助什葉派原教旨主義在伊朗發展”(Najmeh Bozorgmehr 等：“Opponents of Iranian reform may soften stand”，*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13 日，第 5 頁)。“伊朗一直在指責美國的幕後作用。……美國並不急於擺脫干系。美國對日前伊朗的反政府示威活動表示歡迎，稱支持伊朗人希望享受民主和自由的愿望。國務院發言人鮑徹說：‘我們贊賞伊朗人民，他們使大家注意到了伊朗政府的毀滅性政策給人民帶來了多大的危害’”(吳鑫：“伊朗：神權政治的內憂外患”，《三聯生活週刊》2003 年第 25 期，第 10 頁)。

<sup>594</sup> 發人深省的是，“土耳其學者妮魯發·戈爾就論說披罩紗的女人，往往反而好戰、直言無諱且受過良好教育。在基本教義派人士發動的新攻勢中，很多披罩紗的女人都扮演了積極甚至英勇的角色”(凱倫·阿姆斯特壯：《為神而戰》第 422 頁)。在穆斯林眼裡，西方婦女解放的社會效果，帶來媒體鋪天蓋地的色情宣傳，導致對婦女更加普遍和廣泛的侮辱與歧視。“許多穆斯林婦女覺得遮蓋面紗，象徵著回復到殖民以前的時代，也就是回歸到他們社會還未瓦解並尚未偏離其正確方向之前，但是她們不祇將情勢逆轉，調查顯示，大多數蒙面紗的婦女對於性別等事項抱持先進的觀點”(凱倫·阿姆斯特壯：《伊斯蘭》第 239 頁)。

<sup>595</sup>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118 頁。

<sup>596</sup> 張銘接下來說的是：“希翼這樣的社會運動會具有常規狀態下的‘理性’和‘克制’是不現實的。這樣的社會運動正要通過社會機體的‘非常反應’來清除嚴重危及社會基本生存的異化因素，它是要以眾多社會成員的非理性行為來實現社會基本生存和延續這樣的‘大理性’。儘管這從社會現代化發展的角度來講，是一種完完全全的倒退。從這個出發點看問題，我們會感到，伊斯蘭世界所面臨的挫折和它所做出的拼死抗爭，實際上離我們並不很遙遠”（張銘：《現代伊斯蘭復興運動》第4~5頁）。

<sup>597</sup> 楊灝城、朱克柔：《當代中東熱點問題的歷史探索》第30頁。

<sup>598</sup> 本·拉登是沙特所謂“新伊斯蘭主義者最重要的成員之一”。“新伊斯蘭主義者寧願自稱‘薩拉非因’（Salafiyyin 的阿拉伯語音譯，意譯為‘先賢派’或‘先輩派’），而不願稱之為‘烏蘇利因’（Usuliyyun，即原教旨主義）。故而，新伊斯蘭主義者將其發動的伊斯蘭潮或宗教復興運動稱為‘薩拉非因運動’”（王鐵鐸、林松業：《中東國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第281、275頁）。

<sup>599</sup> 阿姆斯特壯也說：原教旨主義“這個詞彙也往往讓人留下一種印象，以為基本教義派人士本質上即不脫其保守、戀舊的傾向。但基本教義派人士的觀念基本而言，卻是現代的、高度創新的”（凱倫·阿姆斯特壯《為神而戰》第11頁）。

<sup>600</sup> 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6頁。

<sup>601</sup> 凱倫·阿姆斯特壯《為神而戰》第492頁。

<sup>602</sup> 周軼君：“幾乎加沙人都說他‘好’”，《參考消息》2003年6月19日，第12頁。

<sup>603</sup> “‘哈馬斯’在巴人心中威信不減”，《參考消息》2003年6月28日，第3頁。

<sup>604</sup> “美歡迎‘哈馬斯’宣佈停火，歐盟拒絕將其列入恐怖名單”，《參考消息》2003年6月29日，第2頁。在美國和以色列的強大壓力下，歐盟最終不得不將哈馬斯納入恐怖主義黑名單。宣佈的同時，愛爾蘭外長往回找補說，如果哈馬斯接受停火，就應當將其從歐盟的黑名單上除名。法國外長往回找補說，如果歐盟對哈馬斯如此強硬，也應當對以色列發出同樣強硬的和平信號（Judy Dempsey：“EU set to blacklist Hamas groups”，*Financial Times* 2003年9月8日，第2頁）。

<sup>605</sup> 哈拉爾德·米勒：《文明共存》第184頁。

## 第十章

# 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

10.1 否定之否定

10.2 宗教復興的社會啟迪





1990 年，福山縱情歡唱：“我們可能正在目睹……這樣的歷史終結，即人類意識形態的演進的終結點和作為人類最終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sup>606</sup> 十年以後，福山莊嚴重申：“十多年前，我認為我們已經到達‘歷史的終點’：不是說歷史事件將終結，而是被認為是經過不同的政府形式演變發展的人類社會的歷史在現代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中達到了頂點。”<sup>607</sup>

## 10.1 否定之否定

亨廷頓引述高足的“歷史終結”之後，更上了一層樓：“在這個新的世界裡，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危險的衝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衝突，而是屬於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衝突。”<sup>608</sup> 亨廷頓沒有說出來的潛台詞是：如果西方(美國)資本主義代表人類社會進步的最終形式，反美、非美、不美的文明衝突，祇能定義為復古反動。

令人無所適從的是，幾乎所有穆斯林國家的經驗都已經證明，在經濟制度上，越是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由放任的思路改革開放，越是加劇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兩極分化，越是喚起原教旨主義復興；在政治制度上，越是按照福山提倡的美國模式普及自由民主，越是阻擋不住原教旨主義通過窮人大多數的合法選舉篡奪權。

譬如，在“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方面，1984 年 12

月，美國凍結經濟援助，“表達了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迫使蘇丹引進經濟改革立場的支持”。老布什副總統訪問蘇丹，提出解除援助凍結的四項條件，包括“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要求的經濟改革。”“蘇丹政府屈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取消了對食品的補貼，正是一個被證明為政權失當的行動。”1985年4月，尼邁里被軍事政變推翻。<sup>609</sup> 80年代末，阿爾及利亞沙德利政府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導下改革開放。90年代初，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導下改革開放。一系列自由放任的改革開放，都在加劇貧富分化的同時，引起社會動蕩，激發原教旨主義復興。亞洲金融危機中，在印度尼西亞，又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方案，直接促成大規模社會動亂，穆斯林組織走上街頭，蘇加托獨裁政府垮臺。<sup>610</sup>

譬如，在“現代的自由民主制度”方面，“目前中東地區任何的世俗政府都不安地瞭解到如果有真正的民主選舉，則伊斯蘭政府大有可能取得政權。”<sup>611</sup>

民主已成為現代伊斯蘭政治思想和實踐的有機組成部分。……許多伊斯蘭行動主義者已經把議會民主“伊斯蘭化”了，並在反對執政政權的過程中訴求民主。伊斯蘭組織，諸如埃及、約旦的穆斯林兄弟會，巴基斯坦、克什米爾、印度和孟加拉的伊斯蘭教促進會，土耳其的繁榮黨，以及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拯救陣線、突尼斯的復興黨、科威特的改革學會、馬來西亞的穆斯林青年運動和泛馬來伊斯蘭黨，他們都提倡民主選舉原則，並在獲准的地方參加議會選舉。<sup>612</sup>

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拯救陣線、土耳其的繁榮黨、蘇丹的烏瑪黨、塔吉克斯坦的伊斯蘭復興黨，都是通過民主選舉而奪取政權或幾乎奪權。蘇丹的巴希爾、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先政變奪權，全面推動伊斯蘭化以後，再在大選中高票當選。

1989年4月，突尼斯舉行全國選舉，儘管政府對選舉過程嚴加控制，並阻止伊斯蘭傾向運動或復興黨以政黨形式參加選舉，然而，該組織的成員仍然贏得了18%的選票，在一些城鎮地區，這一比例甚至高達40%。……1992年，真主黨在黎巴嫩的議會選舉中取得極大的成功；同年10月，科威特議會的50個選舉席位中，伊斯蘭主義者輕取三分之二。在整個穆斯林世界，以合法的方式參與政治已不是某幾個伊斯蘭組織的政治選擇，埃及和約旦的穆斯林兄弟會、馬來西亞的馬來西亞青年運動和伊斯蘭黨等等，凡是允許參加選舉的國家，伊斯蘭組織和政黨幾乎毫無例外地以合法的途徑融入政治進程。<sup>613</sup>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運動，打破了“現代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終結人類歷史的迷夢。<sup>614</sup>面對無法迴避的普遍現實，2001~2002年，福山在引述座師的“文明衝突”之後，不得不又上了一層樓：

如果我們認識到根本的鬥爭不僅僅是與實際恐怖分子的鬥爭，而是與認為世界就是信徒與非信徒之間的二元鬥爭的極端伊斯蘭主義者的鬥爭，那麼我們談論的就不是一小群孤立的狂熱分子。由於勇於同美國對抗，9月11日以後，本·拉登在整個穆斯林世界獲得了大量的同情，從卡拉奇貧民窟裡的居民



到貝魯特和開羅的專業人士，再到生活在英國和法國的巴基斯坦人和阿爾及利亞人。中東問題專家丹尼爾・派普斯估計，這類激進人口約佔穆斯林世界的 10~15%。

多少人？按 12 億穆斯林算下來，是 1.2~1.8 億。福山想給眾多人口戴上一頂綠帽子——“伊斯蘭~法西斯主義”。<sup>615</sup> 正好和希特勒上臺一樣，也是民主選舉的產物。怎麼辦？不能推廣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了。上層樓又上層樓，螺旋上昇，否定之否定，終結了的歷史還得重新來過，正好也和希特勒完蛋一樣：

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不是因為其內在的道德矛盾而崩潰的，他的消亡是因為德國被炸成了瓦礫堆，而且已被盟軍佔領。本・拉登因成功地襲擊了雙子塔樓而在穆斯林世界大受歡迎。打個比方，如果美軍在廣場的路燈柱上對拉登和他的塔利班保護者施以絞刑，那麼其運動的吸引力會小得多。<sup>616</sup>

真惹急了，哈佛博上一樣殺氣騰騰！可惜是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如今讓“反恐”專家最頭痛的是，“自殺炸彈不可能被常規懲罰嚇住。死刑懲罰對那些準備赴死的人有什麼意義？更嚴厲的法律制裁和國際慣例肯定無效。”<sup>617</sup> 在巴勒斯坦難民營，家人為自己的孩子成為自殺炸彈而自豪，而祝福。“他們不但不怕死，甚至還甘願在攻擊行動中英勇就義。事實上，在執行恐怖行動的過程中，人們還常常發現這些自殺式炸彈手根本不想逃跑，甚至認為在行動中生存下來是很不光彩的。”<sup>618</sup>

比這更麻煩的是，本・拉登還沒抓住，“第二代本・拉登”

走到前臺。<sup>619</sup>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專家羅蘭·賈卡指出：

儘管華盛頓或利雅德視他為恐怖分子、異端分子，然而對於千百萬回教徒而言，他膽敢與美國人、猶太人和腐敗的國王公開作對，成了一個神話人物、一個對抗西方“邪惡”的烈士。在某些清真寺裡（包括法國境內）人們稱他為“義勇的奧薩瑪”，成千上萬的父母為他們的小孩命名為奧薩瑪，某些回教國家的農莊、學校及商店也都以這個名字作為招牌，表示對他的敬重。<sup>620</sup>

因為這份頭痛，2003 年 10 月，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反恐戰爭備忘錄》裡垂頭喪氣。這份人稱“迄今最重要且令人目瞪口呆的官方文件”，等於承認“反恐”戰爭徹底失敗：

我們無法衡量在反恐戰爭是勝利或失敗，因為我們不知道每天捕獲和消滅的恐怖份子的人數，是否超過伊斯蘭學院和激進伊斯蘭教士每天招募和訓練與我們作對的恐怖份子的人數。

要怎樣阻嚇向激進的伊斯蘭學院提供資金的幕後人物，目前的形勢是否顯示我們愈努力就愈落後，是否可以建立一項秘密基金，以誘使伊斯蘭學院不與我們作對。<sup>621</sup>

即便如此，美軍還是比哈佛教授更著急想吊死本·拉登。美國警方抓人，最高懸賞從未超過 200 萬美元。如今懸賞本·拉登的花紅，從 500 萬美金漲到了 2500 萬。<sup>622</sup> 後來連基地組織的三把手——扎卡維的懸賞也漲到 2500 萬美元。<sup>623</sup> 重賞史無前例，不知有多少智勇雙全的蘭博，在掘地三尺，刨本·拉登的祖墳哩。到底難在哪兒了？福山振振有辭，交代得明白：

美國當前所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與一小撮恐怖分子的鬥爭。恐怖分子賴以游泳的伊斯蘭~法西斯主義海洋構成了一種思想挑戰，在某些方面這種挑戰比共產主義的挑戰還要嚴峻。<sup>624</sup>

靠歷史哲學成名的福山肯定聽說過，德國法西斯橫掃歐洲如捲席，終於被盟軍佔領，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共產主義蘇聯傷亡兩千多萬人，從莫斯科一路反攻到柏林。而德國法西斯與世界穆斯林相比，實在算不上“海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當年希特勒是被資本主義加社會主義的世界人民淹死的。二戰以後，不算遭美國中央情報局顛覆的政權和美國政府經濟制裁的國家，僅美國軍隊親手打過的國家(包括直接戰爭和狂轟濫炸)，英國《衛報》專欄作家一口氣數出20多個，包括中國(1945~1946、1950~1953)、朝鮮(1950~1953)、危地馬拉(1954、1967~1969)、印度尼西亞(1958)、古巴(1959~1960)、扎伊爾(1964)、秘魯(1965)、老撾(1964~1973)、越南(1961~1973)、柬埔寨(1969~1970)、格林納達(1983)、利比亞(1986)、薩爾瓦多(80年代)、尼加拉瓜(80年代)、巴拿馬(1989)、伊拉克(1991~2002)、波斯尼亞(1995)、蘇丹(1998)、南斯拉夫(1999)、阿富汗(2001)。<sup>625</sup> 接下來要還整治的名單早開出來了：伊拉克(2003年佔領)、伊朗、敘利亞、朝鮮、利比亞、古巴、蘇丹。<sup>626</sup> 一天也沒閒著，天天恃強凌弱，滿世界欺負過來非弱即小，沒有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就這點兒出息，遠不如當年的德國法西斯。如今，眼看身陷淹死過希特勒的波濤洶湧，又哪裡來得辦法把“海洋”吊死在路燈柱上呢？——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日裔美人福山的《歷史的終結》，恐怕祇能是

日裔美人福山自己的歷史的終結了。

最後再看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作為全書立論的結尾，亨廷頓煞有介事地詳細預言，不久的將來（21世紀初），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帶來對穆斯林國家石油資源無法遏止的渴求，勢必促成儒教~伊斯蘭教結盟。於是乎，“美國、歐洲、俄羅斯和印度展開了一場反對中國、日本和大多數伊斯蘭國家的真正的全球戰爭。”文明衝突的格局一清二楚：“黃禍”加“綠禍”反對西方基督教文明。<sup>627</sup>何謂“大多數伊斯蘭國家”？70年代中期以來，伊斯蘭教在黑非洲迅猛發展，穆斯林人口翻了一番，已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sup>628</sup>印度不僅是非伊斯蘭國家中穆斯林最多的國家，而且是僅次於印度尼西亞的穆斯林人口第二大國家，因為貧富懸殊和種姓制度，伊斯蘭教發展尤其迅猛。<sup>629</sup>暫且不論日本、印度的陣營安排值得商榷，籠而統之望過去，亨廷頓的這場“全球文明之戰”，不能不令人聯想起黑人、黃人、南亞北非南美黃裡透白的多數南方窮人，與少數北方富有白人的衝突；不能不令人聯想起過去殖民地受壓迫、受剝削的廣大人民，反抗一小撮帝國主義列強的鬥爭。

## 10.2 宗教復興的社會啟迪

西方媒體通常製造一種印象，就是將弊端叢生，而且偶有暴力形態的宗教狂熱（稱為“基本教義派”），皆視為是伊斯蘭的現象，但是實情並非如此。基本教義派是一種全球的事實，而且在每一種主要的宗教裡面都會出現，此一現象乃是對現代化

的回應。世上有基本教義派的猶太教、基本教義派的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印度教、基本教義派的佛教、基本教義派的錫克教，甚至基本教義派的儒教。……所有信仰中的基本教義派運動都有共同的特徵，他們表現出對現代試驗的深沉失望與幻滅，而這種現代的試驗尚未實踐自己承諾的所有事情。<sup>630</sup>

恩格斯說過：“宗教一旦形成，總要包含某些傳統的材料，因為在一切意識形態領域內傳統都是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這些材料所發生的變化是由造成這種變化的人們的階級關係即經濟關係引起的。”“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有宗教變遷相伴隨，祇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種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而言。”<sup>631</sup> 歐洲從奴隸制轉入封建社會，伴隨的是天主教會的黑暗統治；從文藝復興步入資本主義，伴隨的是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令人好奇和期待的是，在社會主義迫使資本主義注重公平、資本主義迫使社會主義追求效率的歷史終結之後，全球化信仰危機，危機到不僅所有宗教統統原教旨主義復興了，而且奧姆真理教、法輪功等歪門邪教蔓延橫行。“有宗教變遷相伴隨”的“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轉去哪裡？

湯因比引述托馬斯：

熱望停止了，理解也停止了；

理解停止了，生存也停止了。<sup>632</sup>

## 註釋：

<sup>606</sup> 亨廷頓引述福山的話之後，提出不同意見，以申引出新的文明的衝突：“對和諧的期待得到了廣泛的認同。政治領袖和知識領袖都詳細闡述了類似的觀點。……冷戰結束時的和諧錯覺很快被下述情況所驅散：發生了大量的種族衝突和‘種族清洗’，法律和秩序陷於崩潰，出現了國家之間聯盟和衝突的新模式，新共產主義和新法西斯主義開始復活，宗教原教旨主義得到了加強，俄國結束了同西方關係的‘微笑外交’和‘同意政策’，聯合國和美國沒有能力制止流血的地區衝突，一個正在興起的中國日益自我伸張。在柏林牆倒塌五年之後，世界比冷戰時代的任何時候都更頻繁地聽到‘種族滅絕’一詞。一個和諧世界的範式顯然距離現實太遙遠，它不能對後冷戰世界作有用的指導”（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11~12 頁）。

<sup>607</sup> 福山：“恐怖主義與‘文明衝突’”，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 75 頁。

<sup>608</sup>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7 頁。

<sup>609</sup> 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 116~119 頁。

<sup>610</sup> 粵海金融控股研究部：《香港聯繫匯率保衛戰》第 105~106、163~178 頁。

<sup>611</sup> “例如，在埃及，伊斯蘭就如同 1950 年代納賽爾主義一樣流行。伊斯蘭的服飾乃獨一無二的，而且由於穆巴拉克的政府乃世俗派的，所以此種服飾乃自願穿著。即使世俗派的上土耳其，最近的調查發現，有 7% 的人口自稱是虔誠的，而且 20% 的人每天禱告五次。人們轉為寄望於約旦的穆斯林兄弟會，而巴勒斯坦人則指望穆加瑪 (Mujamah)。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PLO) 在 1960 年代帶有其他組織具有的特點：顯得過於笨重、腐敗而且過時。在中亞共和國，穆斯林在數十年蘇聯壓迫之後，重新找回其宗教”（凱倫·阿姆斯壯：《伊斯蘭》第 251~252 頁）。

<sup>612</sup> 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 288~291 頁。

<sup>613</sup> 東方曉：《伊斯蘭與冷戰後的世界》第 11 頁。

<sup>614</sup> 真納早就說過：“民主是穆斯林的生命。……穆斯林相信博愛、平等和自由”（博萊索：《真納傳》第 211 頁）。

- <sup>615</sup> 無獨有仁。當年納賽爾收回蘇伊士運河，英國首相艾登譴責他是希特勒。後來老布什接著罵薩達姆是納賽爾的繼承人(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92頁)。
- <sup>616</sup> 福山：“恐怖主義與‘文明衝突’”，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80~83頁。
- <sup>617</sup> Martin Wolf：“The frightening flex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Financial Times* 2003年6月4日，第13頁。
- <sup>618</sup> 胡聯合：《當代恐怖主義與對策》第54~56頁。塔利班的戰士時常穿白衣戰鬥。“為什麼穿白衣？一個阿富汗士兵告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記者說：‘塔利班戰士穿的是穆斯林死後待葬的衣著。他們知道，美國轟炸起來，他們必將死無葬身之地，就穿著他們的墳墓來戰鬥。’一個美國國防部官員說，他們不逃跑”(章楊：《美國的戰爭》第69頁)。
- <sup>619</sup> 基地組織1.8萬人，2004年包括西班牙大爆炸，已經不用本·拉登親自出手，都是“第二代本·拉登”直接組織指揮了(“‘第二代本·拉登’走到前臺”，《參考消息》2004年6月5日，第3頁)。
- <sup>620</sup> 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20~21頁。
- <sup>621</sup> “我們是否有必要制定更完善的長遠戰略去對付下一代恐怖份子，目前的行動顯得短視，從代價和效益比率來看我們失算，為了反恐我們付出數以十億計美元，而恐怖份子祇花費數百萬美元，就足以使我們疲於奔命”(“拉姆斯菲爾德自嘆陷伊泥淖”，香港《信報》2003年10月25日，第8頁)。
- <sup>622</sup> 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20頁；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109頁。奧爾瑪的懸賞為一千萬美元(王毓國：《與槍口對話》第47頁)。2003年，薩達姆的懸賞水漲船高，也攀升到2500萬，兩個兒子的懸賞各為1500萬。一網逮住爺仁，獎金5500萬美元(Gareth Smyth等：“Bush puts bounty of \$25m on Saddam”，*Financial Times* 2003年7月4日，第1頁)。2003年7月，美軍擊斃薩達姆的兩個兒子，佔領美軍司令宣稱準備兌現三千萬美元獎金給提供消息的線人(“烏代庫賽慘死疑因籠裡雞作反”，香港《信報》2003年7月24日，第8頁)。有當地人把薩達姆的兩個兒子稱為英雄，因為他們四個人與前來包圍的美軍，包括直昇飛機發射導彈，戰鬥了五個小時之久(Charles Clover：“Locals say brothers fought and died as

heroes”，*Financial Time* 2003 年 7 月 24 日，第 3 頁）。不知道該線人是否拿到獎金，知道的是 2004 年 6 月該線人在大街上被槍手擊斃。

<sup>623</sup> “捉拿扎卡維獎金增至 2500 萬美元”，香港《信報》2004 年 7 月 2 日，第 7 頁。

<sup>624</sup> 福山：“恐怖主義與‘文明衝突’”，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 80-83 頁。

<sup>625</sup> 阿魯恩德哈蒂·傑伊：“打著反恐旗號的恐怖主義”，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 295 頁。

<sup>626</sup> 美國《抗擊恐怖主義國家戰略》第 8 頁（網址：<http://sunio.state.gov>）。

<sup>627</sup>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364 頁（詳見附錄一：“亨廷頓‘黃禍’加‘綠禍’的世界大戰”）。70~85% 的英國人、90% 以上的美國人、80% 的法國人、85% 以上的西班牙人信仰基督教（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390 頁）。

<sup>628</sup> 黑非洲的穆斯林從 70 年代中期的近一億增加到兩億，約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196 頁）。70 年代，尼日利亞總統戈翁、加蓬總統邦文、烏干達總統阿明、中非總統博卡薩，出於各種原因，先後皈依伊斯蘭教（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 194 頁）。

<sup>629</sup>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本來就是因為信仰伊斯蘭教，從印度分離出來的。如今印度境內還有 1.2~1.4 億伊斯蘭教徒，僅次於印度尼西亞（1.7 億）。伊斯蘭教與窮人的親密關係，典型反映在印度上千年的教派衝突上。通過改信伊斯蘭教，一般平民“可以擺脫印度教種姓制度的束縛。……由於印度教社會種姓制度的壓迫，不少低種姓的印度教徒和不可接觸者紛紛改信伊斯蘭教”（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444~445 頁）。“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大量不甘忍受印度教種姓制度壓迫的‘不可接觸者’皈依伊斯蘭教，希望擺脫自己的悲慘命運，而印度教高等種姓則因此把伊斯蘭教等同於‘不可接觸者’，視之為不潔淨而加以鄙視。這些都是造成印伊兩大宗教難以和睦共處的文化心理根源。”印度兩級分化極端嚴重。“據統計，在印度獨立後發展起來的 50 個工業財閥中，沒有一個是穆斯林：在擁有五千萬盧比資產的 2832 個工業資本家中祇有四個是穆斯林”（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周邊地區民族宗教問題透視》第 175 頁）。如今全國近 25% 的人口每天開



銷不到一美元，十億盧比(約合 2100 萬美元)以上的富翁 110 名，堪稱典型(“印度十億富翁逾百”，《新民晚報》2003 年 2 月 2 日)。“如今印度仍有 1.6 億賤民——“不可接觸者”，大部分生活在農村。”2003 年，一些人認為找到了解決辦法。即賤民公開改信佛教和伊斯蘭教。……改變宗教信仰運動使傳統印度教信徒們感到恐慌。五個地區已經通過了一些法律，旨在限制這種行為”(“有誰信，貧賤富貴由天定？”《參考消息》2003 年 6 月 7 日，第 6 頁)。

<sup>630</sup> 凱倫·阿姆斯壯：《伊斯蘭》第 232~233 頁。宗教的原教旨主義復興，從美國福音派新教徒開始。“20 世紀晚期的世界裡，一項非常令人驚訝的發展，就是在所有主要宗教傳統內部，都涌現了一支普遍被喚作‘基本教義派’的虔誠、好戰流派。……這種基本教義派思潮還不僅限於一神教信仰，其他如佛教、印度教甚至儒教信仰當中，我們也都可以發現基本教義派信徒的身影”(凱倫·阿姆斯壯《為神而戰》第 9~10 頁)。

<sup>631</sup> 黑體加重為原文所有(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第 253、231 頁)。

<sup>632</sup> 湯因比：《一個歷史學家的宗教觀》第 13 頁。

## 附錄一

### 亨廷頓“黃禍”加“綠 禍”的世界大戰<sup>633</sup>





最重要的權力增長正在並繼續發生在亞洲文明之中，中國正逐漸變成最有可能在全球影響方面向西方挑戰的國家。

這個政權用蓬勃發展的經濟提供的行為合法性和中國文化獨特性提供的民族主義的合法性，來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的合法性。一位評論家評述說，“天安門事件後的政權熱切地接受把中國的民族主義作為合法性的新源泉”，並有意識地激起反美情緒來為自己的權利和行為辯護。

武器擴散一直是儒教~伊斯蘭教聯繫的最為密切和具體之處。中國在向伊斯蘭國家轉讓常規武器和非常規武器方面起了主要作用，這些轉讓包括：在阿爾及利亞沙漠中建造一座防備嚴密的秘密核反應堆，它表面上是用於研究的，但西方專家們普遍認為它具備生產鈾的能力；向利比亞出售化學武器原料；向沙特阿拉伯提供 CSS-2 中程導彈；向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和北朝鮮提供核技術或原料；向伊拉克提供大量的常規武器。除此之外，北朝鮮在 90 年代初經由伊朗向敘利亞提供了“飛毛腿 C 導彈”，此後又提供了這些導彈的機動發射架。

儒教~伊斯蘭教軍事聯繫的中心環節是以中國和在較小程度上還有北朝鮮為一方，以巴基斯坦和伊朗為另一方之間的關係。1980~1991 年，中國武器的兩個主要接受國是伊朗和巴基斯坦，其次是伊拉克。自 70 年代起，中國和巴基斯坦之間發展了異常密切的軍事關係。1989 年，兩國簽署了在“購買、聯合研製和開發、共同生產、技術轉讓以及通過雙邊協議向第三國出口方面進行合作”的十年諒解備忘錄。1993 年又簽署了一個由中國為巴基斯坦購買武器提供信貸的補充協議。結果中國

成為“巴基斯坦最可靠的和最大的武器供應者，為巴基斯坦提供了幾乎所有種類和用於各軍種的武器”。中國還幫助巴基斯坦建造了生產噴氣式飛機、坦克、裝甲車和導彈的設施。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為巴基斯坦研製自己的核武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幫助：據說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供濃縮用的鈾，為設計導彈提供諮詢，還可能允許巴基斯坦在中國的試驗場上爆炸核裝置。中國此後又向巴基斯坦提供了能夠運載核武器的射程為 300 公里的 M-11 彈道導彈，從而違背了對美國作出的承諾。作為回報，中國從巴基斯坦得到了空中加油技術和毒刺式導彈。

到 90 年代，中國和伊朗之間的武器聯繫也變得緊密起來。在 80 年代的兩伊戰爭中，中國向伊朗提供了其武器的 22%，並在 1989 年成為伊朗最大的武器供應者。中國還對伊朗公開聲明的獲取核武器的努力給予了積極的合作。“中國~伊朗合作協議草案”簽署之後，兩國於 1990 年 1 月達成了一個關於科學合作和軍事技術轉讓的十年諒解協議。1992 年 9 月，拉夫桑賈尼總統在伊朗核專家的陪同下訪問了巴基斯坦，然後去中國簽署了另一個核合作協議。1993 年 2 月，中國同意在伊朗建設兩個 300 兆瓦的核反應堆。在執行這些協議時，中國向伊朗提供了核技術和核情報，幫助伊朗培訓科學家和工程師，並向伊朗提供卡里安管 (calutron) 濃縮裝置。1995 年，在美國的持續壓力下，中國同意“終止”（根據美國的說法），或“中止”（根據中國的說法）出售這兩個 300 兆瓦反應堆。中國還是伊朗導彈和導彈技術的主要供應國，包括 80 年代後期通過北朝鮮提供的蠶式導彈，1994~1995 年提供的“幾十或者幾百個導彈制導系統

和電腦化機械裝置”。中國還許可伊朗生產中國式的地對地導彈。北朝鮮也協助援助，向伊朗運送了飛毛腿導彈，幫助伊朗發展自己的生產設施，1993 年又同意向伊朗提供射程為 600 英里的諾冬 I 型導彈。作為這個三角關係的第三個邊，伊朗和巴基斯坦在核領域中也進行了廣泛的合作。巴基斯坦為伊朗培訓科學家，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國於 1992 年 11 月達成了聯合進行核專案的協議。中國為巴基斯坦和伊朗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提供了廣泛援助，這證明這些國家相互承擔的義務和合作達到了異乎尋常的水平。

這些事態發展和它們對西方利益構成的潛在威脅，使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問題成為西方安全議程的首要問題。

在一年以前的隨意抽樣調查中，當被問及哪個國家對美國來說最危險時，在答案中名列前三位的是伊朗、中國和伊拉克。

中國的崛起對美國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戰。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衝突較之美日衝突範圍更廣泛，包括經濟、人權、西藏、臺灣、南中國海和武器擴散問題。美國和中國幾乎在所有重大政策問題上都沒有共同的目標，兩國的分歧是全面的。……中國不願意接受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或霸權。……中國作為東亞佔主導地位的地區大國的狀況如果繼續下去，將對美國的核心利益構成威脅。

一個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與美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鬆散的西歐聯盟，不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但是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國可能構成這種威脅。在必要時進行戰

爭以阻止中國在東亞的霸權，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如果中國的經濟繼續發展，這可能是 21 世紀初美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唯一最嚴峻的安全問題。

在諸大國中，祇有中國的暴力傾向超過了穆斯林國家；它在 76.9% 的危機中使用了暴力。

## 文明與核心國家：正在形成的聯盟

在冷戰後多極、多文明的世界裡，缺少一個在冷戰期間曾佔主導地位的分界線。然而，只要穆斯林人口增長和亞洲經濟增長的浪潮持續下去，西方與挑戰者文明之間的衝突就將超過其他任何分界線而成為全球政治的中心。穆斯林國家的政府可能對西方變得更為不友好，在穆斯林集團和西方社會之間將出現間歇性的低強度、有時可能是高強度的暴力衝突。以美國為一方和以中國、日本及亞洲其他國家為另一方之間的關係將具有極大的衝突性；如果美國對中國作為亞洲霸權力量的崛起進行挑戰，就可能發生一場大戰。

在這樣的形勢下，儒教~伊斯蘭教國家之間的聯繫將會繼續，或許還會擴大和加深。這一聯繫的中心是穆斯林和華人社會在武器擴散、人權和其他問題上反對西方的合作。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國的密切關係是合作的核心，90 年代初楊尚昆主席對伊朗和巴基斯坦的訪問、拉夫桑賈尼對巴基斯坦和中國的訪問使這一點明朗了。這些舉動“表明了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國之間聯盟胚胎的形成”。在去中國的路上，拉夫桑賈尼在伊斯蘭

堡宣稱，在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間存在“一個戰略聯盟”，對巴基斯坦的攻擊將被視為對伊朗的攻擊。為了加強這一模式，貝娜齊爾·布托在 1993 年 10 月任總理後立即訪問了伊朗和中國。這三個國家之間的合作包括政治、軍事、政府官員定期互訪，以及在各種民用和軍事領域的合作，包括軍工生產合作，加上中國向另兩個國家出售武器。這種關係的發展得到了巴基斯坦對外政策思想中的“獨立”派和“穆斯林”的強有力支持，這些人希望建立一個“德黑蘭~伊斯蘭堡~北京軸心”。在德黑蘭，人們認為，“當代世界的獨特性”要求伊朗、中國、巴基斯坦和哈薩克斯坦進行“緊密和持續的合作”。至 90 年代中期，一個近乎於事實上的聯盟已經在這三個國家中間存在，該聯盟的基礎是反對西方、在安全問題上對印度的關注以及抗衡土耳其和俄羅斯在中亞的影響。

這三個國家能成為涉及到其他穆斯林和亞洲國家的更為廣泛的集團的核心嗎？格雷厄姆·富勒認為：一個非正式的“儒~伊聯盟得以實現，並非因為穆罕默德和孔夫子是反西方的，而是因為這些文化提供了一個能夠表達部分是由西方——一個在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上佔統治地位，並越來越為世界人民所痛恨的西方——造成的痛苦的載體，一些國家感到‘它們沒有必要再忍受’”。最強烈地呼籲這種合作的是卡扎菲，他在 1994 年 3 月宣佈：

新的世界秩序意味著猶太人和基督教徒控制穆斯林，如果他們能夠，隨後他們將控制印度、中國和日本的儒教和其他宗教。



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在說：我們曾決心摧毀共產主義，而西方現在必須摧毀伊斯蘭教和儒教。

現在我們希望看到，以中國為首的儒教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基督教十字軍陣營之間的對抗。我們沒有理由不對十字軍的參加者持有偏見。我們和儒教站在一起，與它結盟，和它在一條國際戰線上並肩作戰，我們將一同消滅我們共同的敵人。

因此，作為穆斯林，我們將支持中國反對我們共同敵人的鬥爭……

我們希望中國取得勝利……

然而，中國方面對反西方的儒教和伊斯蘭教國家聯盟的熱情一直相當低落。江澤民主席 1995 年宣稱，中國不會與任何國家結盟。這個立場或許反映了傳統的中國觀念，作為一個中央帝國，即中心國家，中國不需要正式盟友，而其他國家會發現與中國結盟符合它們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國與西方的衝突意味著它將重視與其他反西方國家的夥伴關係，其中伊斯蘭國家佔最大部分，而且是最有影響的成員。此外，中國石油需求的日益增長可能會驅使它加強與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及哈薩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關係。一位能源專家 1994 年評論道：這樣一個以武器換取石油的軸心，“再也不需要聽從倫敦、巴黎或華盛頓的旨意了”。

## 文明間戰爭與秩序

涉及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國家的全球戰爭很可能不會發生，但不是不可能發生。前面已經提及，這樣的戰爭可能由不同文明集團間的斷層線戰爭昇級而引發，特別是當一方為穆斯林而另一方為非穆斯林之時。如果雄心勃勃的穆斯林核心國家競相為其參戰的宗教親族提供援助，戰爭就更可能昇級。如果第二和第三層次的親緣國家認為不深入地捲入戰爭符合自己的利益，戰爭昇級的可能性就小一些。引發文明間全球戰爭的一個更為危險的因素，就是各文明之間及其核心國家之間均勢的變化。如果這種狀況繼續下去，中國的崛起和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競爭者”的日益自我伸張，就將在 21 世紀初給世界的穩定造成巨大的壓力。中國作為東亞和東南亞支配力量的出現，與歷史已經證明的美國利益相悖。

鑒於美國的利益，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戰爭將如何發展？假設在 2010 年，美國軍隊撤出了已經統一的朝鮮，在日本的駐軍也極大地減少。臺灣和中國大陸已和解，臺灣繼續保持它事實上擁有的大部分獨立，但明確承認北京的宗主權，而且依照 1946 年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模式，在中國的倡議下進入了聯合國。南中國海石油資源的開發進展迅速，大部分區域是在中國的保護之下，而越南控制的一些區域則由美國公司開發。中國因擁有新的兵力投放能力而信心大增，宣佈它將建立對整個南中國海的控制，中國對整個海區一直宣稱擁有主權。越南開始抵抗，中越之間隨之發生海戰。急於雪 1979 年之恥的中國人

入侵了越南，越南求助於美國。中國人警告美國不要插手，日本和亞洲其他國家則驚恐萬狀。美國人表示不能容忍中國對越南的入侵，呼籲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並將少數僅存的航空母艦特混艦隊中的一支派往南中國海。中國譴責美國的行動侵犯了中國的領海，於是對特混艦隊發動空襲。聯合國秘書長和日本首相為推動停火協議所做的努力失敗，戰火蔓延到東亞的其他地區。日本禁止美國使用美軍在日本的基地從事反對中國的活動，美國無視禁令，日本宣佈保持中立並封鎖美軍基地。中國從臺灣和大陸派出的潛艇和陸基飛機重創美軍艦隊和在東亞的軍事設施。與此同時，中國的地面部隊挺進河內，佔領了越南的大片領土。

由於中國和美國都擁有向對方領土發射核彈的能力，因此雙方心照不宣地採取了克制的態度，在戰爭初始階段沒有使用核武器。然而，兩國國內都存在對核襲擊的恐懼，在美國尤為強烈。於是，很多美國人開始發問：為什麼我們要面對這種危險？即使中國控制了整個南中國海、越南甚至整個東南亞，對於我們又會有什麼不同？反戰情緒在美國西南部拉美裔控制的州內最為強烈，那裡的人民和州政府宣佈“這不是我們的戰爭”，並效仿 1812 年戰爭期間新英格蘭的模式，選擇退出戰爭。在中國人鞏固了它在東亞的最初戰果之後，美國的公開輿論開始向日本人在 1942 年時曾希望的那個方向轉變，他們認為：擊敗這個新近宣稱霸權的國家代價太大，還是讓我們滿足於通過談判來結束目前在西太平洋進行的零星戰鬥或“假戰爭”吧。

然而，與此同時，這場戰爭對其他文明的主要國家產生了

影響。印度抓住中國的精力被牽制在東亞的機會，對巴基斯坦發動了致命的攻擊，旨在徹底摧毀該國的核武器和常規軍事力量。印度取得了最初的勝利，但是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國之間的軍事聯盟因此正式建立，伊朗派遣現代化和裝備精良的軍隊前去支援巴基斯坦。與伊朗軍隊和由不同民族集團組成的巴基斯坦遊擊隊作戰的印度陷入了困境。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呼籲阿拉伯國家的支持，印度警告說伊朗可能控制西南亞。但是，中國對抗美國的最初勝利在穆斯林社會中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西方運動，剩下的幾個阿拉伯國家和土耳其的親西方政府一個接一個地被伊斯蘭主義運動推翻。這個運動的主力軍來自穆斯林人口暴增的最後一代青年人。由西方的軟弱而引發的反西方浪潮導致了阿拉伯人對以色列的大舉進攻，對此，已被大大縮編的美國第六艦隊無力制止。

中國和美國都試圖在其他重要國家中尋求支持。由於中國在軍事上得手，日本開始緊張不安地追隨中國，變以前的正式中立立場為親中國的積極中立，隨後又按中國的旨意行事而成為參戰方。日本軍隊佔領了存留下來的日本美軍基地，美國匆忙撤出。美國宣佈對日本實行封鎖，美日艦隊在西太平洋展開了零星戰鬥。戰爭伊始，中國提議與俄羅斯簽署一個共同安全條約（令人隱約地聯想起希特勒-斯大林條約）。然而，中國的戰果對俄羅斯產生了與日本相反的效果。中國贏取勝利和全面控制東亞的前景嚇壞了莫斯科。俄羅斯向反對中國的方向發展，開始向西伯利亞增派軍隊，居住在西伯利亞的無數中國人干預了這些行動。中國進行軍事干預來保護自己的同胞，並佔領了

海參威、黑龍江流域和東西伯利亞的其他重要地區。隨著俄羅斯和中國的戰鬥在中西伯利亞蔓延，在原先被中國置於“保護”之下的蒙古出現了暴動。

控制和獲取石油對於所有參戰方都是至關重要的。日本儘管對核能源進行了巨額投資，但仍然嚴重地依賴於石油進口，這進一步加強了日本順應中國的傾向，以及它確保波斯灣、印度尼西亞南中國海石油渠道暢通的傾向。戰爭期間，隨著阿拉伯國家被伊斯蘭好戰分子所控制，波斯灣對西方石油的供應已減少到杯水車薪，於是西方日益依賴於俄羅斯、高加索和中亞的石油。這導致西方加緊了把俄羅斯納入自己一方的努力，並支持俄羅斯加強對其南面石油蘊藏豐富的穆斯林國家的控制。

與此同時，美國急切地動員歐洲盟國給予全面支持。歐洲國家雖然擴大了對美國的外交和經濟援助，但不情願在軍事上捲入。然而，中國和伊朗擔心西方國家最終會集結起來支持美國，甚至像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最終支持了英國和法國那樣。為了防止這一情況的出現，它們秘密地在波斯尼亞和阿爾及利亞部署中程核導彈，警告歐洲國家不要介入戰爭。除日本外，中國對其他國家的恐嚇幾乎總是產生與中國預期相反的效果，此次亦不例外。美國情報機構發現並報告了這一部署行動，北約理事會聲明必須立即撤出這些導彈。然而，在北約未及採取行動之前，一直想重新扮演反對土耳其的基督教衛士之歷史角色的塞爾維亞，入侵了波斯尼亞。克羅地亞也參加了進去，於是兩個國家佔領和分割了波斯尼亞，繳獲了導彈並繼續進行它們在 90 年代被迫終止的種族清洗。阿爾巴尼亞和土耳

其試圖幫助波斯尼亞人；希臘和保加利亞發動了對土耳其歐洲地區的入侵，土耳其人紛紛逃過博斯普魯斯海峽，伊斯坦布爾市內一片恐慌。同時，阿爾及利亞發射的裝有核彈頭的導彈在馬賽附近爆炸，北約以對北非目標進行毀滅性轟炸來進行報復。

就這樣，美國、歐洲、俄羅斯和印度展開了一場反對中國、日本和大多數伊斯蘭國家的真正的全球戰爭。這樣的戰爭將如何終止呢？雙方都擁有大量的核武器，很明顯，只要對它們的使用超過最低限度，雙方的主要國家都將被嚴重摧毀。如果相互威懾能夠起作用，筋疲力盡的雙方就有可能達成停戰協定，但這並不能解決中國在東亞的霸權這一根本問題。另一種可能是，西方企圖使用常規軍事力量來擊敗中國。然而，由於日本已與中國結盟，日本島便成為中國的防護體，這使得美國無法使用海軍攻擊中國沿海的人口和工業中心。替代辦法便是從西面對付中國。中俄之間的戰鬥促使北約接納俄羅斯為成員國，與它合作抵禦中國對西伯利亞的入侵，並維持俄羅斯對中亞富有石油和天然氣的穆斯林國家的控制，同時還促進藏族、維吾爾族和蒙族人反對中國統治的起義，逐步調動和部署西方和俄羅斯軍隊東進西伯利亞，旨在越過長城向北京、滿洲和漢族中心地帶發起最後的攻擊。

不論這場全球文明之戰的直接後果如何，是在相互核摧毀、雙方都精力耗盡之後通過談判而停戰，還是俄羅斯和西方軍隊最終進入天安門廣場，更大範圍的長期後果幾乎不可避免地是，所有主要參戰方的經濟、人口和軍事權力的急劇下降。

其結果是，幾個世紀來全球權力先是從東向西，然後又反過來從西向東轉移，現在變為從北向南轉移。文明間戰爭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免于參戰的文明。西方、俄羅斯、中國和日本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如果印度逃避了這場劫難，即使它也是參戰方，那也將為印度沿著印度路線重塑世界敞開大門。大批美國公眾指責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精英以其狹隘的西方取向導致了美國的嚴重衰弱。拉美裔領導人通過允諾可從置身戰爭之外的繁榮的拉丁美洲國家得到馬歇爾計劃式的廣泛援助，得以上臺執政。另一方面，非洲不僅對歐洲的重建沒有幫助，被社會動員起來的民眾反而出動掠奪歐洲殘存的財富。在亞洲，既然中國、日本和朝鮮遭到了嚴重的戰爭破壞，權力也向南轉移，在戰爭中保持中立的印度尼西亞成為佔主導地位的國家，並在澳大利亞顧問的指導下，開始對東起新西蘭、西至緬甸和斯里蘭卡、北到越南的事務指手劃腳。所有這一切都預示著，在未來，印度尼西亞將與印度和復興了的中國發生衝突。無論如何，世界政治的中心都在向南轉移。

如果讀者認為這一場景似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離奇幻想，那倒是幸事。還是讓我們希望，不會出現比它更看似可信的其他全球文明間的戰爭場景吧。然而，這一場景最看似可信、因而也最令人擔憂的一點是戰爭的起因：一個文明的核心國家(美國)干預另一個文明的核心國家(中國)與該文明成員國(越南)之間的爭端。對於美國來說，為了維護國際法、抵抗侵略、保衛海洋自由、保證獲取南中國海的石油，以及阻止東亞為一個國家所控制，這樣的干預是必要的。但是對於中國來說，美國的

干預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中國認為，這是西方大國羞辱、恐嚇中國的典型狂妄企圖，是在中國合法的勢力範圍內挑動其他國家反對中國，是否認中國在世界事務中應起的作用。

簡而言之，在即將到來的時代，要避免文明間大戰、各核心國家就應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衝突。但事實是，一些國家，特別是美國，毫無疑問會認為這一點是難以接受的。

#### **註釋：**

<sup>632</sup> 所有文字均摘自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77、106、205~208、238、254、259、291 頁；第九章第 266~268 頁和第 12 章第 361~366 頁。小標題為原文所有。





## 附錄二

### 漂亮的女司機<sup>634</sup>



【博訊 2003 年 2 月 27 日消息】鳳凰台“鏘鏘三人行”的節目裡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

在國內某地，有一個女司機開著一輛滿載乘客的長途客車行馳在盤山公路上。長途客車上三名歹徒居然盯上漂亮的女司機，強迫中巴停下，要帶女司機下車去“玩玩”，女司機情急呼救，全車乘客噤若寒蟬。

只有一中年瘦弱男子應聲奮起，卻被打傷在地。男子氣極，奮起大呼全車人制止暴行，卻無人回應，任憑女司機被拖至山林草叢。半個時辰後，三歹徒與衣衫不整的女司機歸來。車又將行，女司機要被打傷流血的瘦弱男子下車。男子不肯，倔持起來。

“喂，你下車吧，我的車不拉你！”中年男子急了，說：“你這人怎麼不講道理，我想救你還錯嗎？”

“你救我？你救我什麼了？”女司機矢口否認，引得幾個乘客竊笑。中年男子氣極，恨自己身無大俠之力！救人未救成，可也不該得此枉被驅逐下車的結果呀，他堅決不下。“再說我買票了，我有權坐車！”女司機揚起臉無情地說：“不下車，我就不開。”

沒想到的是，滿車剛才還對暴行熟視無睹的乘客們，卻如剛剛睡醒般，齊心協力地勸那男子下車：“你快下去吧，我們還有事呢，耽擱不起！”有幾位力大的乘客甚至想上前拖這中年男子下車，使人想起莫泊桑筆下《羊脂球》裡的情節。

三個歹徒咧著嘴笑，得意地笑了。其中有個黑皮無賴毫不

知恥地說：“哥們把她玩恣了！”另外兩個歹徒也胡言亂語：“她是我對象，關你屁事！”一場爭吵，直到那男子的行李從車窗扔出，他隨後被推搡而下。汽車又平穩地行駛在山路上，女司機掠了一下頭髮，按響了錄音機。車快到山頂，拐過彎去就要下山了，車左側是劈山開的路，右側是百丈懸崖。汽車悄悄地加速了，女司機臉上十分平靜，雙手緊握著方向盤，眼睛裡淌出晶瑩的淚水。

一歹徒似乎覺察到了什麼，說：“慢點開，慢點開，你XXX想幹什麼？”女司機並不說話，車速越來越快。歹徒企圖撲上去搶方向盤，汽車卻像離弦的箭向懸崖沖去……

第二天，當地報紙報道：伏虎山區昨日發生慘禍，一中巴摔下山崖。車上司機和十三名乘客無一生還。半路被趕下車的中年人看到報紙哭了。誰也不知道他哭什麼，為什麼哭……

**註釋：**

<sup>64</sup> 摘自博訊新聞網：<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3/02/200302270141.shtml>。

## 引用及參考書目

21世紀研究會編：《伊斯蘭的世界地圖》，（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4。

21世紀研究會編：《民族的世界地圖》，（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3。

阿諾德·湯因比：《一個歷史學家的宗教觀》，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阿諾德·湯因比：《文明經受著考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

阿布哈桑·阿里·拿德章：《伊斯蘭教與世界》，科威特 Al farsal Press 1989。

艾哈邁德·愛敏：《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商務印書館 1982。

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商務印書館 1997。

愛德華·薩依德：《遮蔽的伊斯蘭——西方媒體眼中的穆斯林世界》，（臺灣）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2。

安維華、錢雪梅主編：《海灣石油新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0。

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Bassam Tibi：《原教旨主義的挑戰：伊斯蘭政治與新世界的動蕩》，*The challenge of fundamentalism: Political Islam and the new world disord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保羅·貝羅克：《城市與經濟發展》，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本·貝拉言論集》，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5。

彼得·柏根：《本·拉登的聖戰工廠》，（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1。

伯納德·路易斯：《中東：激蕩在輝煌的歷史中》，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2000。

伯納德·路易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商務印書館 1982。

布特羅斯·加利：《埃及通往耶路撒冷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布邁丁言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 蔡德貴主編：《當代伊斯蘭阿拉伯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1。
- 蔡佳禾：《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寧夏人民出版社 2003。
- 曹建、曹軍：《奧薩瑪·本拉登——聖戰英雄 or 恐怖大亨》，（臺灣）時英出版社 2001。
- 崔國平、郭瑞芳主編：《21世紀戰爭透析》，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3。
- 陳聯璧、劉庚岑、吳宏偉：《中亞民族與宗教問題》，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2002。
- 陳建民編著：《當代中東》，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2。
- 陳嘉厚主編：《現代伊斯蘭主義》，經濟日報出版社 1998。
- 程光泉主編：《全球化理論譜系》，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 大衛·托馬斯：《猶太人歷史》，大眾文藝出版社 2004。
- 戴維·布倫蒂、安德魯·萊西特：《卡扎菲傳》，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2。
- 「宏、張國傑編著：《百年中國穆斯林》，寧夏人民出版社 2002。
- 迪特馬·羅特蒙特：《殖民統治的結束》，（臺灣）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0。
- 東方曉主編：《伊斯蘭與冷戰後的世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9。
- Fatima Mernissi：《婦女和伊斯蘭：歷史和神學的考查》，*Women and Islam: An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enquiry*, Blackwell 1991。
- 風梳柳編：《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阿富汗》，光明日報出版社 2001。
- 弗蘭西斯·福山：《大分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2。
- 弗蘭西斯·福山：《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海南出版社 2001。
- 弗蘭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遠方出版社 1998。
- 弗里德里希·希爾：《歐洲思想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3。
- 弗爾南·布羅代爾：《文明史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3。
- 伏爾泰：《風俗論——論各民族的精神與風俗以及自查里曼至路易 13

的歷史》，商務印書館 1998。

福阿德·馬塔爾：《薩達姆·侯賽因》，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1。

甘肅省民族研究所編：《伊斯蘭教在中國》，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2。

Gertrude Himmelfarb：《一個國家，兩種文化》，*One nation, two cultures*, Alfred A. Knopf 1999。

葛壯：《伊斯蘭教與中國社會》，（臺灣）東大圖書公司 2002。

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編：《轉變中的福利國家》，重慶出版社 2003。

Gore Vidal：《為永遠和平永遠戰爭》，*Perpetual war for perceptual peace: How we got to be so hated*, Thunder's Mouth Press / Nation Books 2002。

高佩義：《中外城市化比較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 1991。

高惠珠：《阿拉伯的智慧》，（臺灣）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1996。

高鴻志：《英國與中國邊疆危機 1637~1912》，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1998。

郭寶華：《中東國家通史——也門卷》，商務印書館 2004。

哈拉爾德·米勒：《文明共存——對塞繆爾·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批判》，新華出版社 2002。

哈里·亨德森：《全球恐怖主義——完全參考指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哈瑞森、亨廷頓編著：《為什麼文化很重要》，（臺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3。

亨利·基辛格：《白宮歲月》，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3。

何平編著：《阿富汗史：文明的碰撞和融合》，（臺灣）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2003。

賀雄飛編著：《猶太人之迷——一個神奇民族的成果智慧》，時事出版社 1997。

赫伯特·戈特沙爾克：《震撼世界的伊斯蘭教》，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7。

赫克托·博萊索：《巴基斯坦的締造者——真納傳》，商務印書館 1977。

赫爾穆特·麥切爾：《近東與中東危機》，（臺灣）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0。



- 胡聯合：《當代恐怖主義與對策》，東方出版社 2001。
- 黃民興：《中東國家通史：伊拉克卷》，商務印書館 2002。
- 黃維民：《中東國家通史：土耳其卷》，商務印書館 2002。
- 黃振編著：《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
- Jane I. Smith：《伊斯蘭在美國》，*Islam in Americ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江紅：《為石油而戰——美國石油霸權的歷史透視》，東方出版社 2002。
- 金宜久主編：《當代伊斯蘭教》，東方出版社 1995。
- 金宜久主編：《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6。
- 金宜久、吳雲貴：《伊斯蘭與國際熱點》，東方出版社 2002。
- J. J 桑德爾斯：《中世紀伊斯蘭文明史》，（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 2001。
- J. L 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神話還是現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9。
- Jundith Miller、Laurie Mylroie：《薩達姆與波斯灣戰爭》，（香港）中原出版社 1991。
- 卡爾·布羅克爾曼：《伊斯蘭教各民族與國家史》，商務印書館 1985。
- Karim H. Karim：《伊斯蘭禍：媒體與全球暴力》，*Islamic peril: Media and global violence*, Black Rose Books 2000。
- 凱倫·阿姆斯壯：《伊斯蘭》，（臺灣）左岸文化 2003。
- 凱倫·阿姆斯壯：《為神而戰：基本教義派的起源與發展》，（臺灣）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003。
- 凱倫·阿姆斯壯：《穆罕默德——先知的傳記》，（臺灣）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002。
- 藍瑛主編：《非洲社會主義小詞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2。
- Lawrance Davidson：《伊斯蘭原教旨主義》，*Islamic fundamentalism*, Greenwood Press 1998。
- 李爽：《海灣強人薩達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8。
- 李學軍：《薩達姆：沙漠梟雄與他的王國》，（臺灣）廣達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2003。

李春放：《伊朗危機與冷戰的起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李進新：《新疆宗教演變史》，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理查德·尼克松：《領導者》，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7。

理查德·克拉克：《反擊一切敵人——前白宮安全顧問揭露美國反恐戰爭內幕》，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4。

《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劉靖華、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0。

劉天明：《伊斯蘭經濟思想》，寧夏人民出版社 2001。

羅伯遜：《基督教的起源》，三聯書店 1986。

羅蘭·費卡：《本拉登秘密檔案》，（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 1972。

馬繼東主編：《生化武器和秘密戰爭》，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2。

馬堅翻譯：《古蘭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馬大正：《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新疆穩定問題的觀察與思考》，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

馬利章：《走進也門——阿拉伯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3。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 1979。

米壽江、尤佳：《中國伊斯蘭教簡史》，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

米歇爾·阿爾貝爾：《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9。

穆罕默德·庫特卜：《伊斯蘭——被誤解了的宗教》，科威特 Al faisal Press 1989。

穆罕默德·哈塔米：《從城邦世界到世界城市》，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2。

納忠：《阿拉伯通史》，商務印書館 1999。

納忠、朱凱、史希同：《傳承與交融：阿拉伯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 南懷瑾：《原本大學微言》，（臺灣）老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8。
- 潘志平主編：《中亞的民族關係：歷史、現狀與前景》，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 潘光、余建華、王健：《猶太民族復興之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
- 潘光、余建華、崔志鷹、鄧新裕：《猶太之旅》，上海文藝出版社 2002。
- 彭樹智主編：《阿拉伯國家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 彭樹智主編：《伊斯蘭教與中東現代化進程》，西北大學出版社 1997。
- 彭樹智、黃楊文：《中東國家通史：阿富汗卷》，商務印書館 2000。
- Peter Mandaville：《伊斯蘭跨國政治——重新設計烏瑪》，*Trans-national Muslim politics — re-imagining the Umma*, Routledge 2001。
- 喬良、王湘穗：《超限戰——對全球化時代戰爭與戰法的想定》，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1999。
- 喬治·索羅斯：《美國霸權泡沫化——重新思考美國的角色》，（臺灣）聯經出版公司 2004。
- 喬治·索羅斯：《索羅斯論全球化》，（臺灣）聯經出版公司 2002。
- 恰伊姆·赫佐格：《贖罪日戰爭》，解放軍出版社 1984。
- 錢學文：《當代沙特阿拉伯王國社會與文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3。
- 秦惠彬主編：《伊斯蘭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
- 曲洪：《當代中東政治伊斯蘭：觀察與思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1。
- ROMU 國際出版社編著：《閱讀世界紛爭地圖》，（臺灣）世潮出版有限公司 2003。
- Roberto Finzi：《反猶主義》，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4。
- 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 1999。
- Sayed Kotb：《伊斯蘭教的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 in Islam*, Octagon Books 1970。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編譯：《卡扎菲和利比亞》，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蘭教研究室編：《中國伊斯蘭教基礎知識》，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施賓格勒：《西方的沒落》，（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時延春：《中東風雲人物》，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3。

時延春：《鳳凰涅槃中的阿拉法特》，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4。

孫振玉：《傳統與現實——土耳其的伊斯蘭教與穆斯林》，民族出版社 2001。

孫承熙：《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大綱》，昆侖出版社 2001。

孫正達、張暄、蔣加明：《以色列國》，當代世界出版社 1998。

孫壯志：《中亞安全與阿富汗問題》，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3。

唐大盾等：《非洲社會主義：歷史·理論·實踐》，世界知識出版社 1988。

唐昊、彭沛：《巴基斯坦、孟加拉——面對種族和宗教的衝突》，四川人民出版社。

唐曼：《科技屬於人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1。

Tariq Ali：《原教旨主義的衝突：十字軍聖戰和現代性》，*The clash of fundamentalisms：Crusades Jihads and modernity*，Verso 2002。

W．C．丹尼爾：《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

王家瑛：《伊斯蘭宗教哲學史》，民族出版社 2002。

王京烈主編：《面向21世紀的中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9。

王新剛：《中東國家通史：敘利亞和黎巴嫩卷》，商務印書館 2003。

王新中、寬開運：《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商務印書館 2002。

王鈺、李蘭軍、張穩剛：《亞歐大陸交流史》，蘭州大學出版社 2000。

王鐵錚、林松業：《中東國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商務印書館 2000。

王毓國：《與槍口對話——阿富汗採訪紀實》，知識出版社 2002。

- 王小強：《產業重組時不我待》，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8。
- 吳雲貴：《當代伊斯蘭教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 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0。
- 武光誠：《從地圖看歷史》，（臺灣）世潮出版有限公司 2003。
- 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東方出版社 1998。
- 肖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務印書館 2001。
- 肖憲：《當代國際伊斯蘭潮》，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7。
- 肖憲：《傳統的回歸：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4。
- 小約翰·威爾斯：《1688 年的全球史》，海南出版社 2004。
- 解傳廣、王紅：《親歷伊拉克》，新世界出版社 2002。
- 邢東田：《當今世界宗教熱》，華夏出版社 1995。
- 徐亞清：《中亞五國轉型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3。
- 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商務印書館 1997。
- 楊灝城、朱克柔：《當代中東熱點問題的歷史探索——宗教與世俗》，人民出版社 2000。
- 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商務印書館 2002。
- 楊魯萍、林慶春編著：《突尼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
- 殷罡主編：《阿以衝突——問題與出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2002。
- 殷罡、秦海波編著：《薩達姆·侯賽因——注定要震驚世界的人》，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0。
- 余振貴：《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寧夏人民出版社 1996。
- 于力人：《中央情報局50年》，時事出版社 1998。
- 約·阿·克雷維列夫：《宗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4。
- 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為什麼美國不能獨斷專行》，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2。
- 粵海金融控股研究部：《香港聯繫匯率保衛戰》，（香港）青文書屋 1999。

《展望 21 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85。

張承志：《心靈史——揭開哲合忍耶的聖域之謎》，（臺灣）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7。

張銘：《現代伊斯蘭復興運動》，（香港）三聯書店 2002。

張中復：《清代西北回民事變——社會文化適應與民族認同的省思》，（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1。

張文建：《走進阿拉伯》，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3。

張文建：《信主獨一——伊斯蘭教》，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9。

張維秋：《我在伊拉克當大使，1998~2003》，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3。

張俊彥主編：《中東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7。

張錫模：《聖戰與文明：伊斯蘭與世界政治首部曲》，（臺灣）玉山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張芝聯、劉學榮：《世界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 2002。

章楊：《美國的戰爭——從阿富汗到伊拉克》，（臺灣）帝國文化出版社 2003。

趙常慶：《十年巨變：中亞和外高加索》，東方出版社 2003。

仲躋昆等：《阿拉伯：1002 夜》，吉林攝影出版社 2000。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全球變局：美國與伊拉克》，時事出版社 2003。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 2002~2003》，時事出版社 2003。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時事出版社 2002。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編著：《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時事出版社 2001。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時事出版社 2003。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周邊地區民族宗教問題透視》，時事出版社 2002。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當代第三世界透視》，時事出版社 2001。

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編：《伊斯蘭文化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1。

周建明、張曙光：《美國安全解讀》，新華出版社 2002。

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左文華、肖憲：《當代中東國際關係》，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9。

朱蒂·密勒、史蒂芬·英吉伯格、威廉·布洛克：《細菌戰——美國生化武器之秘》，（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2。